



德意日法西斯覆灭记

(上卷)

● 解力夫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前言

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报失最严重的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从1939年全面爆发到1945年德、意、日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历时6年，战火蔓延欧、亚、非三大洲，先后有60多个国家、约占世界4/5的人口卷入战争。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据极不完整的统计，军队和平民的伤亡约在9000万人以上，其中以中国、苏联伤亡的人数为最多。军费消耗为11000多亿美元。多少世纪以来人类在艺术及学术上的成就或遭到了毁灭，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危机析端深刻化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行垂死挣扎的表现。德、意、日这三个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危机，为了扩大势力范围，称霸世界，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的结局与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垮了。经过这次大战的洗礼，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人民革命运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许多受压迫的国家打破了殖民主义的枷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整整50年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战争的创伤早已痊愈，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与残酷景象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薄，人民更加向往和平，向往安定，向往发展；但是，当今的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世界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与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建立国际新秩序，要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1945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本世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团结抗战的胜利，是光明、正义力量的胜利。为了叙述这一斗争的伟大历程，本书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德、意、日法西斯从兴起到覆人的全过程：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及德、意、日法西斯的肆行侵略；西方慕尼黑政策的彻底破产，从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法西斯德国继侵占北欧、西欧后，又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以及日本法西斯冒险南进、偷袭珍珠港，从而导致苏美两大国参战，从而有力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大大加速和强化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

本书还记述了全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大团结，特别是苏联、美国和英国等日领导人运筹帷幄，团结协商，为反法西斯斗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记述了各国军民的英勇抗争，特别是苏联军民在斯大林领导下为扭转战局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记述了各国军民的战略大反攻，德、意、日法西斯在各条战线所遭受的巨大失败，以至最后覆灭的可耻下场。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损害和牺牲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基础之上，不论其借口如何，都是不道德的，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应该作为世界霸权主义的前车之鉴！

本书是作者应世界知识出版社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而

撰写的。愿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发扬光大，愿当今世界消除侵略、
奴役和恐怖，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大地！

解力夫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谨以此书献给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人们。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友好相处，愿在地球上消除侵略、奴役、霸权和压迫，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大地！

德意日法西斯覆灭记

法西斯横行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固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加深。尤其是东西方——德国和日本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德、意、日三国反共同盟的确立，更加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加紧扩军备战，肆行侵略。在西方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希特勒先后侵吞了奥地利和捷克，而且胃口愈来愈大。与此同时，意大利法西斯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罪恶战争，企图建立其“非洲帝国”。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后，1937年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在此情况下，中国军民奋起抗战。战火愈烧愈大。

第一章希特勒玩火

加紧扩军又备战，“和平”高调解孤悬；

武力强夺奥地利，奸谄诡诈行欺骗。

1934年，在德国历史上是多事之秋。就在风云多变的这年夏天，希特勒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在这之前，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的周围。“德意志民族尽管是单一民族，但它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如果不把这些领土统一起来，建立德意志大帝国，就谈不上民族的幸福。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战斗。”希特勒到处这样游说鼓吹，而且他还通过报纸和电台煽动德国民众的战争狂热。

虽说希特勒疯狂已极，但他或多或少还受到老总统兴登堡的约束。1934年8月初，87岁的老总统病危，希特勒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召开内阁会议。经过短暂的讨论，会议很容易地通过了将总统职务移交给希特勒的决定。8月2日兴登堡病逝，内阁立即宣布一项法律，规定“德国总统职务与总理合并为一，因此，帝国总统原有的职权交给帝国总理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从而，希特勒攫取了国家元首兼总理的桂冠，并握有对国防军的最高统帅权。

为防止军队背叛，希特勒要全体官兵对他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9月4日至9月10日，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热烈庆祝希特勒登上权力最高峰，戴上元首兼总理的桂冠。在其党代表会开幕的那一天，希特勒神气活现，像旧日的皇帝那样迈着方步进入旗帜如林的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同时，三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希特勒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代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1000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1000年中，德国没有其他革命！

希特勒窃取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疯狂推行扩军备战的侵略政策。他多次鼓吹对外进行侵略，说“德意志民族自从历史性地进入世界历史以来，就一直处于空间危机之中”，德国“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6200万人，平均136人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德意志民族就不能增殖”。希特勒认为，德国不是一个强国，从领土上看比其他列强要小得多，所以德国必须向外扩张土地。为了寻找扩张的理由，他还极力散布弱肉强食的谬论，说在地球上，不论哪个国家都不曾凭借上帝的赐予而获得尺寸的土地，一个国家的疆域的确定和变更，完全是由人造成的，也就是说必须靠武力去获取！

希特勒主张，要获取土地必须向东方扩张，向苏联和东欧获得“生存空间”，才能消除德国“人口过剩”危机，保障德意志人的生存。“而要推行旨在为我们的德国人民谋取必要土地的东方政策”，对德国来说，发动战争是崇高的事业，是争取生存的最高体现，德国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运用强大军事政权手段的大陆国家。

希特勒的远大目标是征服欧洲，称霸世界；近期的目标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及其对德国军事装备和军事能动性的限制，重新恢复德国在 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领土，武力夺取周边一些国家的领土。目的是建立一个拥有 8000 万至 1 亿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志帝国，以这个帝国为核心，进而建立欧洲及世界霸权。希特勒狂妄地宣称，德国的战争目的“不是几个少数民族，而是几个大陆；不是打败敌人，而是消灭他们；不是结盟，而是要卫星国；不是划一下国界，而是要重新安排整个地球上的国家”！

希特勒深知，要想称霸世界，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为此，必须强化战争经济。从 1934 年起，他把全国经济纳入所谓“总体战争经济体制”，动员国家的经济力量为扩充军备服务。为此，德国成立了各种经济组织，这些组织的负责人由希特勒任命，利用国家的干预达到控制全国经济的目的。1934 年，德国内阁通过《准备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国防会议决定动员 24 万个企业接受战备物资的订货。1935—1938 年共发行 120 亿马克“梅福票”，全部用于军备开支。1933—1934 年度的军备开支为 19 亿马克，约占国家总开支 81 亿马克的 1/4；1936—1937 年度的军备开支为 58 亿马克，占国家总开支 158 亿马克的 1/3 强；1938—1939 年度的军备开支为 184 亿马克，占国家总开支 380 亿马克的 1/2 强。

德国垄断资本家积极支持希特勒的总体战争经济。1933 年 4 月 25 日，军火商克虏伯给希特勒一份备忘录，建议改组工业，为军工生产提供条件。1935 年，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向德国国防部装备委员会呈交一份备忘录，建议“建立一个新的战争经济组织”，以便加速军备生产。在垄断资本家的建议下，1935 年 5 月 21 日，希特勒政府秘密通过了“国家防御法”，成立了“战争经济全体总办”，其宗旨是使全部经济力量为战争服务，委任沙赫特担任这一职位，授予他“指导战争经济工作的全权”。在沙赫特主持下，德国集中财力、物力，疯狂扩充军备，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

总体战争经济改变了德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军事工业恶性膨胀，结果使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畸形发展，人民需要的消费资料的生产大大缩减了，大量金钱投入军事工业及与军事工业有关的产品生产。投入军事工业的投资，平均约占总投资的 50% 以上。

希特勒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中，以“砸烂《凡尔赛和约》的锁链，恢复德国人民的荣誉与自由”、“保卫德国的边界”和“维护和平”等口号来欺骗人民。他侈谈德国人民的“平等权利”，煽动群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情绪，为其侵略扩张服务。正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1937 年 12 月 10 日所讲的：“政治就是一种赌博。历来赌博是怎样赢钱的呢？就是要下大的赌注。这完全和买彩票一样。谁买彩票买得最多，谁中头彩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有人问我们，40 年计划难道不是战争计划吗？我就这样回答：‘是的，是这样的计划！’”希特勒分子就是这样，把德国人民的命运视为多数人受害、少数人获利的彩票赌局。戈培尔野蛮地声称：“只要我们，纳粹政府和后台老板能赢，我们就准备把全体人民去作赌注——战争就是这场赌博的最残酷的结局。”

为了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事限制，早在 1934 年，希特勒就命

“梅福票”是由德国金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的军火工业子公司发行的一种汇票。这种汇票由国家担保，用来支付给军火制造商，可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

令陆军要在同年 10 月 1 日以前，把它的兵力增加两倍，从 10 万人增加到 30 万人。与此同时，还在加紧扩建空军和海军。到 1935 年 2 月 16 日，希特勒公布了一项惊人的法令：实施普遍军役制，并规定和平时期建立 12 个军和 36 个师的军队，大约 50 万人。德国的航空工业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2 年才生产 36 架飞机，到 1935 年已上升到 3183 架了。这样一来，《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军事限制被希特勒彻底打破了。

希特勒扩军备战的步伐是惊人的。1939 年 9 月 1 日他供称：“我致力于德国国防的重建工作已 6 年有余。在此期间，为建军而支出的费用在 900 亿马克以上。”每年平均 151 亿马克。在 1933 年到 1938 年的 6 年中，德国军事预算的开支和军事生产分别增加了 9 倍。军费开支占同期国家预算的 3/5。1939 年，建成位于德国西部边界的长 500 公里，包括 16000 个军事设施的齐格菲防线。1939 年，德国生产了 8295 架飞机。这一年，德国的军火生产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 1 倍。希特勒对大规模扩充军备的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说：“从原则上来说，我不是为了不打仗才建立国防军的。我一向都有打仗的决心。迟早我总要解决这一问题。”

希特勒除了加快军火生产和建立国防军外，还抓紧对青少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政府规定，从 6 岁到 18 岁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之中。从 6 岁到 10 岁，男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所谓学龄团员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见习期。每个少年发给一个表现记录簿，记录他在整个纳粹青年运动中的表现情况，包括他的思想发展状态。满 10 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后，升入“少年队”，并举行如下宣誓：

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们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到 14 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 18 岁，然后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青年团是一个按照类似冲锋队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庞大组织。在这个组织里，行将成人的青年们不仅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军事训练。到 1938 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 772 万。

在政府规定的教育制度下，学生们从小接受法西斯训练，学习军事。学校教育全力灌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法西斯理论。希特勒要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青年。他说：“我需要看到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的、主人气概、不胆怯的、残忍的青年。绝不许他们软弱和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光辉。”“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这位纳粹元首还大放狂言，要用刀剑去征服土地，“谁要胆敢加以阻挠，定要把他撕成碎片”！

为了对青少年进行纳粹军国主义教育，在德国所有学校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废墟，
我们对此毫不在意。
反正我们要一往无前，
国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德国，

而明天我们将拥有整个世界！

面对纳粹德国扩军备战的疯狂行动，法国、英国和国际联盟理事会，除了发出空洞的警告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惩罚行动。然而，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他认定，现在又该来弹弹他那爱好“和平”的调子了，借以麻痹法国、英国和美国，以便乘他们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此外，他还想看看是否能在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大国中间钻个空子，借以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5年5月21日晚上，希特勒特意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动听的“和平”演说。宣称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令人极端憎恶的，德国所希求的只是在对大家公正的基础上的和平谅解。他说：“过去300年中，欧洲大陆上所流的血，跟这些事件对各国所产生的后果，颇不相称。到头来法国仍旧是法国，德国仍旧是德国，波兰仍旧是波兰，而意大利仍旧是意大利。帝王的野心、政治欲望、爱国偏见，造成了大量流血……如果这些国家仅仅把它们牺牲的一小部分用在比较明智的目的上，成就无疑会更大而且更永久。”

希特勒反复宣称，德国没有领土野心，德国已和波兰缔结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我们要无条件地信守这个协定，我们承认波兰是一个伟大的而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国土”。至于奥地利，希特勒说，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更不想并吞奥地利或者把它合并。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希特勒在演讲结束时还讲了一段冠冕堂皇的话：“不论是准，要在欧洲点起战火，除了混乱外不能希望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的将是西方的复兴，而不是西方的衰亡。德国可能对这项伟大的工作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希望和不可动摇的信念。”

多么滑稽啊！希特勒的和平宣传效果发生“积极效应”。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欣喜若狂，并为此发表评论说：“这篇演说结果证明是合理的、直爽的和全面的。凡是本着公正态度来看这篇演说的人，谁也不能怀疑，希特勒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完全构成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德国，来代替16年前强迫它接受和平的战败的德国。”

法国政界的一些显要人物们也在为希特勒大唱赞歌，他们认为这篇演说“是一篇诚挚而经过周密考虑的由衷之言”。并以此对戴高乐等人加强国防的建议大加谴责，说什么“何必庸人自扰！你看人家希特勒不是一再声明不要战争而渴望和平吗？我们实在不应再搞劳民伤财的备战了”！

但是，就在希特勒发表了这篇动人的“和平”演说九个月之后。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命令三营国防军，以奇袭行动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两个小时后，希特勒在国会宣布，由于法国和俄国签订了互助协定，洛迦诺公约已经失效。德国人民为了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

参见希特勒言论集《我的新秩序》，333—334页。

1925年，德、比、法、英、意5国在洛迦诺签订《莱茵保安公约》。规定莱茵区实行非军事化。宣称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实际上是英法企图固定战后德国西部边界，把德帝国主义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

主权！这时 600 名议员，像机器人一样倏地站起来，右臂向上伸出作纳粹式敬礼，口中高呼“万岁”！

希特勒进占莱茵兰的这一冒险行动，却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首脑勃洛姆堡在约德尔和大多数高级军官的支持下，要求撤回已经越过莱茵河的三营军队。正如约德尔在纽伦堡作证时所说的：“以我们当时的处境来说，法国的掩护部队本来是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的。”但是，希特勒相信法国人不会进军，断然拒绝了态度动摇的总司令部的一切撤退的建议。即使这样，希特勒的心里也是敲小鼓的。他私下对施密特博士说：“进军莱茵兰以后的 48 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点点军事力量，即使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但在一些动摇不定的将军们面前，希特勒却夸口说：“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当德国的领导人，会发生什么情况？随便你们怎么说，他都会吓破胆的，我不得不说谎，但是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

的确，希特勒此举，不仅得到了犹豫不定的法国人的帮助，而且还得到法国的因循苟安的英国盟友的帮助。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艾蒂尔·佛兰亭 3 月 11 日飞往伦敦，请求英国政府支持法国在莱茵兰采取军事上的对抗行动。他的请求被婉言拒绝。英国不愿冒引起战争的危险，虽然盟国对德国占有压倒的军事优势。然而，根据洛迦诺公约的规定，法国是有权对德军进入这个非军事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而且根据这个条约，英国是有义务以它自己的武装部队来支持法国的。没有结果的伦敦会谈，向希特勒证实，他最近的军事冒险又侥幸得逞了。

希特勒在莱茵兰的冒险成功，其重要性超过了当时所能想象的程度。在国内，这个胜利加强了声他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过去德国统治者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这个胜利确定了他凌驾于他的将领们之上的地位和权威，因为他们曾在一个成败的关键时刻踌躇动摇，而他却保持着坚定。这个胜利告诉他们，在对于外交关系和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比他们来得高明。他们曾经担心法国会作战，希特勒则判断法国不会出兵。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占领莱茵兰，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为希特勒日后在欧洲寻找侵略的新机会打开了道路。因为欧洲不但由于三营德军跨越莱茵河桥而吓破了胆，而且它的战略形势也因此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对法国来说，这是未日的开始。关于这一点，戴高乐早就预料到了。首先，法国在东方的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突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不愿用战斗来反对德国侵略，以维护法国政府自己曾费了很大的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东方盟国开始了解到，即使法国不是那么因循苟安，由于德国拚命地在法德边界后面建筑一道西壁防线，法国也很快就会无法给予它们很多援助。它们知道，这条堡垒防线的建立，很快就会改变欧洲的战略形势而对它们不利。法国有 100 个师，尚且不敢去击退 3 营德军，那么在德国军队攻击东方时，它们就更难指望法国愿意让它的青年人流血牺牲来袭击难以攻破的德国工事了。

在希特勒出兵占领莱茵兰不久，1936 年 5 月 5 日，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开进阿比西尼亚（今为埃塞俄比亚，下同）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7 月 4 日国际联盟正式屈服，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两星期后，7 月 16 日，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了军事反叛，内战爆发。这件事使得法国的边界上有了第三个不

友好的法西斯国家。10月25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一个秘密议定书，规定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外交方面的共同政策。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一手打破了《凡尔赛和约》的桎梏，靠了虚声恫吓而占领了莱茵兰，而且完全打破了最初的孤立状态，现在已有了墨索里尼和佛朗哥作为忠实的盟友，又使波兰脱离了法国的影响。希特勒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这些成就，进一步刺激了他的侵略胃口，他决心用武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希特勒发狂地叫嚷：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要获得1200万德国人！

10年前，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已经说过，德国必须在东方有生存空间，必须用武力取得它。不过，那时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鼓动者。现在，他是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他命令最高统帅部和外交部具体谋划进攻的日期和准备工作。为了便于推行他的侵略扩张计划，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现在又亲自接管了勃洛姆堡总司令的职务，并取消原来的战争部，新设了武装部最高统帅部。陆海空三军都隶属其下，由希特勒直接指挥。他要向他的祖国——奥地利开刀了。

早在1934年7月25日，也就是希特勒夺权一年半以后，他指示在维也纳的纳粹匪徒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如今，事隔四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纳粹德国羽毛丰满，德意修好结盟，英法进一步暴露了当权者眼光短浅、软弱无能的真面目。希特勒认为，现在实现侵占奥地利的“奥托”计划是十拿九稳的了。经过和他的同僚们谋划，他决定先把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施尼格博士骗到伯希特斯加登会谈，胁迫他写卖身契，宣布德奥合并，放弃奥地利独立，否则就大兵压境，用武力取之。

许施尼格在他撰写的《奥地利安魂弥撒》这本书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谈的经过。双方曾进行了如下的对话：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间你们边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虚张声势的东西都将完蛋。你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以上吗？谁知道——也许我将像一场春天的风暴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维也纳，那时你就会真正体验到点什么了。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丧命。军队之后，褐衫队和“奥地利兵困”也要跟着来的！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报仇，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奥地利变为第二个西班牙吗？所有这些，如果可能，我是愿意避免的。

许施尼格：……当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如你这样做就会引起流血。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谈阔论。但在这背后，有许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实存在。许施尼格先生，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已经结成同盟，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这头一次的谈话是在1938年2月12日上午11点举行的。经过一次正式

的午餐后，那些奥地利人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见到希特勒的特使里宾特洛甫和巴本，一个书面的最后通牒提出来了。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对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实行大赦，把奥地利纳粹党正式并入由政府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稍后，希特勒接见奥地利总理。“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希特勒说，“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实行这个协定。……否则，我们将以兵戎相见！”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他狂妄地宣称：有1000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作为世界一个大国，德国决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族弟兄遭受残酷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职责！

这是希特勒对欧洲各国的挑战。他“直率而公开”的通知：今后解决700万奥地利人和300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是他希特勒的事情。

四天后，2月24日，许施尼格在向奥地利联邦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答复了希特勒。他强调说，奥地利已经让步到了“我们必须停止而不能再退”的极限了。他在结束演说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红—白—红（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誓死效忠！”

希特勒闻讯勃然大怒。决定要对奥地利实行军事占领，并要许施尼格立即辞职，而且必须在两小时内任命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为总理。与此同时，又指示暴徒们在维也纳街头捣乱，狂呼：“吊死许施尼格！希特勒万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以“应奥地利临时政府的紧急请求，于3月11日派军队维持秩序”的名义，武装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希特勒武装侵占奥地利的紧急关头，法国、大不列颠和国际联盟又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德国对一个和平邻邦的侵略呢？什么都没有。当时法国又处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中。3月10日，星期四，夏当总理和他的内阁辞职了。直到13日德奥合并已经宣布后，才有了莱翁·勃鲁姆组成的法国政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加强国防”和“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建议，仍然没有引起法国权贵们的注意。

英国呢？在2月20日，就是许施尼格在伯希特斯加登屈服后的一个星期，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称：“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两位政治家商定了改善他们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措施……很难认为，一个国家已为另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了它的独立。”甚至当英国政府弄清希特勒的军队正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也只是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强烈抗议”。外交大臣艾登因与内阁意见不合而被迫辞职了。

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他说，艾登的辞职是法西斯的“一次大胜利”。“我们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件事，‘你看我们领袖的威力多么大，英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下台了！’”

在艾登辞职的第二天，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演说，他支持艾德礼的论点，并对绥靖政策进行批评，他说：“上周是独裁者们的美满的一周——是他们所未曾有过的最美满的一周。德国独裁者已经把他的铁掌伸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身上。而法西斯独裁者对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终局。”

丘吉尔继续指出：“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并且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损害，都是在1932年到1935年间造成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是在1936年初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需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现在我们处于他的第三次行动的时候，但是这次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有利了。奥地利现在已受奴役，我们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正如丘吉尔所预料的那样，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后，大肆鼓吹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军事上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希特勒在强行占领莱茵兰和武装吞并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了。

面对着日益恶化的欧洲局势，3月14日，也就是在希特勒完全并吞奥地利之后，丘吉尔在下院指出：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多少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丘吉尔义愤填膺，振臂高呼，要求英国政府改弦更张，放弃绥靖主义的政策；呼吁欧洲各国政府，认清形势，团结起来保卫和平，反对侵略；并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办法，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令人遗憾的是，丘吉尔的呼吁和建议，不仅没有引起西方大国的高度重视，反而被粗暴地拒绝了。

在丘吉尔讲话过去四天之后，3月18日，唯独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建议举行有关国家会议，讨论时局，研究如遇德国对和平进行严重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在国际联盟中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但是这一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十分冷淡，他们都以反苏反共为由拒绝了，并和希特勒眉来眼去，勾勾搭搭，鼓励纳粹祸水东引。就这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另

见[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392—393页。

见[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403页。

一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悲惨命运又发生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章卑鄙的图谋

希特勒如醉如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欲实施绿色方案，急匆匆调兵遣将。

大量的事实表明，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是蓄谋已久的。他在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之后，就在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了。

“绿色方案”是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代号，1937年6月24日制定。方案中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

显然，由于轻易地征服了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时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希特勒在1938年4月21日，召开武装部队高级长官会议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就根据讨论的总结，从政治、军事和宣传方面提出了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希特勒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他向凯特尔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决心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获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

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由托马斯·迪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诞生后，他几乎是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

早在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萨里克和贝奈斯领导了捷克的复国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在1918年使捷克斯洛伐克从哈布斯堡帝国中独立出来，成为中欧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

捷克斯洛伐克是法国在东欧的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国，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订有互助条约。这个国家有1400万人口，其中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950万，少数民族500万。少数民族中有350万是日耳曼居民，主要居住在西部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山区——苏台德地区。德国并吞奥地利时，一再扬言希望改善德捷关系，事实上希特勒企图侵略这个国家是蓄谋已久了。

希特勒侵捷，仍然是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日耳曼人党实际上是德国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见《纽伦堡文件》，第二编，4页。

的“第五纵队”，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1935年，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15000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完全按柏林的指使行事。

1935年3月28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事端，让他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来说，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了莱茵兰和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完整和独立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没有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对捷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

1935年4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他要尽力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

达拉第从伦敦回来10天之后，当有人问他法国是否会为捷克斯洛伐克参战，他回答说：“用什么参战？”他宣称，法国的空军是如此孱弱，使得法国不能参战。他还说：“从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就处于完全无望的境地。”5月10日，法副总理夏当对美大使布立特说，一旦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除了进行抗议之外，将毫无作为”！

法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立即由一名英国记者转告了柏林，此人是德国驻伦敦使馆的秘密特务。他在达拉第4月28日到达伦敦以后不久，就见到了达拉第。据这个特务说，达拉第迫切希望英国立即向布拉格施加压力，因为达拉第预料几个月之内便会最后摊牌。法国被它与捷克的条约“缚住手脚”。这样，英国采取行动就越发重要了。“目前，欧洲的和平可能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以及贵国政府，特别是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达拉第还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法国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就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月3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

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甚为高兴。

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5月19日，莱比锡一家报纸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5月9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在柏林，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从5月20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末，演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48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1914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德军开始在德捷边境集结和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可能被泄漏所造成的。

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和法国政府在迫于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也曾一度表现了同苏联政府的团结精神。但为时不久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外交部送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苏联的谴责和世界舆论的警告：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捷克斗争的苏联政府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个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

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他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贝奈斯总统报复。在他5月30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中说：“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他命令：“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1938年10月1日能够付诸执行。”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的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锲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希特勒如醉如狂的侵略行动，吓坏了德国的将军们，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坚决反对这种行动。他在5月5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苏联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年至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希特勒在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

“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致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

克。”

面对着希特勒的顽固态度，贝克将军决心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说穿。7月16日，他给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呈上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条陈说：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情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年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坚持要战争，高级将领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指挥军队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贝克要求勃劳希契代表陆军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求希特勒停止备战，并安排在8月4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贝克准备了一篇措词激烈的讲稿，准备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纳粹任何冒险引向武装冲突。然而，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采取强硬行动，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月18日，他愤懑地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在紧要关头，他把贝克甩掉了。

贝克在德国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没有料想到，作为世界上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相当时期以来，他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

希特勒的信息十分灵通，他在全球布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早在5月14日，纽约报纸发表了一则电讯。它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报道，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地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电讯的真实性。

就在8月3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驻外使节不必担心英国和法国会对捷克问题进行干涉的那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地区危机的“调解人”。7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

见《纽伦堡文件》，第二编，10号。

“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的活动看，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而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风尘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苏台德人需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伦西曼扮演的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的角色，纳粹头目是很欣赏的。他们非常了解伦西曼使命的真正意义。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动家费林格指出，伦西曼的使命是“用以遮盖英国公民眼睛，使之看不到苏台德区被割让的一种掩饰物，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被决定了”。

当伦西曼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拼命施加压力时，希特勒便以战争相威胁。在8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8月23日，希特勒还到基尔湾检阅德国的海军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武官参观，以炫耀武力。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克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张伯伦满口答应，还希望希特勒去同英王一起游览伦敦。英德间就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罪恶的交易。张伯伦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因此，英国卖力地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侵占苏台德地区。

在希特勒到基尔湾检阅海军演习时，他还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特勒告诉他们，匈牙利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苏联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外长的致命短视这时已经表露无遗，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种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危害之大是他所想象不到的。

与此同时，德军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部正在日夜工作，忙于制定在10月1日向捷克斯洛伐克入侵的最后计划。这时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除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9月5日，在赫拉德欣宫召见苏台德人的领袖孔特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惊叫道：“我的天啊，他们给了我们所要的一切！”不过，这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子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月7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以所谓捷克警察有过火行为为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的一切谈判。

9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他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

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当时的形势正是：希特勒，如醉如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被希特勒的威胁吓破了胆。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愿前赴柏林屈尊求见。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盼。”

9月14日，张伯伦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在他飞离伦敦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就这样，一场牺牲捷克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就此开始了。正是：希特勒横行霸道，张伯伦助纣为虐。欲知这一罪恶活动如何拍板成交，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章慕尼黑的悲剧

慕尼黑会结恶果，捷克无奈成牺牲；
英伦首相张伯伦，俯首贴耳遗骂名。

1938年9月14日晚上，伦敦和柏林同时宣布，英国首相张伯伦第二天将飞往德国，会见德国元首希特勒。这一消息使世界上很多害怕战争的人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停战以来，再过几周就20年了，很少有人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遮天蔽日的轰炸机群将把城市炸成废墟”。

特别是在伦敦，许多家报纸都对这位上了年纪的首相的“勇敢精神”表示赞扬。例如，《每日先驱报》称这是“避免看来越来越令人可怕地逼近的战争的一种努力，因而它心然会赢得各方——不管是什么党派——舆论的同情”。

德国驻英代办西奥多·科尔特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对英国人的“情绪”作了如下的概括：

“昨天宣布了张伯伦将访问元首的消息后，整个英国的气氛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变化。直到傍晚为止，全体英国人民还沉浸在非常沮丧的心情之中。这种沮丧心情是由于当局作出同样严重的决定而造成的，即在某种情况下要拿起武器。现在事情发生了完全出人意外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和平解决的希望……报纸的下述报道并不夸张：男人和女人在大街上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9月15日清晨，张伯伦临行前，在伦敦赫斯顿机场对报界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要去会见德国总理，因为在我看来，情况是，他和我之间的讨论可能会产生有益的结果。我的政策一贯是设法保障和平，希特勒先生欣然接受这一点，促使我抱有这样的希望：我的访问将不是没有成果的。”

就这样，这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这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纡贵，不惮作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希特勒央求。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茵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这位首相的路程缩短一半的。

张伯伦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飞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三个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之行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多方面的建议”。希特勒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张伯伦一到，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去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架子。

希特勒之所以对张伯伦如此了解并不是偶然的，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张伯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1937年5月上台执政。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家庭，是大军火制造商，死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而且是一个“软骨病”患者，尤其害怕战争。他一上台就全面推行绥靖政策，姑息侵略。这正好适合法西斯国家的愿望和需要。德驻英大使写道：“张伯

伦政府是战后英国历届内阁中，第一个把谋求对德妥协作为自己政纲中最重大事项的政府。”

张伯伦上台不久，同年11月中，就派遣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德国拜见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希特勒答应在六年内不会认真提出归还殖民地的问题，哈利法克斯则表示：不反对德国在中欧扩张，但德国必须避免公开使用武力。他还恭维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暗示德国可向东欧方向进军。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照例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00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心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国家。希特勒说，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领导德国渡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心不会后退一步。

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词。张伯伦简直无法插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让我来？我浪费了你的时间了。”

这时希特勒才谈起了他的主要目的：“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如果英国同意这种割让，那么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布，这是一项基本原则的决定。然后毫无疑问就可能在该地区取得很大程度上的安定……可以继续按照这些原则进行会谈。但是，首相必须首先表明，你是否接受这个基础？”

换言之，屈服于希特勒的要求不是和平的代价，而是继续进行会谈的代价！张伯伦当然无权做出这种许诺，但对希特勒的要求也不感到特别震惊。他回答说：“眼下，我还不能代表英国政府做出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没有授权我做这种保证。此外，在没有同法国政府和伦西曼勋爵进行商量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发表这种声明。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同意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谈以前，希特勒不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候，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一股劲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9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借以同捷克人不断挑起冲突和纠纷。9月18日这一天，正当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的时候，希特勒就向5个军团，共计36个师下达了行动时间表。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他对匈牙利和波兰不断施加压力，要他们参加趁火打劫的分赃勾当。9月20日，

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希特勒说，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第一，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在它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第二，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不作任何保证。从希特勒向匈牙利人说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与否，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9月21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9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援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与此同时，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2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公使还恫吓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9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为了“避免战祸”，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虽然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他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9月22日下午在莱茵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谈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在张伯伦前往戈德斯堡的前一天，9月21日，英国的有识之士丘吉尔，向伦敦的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25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心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外长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

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们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去议，商讨采取适当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丘吉尔对苏联政府对时局的声明十分赞赏，并建议英法政府予以积极的响应。“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空军支援。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

丘吉尔指出：“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30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结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且说9月22日，张伯伦第二次赴德，在戈德斯堡同希特勒举行会谈。这次先由英国首相发言。他先解释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关于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的建议。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希特勒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至于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

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来说，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在场的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

“是的。”英国首相微笑着回答。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不过，这显然不是因为恨希特勒骗了他，恨希特勒像普通一个敲竹杠的人一样，只要对方一答应，就立刻涨价。张伯伦所惋惜、着急的是，他牺牲捷克人所如此吃力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特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元首”已经从他那里得到所要求的一切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他被英国的正直人士指责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动希特勒的铁石心肠。希特勒仍然要求，苏台德区必须立即由德国予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9月28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

这样，张伯伦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茵河彼岸去考虑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商量以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克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克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显然，德国的独裁者并不愿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把捷克人撤退的期限推迟在10月1日。希特勒卖乖地说：“张伯伦先生，买你的面子，我愿意在日期上作一个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可以同意规定10月1日为撤离期限。”说着，他拿起笔来，在备忘录上把日期改了尽管张伯伦在开始时不同意希特勒这一要求，但是，他的谈判只使《备忘录》的措词进行了两处小的修改，并使捷克人从苏台德区全部撤走的时间推迟了72小时。对于《备忘录》所附地图上标明的边界，他没有得到任何修改，对于在苏台德区的捷克人和反纳粹的日耳曼人，他也没有为之取得任何保护或经济上的救济。在会议上修改后的这份德国文件全文如下：

备忘录

不断增加的关于苏台德区的事件的消息表明，局势对于苏台德区日耳曼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因而对欧洲和平也构成危险。因此，重要的是，应当毫不拖延地实现捷克斯洛伐克所同意的苏台德区的分离。在所附地图上（该地图将由代表团带上），将要割让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涂了红色。除了将要占领的地区之外，也要举行公民投票的地区涂了绿色。

边界的最后划定，必须符合有关的人的愿望。为了确定这些愿望，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为投票作准备。在此期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防止发生骚动。必须造成一种均势局面。所附地图上确定为日耳曼人的地区，将由德国军队占领，而不考虑那里举行的公民投票后是否表明捷克人在这个地区的这部分或那部分占多数。另一方面，捷克领土由捷克军队占领，而不考虑在这个地区里是否存在大块讲德语的地区，因为讲德语地区的大多数人在公民投票中无疑将声明自己是日耳曼族。

为了立即最后解决苏台德日耳曼人问题，现在，德国政府提出下列建议：
——从所附地图标明是要撤出的地区撤走全部捷克武装力量、警察、宪兵、海关人员以及边防战士，这块地区将于10月1日交给德国。

——所撤出的领土将按现状（进一步细节见附件）移交。德国政府同意，捷克政府或捷克陆军应派一名全权代表驻于德国军事力量总部，以解决撤退方式的细节。

——捷克政府立即把捷克国领土上任何地方的军队或警察中服役的所有苏台德日耳曼人遣散回家。

——捷克政府释放一切日耳曼族政治犯。

——德国政府同意在界线划得比较明确的那些地区，至迟在 11 月 25 日以前，举行公民投票。根据公民投票结果对新边界所作的修改将由德捷委员会或国际委员会决定之。公民投票将在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在 1918 年 10 月 28 日曾住在所谈的这些地区，或者在这个日期以前出生在这些地区的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参加投票。这些合格的男女投票者的简单多数就可决定全体人口是属于德国，还是属于捷克国。在公民投票期间，双方将从界线划分得比较准确的地区撤出其军事力量。日期和时限将由德国和捷克政府共同决定之。

——德国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有权威的德捷委员会来确定所有进一步细节。

1938 年 9 月 23 日于戈德斯堡

附件

在移交所撤出的苏台德日耳曼人领土时，不得破坏军事、商业或运输设施（工厂），也不得以任何方式使它们无法使用。这些设施包括空军的地面机构以及一切无线电台。

在这些指定的地区中的一切商业物资和运输物资，尤其是铁路车辆，均应完整无损地移交。这一点运用于所有公用事业（天然气厂、电站等）。

最后，食品、货物、牲畜、原料等等一概不得转移。

希特勒还表白说，如果他用武力，那末，从捷克斯洛伐克手里取得的土地和他现在提议割让的地区就完全不一样了。张伯伦随即表示，他准备将德国《备忘录》转交捷克政府。第二天上午，希特勒和张伯伦在“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分手告别。在分手之前，他们两人又单独会谈了一会儿。希特勒说，就他而言，苏台德问题是必须予以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他还说到德英的密切关系以及两国之间的合作，说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他最为关心的事。他又耍起他的老一套来了。“我们两国没有必要产生分歧，”希特勒说，“我们不会干预你们在欧洲之外的利益，而你们让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由行动，也无损于你们。当然，到一定时候，殖民地问题也得解决，现在不急，况且也决不会因这个问题而打仗。”

然而，就是这一点，对英国首相来说，也似乎颇有作用。他对希特勒的“开恩”十分领情，并表示愿向有关方面转达。最后张伯伦真挚地同“元首”道别。他说，他感到由于过去几天的会谈，他和“元首”之间已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仍然希望目前困难的危机将能克服，那时他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同“元首”讨论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

希特勒感谢张伯伦这一番话，并告诉他，自己也抱有同样的希望。希特勒再次保证捷克问题是自己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希特勒否认还要攫取领土的声明，看来给告辞回国的英国首相留下了根

深的印象，因为他随后在下院发表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希特勒作这番表示时“怀有极大的诚意”。

事实上，张伯伦在9月24日回到伦敦后，就马上说服英国内间接受希特勒的新的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提出了异议。张伯伦已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这时英国广泛兴起要求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政府，后者在9月24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愤然拒绝纳粹的要求，而且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近100万人。

面对这些，张伯伦十分焦急。他要向德国独裁者作一次最后的呼吁，他急忙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9月26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威尔逊爵士乘专机赶到柏林。

张伯伦在这封信中，极力讨好希特勒。他说，由于捷克人已经情愿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问题。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10月1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同他们谈判细节。希特勒说，他一定要在44小时内——9月28日下午2时前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经破釜沉舟了。他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内对贝奈斯总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宣称战争与和平问题现在要看捷克总统怎样来决定，不管怎么说，他都要在10月1日拿下苏台德区。他滔滔不绝，怒不可遏的语言和会场中不断迸发出的欢呼喝彩，使他忘乎所以，如醉如狂。虽然如此，他还是很狡猾，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点甜头。他感谢首相争取和平的努力，并且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说：“我们不想要捷克人！”

在9月27日下午，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一个“绝密”的命令。命令大约21个加强团，也就是7个师组成的突袭进攻部队，从训练地区进驻捷克边境的出击点。为了在群众中激起战争狂热，希特勒下令在黄昏时分，乘10万柏林人下班上街的时候，在首都检阅一个摩托师。结果，至少对最高统帅说来是一场失败。柏林的老百姓对此表现了惊人的冷淡，根本不想听到战争。

在总理府内还有更坏的消息。从布达佩斯来的消息说，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通知匈牙利政府，如果它进攻捷克的话，它们就将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这样战争就扩大到巴尔干，而这却是希特勒所不愿见到的。巴黎的消息更严重，那里的德国武官来的电报说，法国的部分动员几乎不亚于总动员。因此估计，到下令动员后的第六天，第一批65个师就可以在德国边境部署完毕。而且，美国总统和瑞典国王反对战争，呼吁和平。

这时，希特勒确实知道：布拉格毫无畏惧，巴黎在急速动员，伦敦态度转硬，他自己的人民漠然无动于衷，他的将领坚决反对他，而他关于戈德斯堡建议的最后通牒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就要到期了。这时希特勒又想起了张伯伦，写信要他继续努力，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刻恢复“理智”。

9月27日，这位英国首相给捷克总统贝奈斯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如果明天（9月28日）下午两点，捷克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話，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

蹂躏。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到希特勒身上，而是把它放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就来了。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园。”

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 8 点 30 分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堡德国的最后通牒，在 9 月 28 日下午 2 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于是，张伯伦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借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与此同时，张伯伦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说：“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元首，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丘吉尔说，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9 月 27 日晚，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与此同时，希特勒收到了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他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此间，美国政府这时也积极协助张伯伦策划慕尼黑阴谋。9 月 24 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报告说，英国驻德大使对英国国内反张伯伦势力的发展十分不安，并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张伯伦的倒台就意味着战争。他呼吁美国政府公开支持张伯伦，以巩固他的地位。美国驻英、驻法大使，也向本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美国总统为了搭救张伯伦、达拉第，于 9 月 26 日发给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亨斯两封内容相同的信；国务卿赫尔则给张伯

伦和达拉第发出两封同样的信，呼吁他们继续谈判，以便“和平地、公正地和建设性地解决争论的问题”。9月27日，美国总统又给墨索里尼一封秘密信件，请他“帮助继续努力，以求用谈判或其他和平手段就争论问题达成协议，而不要诉诸武力”。

当晚，罗斯福总统又单独给希特勒去信，建议在欧洲某一中立地区立即举行会议，由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直接有关的各国参加。这个建议说：“继续谈判仍然是唯一的途径，通过这种途径，眼前的问题可以在持久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经过阴谋家们的精心策划，一个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会议就这样商定了。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被认为是“未出席会议的参加国”。令人奇怪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自己也没有获准出席会议。然而，张伯伦却对这一会议“充满信心”。正如他9月28日下午在英国下院所讲的：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2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24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新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24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往德国。欲知慕尼黑会议如何发展，这些阴谋家们如何将捷克斯洛伐克引向深渊，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章走向深渊

一味姑息不争辩，强盗更加无忌惮；
明枪强夺当公理，绥靖危途陷深渊。

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正式开场了。9月29日午后12点30分，阿道夫·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暗后室开始其卑鄙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在这个他曾遭到啤酒馆政变惨败的城市里，俨然像一个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为了使会议按其既定的目标进行，那天一清早，他就前往德奥边境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定下了基调。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刻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意大利外文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引用希特勒的话说：“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对此表示赞同。

然而，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英国和法国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事实上，张伯伦到慕尼黑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不让任何一个人，当然不让捷克人，甚至也不让法国人，阻碍他同希特勒迅速达成协议。至于达拉第，整整一天都像是晕头转向地跟着跑，根本不需要提防，然而业已不定决心的首相还是不放心。

会谈是12点45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高潮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要的东西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没有人当主席。整个进程都是很随便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希特勒作了“无论如何都要在10月1日进军”的开幕发言以后，他们还要拼命迎合他。

会议在墨索里尼发言时，接触到了实质问题，他是第三个发言的。他说，“为了提供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带来了一个明确的书面建议。其实，意大利领袖当作他自己的折中方案拿出的骗人东西，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草拟出来的。戈林把它拿去给希特勒看，希特勒审定之后，即马上由施密特博士译成法文送给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阿托利科把它全文用电话传到罗马，那位意大利独裁者，在要上火车赴慕尼黑之前刚刚收到，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非正式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的德国建议。

建议的措词同希特勒被拒绝的戈德斯堡要求极为相似，因此上述事实本来似乎应当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对达拉第和张伯伦或者现在随他们来开会的英法驻德大使来说，却不是如此。法国总理“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他是本着客观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英国首相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至于汉德逊大使，他认为墨索里尼“巧妙地结合了希特勒的建议和英法建议而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弗朗索瓦—庞赛大使的印象是，与会者是根据由霍拉斯·威尔逊起草的一项英国备忘录在进行工作。这些不惜一切代价一心只想姑息的英法政治家与外交家竟然如此愚蠢、容易上当受骗！

既然“意大利建议”受到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剩下的就只有少数细节还要推敲了。过去是商人出身而且又曾任过财政大臣的张伯伦，想知道在苏台德区的公有财产转交给德国以后，由谁来赔偿捷克政府。希特勒激动地回答说，根本不给什么赔偿。首相反对规定捷克人在迁出苏台德区时，甚至不能带走他们的牲畜。他说：“难道这是说，农民要被逐出，而他们的牲畜倒要被留下吗？”这时希特勒冒火了，“我们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浪费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对张伯伦嚷了起来。首相就此再也不提这回事了。

张伯伦开头确也曾坚持应当有一个捷克代表出席，或者至少用他的话来说，“随叫随到”。但是希特勒寸步不让。他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最后，张伯伦还是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大多数同意，像首相所建议的那样，可以有一位捷克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

张伯伦和达拉第两人急忙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完全同意他提出的立即解决问题的要求，于是，照威尔逊的说法，“元首”就“大大平静下来了”。但是，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张伯伦声称，“担保”一词在英语中包含的内容很多，“他必须先知道自己能否履行这种文件”，然后才能在文件上签字。他没有坚持让捷克派一名代表参加讨论，但却重申，他希望让“一名布拉格代表坐在隔壁房间里，以便能从他那里得到保证”。

希特勒回答说，事实上，现在“没有”捷克代表，“要是每一细微末节都事先征得捷克政府的同意，那么没有两周时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与此同时，捷克人却在忙于破坏桥梁和建筑物。根据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割让的具体事宜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处理，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派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他所希望的是，这几个大国“能运用自己的权威，承担正确完成割让工作的责任”。

就这样，四位领导人争论不休。墨索里尼同意希特勒的这一意见：“等待捷克代表来是不行的”，“在撤退和防止破坏方面，这几个大国应当作出道义上的保证”。达拉第起初支持张伯伦坚持要让捷克代表与会的立场，后来便退让了：“要是让布拉格代表参加会议会造成困难，那他准备放弃这一主张，因为重要的是迅速解决问题。”

这次讨论快结束时，根据张伯伦的建议，会议暂时休会。3点刚过，各代表团就离开了元首大厦，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回到各自下榻的饭店。墨索里尼是元首的贵宾，所以就到希特勒的私宅去了。

希特勒和意大利领袖一起在元首官邸用了午饭。他们边吃边谈，希特勒此刻慷慨激昂地讲着，毫无顾忌地大骂张伯伦。他说：

“达拉第是位律师，他懂得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大事；你可以同他进行明确而满意的谈判。但是，这个张伯伦，就像一个好讨价还价的小店主，每个村庄，每个细节都要计较；他比捷克人还坏。他在波希米亚失去了什么？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接着，希特勒讲起了戈德斯堡会谈。当时，张伯伦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周末去钓鱼：“我不知道什么叫周末，我也不钓鱼！”现在是英国停止扮演“欧洲主宰”的角色的时候了。他重复了上午把自己和意大利领袖称作“革命者”的说法，并谈到今后要同英国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将使“年富力强的入大有作为，登峰造极”。

然后，希特勒问墨索里尼，意大利王室是不是他实现自己目标的障碍，王室成员是否真的依然“亲英”。墨索里尼回答说，在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

战争期间，翁伯托王储曾发表过“错误”的讲话。于是墨索里尼告诉王储，萨沃伊王室之所以能存在下来，全靠领袖的支持，而且，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已如此根深蒂固，君主制必须与它和衷共济。当时，这位工储保证忠诚不二。

接着，墨索里尼又向希特勒提出了问题，问及德国的内部安全。希特勒回答说，整个“工人阶级”都是支持他的，反对他的只有教会中和地主贵族中的反动派。领袖委婉地询问，要是赦免了涅穆勒牧师，会不会扰乱国内的平静：“到处都听到人们在念叨他的名字，而且他已被关押很久了，把他放了不好吗？”但是，希特勒斩钉截铁他说：“不行，这个人太危险了……他在集中营里享有很大的自由，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不能放他！”马丁·涅穆勒牧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艘潜艇的艇长，后来成为柏林著名的新教牧师，起初支持纳粹。由于他对希特勒要控制教会这一点感到失望，并表示反对，遂于1937年被捕，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两地的集中营受到“保护性拘留”，直到1945年才被盟军释放。

当这两位法西斯独裁者进行这些“使人大受启发”的交谈之后，又到了开会的时间了。正当会议的参加者再次聚集在元首大厦的时候，一架从布拉格起飞的飞机正在来慕尼黑的途中，机上坐着捷克的两名代表，更确切地说，是两名“观察员”。贝奈斯总统苦苦哀求，说应当听听他的国家申诉自己的主张，结果只是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的粗暴“通知”。那是9月28日晚上，哈利法克斯通知他，布拉格应当“选定受权代表捷克人讲话的代表，以便明天一接到通知就到慕尼黑”。

召开慕尼黑会议的消息对贝奈斯和扬·马萨里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看到戈德斯堡会谈显然陷入僵局，心中曾浮现出某种希望。捷克将领们的愤怒和懊恼之感，也不下于他们两人的绝望心情。参谋长路德维克·克莱奇将军从他设在摩拉维亚的总部返回布拉格，同陆军监察长、新任命的总理扬·西罗维将军和三名主要野战司令官——沃伊切霍夫斯基、卢扎、普日哈拉以及总统军事办公室主任布拉哈等几位将军，一道晋谒总统。这些军人恳求贝奈斯不要再作让步，时局已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起来战斗的地步。军队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西方国家会感到惭愧，因而会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贝奈斯心灰意懒地回答说，他要着眼于大局。他说，英国和法国不会加入这样一场冲突，反而会说是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了战争。这些军人于是就抱着悲愤和沮丧的心情离去了。

捷克的这两位“代表”（或叫观察员）是9月29日下午3时从布拉格起飞，大约在4点半到达慕尼黑的。不清楚德国人是怎样知道他们到来的消息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到机场迎接这些捷克人。据捷克“代表”马斯特尼在其后的报告中记述，德国人的接待是很冷淡的。

“在机场上，我们受到的接待就像是对待警察眼中的嫌疑犯似的。我们被送上一辆警车，在秘密警察的陪同下，到了摄政宫饭店。英国代表团也住在那里。不许我们离开房间，这些房间都有警察守卫。当时会议已在进行之中。我费了很大劲才先与罗歇、后与阿希东一格瓦特金通了电话。阿希东一格瓦特金对我说，他想马上到饭店同我谈谈。

“晚上7时，我同阿希东一格瓦特金先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他神情紧张，吞吞吐吐。从他的某些谨慎的言语中，我猜到，已经拟出了一个方案的

大纲（详细内容他当时还不能告诉我），而这个大纲比起英国和法国的建议来要严厉得多。我指着我的红色地图，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所有切身利益之所在。格瓦特金先生对摩拉维亚走廊问题表示了某种谅解，虽然他完全没有理睬这个问题的所有其他因素……我提请格瓦特金先生注意，这样一项方案在国内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回答说，看来，我并没有认识到局势对于西方国家是多么困难，同希特勒谈判是多么棘手。谈到这里，格瓦特金先生就回去开会了，临走时保证一休息就打电话给我们。”

捷克人不是以“代表”而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了，但是，已经向他们表明，除了摄政宫饭店的房间内所能看到的東西外，他们将没有机会观察任何事物。

前来慕尼黑的两个捷克“代表”，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的公使伏伊特赫·马斯特尼，一个是布拉格外交部的休伯特·马萨里克博士，他们被冷淡地带进隔壁一个房间里。直到晚上10点，这两个郁郁不乐的捷克人给带去见英国首相忠实的顾问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代表张伯伦把四国协议的要点通知了他们，并且交给他们一张捷克人应立即撤出苏台德区的地图。当两个捷克使者想提出抗议的时候，那位英国外交官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就走

了。两个捷克人继续向跟他们在一起的阿希东一格瓦特金表示抗议，然而，一点用处都没有。

阿希东一格瓦特金也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告诫捷克人说：“你们要是不接受的话，就得完全单独去同德国人打交道。也许法国人同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讲得客气一点，不过你们可以相信我，他们同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不想管你们的事！”

虽然这话必然使两位捷克使者十分伤心，但说的却是老实话。9月30日凌晨刚敲过一点，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就按这个次序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协定规定，德国军队将如希特勒过去一再预言的那样，在10月1日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10月10日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希特勒已经得到他在戈德斯堡所没有得到的东西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出卖捷克的文件全文如下：

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

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达成的协定

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考虑到苏台德日耳曼人领土割让给德国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同意有关上述割让的下列条款和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措施，并且根据本协定，它们对保证履行本协定所必要的步骤各应负其责任。

一、撤退将在十月一日开始。

二、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同意从领土上撤退应于十月十日完成，不得破坏目前存在的任何设施，并且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负责进行撤退，不得损害上述设施。

三、关于撤退的条件，应由德国、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详细规定之。

四、德国军队分阶段占领主要是日耳曼的领土的工作将在十月一日开始。在附图所标出的四块领土，将由德国军队按照下列次序加以占领：

标为第一号的领土在十月一日和二日占领；

标为第二号的领土在十月二日和三日占领；
标为第三号的领土在十月三日、四日和五日占领；
标为第四号的领土在十月六日和七日占领。

其余日耳曼特征最强的领土将由上述国际委员会立即确定，并由德国军队在十月十日占领。

五、第三款所提到的国际委员会将决定应举行公民投票的领土，该领土在公民投票未完成前，应由一些国际机构占领。同一国际委员会将确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条件，以萨尔公民投票的条件为基础。国际委员会并应确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这一日期将不迟于十一月底。

六、边界的最后确定将由国际委员会完成。该委员会也将有权向四国即德国、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建议，可以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在严格地从人种学来确定的、不必举行公民投票而予以移交的地区，作出小的变动。

七、应有自由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领土的权利，选择权应在本协定签订日期起六个月内行使。一个德捷委员会应确定自由选择细节，考虑便于迁移居民的方法及解决由上述转移而产生的原则问题。

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本条约签字之日起，四个星期内将从其军队和公安部队中解决任何希望解除的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职务，并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在同时期内释放因政治罪行而在服徒刑的犯人。

阿道夫·希特勒
爱德华·达拉第
本尼托·墨索里尼
尼维尔·张伯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于慕尼黑

当英法代表将这样一个肢解、出卖捷克的协定文给捷克人时，还以十分粗暴的态度恫吓说：“这是一项无权上诉、也不可能改变的判决。”捷克“代表”马萨里克当即反驳说：“这一协定是在没有捷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不排除最糟糕的情况，必须为最严重的不测事件做好准备。”

然而，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捷克政府最终还是屈服了。就在9月30日上午，贝奈斯总统谨慎地召集了一大批人，对如此令人痛苦的一个决定分担责任——西罗维将军的内阁成员和霍贾博士的上届内阁成员、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陆军参谋长克莱奇将军和胡萨雷克将军。在前一天，当慕尼黑会议正在进行时，若干与会者曾敦促贝奈斯说，全国应进行战斗，即使被法国人、英国人抛弃也要战斗。这些与会者包括右翼国家民主党领导人拉迪斯拉夫·拉辛、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几个主要将军。西方评论家认为，显然，贝奈斯之所以决定接受慕尼黑的条款，而不想单独战斗或在苏联作为唯一的盟国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主要是因为他不愿意使他的国家遭受对德战争所会造成的大量死亡和破坏，并认为，如果苏联参战，“西方会认为我们是使中欧布尔什维克化的工具”，并“会在一场德苏战争中撒手不管”。

作为总理，西罗维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协约国一道战斗的捷克军团的独眼英雄）在当天傍晚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他的政府的结论，并为这个结论辩护。这就是：“如果我们必须在减少我们的领土和让全国人民死亡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保全我国人民的生命……这样，我们不致被迫放弃我们的这个信念，我们的民族会复兴，

就像它过去经常复兴那样。”

克莱奇将军作为参谋长向军队发布命令，要求他们“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决定、并向他们保证说：“我们的军队没有被击败。我们的声誉没有玷污……共和国将需要我们。”一位颇有名望的捷克诗人约瑟夫·霍拉谈到了人民的情绪和“自豪感”：“在我们悲伤的日子里，当其他更强大的国家决定使我们的古老国家沦为乞丐时，你们大家要自豪地和镇静地抬起头来。应当感到羞耻的不是我们。”

捷克被出卖了，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屈从希特勒的要求，并把人民的情绪引向指定的方向，惯于撒谎的帝国主义分子采取的欺骗手段之一，就是宣称苏联不遵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相互援助协定。事实上，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阴谋诡计的每一阶段，当时苏联政府都明确表达了苏联决心履行盟国义务的坚定意志。法国政府于1938年9月初询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受到袭击，苏联将如何对待？苏联政府在答复中提出如下的建议：

第一，发表苏、英、法三国联合声明，宣布如果德国无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敦促国际联盟讨论防卫手段与途径。

第三，苏、法、英三国举行全面会谈，以讨论技术问题。

当波兰政府准备参与瓜分从捷克斯洛伐克分割来的战利品，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集结军队时，苏联政府对华沙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声明，它将把波兰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视为无端入侵，并将立即废除波苏互不侵犯条约。

然而，伦敦和巴黎的诽谤者甚至下惜造谣说，慕尼黑协定是同苏联政府商量好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是，在捷克危机时刻，只有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坚决主张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声明：只要法国履行自己的义务，苏联就立即给予援助。后来斯大林曾委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转告捷政府，即使法国不出兵，只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并向苏联提出请求，苏联也准备给予军事援助。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阶级在这紧要关头拒绝了苏联的支援，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屈服了。他们宣称：“我们宁愿希特勒攻进来，而不愿靠伏洛希罗夫来保卫我们。”

在牺牲捷克的慕尼黑协定签字之后，张伯伦又奴颜婢膝地找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他说：“相信元首会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什么困难的活，希望希特勒不要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要不是施密特把它记录在案的话，即使张伯伦在前一天夜里已经对德国独裁者作了那样下贱的投资，人们也简直不能想象这番话会出自一个英国首相之口。

张伯伦还向希特勒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对两国对欧洲都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

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声明，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并肩”对英国作战。

张伯伦“胜利”地回到了伦敦，达拉第也回到了巴黎。得意洋洋的张伯伦挥舞着同希特勒签署的联合声明迎接拥到唐宁街的人群。他笑逐颜开，站在唐宁街10号三楼的阳台上对前来欢迎的人们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我建议你们安然睡觉去吧！”

《泰晤士报》宣称：“没有一个征服者从战场上得胜归来的时候，曾带着比这更高贵的桂冠。”居然有一个自发的运动，来筹集一笔“全国感恩基金”向张伯伦致敬。不过，他谦虚地拒绝了。只有海军大臣达夫·古柏一个人因此愤然辞职。在继之而来的下院辩论中，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在那篇值得纪念的发言中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然而，据他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停了下来，一直等到暴风雨般的抗议声平息之后才能接着讲下去。

英国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三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古柏大臣首先发表了辞职演说。他说：“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感到有理由住手！”

面对着希特勒的疯狂扩张，古柏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他说：“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伯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吉柏继续说，“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迎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迎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侵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了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的激动和问题之严重。但由于绥靖主义情绪在下院占有优势，结果表决时下院以366票对144票通过了

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政见的人除了表示强烈反对外，别无他法。

丘吉尔就是这样做的。他在演说中说：“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伯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堡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扼要地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1镑17先令6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丘吉尔说，“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在费心机。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丘吉尔痛心地说：“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的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却下来，张伯伦和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在英法的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投降了。为此发表的官方公报说，它是带着“对全世界提出抗议”投降的。新任总理西罗维将军在向捷克人民所作的广播中愤懑地解释说：“我们被抛弃了，我们是孤独的。”他的一位名叫克罗夫塔的同事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是被迫落到这种地步的；现在一切都完了，今天轮到的是我们，明天轮到的就是别人了！”

贝奈斯总统在柏林的要求下于10月5日辞职，后来因为看到他的生命有危险，就飞到英国，开始度流亡生涯。从这时起，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正式加上了一个连接号。

为纳粹帮凶的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在扬言要对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就像食尸的饿鹰一样，乘虚而入，各分得了一块土地。除此而外，柏林还逼着这个肢体残缺、防务荡然无存的国家成立了一个显然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亲德政府。人人都了然，从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第三帝国元首的鼻息下苟延残喘而已。

希特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当然这只是他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步。仅此，他就强迫捷克割让了1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28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80万捷克人。在这个地区内，有着大量的捷克工事，捷克人构筑了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

诺防线可与之媲美。

这还不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路、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被肢解以后，丧失了66%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和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仅仅在一夜之间，捷克就被瓜剖豆分而破产萧条了。

希特勒，这个昔日维也纳的流浪汉，在仅仅4年半的时间内，就使一个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军事上被解除武装、在经济上接近崩溃的德国，一跃而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所有其他的国家，甚至英国和法国，都在它的面前发抖。在这个令人目眩的跃进过程中，没有一个《凡尔赛和约》的战胜国阻挡它侵略扩张的道路，即使在它们有力量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做的胆量。事实是，在希特勒取得了最大胜利的慕尼黑会议上，英国和法国还曲意予以支持。而且想必使希特勒自己也最感诧异的，也肯定使贝克将军、哈塞尔以及参加他们那小小的反对派的一伙人莫名其妙的，是主宰着英国和法国政府的那些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到，由于他们对这位纳粹头子的每一步侵略行动都不加回击而造成的后果。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似乎只有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比他在10月5日在下院的演说里把慕尼黑的后果讲得透彻的了。他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他进一步指出：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之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臣，他的话并没有引起英国统治集团的关切和注意。

张伯伦对希特勒要什么就给什么的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和戈德斯堡之行，还有最后那一次决定命运的慕尼黑之行，挽救了希特勒，使他有了下台阶的梯子，把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军队中的威信，提高到几个星期以前还无法想象的程度，这一切也把第三帝国同西方盟国相抗衡的力量提高到无可估量的程度。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法国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原来法国拥有100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可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捷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35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这支力量，无异等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誓言相信呢？同法国的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能听到的答复是：价值不大。这些首都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尚未太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

然而，对希特勒来说，慕尼黑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认为，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向法国在军事上决一雌雄的前奏。在德军进占苏台德区还不到10天后，希特勒就着手军事部署来并吞默默尔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了。正是：纳粹侵捷未罢休，愈演愈烈在后头。欲知希特勒如何进一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打算从地图上抹掉这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的国家，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章进一步肢解捷克

得寸进尺贪无厌，策动捷克闹动乱；
哈查一纸卖身契，残存国土颜色变。

张伯伦天真地认为，只要稳住德意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同他们搞好关系，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力改善，他还不知道两个独裁者早已商定，有一天他们要向英国开刀呢！正是基于这一错误的思想和迟钝的感觉，慕尼黑会议之后，张伯伦又和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匆匆忙忙地去访问意大利了。

会谈在 1939 年 1 月 11 日举行。对此，皇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不屑地这样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沉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远！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德·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

齐亚诺又写道：“英国人不想打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但并不想打仗……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已告结束了，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一次大失败，但没有什么害处……两星期后，张伯伦又把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的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是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墨索里尼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与此同时，1 月 18 日，里宾特洛甫抵达华沙，对曾经帮助他们肢解捷克的波兰展开外交攻势。吞并捷克，继而包围波兰。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声言德国在但泽拥有主权，并把德国在波罗的海区域的控制权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默默尔，以此来截断波兰出海的通道。波兰政府对这种压迫表示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视着，等候发动战争的时机。

在 3 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出现种种谣传，说德奥境内，特别是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之间地区，军队调动频繁。据说德国已按战时编制动员了 40 个师。有些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国的支持，正在准备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克上校看见条顿民族的烈风已经吹向另一个方向，就松了一口气。他在华沙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对斯洛伐克人的愿望深表同情。

如今，希特勒又大食其言，向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刀了。在过去六个星期之内，他一直在私下或公开向张伯伦担保，说苏台德区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尽管英国首相在相信希特勒的话这方面容易受骗到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他确有一些根据可以认为，德国独裁者在吸收了原来住在德国境外而现在住在德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以后会罢休的。希特勒不是一再说过他在第三帝国之内不要一个捷克人吗？但是张伯伦忘掉了，这位元首在《我的奋斗》中多次以狂妄的口气宣扬德国的前途在于向东方征服生存空间。1000 多年来，这块地区一直是斯拉夫人占着的。

慕尼黑会议结束不久，也许出于恐怖的原因，新任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弗朗吉席克·契瓦尔科夫斯基，在 10 月 14 日卑躬屈膝地到慕尼黑来朝拜，乞讨希特勒手中的那一点残羹剩饭，并且问德国是否准备同英国和法国一起保证他的国家大大缩短了了的边境。希特勒鄙夷不屑地回答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担保不值一文钱……只有德国的担保才有用。”

可是，到 1939 年初，仍然迟迟不见这种担保，理由十分简单，希特勒并不想给予这种担保。这种担保会影响他紧跟着慕尼黑会议以后定下的计划。很快就根本不会有捷克斯洛伐克的存在了，还要有什么担保呢？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得引诱斯洛伐克分裂出去。

10 月 17 日，也就是在捷新任外长会见希特勒之后三天，戈林就接见了两个斯洛伐克领袖斐迪南·杜尔坎斯基和马赫，还有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领袖弗朗兹·卡马辛。杜尔坎斯基是新近取得自治地位的斯洛伐克副总理，他向戈林保证，斯洛伐克所真正需要的是“完全独立，同时与德国建立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十分密切的联系”。同一天，外交部的一项秘密备忘录中曾提到，戈林决定，斯洛伐克的独立必须予以支持。“一个没有斯洛伐克的捷克国家，更可以受我们自由摆布。斯洛伐克境内的空军基地，在对东方作战时十分重要。”这就是 10 月中旬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亲德的新政府竭力讨好希特勒。为了取得希特勒的欢心，捷克内阁在 1938 年圣诞节以前就解散了共产党，并且解除了日耳曼人学校里所有的犹太教员的工作。1939 年 1 月 12 日，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在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强调说，他的政府“将在各方面满足德国人的愿望，以此来努力证明它的诚心善良”。同一天，他还促请驻在布拉格的德国代办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并入德国”之说甚嚣尘上。

为了想探明这点残山剩水还能不能挽救，契瓦尔科夫斯基最后说服希特勒答应于 1 月 21 日在柏林接见他。这是一幕极悲惨的景象，虽然对捷克人来说，接踵而来的下一幕还要更惨。捷克外交部长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面前摇尾乞怜，希特勒当时盛气凌人的样子达到了极点。希特勒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于德国的克制才免于惨遭浩劫。虽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辙，他还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历史，他们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这是捷克的唯一自全之道。具体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退出国际联盟，大大缩减它的军队，参加反共公约，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国的指导，同德国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条件是，解雇一切对德国不友好的政府官员和报刊编辑，未经德国同意，捷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业。最后还有，像德国人那样，根据纽伦堡法律，宣布犹太人不受保护。同一天，契瓦尔科夫斯基又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了新的要求。后者威胁说，捷克人若不立即悔过自新，并且照办德国人要他们做的一切，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现在可以开幕了。由德国政府所煽动起来的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的分裂运动，已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如果不把它们镇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就会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肯定会占领布拉格。然而，如果分裂主义者被中央政府压下去，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也会利用由此引起的纷乱，照样进军布拉格。

捷克政府在反复犹豫之后，最后只是在对分裂主义者挑衅已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第二条道路。3 月 6 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博士解散了卢西尼亚的自治政府。3 月 9 日夜，又解散了斯洛伐克的自治政府。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斯洛伐克总理提索神甫、都卡博士和杜尔坎斯基，并且宣

“纽伦堡法律”是希特勒纳粹党于 1935 年 9 月 15 日在纽伦堡通过的《帝国居民法》和《血缘保护法》的总称，旨在剥夺犹太人及其他非“优等民族”的政治和人身权利。

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戒严。这个对柏林百依百顺的政府一共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勇敢的行动，然而这个行动却很快就导致了使它遭到毁灭的一场惨祸。

哈查总统任命斯洛伐克自治政府代表卡洛尔·西尔多代替提索出任斯洛伐克的新总理。西尔多于3月11日回到斯洛伐克的首府布腊提斯拉伐，当天就召集了新内阁会议。到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会议突然被一群奇怪的不速之客打断了。奥地利的吉斯林、纳粹省长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的纳粹党组织领袖约瑟夫·贝克尔，率领五名德国将军闯进了会议厅，要阁员们立即宣布斯洛伐克独立。如果他们不这样宣布的话，希特勒就要实行军事占领。

西尔多是反对同捷克人割断一切联系的，因此迟迟不决。但是第二天，提索神甫就从他据说是受软禁的一个修道院里逃了出来。他本人虽然已不再是阁员，却以“总理”的身份要求立即召开内阁会议。第二天早晨，这位矮小圆胖的神甫就被德国人装上飞机送到柏林，接受希特勒的训示。这位纳粹元首愤愤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完全靠德国的恩惠才得以免于进一步被肢解”，德国已经表现了“最大程度的克制”；然而捷克人却还不知道感恩戴德。“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了，过去的贝奈斯精神又在借尸还魂了。”希特勒要斯洛伐克立即宣布“独立”，德国予以保护，否则就用武力解决，希望斯洛伐克马上就作出决定。

提索虽然当时没有表明自己的决定，但却回答说，斯洛伐克人将证明自己不会辜负元首的“恩惠”。那天，在德国外交部一直进行到深夜的会议上，德国人帮助提索起草了一份让这位“总理”一回到布腊提斯拉伐就发出的电报，宣告斯洛伐克独立，并且迫切要求“元首”保护这个新国家。它使人想起刚好一年以前由戈林口授的赛斯-英夸特那份吁请希特勒派遣德军到奥地利的电报，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还起草了一份斯洛伐克“独立”宣言，并且把它赶译成斯洛伐克文，让提索带回到布腊提斯拉伐。第二天，3月14日，这位“总理”就向议会宣读了这份宣言。会上有几个议员提出至少还应该对它进行一下讨论，但就连这种提议也被日耳曼民族领袖卡马辛压了下去。他警告说，要是宣布独立再有任何耽误的话，德国军队就来占领了。在这样的威胁面前，满腹狐疑的议员们只好屈服了。

“独立”的斯洛伐克就这样在1939年3月14日诞生了。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缔造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至此已经寿终正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布拉格领导人，又一次帮了希特勒的忙，完成了自己国家的最后一幕悲剧。老态尤钟、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请求希特勒予以接见。希特勒慷慨地答应了。这正好给了希特勒一个机会，使他有一个舞台，演出他一生事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一场戏。

这位德国独裁者在3月14日等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光临”的时候，舞台上的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他的巧妙摆布之下，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都已宣布独立，因而布拉格政府手里现在只剩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块捷克人的土地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英国和法国曾担保其边境完整的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了；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一起作出庄严担保的张伯伦和达拉第早已“下台退场”了。这就消除了任何引起外国干涉的危险。

但是，为了要做得加倍保险，他就要强迫这个登门求见的软弱昏聩的哈查，接受他本来打算用武力达到的解决办法了。用这种办法，他就可以使人感到那确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正式请求他这样做的，就像并吞奥地利和慕尼黑会议所已证明了的一样，在欧洲只有他一人完全掌握了这种兵不血刃就

使人亡国的新手段。

然而，希特勒还演了一场活报剧来欺骗德国人民和其他容易受骗的欧洲人民。捷克总统抵达柏林时，受到了一个国家元首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正式的礼遇。车站上排列着仪仗队，德国外交部长亲往迎接贵宾并且塞给总统的女儿一束鲜花。总统一行在豪华的阿德隆饭店最好的房间里下榻。那里专门为哈查小姐备着巧克力糖，那是希特勒亲自送的礼物。当年迈的总统和他的外交部长到达总理府的时候，那里还有党卫队的仪仗队向他致敬。

可是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悲剧，就是在隆重的外交礼节的掩盖下发生了。1939年3月15日，是决定捷克命运的一天。那天子夜，希特勒在总理府一个只亮着几盏青铜吊灯的房间里，接见捷克总统哈查和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他们走进这个黑沉沉的房间，犹如进入龙潭虎穴一样。这时哈查已经预料到有什么大祸在等待他了。早在他的火车还没有离开捷克国境的时候，他就得到布拉格来的消息说，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重要的捷克工业城市摩拉夫斯卡—俄斯特拉伐，而且沿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境摆好了阵势。因此，这位身材矮小、年迈龙钟的总统，一来到柏林就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得罪这位强邻。

他深深地懂得，希特勒的军队已从三面包围了他这个已缩小得可怜的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契瓦尔科夫斯基，也像他的上司一样，力图从里宾特洛甫的面部表情领会意图，唯恐因吃不透而惹恼了这位纳粹外长。在商务方面，他准备搞一个关税同盟，给德国以普遍的优惠待遇；在政治方面，也几乎可以想象得到的方式予以默许。这位个子矮小，肤色黝黑的外长，有一句话充分说明了他摇尾乞怜、奉承讨好的模样：“帝国部长先生，倘使我们可以的话，在外交方面我们总是希望依靠你的。”

可是，这一切毫无作用。对希特勒说来，捷克好比是斗牛士手里一块刺激牛的红布，他早就决定要从地图上抹掉这个国家。因此，会谈一开始就是一副悲惨的场面。希特勒说：“和贝奈斯政权相比，目前情况丝毫没有变化，贝奈斯虽不当权了，但贝奈斯的思想在新捷克斯洛伐克依然存在。”最后，他声色俱厉他说，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他的一片好心；如果贝奈斯的倾向不完全消失的后，他就要把这个国家完全消灭。

希特勒说完之后，就请客人出去。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两个苦命的人加紧施加压力。他们硬是围着桌子追逐哈查总统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外长，一次又一次地把放在桌子上要他们投降的文件掷到他们面前，把笔塞到他们手里，不断地重复说，要是他们拒绝的话，纳粹军队就把捷克斯洛伐克消灭。在这可怕的威胁面前，哈查昏过去了。戈林就让守护在旁边的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雷尔打针抢救，使他醒了过来。总统总算恢复了神志，能够拿得住德国人塞给他的电话听筒，在里宾特洛甫下令接通的专线上同他在布拉格的政府讲话。他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内阁，并且建议投降。然后，莫雷尔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他的精神多少又好了一些。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又踉踉跄跄地回到阿道夫·希特勒面前，在他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时间是1939年3月15日凌晨3点55分。

在所谓双方发表的会谈公报上写着：“元首和总统（希特勒与哈查）在会谈中，以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这一部分的安宁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并为了实现最后和平，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给德国元首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他们的民族能够生活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他们的特定的方式得到发展。”

至此，希特勒诡辩欺诈的伎俩也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据他的一个女秘书说，希特勒在签字以后，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每一个在场的女人，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平生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面对着希特勒的疯狂侵略扩张，3月15日，张伯伦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6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当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张伯伦却说道：“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从斯洛伐克国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以后，形势改变了。由于斯洛伐克发表了这个宣言，结果使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因内部分裂而归于消灭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丘吉尔就此对张伯伦发表评论说，“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真心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听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在这一夜之间，他突然从过去的错误中转变过来了。”

据英国当时报纸报道，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演说，调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破坏慕尼黑协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证：“这是我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可以保证，我对捷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决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张伯伦在演说中说：“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本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刚才给你们宣读的那些保证，怎么能够说是一致的呢？”

“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现在，我们听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所以才不得不侵占它的领土……如果那里发生骚乱，难道不是外国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小国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接着来呢？事实上，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和政策比较起来迥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他必定经过了极度紧张的思想斗争。15日那天，他还说：“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轨。”但是现在腔调却来了一个突然的转变。

不但如此，张伯伦改变主意，并不限于这些。在希特勒的名册中，下一个要鲸吞的目标就是波兰。对此，张伯伦3月31日在议会发表讲话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去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的立场。与此同时，英各自治领地也获得详细的通知。

丘吉尔欢迎这种转变。不过，由于张伯伦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丘吉尔说：“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经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虽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35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丘吉尔说：“只要一提到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

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的例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

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曾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10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25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法西斯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多么狂妄啊！

希特勒鲸吞捷克斯洛伐克，大大加强了纳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如西方新闻媒介所报道的，德军占领这个国家不久，希特勒就从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了95亿马克的金钱和100多万支步枪、43000多挺机枪、1500多架飞机、2100多门大炮、500多门高射炮、300余万发炮弹，10亿发子弹和400多辆坦克。占领了当时最大的军火工业城斯科达，并把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男女掳去当兵和服劳役。由此大大加强了希特勒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它的战争实力。

希特勒和其他一些纳粹头目们没有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末日可能就是德国法西斯末日的开始。他们怎能想到呢？从1939年3月15日的黎明开始，引向战争、引向失败、引向灾难的大路已经平铺在他们的面前了。这是一条又短又直的路。希特勒一旦走上这条路，顺势而下，就是要停也停不住了。

尽管张伯伦后来有所“觉悟”，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危难的日子里，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动一动来挽救它，虽然在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它们都曾庄严地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犯。

究竟是谁替希特勒敞开了方便之门呢？正是以张伯伦为代表的西方绥靖主义者。毛泽东在1939年深刻地揭露了这些绥靖主义阴谋家们的险恶用心。指出：“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

“我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张伯伦一伙原来打算给希特勒打开东进的大门，玩弄纵虎伤人的阴谋。他们以为奉送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会满足希特勒的侵略欲望，殊不知侵略者的欲壑难填。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外长在被迫接受慕尼黑协定时对英法部长们所讲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国家是否会从慕尼黑作出的决定中得到好处，但肯定无疑的是，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在我们之后，其他人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

历史果真是无情的，玩火者自焚！希特勒在“抹掉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下一个猎取对象动手了。正是：纵虎贻患，必定遭难。

就在希特勒在欧洲大肆侵略扩张的时候，他的盟国，意大利和日本，也在向非洲、亚洲大肆掠夺。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82页和570页。

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82页和570页。

第六章意侵阿比西尼亚

意酋也是侵略狂，觊觎东非好风光；
阿国人民齐抵抗，义愤填膺保家乡。

就在希特勒于欧洲疯狂扩军备战大行侵略时，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他扬言要重建“新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湖；他觊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处心积虑地要侵入非洲。阿比西尼亚（现为埃塞俄比亚）成为他猎取非洲的首要目标。

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全国面积约有 122 万多平方公里，其中高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2/3，平均高度为 2500 米至 3000 米，有“非洲屋脊”之称。西部地势逐渐下降，斜向苏丹平原。北部、东北部和南部有沙漠和半沙漠，占全国总面积的 28%。从东北到西南纵贯全境有一条大裂谷，宽 100 多公里，深 2 公里多，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阿比西尼亚虽地处热带，但因地势高，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 11 摄氏度至 17 摄氏度，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年平均气温为 13 摄氏度，但谷地和低地较热。每年 10 月到次年 4 月为旱季，5 月至 9 月为雨季，高原地区年降雨量约 1000 至 1500 毫米，境内多河流湖泊，最大的湖是塔纳湖，主要河流有阿瓦什河、阿贝河、谢贝利河，最高山为腊斯一达香山。阿比西尼亚是具有 3000 年历史的古国。公元前 975 年，孟尼利克一世称王。公元 13 世纪至 16 世纪，阿姆哈拉族人建立了新兴的国家——阿比西尼亚。由于地处亚热带，经济作物比较发达，盛产咖啡、棉花和烟草。阿比西尼亚是世界上主要咖啡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畜牧业比较发达，主要牲畜有牛、羊、马、骆驼等。皮革是阿比西尼亚另一项重要出口物资。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已经发现的有白金、黄金、锰、铜、石油等。但由于经济落后，无力开采，人民生活异常贫困。

因此，从 16 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就成了欧洲列强掠夺的对象。1543 年，葡萄牙人开始侵入。19 世纪中叶，英国人入侵。19 世纪末叶，意大利殖民势力排挤了英国势力，侵占了红海沿岸地区。1890 年 2 月，意大利把这个地区合并为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并且片面宣布阿比西尼亚受其“保护”，1895 年至 1896 年阿比西尼亚进行反意战争。在 1896 年 3 月 1 日开始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侵略军遭到惨败。在这次战役中，意军死伤共 6500 人，被俘 2500 人，而阿军只损失 3000 人。在非洲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上，阿比西尼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就加紧扩军备战，扬言要“雪阿杜瓦之耻”，决心要把阿比西尼亚这个古老的文明之国攫为己有。在这一罪恶目的驱使下，意大利法西斯匪徒软硬兼施，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首先在开展外交的掩护下，意大利领事馆遍设阿国各地，其实那些地方并没有什么意大利的事业需要保护，通常那些领事都是当地唯一的意大利人。他们并不从事一般的领事工作，而是按照墨索里尼给他们的任务搜集情报，掌握驻在国动向，并伺机进行煽动，制造内乱，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有许多暗探和奸细，他们暗中活动，收买人心，挑拨民族关系。他们几乎无孔不入，渗透到一切领域。为了及时获取情报，各领事馆都设有电台，可同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随时互通消息。所以，意大利对这个古老的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比阿比西尼亚政府了解得更及时，更准确。为了将来战争的需要，意大利使馆又在亚的斯亚贝巴开设了一所通讯学校，专门训练领事馆的

报务人员，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就派往各情报站去服务。

为了收买人心，培养亲意大利的势力，他们还在各地设立医院、学校和俱乐部，在意大利所开办的学校里，阿比西尼亚的孩子也受到像意大利孩子一样的待遇。他们给孩子们穿美丽洁净的衣服，并且在一些大的游戏场上设置了各种玩具。学生们过了几个星期后，便依照法西斯的方式行礼，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呼喊：“墨索里尼万岁！”

为了尽快地鲸吞阿比西尼亚，早在 1934 年秋天，意大利就向它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运送飞机和坦克，建设飞机场；12 月 5 日，在阿比西尼亚与意属索马里兰接壤的欧加登省瓦尔一瓦尔绿洲进行挑衅，为大规模武装入侵阿比西尼亚进行试探。意大利军队的侵入，遭到阿比西尼亚当地驻军的反击，因此，一场蓄意进行的侵略战争和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战争打响后，双方陆续增兵。意大利利用飞机、大炮、坦克向无辜的阿比西尼亚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地野蛮屠杀。但是，在这多山的丛林地带，意大利的坦克并不能施展它的威力。阿比西尼亚人很少使用步枪，他们抽出佩刀攻击意大利人；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还使一辆坦克完全失去了作战的能力。意军的大炮也不能摧毁什么，他们找不到攻击的目标。经过激烈的争夺，双方互有胜负。在阿比西尼亚人组织第二次反击时，意大利军队的阿斯喀拉人向他们的白人军官反叛起来，一个意大利的军官被他的索马里士兵杀死了。这时，意大利的军队方才撤了回去。

在这次交火中，意大利死伤了 2300 多人。按照当时的情况，意大利军队的处境是非常恶劣的；如果阿比西尼亚人继续发动进攻，他们是无力抵抗的。但当时担心战争进一步扩大的阿比西尼亚政府，却提出了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建议。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一合理建议，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割地赔款和要阿比西尼亚人到瓦尔一瓦尔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的无理要求。同时，墨索里尼又调动了第一九一一和第一九一二两师黑衫队到交战地区。很显然，这个法西斯头子梦寐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大帝。他不仅妄图征服阿比西尼亚，而且还希望得到英属索马里兰，梦想获得五倍于他的国家的殖民地。当意大利提出了无理要求时，阿比西尼亚就愤然加以拒绝了。随之，双方的战争动员就进一步升级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35 年 1 月，墨索里尼任命擅波诺将军为东非意大利军总司令，前往厄立特里亚进行侵略战争的部署。从 2 月开始，意军大量调到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到 1935 年秋天，在阿比西尼亚北部和东南部边界上集结了 30 万意大利军队。

面对着意大利的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全国人民发布了战争动员令。他说：“意大利军对阿比西尼亚的不断侵犯，使我们不能再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了。我们应该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了。”尽管如此，对两国的争端，他仍主张和平解决。他进一步说：“目前我们所希望的是使那些由意大利军队违法占领着的地区归还我们。意大利在非洲的侵略扩张对我们造成了真正的威胁。当 1906 年的边界条约缔结的时候，意大利已经表示出一种意图，希望使它的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兰两个殖民地联结起来，这自然就破坏了阿比西尼亚领土的完整。意大利的侵略行动，不仅威胁着一个独立国家的安全，而且也践踏了国际联盟的宪章，”他要求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加以制裁，并呼吁国际舆论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维护祖国的

独立斗争。

但是，意大利的这种侵略活动，不仅没有受到国际联盟和西方国家政府的反对，反而受到他们的怂恿和支持。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以后，疯狂扩军备战，德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法国便同意大利接近，企图建立英、法、意的联合阵线，共同对付德国的威胁，因此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野心采取迎合态度。1935年1月，法国外交部长赖伐尔跑到罗马，同墨索里尼签订协定，以加强合作，消除分歧。意大利答应放弃它对法属突尼斯的要求，并同意照顾法国在阿比西尼亚的特殊利益。法国同意修定意属利比亚同法属西非洲和法属赤道非洲的分界线，把11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地区让给意大利；同时还修改了法属索马里兰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使意大利又得到了800平方公里的海岸地带。这块地方靠近曼德海峡，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此外，法国还同意意大利取得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20%的股票，使用吉布提港，为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大开方便之门。

英国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据当时在英国政府担任国际联盟事务大臣的艾登回忆，1935年5月初，墨索里尼通过其大使向英王陛下政府带来口信。据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描述，口信的内容是吁请英国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持最友好的、帮助的态度。西蒙告诉这位大使：“对意大利的友好并帮助意大利，一向是英国政府的目标，我们的很多行动都可以作为证明。”可见英国政府是支持意大利法西斯进行侵略的。

至于美国，正当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亚边境运兵、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时，美国国会于1935年8月通过了中立法，禁止把武器卖给交战国家。

英、法、美的这种绥靖政策，大大助长了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墨索里尼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30万侵略大军发动突然袭击，越过马雷布河边界，大规模侵入阿比西尼亚境内。

阿比西尼亚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对于战争的前途和国民的情绪，皇室发言人对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们说：“为了自卫，国王正在改组他的军队。你们已经在城里和乡间看到武装的人了，12岁的孩子已经在他们纤弱的肩膀上背着步枪，老年人把佩刀挂在他们的右腰，这已经是阿比西尼亚人的一种习惯了。我们阿比西尼亚人爱好兵器，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更不是因为我们残忍；我们是一个酷爱和平的国家，我们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为了保卫国家，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一个女子会留在家里的。我们中了弹，只有流着血死去，即使如此，我们是没有人愿意落后的！我们相信，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在全国动员的第二天，国王检阅了由4000名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首都卫戍部队。他们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穿着整齐的军服，戴着装饰着狮鬃毛的军帽。阿比西尼亚有20多万人从军，他们的年龄在12岁至20岁之间。在奥莱塔的军官学校里，正在培育着一批年轻的军官。他们只进行6个月的短期训练，就开赴前线指挥作战了。他们的年龄多在十五六岁左右。每当人们谈起他们太年轻时，他们就骄傲地回答说：“我们的父辈在阿杜瓦击败意大利侵略军时，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啊！”在全国已动员起来的数十万军队中，只有不到5万人拥有现代化武器，其余的多是佩刀和长矛。在索马里和旦那基尔部落里，长枪都涂着毒药。用这种武器进行肉搏，杀伤力是非常大的。过去相互械斗的一些部落，如今也在“保卫阿比西尼亚独立”的口号下联合起来了。

在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中，阿比西尼亚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利用有利的山区地形顽强抗击意大利侵略军。他们组织伏击战，截断侵略军的交通线，深入敌人后方，为保卫每一公里土地而英勇战斗，使意大利侵略军遭到多次重大失败。1935年11月，德波诺被撤职，由巴多格里奥将军接替。

阿比西尼亚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而且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声援。埃及等国人民组成拥护阿比西尼亚独立委员会，举行游行示威，声援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斗争。不仅非洲许多国家，而且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也同情和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意大利侵略军踏入阿比西尼亚国土时，黑人就采取各种方式表示抗议。他们认为阿比西尼亚是一个黑人的国家，摧毁它就象征着白人最后战胜黑人。很多地方都募集资金支援那个非洲王国，而在一些大城市则建立起周密的组织，进行宣传动员，并向国联控诉意大利法西斯罪行。

在全世界人民和进步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英法操纵的国联被迫于1935年11月通过决议，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它实行经济制裁。然而，这些决议只不过是欺骗世界舆论的一纸空文，丝毫没有妨碍意大利的侵略行动。英、法、美在“中立”的幌子下，宣布对交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这样，工业不发达的阿比西尼亚就完全得不到武器供应，意大利法西斯却早已作好了侵略准备，根本不缺乏武器。而对于意大利迫切需要的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则不在禁运之列。这样，意大利就能源源不断地从西方国家、尤其是从美国得到大量的石油去发动战争机器，屠杀阿比西尼亚人民。没有大量的石油，意大利就无法进行这场侵略战争。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供认不讳。据希特勒的翻译保罗·施密特在《外交舞台上的小人物》一书中供称，墨索里尼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期间曾对希特勒说：“如果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我一周后就只好退出阿比西尼亚。这样会酿成一场奇灾大祸。”

10月间，面对国际的所谓“制裁”，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狂妄的声明，他不谈“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50个国家！50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

丘吉尔说：“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

但是，英国政府从来都没有采取认真的行动。“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因此，“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碍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丘吉尔说，“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

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丘吉尔说，“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他的统治作孤注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

“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丘吉尔进一步指出，“它除了在现代轻巡洋舰方面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 1/4。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大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12月9日，英国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也就是说，准备把阿比西尼亚的大部分土地交给意大利。但是，由于墨索里尼要价更高和世界舆论的反对，这一阴谋才没有得逞。

就这样，在英、法、美这种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墨索里尼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阿比西尼亚人民。1936年4月，意大利侵略者进一步加强了攻势，法西斯空军对阿比西尼亚的城市和乡村狂轰滥炸。法西斯匪徒还践踏国际公法，进行灭绝人性的化学战，公然大量使用毒气，致使阿比西尼亚27.5万军民被毒气熏死，40余万无辜居民惨遭杀害。

在阿比西尼亚人民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刻，1936年4月29日，海尔·塞拉西皇帝向国联和西方列强求援，但英、法、美和国联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去反对意大利侵略者。这样，意大利法西斯得以在1936年5月5日攻占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流亡英国。5月9日，墨索里尼正式宣布吞并阿比西尼亚。

阿比西尼亚抗战失败，意大利把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1936年5月16日，《慕尼黑新闻》刊登了一篇评论英国时政的文章，丘吉尔读后感慨万千，认为此文发

人深省，句句击到英国的痛处。特将有关段落，笔录如下：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的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局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是为了占领非洲之角的这个战略要冲，掠夺该国的丰富矿藏和肥沃土地，是为了在非洲扩大侵略取得基地，因而使得帝国主义矛盾，特别是法意矛盾和英意矛盾日趋尖锐，为以后英意在非洲的战争播下了种子。另一方面，意大利在侵阿战争中，也得到德国的支持。因为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臭味相投，希特勒正把墨索里尼看作未来的侵略伙伴，同时也想转移意大利对奥地利和巴尔干的注意力，以便纳粹德国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促进了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接近。法西斯侵略势力便进一步纠合起来，去武装干涉西班牙。欲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武装干涉西班牙

西班牙人求新生，光明黑暗决雌雄；
黑党魔鬼来插手，武装干涉留恶名。

且说墨索里尼侵占阿比西尼亚不久，又把黑手伸向西班牙。他伙同纳粹头子希特勒，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他们咬牙切齿，决心扼杀那里正在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半岛，西邻葡萄牙，北濒比斯开湾，东北与法国、安道尔接壤，东和东南濒临地中海，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的摩洛哥相望，扼地中海和大西洋航路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法、美在西班牙有大量投资，拥有各自的势力范围。西班牙资源丰富，早为墨索里尼所垂涎。西班牙原为王国，1930年初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共和国，民主力量逐步增长。1932年2月，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阵线政府上台执政。这使国际法西斯势力大为惊恐，也引起西方各大国的严重担心。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暗中策划下，西班牙在西属摩洛哥的驻军头目佛朗哥于1936年7月17日发动武装叛乱，德意随即给予公开支持，先以飞机从西属北非地区运叛军到西班牙本土各地，继而公开派遣军队作战，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一场震惊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法西斯武装叛乱，首先在摩洛哥、西班牙辖区开始。叛乱分子残酷地击溃了一些单独的抵抗之后，占领了梅利利亚、休达和得土安几个城市。支持共和国的军官就地被枪毙。紧接着在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和主要的警备部队区也相继发生武装叛乱。叛乱的首领原是圣胡尔霍将军，但是他在7月20日从葡萄牙飞回西班牙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为了领导在摩洛哥的武装叛乱集团，佛朗哥将军于7月19日乘英国飞机从加那利群岛飞抵得土安。圣胡尔霍死后，佛朗哥成了叛乱的魁首。

西班牙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和教会的主教们都支持武装叛乱。反动军阀则是叛乱的突击力量。封建贵族以及和梵蒂冈有密切联系的教会暗地里支持叛乱分子，不少神父、僧侣和各类神职人员都为反对共和国而秘密地进行活动。

在叛乱的准备工作中，占特别地位的是长枪党喽罗们组成的武装集团和所谓“雷克特”的传统分子卡洛斯派的战斗组织。早在1934年3月底，西班牙反动派的代表、保皇分子戈伊凯切亚、卡洛斯右派分子臭洛萨维尔和利萨拉以及巴雷拉中将前往罗马“朝圣”后，就在那里同墨索里尼进行了会谈。墨索里尼许诺给西班牙反动派以物质上的援助，他答应给10000支步枪、20000颗手榴弹、200挺机枪和150万比塞塔，供发难之用。此外，墨索里尼还表示，以后根据情况再增加援助。

叛乱发生后，西班牙的反动武装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肆意屠杀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阵线的号召下，西班牙的劳动人民纷纷拿起了武器，与反动派英勇搏斗。工厂、城市和乡村成立了人民志愿兵中队、大队和纵队，头几天，就有30多万人前来集合点报到，他们希望得到步枪。每个人随便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武装起来。革命英雄主义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唤起了成千上万反法西斯主义者去战斗。

人民群众几乎是赤手空拳地猛攻反动派的兵营，7月19日在马德里，武装警备队的叛乱被平定了。在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工人们在两天的

血战中战胜了军阀。阿斯图里亚斯掌握在人民手中，奥维亚多被包围，而希洪的兵营则被城市居民和矿工们英勇攻占了。

在安达卢西亚和厄斯特列马都拉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塞维利亚的工人，巴达霍斯、卡塞雷斯的农民和雇农，一直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只是在摩洛哥殖民部队的支授下，法西斯分子才得以占领塞维利亚。在加利西亚、拉科鲁尼亚、维哥以及其他城市的渔民和工人们，在几天之内对军队和国民警卫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马拉加、巴伦西亚、毕尔巴鄂、桑坦德及其他许多城市和省份，叛军的计划失败了。空军和几乎整个海军仍站在共和国方面。水兵们和下层指挥官们把大部分军舰和潜水艇开进共和国所控制的港口。

头几天战斗的结局，使叛军陷入困境。国家的主要工业中心仍掌握在人民手中。法西斯分子只能在南方的加的斯、韦耳发和塞维利亚等省，在北方的加利西亚、纳瓦拉、旧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等地区站稳脚跟。叛军被巴达霍斯省分隔为两部分：莫拉将军统率的北方部队和佛朗哥指挥的南方部队。

西班牙战争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全体进步人类都站在西班牙人民共和国方面；整个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集团都反对西班牙共和国，墨索里尼更是迫不及待。在叛乱开始的头几天，他就伙同希特勒用德意的飞机把 14000 多名叛军和大量军事物资从摩洛哥运到西班牙。头几批意大利和德国的军事技术人员以及大批重型武器运到里斯本和葡萄牙其他港口。萨拉查的葡萄牙为佛朗哥将军开放自己的边界。战争的头几天，葡萄牙的武器，甚至葡萄牙的个别部队也从葡萄牙运到叛军所占领的地区。由于有了这些支援，南方叛军得以在 8 月中旬占领了已达霍斯，同旧卡斯蒂利亚、莱昂、加利西亚和纳瓦拉的北方集团军会合。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援助，解救了佛朗哥和他的军队。要是没有意大利和德国的武装干涉，共和国本来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平定法西斯叛乱的。但是共和国和叛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很快便向有利于后者的方面发展。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对西班牙战争所采取的立场，助长了这种趋势。事实上，西方列强的所谓“不干涉”政策，纯粹是掩护意德武装干涉西班牙的一个幌子，其目的是借助法西斯国家之手，慢慢扼杀西班牙民主共和国。

共和制的西班牙沿海一带，经常遭到德国军舰的轰击。意大利的海盗潜水艇在地中海疯狂活动。1936 年 11 月，德国建立了“康多尔”军团，先是由施佩尔将军，后来则由里希特霍芬和福尔克曼将军指挥。军团拥有强大的防空设施、机械化部队、坦克和装甲车。它的全体战斗人员超过 6000 人，而空军在刚建立时就已有 8 个轰炸机和驱逐机大队、一个水上飞机大队。法西斯国家同叛乱分子签订了秘密的互助合作协定。德国和意大利的垄断组织加强了自己在西班牙经济方面的阵地。在柏林设有援助叛乱分子的“w”特别参谋部。1936 年 8 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立了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委员会。

在墨索里尼看来，西班牙是未来战争的一个合适的战略基地和试验自己军事技术装备及其战术潜力的一种演习场。西班牙作为原料产地和投资的场所，在经济上也是有利的。德国和意大利需要利用西班牙的钨、汞、铁和农产品进行军事准备。意德的干涉还追求一个目的：结束西班牙的民主和革命发展过程，并在比利牛斯山脉那边建立法西斯专政。

墨索里尼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是不借工本的。据粗略的统计，意大利法西斯除了向佛朗哥提供了 1000 架飞机外，还提供了价值 140 亿里拉的军事物资。计有大炮 2000 门、自动武器 10000 件、步枪 24 万支、坦克 900 辆、汽

车 12000 辆、拖拉机 800 台、潜水艇 2 艘、驱逐舰 4 艘和许多其他军事装备。德国给叛军提供的武器也是大量的。参加对共和国军队作战的有 15 万意大利正规军和 5 万德国人。意大利来的空军有轰炸机 3 个团和两个大队，驱逐舰 1 个团和两个大队。先后共有 600 名意大利飞行员参加西班牙空战。在这场战争中，前来进行武装干涉的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有 6000 人被击毙，11000 人受伤。希特勒为了研究总体战的战术，在西班牙试用“容克—87”俯冲轰炸机和“梅塞施米特—109”驱逐机。纳粹教官训练了 50000 多名叛军军官。这位盗世英雄为了维持“康多尔”军团，共花费了 2.32 多亿马克。

在意大利和德国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的背后，还有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暗中援助叛军。英国商行供给叛军石油和飞机。佛朗哥从直布罗陀的英国军事基地得到武器和弹药。法国的“雷诺公司”秘密向叛军出售飞机和汽车。法国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整个政策是骇人听闻的。莱昂·勃鲁姆政府于 1936 年 7 月 25 日，通过一项禁止向共和西班牙出售武器的决定，从而破坏了 1935 年 12 月签订的西法贸易协定。根据此协定，西班牙共和国有权向法国购买价值 4000 万法郎的武器，叛军得到美国垄断组织大量的援助。他们所需要的石油有 75% 以上是美国石油公司供给的。佛朗哥和武装干涉者军队中几乎全部军事装备都使用美国燃料。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武装干涉，加上西方列强的绥靖和“不干涉”政策，很快地造成了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叛军方面发展。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转变为民族革命战争。多·伊巴露丽指出：“之所以说它是民族战争，是因为人民反对外国的武装干涉，这种干涉使西班牙有沦为意德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危险；之所以说它是革命战争，是因为西班牙人民，为维护、巩固和发展在同西班牙反动派进行长期残酷的斗争过程中赢得的民主自由而斗争。”

佛朗哥叛乱，使国家陷入内战，这次战争成为西班牙的一场民族大悲剧。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从来也没有像在这三年的战争中流过这么多血。国际法西斯和反动派的势力压在西班牙人民头上。镇压、屠杀、报复和仇恨的方式和规模是骇人听闻的。著名的西班牙专家、前苏联科学院院士伊·米·马依斯基说：“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抵抗，成为和平民主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第一次国际战争。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西班牙战争是在欧洲反对反动势力的一次最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和民主的发动。西班牙人民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给全世界树立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榜样。”

西班牙战争对造就 30 年代年轻的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不仅钦佩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而且学习他们跟反动派和法西斯进行战斗的精神。西班牙战争的三年，对于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是一所严峻的学校。西班牙战争的前线，不仅把西班牙人，而且把全人类分为两个世界：一方是法西斯和反动派的世界，另一方是民主和自由的世界，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主义者都站在西班牙共和国方面。世界各大洲都开展声援西班牙人民的群众运动。1936 年 8 月 3 日，莫斯科 10 万多劳动群众，举行盛大游行示威，高呼口号：“不许干涉革命的西班牙！”人民捐款 4700 万卢布，并有 600 多名志愿人员前赴西班牙前线。在巴黎、伦敦、纽约和世界上的其他的城市，民主力量要求给人民阵线的西班牙提供援助。西班牙大使馆收到几千宗捐款和捐助品。有几万人准备前往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国际上声援西班牙的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为了协调一致，在巴黎成立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国际委员会。在战争的头两

年，国际委员会从 17 个国家就募集到 8 亿法郎。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都出来保卫西班牙人民。这是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著名的国际纵队的组成是声援西班牙人民的最高表现，来自 54 个国家的志愿人员加入了这个组织，到西班牙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志愿军战士们或步行、或乘火车、或坐船、或通过最危险的比利牛斯山口，公开地、秘密地到达西班牙。尽管他们国籍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共同的对抗法西斯的仇恨和援助西班牙人民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大肆造谣说，在国际纵队里，作战的全是共产党人。事实上，在国际纵队里战斗的有共和派、天主教徒、无党派人士、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社会党人、工人、职员、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当时的美国驻共和西班牙的大使写道：国际纵队的大多数战士只不过是反法西斯主义者。国际纵队队员的誓词结尾是：“我自愿来到这里，如果需要，为了拯救西班牙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我将献出自己全部的直至最后一滴鲜血。”整个战争期间，国际纵队的志愿军总数达到 35000 人，约有 10000 人光荣地为西班牙共和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永远鼓舞着全世界革命者去为真理而斗争。在援助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中，意大利共产党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意共领袖陶里亚蒂，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于 1936 年 6 月前往西班牙前线，与西共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坚持到战争的最后时刻。意共中央委员隆哥担任国际纵队的总监，在保卫西班牙的多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意大利共有 3500 名反法西斯战士奔赴西班牙前线。

深受中国人民尊敬和怀念的加拿大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 1936 年曾为战斗的西班牙人民服务。然后又于 1937 年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同样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有 100 多人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士共同战斗，打击法西斯匪徒。据当时一个担任炮兵政委的谢维进回忆，1937 年 5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致西班牙人民书，表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的坚决支持。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还向“国际纵队”的中国支队赠送了一面锦旗，题词是：“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当西班牙首都危在旦夕的时刻，国际无产阶级优秀儿女组成的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歼灭法西斯匪军。这体现了西班牙人民的事业是整个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

1937 年，德意法西斯强盗和西班牙叛军加强攻势，在北方占领了一些地区。2 月 8 日，墨索里尼的正规军占领了南方的海港城市马拉加。德国军舰炮轰共和西班牙的沿海一带。叛军在马德里南面的哈拉马河附近发动了一次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的目的是包围并占领马德里。战斗进行了两个多星期。在一个不大的地段集中了 15000 多人和大量军事装备，叛军吃了败仗。哈拉马河之战是更残酷的战役的一个先声。

一个月以后，3 月 8 日叛军在瓜达拉哈拉地区开始了向马德里的又一次进攻。在德国飞机、坦克和炮队的支援下，有五万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奉墨索里尼的命令来到这里，企图截断马德里与巴伦西亚的联系，然后占领马德里。

在战斗的第十天，共和军和国际纵队转入决定性的反攻。墨索里尼的军队损失巨大，伤亡数千人，被俘 1000 人，损失机关枪 250 挺、大炮 30 门，还有大量的坦克。瓜达拉哈拉之战，共和国取得辉煌胜利。

从此，墨索里尼更加恼羞成怒。1938 年春，伙同希特勒和佛朗哥对人民阵线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3 月 9 日，法西斯军队突破了阿拉贡防线，伸展到地中海滨，将西班牙分割成南北两半，使共和国的处境更加困难。这时，欧洲绥靖主义分子又对西班牙共和国施加压力。1938 年 6 月，法国达拉第政府悍然封锁了法西边界，使西班牙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大量军用物资，包括许多飞机、大饱和机枪，无法运回。这是对西班牙人民卫国战争的沉重打击。9 月底，达拉第伙同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慕尼黑同希特勒勾结，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了这个法西斯罪魁。绥靖主义分子的这种叛卖行径，助长了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从精神上涣散了西班牙共和国战士的斗志，滋长了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情绪。

1938 年 12 月底，德意干涉者和西班牙叛军集中 30 万的兵力，出动大量飞机、坦克和大炮，在北方的加泰罗尼亚发动了新的攻势。共和国的军队在这里只有 10 万人，武器更处于劣势。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最后加泰罗尼亚于 1939 年 2 月沦于敌手。从此，英法政府抛弃了“不干涉”的假面具，于 2 月 27 日，公开承认佛朗哥为西班牙政府首脑，同时断绝了它们同西班牙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这是英法绥靖主义者公开怂恿德意法西斯侵略、出卖西班牙人民的民族革命事业的又一步骤，也是唆使共和国内部动摇分子叛变的一个信号。

1939 年 3 月 28 日，马德里陷落。4 月初，法西斯铁蹄踏遍了西班牙全国。西班牙共和国被国内外反动派颠覆了。在这一罪恶的反革命武装干涉中，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扮演了极为可耻的角色。他出力最大，不仅向佛朗哥提供了 1000 架飞机，派出 15 万意大利正规军，而且还提供了 140 亿里拉的军援。即使在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之后，墨索里尼还以“维持秩序”为名，留下 12 万法西斯军队赖着不走，继续帮助西班牙反动当局镇压革命人民。

佛朗哥为了扑灭战败者继续战斗的任何希望，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用来对付革命和民主的经验几乎全部搬了过来，在西班牙建立了一整套法西斯恐怖制度。根据 1939 年 2 月 9 日关于“政治责任”的法令，凡从 1934 年 10 月 1 日起，直接或间接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都必须接受法院审讯。这个法令是 1940 年 3 月 14 日法律的基础。这项法律宣布，凡参加过共产党和任何其他秘密组织（首先是共济会组织）的人都犯有罪行。根据这项法律，凡共产党人和共济会会员都得送交由两名军人、两名长枪党人和两名高级官员组成的“政治责任”特别法庭审讯。法律规定，被告人无权聘请辩护律师。惩治办法一般分为四等：徒刑 6 年，徒刑 12 年零 1 天，徒刑 20 年零 1 天，死刑。

根据官方的材料，到 1939 年底，在西班牙监狱关押了 27.1 万名政治犯，还有几乎同等数目的犯人被关押在集中营。甚至连法西斯德国大使施托雷尔也深信，到 1940 年年底至 1941 年初，在西班牙监狱和集中营里关押的“赤色分子”达 100 万到 200 万人之多。西班牙，在法西斯的统治下，变成了活的人间地狱。

西班牙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在这一罪恶活动中，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法西斯强盗结成了联盟。至此，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

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欲知德、意、日三国结盟和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章德意日结盟

狼狽为奸黑心肝，欲霸世界逞凶顽；
紧锣密鼓扩军各，结盟侵略为祸患。

话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武装干涉西班牙的罪恶行径中结成了反动联盟。在此之前，德意对中欧和多瑙河流域各怀鬼胎，特别是在奥地利问题上素有矛盾，但是，为了共同对付英法，它们在外交上需互相支持，采取一致行动。

希特勒在执政前，就曾打算和墨索里尼结为“盟友”。1928年8月，他派特使前往罗马，就酝酿政变一事与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达成谅解。1930年夏，德国“铜盔团”代表团受到墨索里尼的热诚接待。德国首席代表说，两国命运相同，自应共同前进。在对西班牙的政策上，希特勒竭力把墨索里尼拉到这边来，同时离间英法和意大利的关系。1936年10月24日，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前去会见希特勒时，希特勒趾高气扬他说：意大利和德国一起，不仅可以征服“布尔什维克”，而且可以征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在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过程中，“柏林—罗马轴心”形成了。1936年10月25日，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签署了德意正式协定。其内容主要是，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两国正式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府，并加紧武装干涉；两国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在这方面意大利对德国作出了若干让步。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个法西斯头目一致认为，德意与英、法、美争夺的重点是在欧洲及其侧翼——非洲地区，但是它们需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有一个同伙，使英、法、美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而日本帝国主义，凭借迅速增长的实力，正企图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独占中国，称霸亚洲，因此也希望在欧洲能找到盟友。经过密谋磋商，德国与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至此，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三国缔约后三天，希特勒便在慕尼黑叫嚷：“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了。起初是欧洲轴心，现在是世界的大三角……这个大三角并不是由三个微弱的幻影组成的，而是由三个大国组成，准备并决定实现它们的权利和确保它们的生死利益。”

随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结盟，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也就正式形成了。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约300万平方公里，还被迫交出了面积约占1/4、人口约占1/10的本国领土。和约规定，德国需支付1300亿马克的赔款，同时在军备方面还要受到很多限制。尽管如此，但其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却根本未被触动。统治阶级又将《凡尔赛和约》强加于德国的种种经济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和约的苛刻限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被用来煽起民族复仇主义。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上台后，正是利用借此煽起的民族情绪，为其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

德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力量，曾提出取消赔款或延期偿付的要求，但遭到法国的坚决拒绝。法国和比利时还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然而，英国为了不让德国过度削弱和不使法国在欧洲更加强大，采取了扶德抑法的

政策。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后，英国表面上不公开谴责法国，但暗中鼓励德国对抗，以坐收渔利，德法冲突虽未扩大，但法国的行动引起了德国人的强烈不满，鲁尔区的德国人拒绝执行法国占领者的命令，工矿企业实行总工、停工。马克飞速贬值，到 1923 年年底，马克同美元之比值竟跌至 40 亿：1。

由于德国通货膨胀和生产下降，法国期望得到的赔款完全落空，还得支付沉重的占领军军费的开支，在国际上也处于孤立地位，最后不得不接受英美提出的条件，即德国的赔款应按照英美两国的意见重新审议，法军撤出鲁尔区。后来在美英经济的大力扶持下，1924 年德国经济开始恢复，1925 年出现了工业高涨，1927 年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到 1929 年，德国的工业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已超过英国和法国，仅次于美国。

1929 年至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德国经济受到沉重打击。1932 年，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 40.6%，退回到 19 世纪的水平，失业工人达到 800 万，占德国工人总数的一半。农民的生活也日渐恶化，纷纷拍卖田产，仅 1932 年就拍卖 14 余万公顷的土地，同年农民债务高达 130 亿马克。在整个危机期间，德国国内动荡不安，罢工、示威游行不断发生，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迅速高涨，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在 1932 年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得票 600 万张，在国会中拥有 100 席。面对着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惊恐万状。他们感到再用资产阶级的老办法已经不能维持其统治了，因而决心采用独裁统治和暴力镇压来维护其政权；在对外政策上，决心采用侵略扩张政策，靠掠夺别国人民来摆脱经济危机。他们要向战胜国索讨殖民地，叫嚷“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因此，德国统治阶级便乞灵于公开鼓吹恐怖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迫不及待地要把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扶上台。

1933 年 1 月，希特勒一上台就立即实行法西斯的极权政治，血腥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疯狂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力扩军备战，提出“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军费迅速上升。从 1933 年开始的 6 年半时间内，德国军费支出高达 900 亿马克，占同期国家预算支出的 3/5。

德国为了扩军备战，必须逐步和最终完全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1933 年 10 月，希特勒以要求“军备平等”为理由，宣布退出裁军会议。1934 年 8 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限额从 10 万人扩充到 30 万人。1935 年 3 月，正式宣布建立德国空军。德国飞机的产量迅速增加，1934 年生产飞机约 2000 架，1938 年增至 5200 架。1935 年 3 月，德国还正式发表了重振军备的宣言。他们一方面制造苏联赤色“威胁”的谎言，表示德国重振军备是为了反对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宣称，德国增加军备是为了“维持和平”，并表示德国的军事力量，“绝不愿为战争上攻击之用”，以取得英法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宣布实行国防军法，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将军队和地方警察扩编为 12 个军、36 个师，约 50 万人。

1936 年 3 月，希特勒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加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至此，《凡尔赛和约》所给予德国的限制和束缚也就荡然无存了。同年 7 月，德国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之后又鲸吞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随着实力的增加，侵略的胃口愈来愈大。地处欧洲心脏地区的法西斯德国就变成了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策动者，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

希特勒为了麻痹英法，竭力制造“西方无战事”的假象。他每撕毁一页《凡尔赛和约》，就对西方大摇一阵橄榄枝；每采取一项扩军备战措施，就大叫一通对付来自东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就在进军莱茵区的两小时后，希特勒立即对西方发誓赌咒：“我们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努力地求得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特别是同我们的西方邻邦之间的谅解……我们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

希特勒的这套伎俩，在西方国家极为奏效。它们出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本性，把希特勒德国看作是镇压欧洲革命和进攻苏联的突击力量，因而，它们不仅容忍希特勒德国撕毁了《凡尔赛和约》，而且还把武器塞到它的手里。美英两国继续给德国大量贷款，对德国的军事工业进行投资。西方国家接受德国对军舰、坦克和其他武器的订货，还帮助德国建立了急需的人造物资的生产。有 200 多个美国公司直接参与了德国重整军备的活动。美国镍托拉斯甚至保证完全满足德国对战略物资镍的一切要求，保证协助德国建立镍的储存。这一切都是作为对希特勒反共的犒赏，竭力要把希特勒德国这股祸水泼向东方。

但是，希特勒德国重新武装起来之后，就立即把手伸进英法的势力范围，开始一个一个地摧折英法帝国主义欧洲战线的侧翼，力图造成一个反包围的战略态势，最后终于向一贯纵容支持它进行侵略扩张的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开刀了。

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用武力向外实行侵略的欧洲国家，又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帮凶。意大利濒临地中海，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20 世纪初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一直对分赃大少不满，力图夺取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在地中海建立一个“大罗马帝国”。但意大利经济基础薄弱，特别是在 1929 年经济危机之后，预算出现巨大赤字，全国失业人口超过 100 万。为了摆脱危机，墨索里尼极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通过武力进行扩张，独霸地中海，控制红海通向印度洋的航路，以削弱英法与亚洲殖民地的联系，发动了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 年 5 月以死伤 14 万人的代价占领了阿比西尼亚，并将其与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合并，组成意属非洲帝国。

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全境不久，又伙同德国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并于 1936 年 10 月签订了共同协定，结成了“柏林—罗马侵略轴心”。

日本帝国主义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之一，日本是亚洲的战争策源地。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当时的人口约 6000 多万，资源贫乏。1868 年实行明治维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军事的、封建的而又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使日本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在军事上则连续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日本法西斯组织在 20 年代就已出现。到 1936 年，法西斯团体扩增到 350 多个。日本法西斯团体的大本营就是以垄断财阀为后台的日本军部，许多高级将领都是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都是法西斯组织

“一夕会”的主要成员。1930年成立的法西斯组织“樱会”的骨干，则是日军参谋本部、陆军省、宪兵队、步兵学校的一批军官。这几个法西斯组织活动猖獗，竭力鼓吹以“国家主义”来“维新”日本，实行“彻底的大日本主义”。

1936年6月26日，法西斯势力策动陆军举行军事政变，袭击首相和大臣的官邸，大藏大臣、内大臣、教育总监等人被杀。政变分子要求成立军人政府。当天，日本统治集团更换内阁成员，同军阀关系密切的前外相广田弘毅出任首相，组成了以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广田内阁较前届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战争政策。

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速了军事化的步伐。从1931年起，日本的军事预算年年上升，1936年达到10.78亿日元，占财政支出的47.2%，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也是垄断资本扩大的过程。到1936年，大垄断企业特别是重工业部门，一般都控制了各该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经济军事化促进了财阀同军部的勾结，为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

日本强化法西斯统治和实行经济军事化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实施侵略扩张，它的侵略目标首先是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逐步向热河省（今内蒙、河北省之一部）和华北蚕食。1933年1月初，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月又侵占热河省，并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1937年7月7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欲知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日军大举侵华

芦沟桥上动刀兵，大举侵华世皆惊；
闪击华北寇得手，军民奋战煞敌风。

就在德意法西斯加紧在欧洲和非洲横行侵略扩张的时候，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的烽火在这里燃起，一场神圣的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开始。

在日本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的四相会议，密谋侵占华北。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奏折中又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形势，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如此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

为了广泛地进行侵华战争动员，当时在东京，歌舞剧院在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日本大本营为了表彰战死者，这三个侵华“英雄”，被特升两级，授予金鸡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摄制了一百部以上的影片，并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日本军国主义在不遗余力地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采取措施发动战争，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同时，英美对日寇的侵华行动，仍采取观望的政策，这无疑对日本军国主义起了纵容的作用。而这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巩固和广泛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趁此时机，尽快占领中国。

“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当时，华北局势十分动荡，亲日分子非常嚣张，投降暗流蠢蠢欲动。那时北平外围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的伪军。仅在北平的西南面，尚有我二十九军部队防守。当时，北宁铁路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于平汉铁路线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

芦沟桥是中国富有诗意的名胜之一。这里曾经是唯一通向“王朝”京城之路。远道而来的游客不顾旅途劳累，总要在旅程中安排一天，早早起来，赶在天亮前登桥观赏一番迷人的“芦沟晓月”（燕京八景之一）。从金朝起，经元、明、清数代，八景名称虽屡有变动，但其中的“芦沟晓月”一景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文人学士写诗作画的生动题材。

清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芦沟晓月”碑，至今立于桥东端的北侧。石碑古朴凝重，保存完好。碑阴题诗情景交融，是芦沟桥风光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景色十分诱人。低低的砾石河岸夹抱着河床，黑森森的河面上波光粼粼，东方已是红霞一片，天空却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这座栏杆上刻着狮子的白石桥仿佛是浮在月色中。银白色的月光和东方的玫瑰色的曙光交相辉映，

像两条大河的水汇合在一起。石狮子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狮子，各具神态。有的凶猛欲噬，有的肥胖滚圆，有的意态懒散，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嬉戏耍闹，有的彼此交头接耳，有的安详地伏卧在母狮怀里……485只狮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据史书记载，芦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完成于公元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筑的。全桥长266.5米，宽约8米，共有桥拱11孔。熟悉欧洲文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来到北京，对芦沟桥赞不绝口，他认为此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由于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时加修建。

芦沟桥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石桥，桥西南与长辛店相距6公里，东与丰台相距7公里。它联络着京广、京包、京山三条铁路干线。“芦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这里是北京以至整个华北通向我国南方的咽喉之地，自古为兵家所必争。

当时，芦沟桥的军事地位更非一般。若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进就可以攻，退就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就成为敌我必争之地。日军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当时，驻守平津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冯在1926年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0年发生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引退，下属部队的一部分进入山西南部，被张学良改编，定番号为第二十九军。这个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队编成两个旅，作为正规军使用，总兵力不下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刘汝明的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天津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师部驻西苑，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何基沣旅驻芦沟桥和长辛店一带，陈春荣旅驻保定一带。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于1936年8月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一天比一天加紧了。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鉴于冀察形势，中国共产党对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除通过二十九军内部进步官兵直接影响该军上层人物外，还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经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二十九军表示大力支持。还经常趁着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鼓舞和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允许

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实行它的“国策”，发动对中国的全面军事进攻。特别是德意法西斯的支持和英美的纵容，就更加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是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事件”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古老的芦沟桥畔发生了。芦沟桥离北京城20里，特务头子土肥原事先曾到现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那天晚上，日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守卫在宛平城内。日军诡称从中国方面听到枪声，日本待工队长随即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他说，演习时有一个叫石山的士兵失踪了，很可能是被中国人打死或抓走的。于是，兵临城下，非要进城搜查不可。

中国驻军拒不开城，日军一个营便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野蛮的进攻。

所谓“士兵失踪”，只是日本的故伎重演而已。“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侵略者借口一名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失踪而挑起的。其实呢，这位中村上尉并未失踪，只是秉承他的上司的旨意去搞罪恶的勾当罢了。后来日本当局怕露了马脚，不得不偷偷把他遣返回国。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又是借口一个日本士兵“失踪”了，从而无理闯入我吉星文团防区，狂妄要求搜查宛平，并且炮轰宛平城。正如冯玉祥将军在这次事变发生后两周对记者说的：“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八’的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日寇的无理进攻，激起了中国将士们的愤慨，当地驻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战士们豪迈地提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8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日军实行白刃战，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的鼓励下，抗日热情高涨。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因此，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士气旺盛。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接着，7月13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了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立即组织北平的各爱国团体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携带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在这一期间，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的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的经费。有不少国民党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芦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进攻时，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而夺取平津以至华北的阴谋，它宣称华北事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冀察当局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在其主子的号令下大肆活动。汉奸齐燮元，过去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现在又亲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还乘机秘密进行逼走宋哲元而使冀察进一步敌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而就在这诱降的烟幕下，日寇却更积极地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调派10万陆军来华；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

在日本帝国主义燃起战火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紧急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亲日派大唱“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英美派则等候美国表示态度，以决进退。7月17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虽然宣布了准备抗战自卫的方针，但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而张群玩弄的“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真言”，竟成为国民党对待神圣抗战的“法宝”。

所谓“十四字真言”，就是在大敌入侵、举国要求抗战的情况下，一味求和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势必天下大乱。因此，必须假装抗战，应付一下。但一战就败，败而后和，就可以遮人耳目了。和后再借日本的力量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一消灭，就可以“永治久安”了。当时在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言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除张群的“十四字真言”外，还有美国买办孔祥熙的“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十二字秘诀。其真意是，参加抗战的招牌可以打一下，但实际上是观而不战，让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厮杀，待两败俱伤时，再收“渔翁之利”。

在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影响下，直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任的宋哲元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他把日军的大举侵犯仍看作“局部的冲突能随时解决”。这种苟安的心理，和蒋介石仍想寻求“外交解决”的侥幸心理一样，因此，在华北军民坚决抵抗日军的同时，宋哲元仍在日本的欺骗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谈判。

就在谈判的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运来的大批日军也

由塘沽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本援军调齐后，便又开始向我大举进攻。

7月21日，敌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26日，日机十余架猛烈轰炸廊坊。同日，北平广安门外有30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27日，日寇一面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一面即于当晚猛攻南苑和北苑。28日，日军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守军死伤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宋哲元于28日晚自北平逃往保定。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

芦沟桥畔侵略者的炮声，震撼着中国大地，全国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的怒潮，席卷了全国。要求救亡图强的电文纷纷投来，冲击着屹立在鄱阳湖和长江之间的庐山，冲击着蒋介石的统帅部。

由于形势所迫，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全国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力主抗战，蒋介石在庐山军政会议上，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他说：“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较为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这一讲话和号召，受到全国所有爱国党派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继庐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届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逐步展开。8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国民党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声称“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其作战序列规定：第一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为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兵力为第六、第七集团军及骑兵第一军等，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兵力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集团军，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福建、广东，兵力为第四、第十二集团军，由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山东，兵力为第三、第五集团军，先由蒋介石、继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同时命令第一战区阻击津浦、平汉两路南下敌人，并侧击南口敌军；第二战区进攻察北的敌人；第三战区击灭淞沪登陆敌军；第四战区固守闽粤海岸；第五战区防守山东及津浦路徐州地区。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腐败，统帅部对抗战缺乏信心，且对敌人存有幻想，指挥失当，以致节节败退。平津沦陷后，华北战场上的日军就以平津为据点向平绥、平汉路、津浦路三方面进攻；又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

路，然后南下，从平汉路西取正大路，以西攻山西。夺取山西是当时日军在华北作战的首要目标。

这时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心急如火，认为天皇立功的机会到了，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关东军一支“精锐”兵团向察绥扑来。日军为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沿平绥线进攻南口，8月2日于张北击败了刘汝明的军队，越过长城线，攻占了万全县，夺取了八角台。8月24日侵占了张家口。沿线国民党守军，采取了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作战，坐待敌人的集结和迂回，不主动出击，其后则不战而退，以至于平绥线上的战地相继沦陷。接着，日军由察南向晋北挺进，晋北重镇大同守军又弃城逃走，使敌人轻易地于9月12日侵占了大同。

日军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负责晋绥防务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他手中的军队虽说号称数十万，但这些军队，军纪败坏，不少官兵染有吸毒恶习，战斗力极差，因此一击就溃，不战即败，望风而逃。不难设想，像这样一支腐败的军队，怎能保家卫国、抵御日寇的侵略呢！因此，日军攻陷大同后，晋北门户洞开，加入无人之境，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攻陷包头。11月8日太原陷落。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汾阳以西、太原以南狼狈逃窜。

当时平汉北段，设有三道防线。第一线为房山、固安等地区，由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和万福麟第五十二军防守；第二线为安新、漕河、满城，由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防守；第三线为正定，由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和独立第四十六旅防守。房山守军防御得宜，下级军官和战士作战勇敢机智，白天战斗不利，便在晚间奇袭敌营。日军由固安强渡永定河，迂回至高碑店，我守军向涿州、涞水、易县转移。9月中旬，第五十三军由任丘撤退，10月初撤到邢台。该部吕正操第六九一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在任丘、容城、清苑、高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抗日青年纷纷来投，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数万人的抗日队伍。

日军侵占徐水后，即向保定进攻。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不力战而放弃满城，10多万大军争相南逃，保定旋即陷落。第五十二军撤至鹤壁，在漳河抵挡一阵就驰往彰德。商震部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在正定滹沱河北岸布阵，坚决抵抗日军。此时，南京政府统帅部命令其他部队向娘子关转移，仅留商震第三十二军和平汉路正面坚持抵抗，经数天战斗，不支而退。10月13日，石家庄陷落。日军遂占领平汉路北段。

1937年10月26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河北成安县，遭到我爱国军民的坚强抵抗。日军一个大队约500人，几乎全部被歼。在这次战斗中，守城的军队、自卫团和从四乡赶来的各村民团，手里拿着枪支、大刀、长矛、梭标等武器，一齐杀向敌人。整个成安城北，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到处是冲天的杀声。战斗从10月22日清晨一直打到10月23日上午9时许，共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几十挺，步枪300多支以及指挥刀、手枪、报话机、弹药、药品等战利品多种。这一仗，大长了我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

这一仗结束之后，恼羞成怒的敌人，从邯郸抽调部队进行报复。当时，我方援军未及时赶到，成安陷于敌手。11月6日拂晓，我军某营从城东北角挖地道攻入城内，配合民众组织与日军展开了逐房逐屋争夺战。后因援军不继，我城内部队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对参战群众残酷镇压，在城内杀害居民3600多人，在城外附近杀害2000余人。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了

人民的反抗，他们掩埋了乡亲，擦干身上的血迹，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与日军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

当北平激战之际，驻守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于7月29日向日本驻津各机关及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祥联名通电：“誓与天津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反顾！”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及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中的海光寺营房，给敌人以杀伤。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昼夜，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

1937年8月，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他们从平津等地撤出后，即南下防守津浦路北段静海、唐官屯、德州等要地，另一部分部队在津浦路和平汉路之间进行游击战争。9月中旬，庞炳勋与刘多荃军在沧州以北激战五日，终因大雨滂沱，工事被淹，始逐渐后退。11月11日，日军攻占大名，守军退至卫河南岸。12日，日军攻陷惠民，13日又攻陷济阳。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不战而退到黄河南岸阵地。至此，华北大部分重要城市被敌军占领。

在平津沦陷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芦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随后，毛泽东主席又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华北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为保卫华北和祖国而斗争。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作了紧急部署：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参加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凡平时担任公开工作，并且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立即设法向内地撤退；凡平时隐蔽较好，并且有社会职业或有条件就业的，应该深入隐蔽下来，准备作长期地下斗争。同时，党向广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伟大的号召：与工农群众结合，与革命武装结合。“到前线去”的口号激励着千百万青年的心。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大举进攻，面临着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员和广大的华北爱国青年，特别是经过初步锻炼的数千民先队员，在中共领导下都积极行动起来，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民先队总部将一部分民先队员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相当多的人奔赴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山东、中原、华南各抗日根据地，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在河北，有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率领的由一部分平津和保定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艰苦地转战在大行山上。在山西，许多革命青年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新军和牺盟会。有的平津学生前赴晋西北参加了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在山东，一部分南下的民先队员刘居英、林一山等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和济南学生组成山东纵队，活跃在泰山一带，后来和八

路军东进部队会合，建立了鲁西北根据地。在广东一带的一批“一二九”青年，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到处响起了雄壮的抗战歌声：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走出工厂、田庄、课堂，

到前线吧，

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是全国人民的呼声，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呐喊。神圣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中华儿女多壮志

义愤填膺要出征，东渡黄河抗敌兵；
中华儿女多壮志，平型关战显威风。

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每师下属两个旅。部队整编后，浩浩荡荡开赴抗日前线。

按照国共两党商定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30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十日内灭亡中国。

就在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路军出师抗战了。在这之前。

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它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实现这十大纲领才能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要求，扩大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开放民主爱国运动，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片面的政府抗战、军队抗战变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向中共干部反复说明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

毛泽东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他已经想到了很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扫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全党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正在紧张训练的全体红军。他们个个义愤填膺，请战书、保证书、决心书像雪片似的飞到指挥员的手里，每一份后边都密密麻麻地签着一片名字。每个人的心头上都烧着一团火，恨不得立刻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红军整编后，在开赴火线前，各师都分别进行了庄严的宣誓。誓词是：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誓言震撼着清晨的原野，誓言激励着战士的心，誓言也激励着成千上万的抗日群众。战士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队队、一批批地出发了。他们踏着泥泞山路，向同蒲线急进。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黄水滚滚而下，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滚滚怒涛，似催征的战鼓，向中华民族的儿女发出了战斗的号召。这次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是红军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军交战了。将士们多年的抗日夙愿就要实现了！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肩上。

雁门关本是当时日军进攻的目标，但因为这里有天险作屏障。易守难攻，故日军又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直入繁峙、代县，切断雁门关后方，然后进逼太原。这时，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以后，即于9月中旬赶到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集结，决定利用平型关险要地形，从侧背出其不意地予敌以猛烈袭击。

9月23日，当日本侵略军占领灵丘并准备向平型关推进时，一一五师已全部集中到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和上寨。当时决定以全师主力埋伏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以北的某高地，断绝敌人的归路；并派出骑兵全部、步兵一部向灵丘方面出动，担任牵制和打击敌人增援部队的任务。

9月25日，日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4000人，100余辆汽车在前，200余辆大车在中间，少数骑兵在后，完全联成一线，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内。约5时半，我八路军健儿向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进攻。我全线部队居高临下，首先以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使其前面的百辆汽车无法逃走。敌人毫无防备，一遭袭击，数千人的部队即在短狭的山谷内乱作一团，汽车、大车、人员、马匹互相撞击。乘敌混乱之际，我军立即向敌人展开猛烈冲锋。这时，阻击敌人从灵丘增援的我军，也打退了前来援助的敌人。

日本侵略军已陷入绝境，但仍企图顽抗。于是，我军和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终于以无比的英勇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把困兽犹斗的敌人完全消灭在平型关以东10里内的地区。敌人死伤的人马、被毁的汽车、遗弃的武器弹药，塞满了两山之间的公路。

平型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据统计，歼灭了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3000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大车200辆，缴获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1000多支、日币30万元以及大量军需物品。

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事实，打击了汉奸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等荒谬论调，给“唯武器论”者和害“恐日病”的人们当头一棒，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挫伤了日本侵略军的锐气，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著文说：“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

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和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加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

平型关大战后，忻口会战开始，八路军在敌侧及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了忻口会战。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不断袭击敌人，破坏日军的交通，收复了繁峙、平型关、吴丘、广灵、浑源、蔚县、阳原、涞源、紫荆关等地，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线，深入到平汉线方面积极活动的一一五师另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等县城，进逼到保定附近。一二师开到晋西北以后，即深入到大同附近，开展雁北的游击战争。10月18日曾伏击日军汽车500余辆于雁门关之南，并曾数度攻占雁门关，收复了宁武、扬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截断了日军在同蒲路北段的后方联络线。

八路军在敌后的广泛出击，使忻口战场日军粮秣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法供应，而机械化部队缺乏汽油则不能作战，因此敌人不得不用飞机运输。这时一二九师的七六九团第三营，突于10月19日夜，冒雨奇袭阳明堡（位于代县南8公里）敌飞机场，焚毁日机24架。

芦沟桥事变后，八路军从出师至11月初，两个多月来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敌11000余人，缴获步枪1300多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多匹，击毁敌机24架、汽车坦克600余辆，牵制了大量敌军，使其不得长驱直入渡河西进，并解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厄运，起了重大的战略掩护作用。

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占有主要地位。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战区和沦陷区人民拿起武器，进行保家卫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省地处要冲。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刘少奇、杨尚昆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支持下，华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烽火连天，群众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中共河北省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地处河北中心的冀中平原，人民群众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阳、蠡县农民即举行过革命暴动。“一二九”运动后，这里是学生爱国救亡活动的重要地区。“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就派孟庆山来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系红军中一个团长，河北蠡县人，临离延安前，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指示他，要他在日寇大举南进、国民党大溃退时，在当地党领导下，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不放松一切时机积极组织武装，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孟庆山一到石家庄就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们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训练骨干，地方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壮大，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日渐深入人心。1937年9月，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地沦陷后，中共保属省委就在安新、安国、蠡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团，共2800人。继之，定县、无极、深泽、安平、肃宁等地，在当地共产党员领导下，也陆续建立了小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从此，冀中的抗日救亡

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就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官员纷纷南撤的时候，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同国民党脱离关系，改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

1937年10月末，部队到达蠡县。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军队迅速发展壮大，战斗在滹沱河到大清河广阔的平原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军队就发展成一支拥有7万人的强大的抗日武装，并在40多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

在冀中抗日武装飞速发展的同时，北平郊区和河北其他地区的群众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活动在北平郊区和平绥路一带的平西抗日武装于1937年10月，攻克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救出被押同胞200余人。中共直南特委在内黄、濮县、滑县等地，组织了抗敌后援会，接着成立了以唐哲民为司令员的抗日游击队。正大路和阳泉煤矿的工人，在敌人进占娘子关时，组建了工人游击队，活动于太谷、榆次等地，共产党员杨秀峰教授等在赞皇、元氏一带成立了“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中共磁县特委在当地建立了抗日政权，并于11月间先后组建了民军第四、第十三、第十四支队以及磁县警备队和“抗日义勇军平汉纵队”。

冀东人民在八路军部队的配合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汉奸殷汝耕组织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地区完全变成了日伪铁蹄统治下的殖民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冀东人民在全国抗日斗争的鼓舞下，开始了新的战斗。1937年9月，在冀东成立了以李运昌为首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积极组织和发动人民，人民抗日自卫组织迅速发展，普及到9个县，有15000名会员。同时，党积极争取地方民团武装，领导工人罢工，建立地方武装，准备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一二九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一个支队，在平西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向冀东挺进。

第四纵队成立后，立即越过白河，进军冀东，连克延庆、昌平，并留下一个大队在平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开了昌（平）滦（平）密（云）地区的局面，打下了平北根据地初步基础。7月，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冀东各县30万群众举行抗日大起义。起义群众攻占了玉田、乐亭、芦龙、蓟县、平谷、迁安等6座县城，捣毁伪政权，在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达10万余人，由党直接掌握的约40000人。冀东抗日起义，使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和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在统一战线形式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七七”事变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牺盟会”的形式，山西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已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上的失败，阎锡山感到他的晋绥军已不顶用，必须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为此，他要求薄一波等帮助他创建新军。

经过中共北方局的批准，1937年10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和国民党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共四个纵队。第一纵队由薄一波领导，主要活动在太岳区；第二纵队由韩钧、张文昂领导，主要活动于晋西南；第三纵队由董天知、戎子和领导，主要活动于上党地区；第四纵队由雷任民领导，活动于临汾、大宁、临县一带。共产党领导的太原及同蒲铁路工人2000余人，成立了“工卫旅”，开始活动在晋中地区，后与

决死队第四纵队都转到了晋西北。晋西北在续范亭主持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 13 个抗日游击队。同时争得阎锡山的同意，在各专区还成立了一二个保安旅。新军迅速成长壮大，共有 50 个团的番号，对山西的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东人民的抗日武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7 年 12 月，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会议，制定了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发动群众，抓紧敌军入侵、国民党军败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机，坚决领导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和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参加起义，起义部队采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为了加强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向山东派遣了数十名红军干部，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骨干。

1937 年 12 月，胶东人民在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在文登东部的天福山举行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与此同时，掖县、蓬莱、黄县等地党组织也领导了武装起义。1938 年 1 月，第三军成立了军政委员会，部队扩大为四个大队，同年 2 月，起义军攻入牟平县城，战后，部队在雷神庙遭强敌袭击，部队领导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英勇牺牲。4 月，第三军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整编胶东各地起义部队，分别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设各路指挥部，共辖部队 7000 余人。

在鲁西北，驻聊城一带的国民党爱国专员（山东省第六区专署）范筑先，抗战初期已与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共山东省委曾派组织部长张霖之等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平津爱国学生，去鲁西北协助范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 11 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范筑先拒绝了韩复榘的南逃命令，重回聊城坚持抗战，将鲁西北的杂牌武装改编为 30 个支队。同时，中共鲁西北特委还独立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后合编为范部的第十支队。

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打击敌人，消灭汉奸，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38 年 3 月，为配合台儿庄战役，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各地游击队广泛向敌出击，第四支队袭击新泰至临城公路，泰西人民自卫团破击津浦铁路，胶东第三军攻克莱阳、掖县，清河区第七、第八支队连续破击胶济铁路，等等。计从 1938 年 1 月至 5 月，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共作战百余次，解放了肥城、长山、邹平、淄川、盐山、乐陵、博山等县城 15 座，声威大振，部队得到了迅速扩大，至 1938 年夏天，部队已达 40000 余人。抗日武装的胜利发展，使山东人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也为山东抗日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就在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的时候，上海保卫战也在炽热地进行。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淞沪抗战

保卫上海浴血战，官兵奋勇杀敌顽；
只因蒋氏瞎指挥，大军溃败留抱憾。

日军侵占平津后，1937年8月13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威胁，蒋介石才下决心抗战。8月14日，他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努力确保大上海。

蒋介石前后调集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1/3强。参加上海抗战的又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师。蒋介石先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张治中为前敌总指挥，后又亲自兼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日军投入上海的总兵力达20多万人，大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兵舰数十艘。这是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无疑，敌我双方一致认为，淞沪地区是举足轻重的。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因此，日本参谋本部在入侵华北的同时，制定了华东地区的作战计划。

由于“一二八”事变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然而，日军在上海兵力却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日租界筑有经营多年的坚固工事，还得到其海军第三舰队的支援。中国政府为防止日军再次攻击淞沪，进犯华东，自1935年起，先后修筑了吴福线（吴县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乍平嘉线（乍浦经平湖至嘉善）三道国防工事，1937年初竣工。“七七”事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进犯上海的可能，于8月上旬命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所部秘密向吴县、常熟、无锡一带集给，以应付突然事件。

张治中将军原来在青岛养病，芦沟桥的炮声改变了他养病的打算。他拒绝医生再三的劝告，第二天便回到南京，接受了蒋介石委任他的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他一到任，就抓紧战备。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区及甬翔方面布设炮位，连续举行演习。日军将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调到上海，日军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对海口实行封锁。在日本国内也已派定陆军，待命出动。日军先后制造水兵宫崎失踪及撕毁国旗事件，形势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张治中回忆1931年以来中日关系的变化，想到“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情景，根据当时敌情的判断，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这次淞沪抗战，一定采取“争取”一着。他对部下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说：“中国对付日寇，我分析：第一个时期是‘九一八’东北之役，敌人打我，我不还手；第二个时期‘一二八’战役和长城战役，敌人打我，我才还手。这两个时期我们都吃了大亏，东北之役，丢了东三省，日本军阀炮制了一个伪满洲国；‘一二八’战役和长城战役，订了个《中日上海停战协定》，长城战役以后，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形成华北特别区，这两次我们都吃了大亏。教训惨痛，

实应记取。”

“作为热血军人，我是决心抗战到底，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我读的那篇祭文里有这么几句话：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樽清酒，再告重泉。这次作战，决心已定，但知天是否能助我？”

基于这样的心态，7月30日，张治中给南京最高统帅提出作战方案报告，他写道：“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列征候之一，如：（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船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因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必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最高统帅部的复电是：“电悉，应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然而，张治中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因此，就在给南京统帅部电报的第二天，8月1日，发布了一篇文告，鼓励京沪区的卫国将士。文告写道：

“此日吾民族已临于最后关头，此日吾人亦陷于生死线上！光荣神圣的民族生存抗战之血幕必将展开。兹特揭櫫要义，为本区将士同志告。期以忠勇坚毅，共迎行将到来之无限艰苦，但必有无限希望的岁月。

“自甲午一役，失地丧师，我同胞忍辱负重，而徒抱复仇雪耻之愿者，已四十余年矣。乃敌自此更逞淫威，肆其凶焰，蹂躏我主权，占领我土地，荼毒我人民。本其岛国野心，妄标大陆政策，鲸吞蚕食，肆无忌惮，攻城略地，何日无之？因之‘九一八’之血迹未干，‘一二八’之屠杀顿起，长城之役甫停，察绥之变旋作。含垢忍辱既已六年，创巨痛深，几难终日。兹复驱师自衅，扰我平津，更且大举动员，图占冀察。然后挥师南指，侵我中原，跃马而行，纵横朔漠，以遂其逐步吞噬之迷梦。我最高统帅所以认为最后关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而举国人士所以奔走呼号，誓死不能退让者，正以此耳。”

文告又说到全面抗战实出于不得已，完全为自卫图存。接着说到同仇敌忾的重要意义，以信将士们的抗战决心。最后，张治中将军又提示了对敌作战应注意的几个要点。号召全军将士“替雪国耻，不怕死，不怕敌人，信仰中央，爱护袍泽，长期苦斗，百折不挠，实行连坐法等，作为京沪区全体将士们的精神教育和纪律的基础”。

同一天，8月1日，张治中又发表了一篇《告京沪区民众书》，除让国人提高亡国灭种的警觉及剖析敌国实情外，重在讲明这一战争的重要意义，发动民众尽力与军队合作，《民众书》写道：

凡我民众，无分男女，无问老少，智者尽其能，勇者竭其力，以绥靖地方，杜绝奸宄，厉同仇敌忾之气，坚至死靡它之心，以听命于政府。则虽不擐甲冑，不执干戈，不冒矢石，而其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实则伟大莫与伦比矣。至于体力精壮，英勇果敢之同胞，愿为父老之前驱，愿作本军之后继者；精警有为，熟悉敌情，能扑灭无耻之汉奸，能肃清地方之间谍者；抑或有他一技之长，愿以供战争之使命者，或编入地方组织，或隶属部队机关，不患无效命之机，不患无杀敌工具。昔孙武子以吴兵复楚，阎应元以江阴抗清，东南为人才文物荟萃之区，孤忠英勇之士，悲壮激烈之操，史不绝书。揆之

十步芳草，十室忠信之义，市井田畴，动多壮士，必有闻风兴起者。自由之葩已胎，独立之旗高举，为民族之英雄，抑为子孙之罪人，决不自择。惟我亲爱同胞，共勉前程，共纾大难，时乎不再，凛凛勿念。

就在张治中部加紧备战的同时，驻沪日军从8月上旬起，就不断向我挑衅。张治中曾两次向南京统帅部请示，要主动出击，先发制人，但都被蒋介石所拒绝了。8月9日上午6时许，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又带一士兵驾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进行侦察，不听卫兵劝阻，发生冲突，中国军队被迫将2人击毙。上海市长俞鸿钧闻讯后即与日方领事提出交涉，谋求以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日方乘机要中国政府立即撤出市内保安部队，拆除军事设施，并以武力解决相威胁。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在佐世保待命的机动部队，迅速驰往上海增援，战事已不可避免。8月11日，南京下令集结京沪线各部队向上海推进，并命海军阻塞江阴水道，防止日海军溯江西上。次日，王敬久第八十七师进入上海市中心江湾，并以一部固守吴淞；孙元良第八十八师进至北站、江湾之间；炮兵第十团一营与炮兵第八团在真如、大场进入阵地；江防由江苏保安第十二、第四两团担任。江阴航道阻塞作业也基本完成。

日本参谋本部8月12日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骨干组成上海派遣军。这时，张治中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攻击准备。此时，张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复电还是“不得进攻”。

因此，原定13日拂晓的攻击，不得不停止。张治中预定13日拂晓攻击，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失此良机，似乎太可惜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据说是：上海外交使团为避免上海作战，建议南京政府，改上海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这个建议文件，大概是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忽然命令我不得进攻，我未见着正式文电、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无从确断。”

我军的进攻，因此延到14日下午3时方才开始。这时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到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敌军已开始向闸北进攻，并先后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等地。张治中部奉命反击，淞沪抗战正式爆发。

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攻击虹口和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八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要地防空。

当天，中国空军首次出动，对虹口及汇山码头等处日军据点进行轰炸，并炸伤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首战告捷。随后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并列，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战斗至日没，中国军队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正当张治中部连续取得进展之时，突然，又接到南京统帅部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西待参京电）”，于是攻击实施，又因此停止。

8月15、16两日，都是奉令做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

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第八连与第七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15日，张治中又以京沪警备司令部名义，向全国发出如下通电：

各报馆转各部队、各机关团体暨全国同胞公鉴：元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国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率所部，星驰应援，保卫我先祖列宗莘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争取四亿五千万炎黄华胄之生存，誓不与倭奴共戴一天！今日之事，为甲午以来50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壮，彼为发挥野心之侵略，我为决死求生之自卫，无论暴政如何披猖，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愿我举国同胞，武装袍泽，毋忘我东北、平津数千万同胞呻吟于日寇铁蹄践踏之奇惨，毋忘我‘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天津战役忠勇牺牲先烈之血迹，以悲壮热烈之精神，共负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统帅之昭示，以百折不挠抗战到底之决心，求得最后最大光荣之胜利。擐甲陈词，不胜激越！

在日援军登陆以前，张治中将军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尤为必要。17日拂晓，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这天上午8时许，张将军到前线视察，经第八十八师炮兵阵地到第八十七师，所见官兵士气高涨，不怕牺牲的精神都极可嘉。从正午12时到下午4时，他在万国体育场附近督战，枪炮声密集，战斗异常激烈。当时敌机限于航程，未对中国军队形成很大空中威胁，中国空军在连日空战中取得击落日机42架的辉煌战绩。正当中国陆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敌人阵地纵深进击时，8月18日，张治中又接到南京统帅部暂停进攻的命令，这是开战以来，第三次的停攻命令。当时蒋介石对“国际调停”仍存有幻想，因此战争总是打打停停，延误了不少战机。

8月20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国划分五个战区，京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指挥陈诚。作战方针为：“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阻止后继敌军之登陆，或乘机歼灭之。”第三战区将全部兵力划分为：淞沪围攻军，指挥官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长江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长江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杭州湾北岸守备区，指挥官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浙东守备区，指挥官为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同日，淞沪围攻军以新到达的第三十六师加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之间，再次对敌发起总攻，并将攻击重点由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汇山码头，拟将日军截为两段，再分别围歼之。经一夜激战，第三十六师突破日军阵地进抵百老汇路，22日晚又一度进至汇山码头，但遭到敌海军炮火阻击。又因进展过快，对巷战地区搜索不严，以致敌便衣队与汉奸乘机纵火扰乱，攻击部队前后隔绝，失去指挥，形成混乱，官兵伤亡达2000多人。

8月23日晨，日军上海派遣军，辖第三、第十一师团，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于张家浜、狮子林、川沙口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夺占了沿江一些要点，其后续部队陆续上岸。日军第三、第十一师团主力登陆后，即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发起进攻。中国第三战区以长江南岸守备部队予以抗击。同时以第九集团军专事上海市区之作战，以新编第十五集团军负责吴淞镇以下沿江防线作战。第十五集团军自8月23日至9月11日，先后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方页之敌发

动攻击，予日军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伤亡甚大。罗店、吴淞、狮子林炮台、宝山、月浦镇先后失陷。迄9月17日，中国军队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西南、双草墩之线，继续与日军对峙。双方展开激烈争夺，陷入苦战状态。

东京日军统帅部，鉴于上海作战不能迅速取得进展，决定再次增兵，加强上海派遣军的力量。9月7日，以台湾守备队扩编而成的重藤支队，乘海军舰艇急派上海，并将华北方面军后备步兵10个大队及炮兵、工兵一部调到上海；9月11日，又下令调第九、第十三、第一一师团及军的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正式编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在9月20日制定的《作战计划大纲》中，提出“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以上海派遣军（以五个师团为基干）击败上海周围之敌”。日军决心将侵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移到上海。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月11日以后，蒋介石亲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9月21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十九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八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第一一、第九、第十三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加入上海派遣军之作战。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

为了避免日军继续突破，10月1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令左翼作战军各兵团，向蕴藻滨右岸陈行、施相公庙，浏河之线阵地转移。至3日拂晓前，完成新阵地的占领。10月5至8日，日军第三、第九师团在第十一师团和第十三师团一部的掩护、配合下，向蕴藻滨地区实施猛攻。中国军队经数日之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11日后，日军继续猛攻，企图进占大场，向南翔发展，截断京沪铁路。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滨南岸阵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中国军队伤亡甚重。10月15日第三战区重新调整部署，将蕴藻滨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令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加入大场方向作战。

中国守卫蕴藻滨南岸之部队，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统一指挥下，10月19日发起攻击，适逢日军主力也发动步兵炮兵联合进攻，双方造成大规模遭遇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相形见绌，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乃于23日开始撤退，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遂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至11月4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第三战区根据战局变化，乃撤销中央作战军，将全正面划分为左、右两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

当上海方面作战处于胶着状态时，日军统帅部就急于打破这种局面，决心采取新的措施。10月9日决定在杭州湾北岸进行登陆作战。20日，命令向上海方面增派第十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同时下达了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令，该军以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组成，柳川平助中将作为司令官。10月30日，又从华北抽调第十六师团等部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至此，上海周围的日军已达两个军九个师团，比华北方面多一个师团，显然主作战已经转移到华东地区，当时，日本留在国内的部队只有近卫及第

七两个常设师团。可见，日军在中国，特别在华东下的赌注，表明了“在上海附近进行决战的意图”。

日军第十军第一梯队登陆兵团——第六师团主力与第十八师团，在飞机火力掩护下，于11月5日拂晓，利用浓雾，向杭州湾北侧的全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卫、金山咀、漕泾等处登陆。由于沿岸担任警戒的中国军队兵力薄弱，为敌军击破，日军登陆成功。当时，中国军队方面，曾令驻浦东的第六十二师及独立第四十五旅与驻枫泾之第七十九师夹击登陆之敌，并令第一预备师由苏嘉路赶往增援，但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未能如期实施。日军乘机突进，一举进入黄浦江一线。

11月7日，日军将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由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大将兼任。同日，该方面军命“第十军以主力进入松江附近，协同上海派遣军在苏州河南面地区的作战，同时须准备以后向昆山方面的攻击”。8日拂晓后，日军第十军主力渡过黄浦江，进入松江附近，与中国军队第一八师一部展开激战。迄9日，松江陷落。

第三战区指挥部，鉴于苏州河南岸守军陷于苦战，战况难以好转。松江方面敌人的突进，使淞沪阵地翼侧受到威胁。为了保存战力，第三战区前线指挥部征得南京总参谋部的同意，乃于11月8日晚命令各部队向吴淞线国防阵地转移。然而，这一撤退的命令，却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反对。他全身戎装，怒气冲冲地来到总参谋部说：

“上海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基地，如果放弃，会使政府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上海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相信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战争可以早日结束。因此，必须收回撤退命令，要各个部队仍在原来阵地死守！”蒋介石的一番话使白崇禧大吃一惊：“天哪！在淞沪三角地带的数十万大军已经接到撤退命令，有的在行动了，怎么能够收回撤退的命令呢？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这位副总参谋长想起曾向蒋介石建议下今后撤，蒋介石一再坚持不允，如果早同意后撤，我军不会陷入敌人的重围。现在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再不下决心，撤退就来不及了。白崇禧见会上没一个人发言，觉得这件事干系太大了，作为副参谋总长，他有责任站出来，否则，这个收回撤退的命令下达下去，那混乱的局面怎么收拾呢？他站了起来，严肃地说：

“委员长，转移阵地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军令如山，前线各个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来的阵地，我看十分困难。”

“不要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蒋介石生气地说，“我们革命军人，东征，北伐以来，遇到多少困难？都叫我们克服了。打仗，怕困难还行吗？敬之，你是参谋总长，你说，是吗？”

何应钦在蒋介石身旁如坐针毡。他没法躲开，吞吞吐吐地开了口，内容却不着边际：“委座克服困难精神，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楷模，素为部属景仰。”

白崇禧一想到90万大军在前线乱作一团的情况，又仗着斗胆说：“现在收回撤退的命令，恐怕来不及了，而且……”蒋介石的怒火压不住了，不等

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事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

白崇禧说完，就对着他说：“议而不决，拖延时间，就来得及吗？如果前线将领和部队有意见，好办，我去前线说服！”

当天黄昏，蒋介石在一群高级参谋的簇拥下，乘火车前往苏州前线指挥部。在一座小学里召集军官们训话。蒋介石首先扼要地谈了敌我双方态势和国际间对上海战场的主要反应，接着便鼓励官兵。他说：“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你们坚守上海快三个月了，这在我国战史上是罕见的。你们在前线作战非常英勇，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继承我们黄埔的传统，表现了我们革命军人的伟大精神，博得了国内外的赞扬和支持。有你们这些善于指挥、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将领，何愁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蒋介石看到教室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师以上的将领都聚精会神地听他的训话。他想：如果现在宣布收回撤退的命令，晓以利害，大家会接受的。他说：“现在，九国公约国家的会议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上，美国同情支持我们，英国同情支持我们，法国同情我们，苏联也同情支持我们，总之，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同情支持我们。现在各国代表正在讨论会议宣言的草稿。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上海就不会沦入敌手，战争就可以早日结束了。”

会场上一片沉寂，没有一个人吭声，但有的惊愕，有的诧异，有的焦虑，大家都关心自己所指挥的部队，先后都把撤退的命令传达下去了，各个部队也都作了布置，有的已经行动了，怎么能够“再坚决死守一下”呢？

蒋介石也注意到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他认为大家还没有理解他讲话的深意。呷了两口茶，又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只要我们在上海能够继续顶下去，也就是再坚决死守一下，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一个小小的日本，侵略中国可以，怎么能够和美国、英国、法国与苏联这些大国对抗呢？这些大国一制裁日本，战争当然结束了。因此，我要收回撤退的命令，命令你们仍在原来阵地死守，死守！你们听清楚了吗？！”

“委员长的转移命令已经发布，有的已经行动了……”顾祝同这位第三战区的副司令官，对几十万大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得不提醒蒋介石。

“我知道！”蒋介石不耐烦地说，“撤退命令我现在收回，重新命令他们返回原来阵地！”

这样一来，淞沪地区的战场混乱极了，90 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地带，拼命抢路，闹得人仰马翻。

从沪西，经过青浦、南翔，到昆山一带地区，河汉纵横，没有准备船只摆渡过河，也没有一处可以徒涉，仅有的一条狭窄的公路上，没有接到新的命令的部队在继续后撤；已经接到新的要坚持死守命令的部队向原来的阵地返回，都在这条公路上相遇了。两边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公路堵塞了。人吵马叫，乱成了一团。本来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现在变成了一堆乱麻。

蒋介石的瞎指挥，部队的混乱，给敌人造成了围歼的绝好机会。在敌机狂轰滥炸和地面炮火的猛烈打击下，几十万大军，联络中断，失去指挥，溃不成军。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于敌手。蒋介石所指望的九国公约会议也完全落空了。会上通过的宣言说：“就法律而论，此次冲突实与九国公约即非战公约之签字国有关，就事实而论，实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有关。日本为干涉他国内政而使用武力，既无法律根据，且此项权利一经公认，将永为纠纷之渊源。”

蒋介石看了犹如“天书”一般的“宣言”也惊呆了。他一心指望九国公约主持正义，谴责和制裁日本政府，由此可以保住上海，结束战争，迎来和平。他把赌注都押在这上面了，现在上海已经失守，宣言空空洞洞，他的希望破灭了。

上海虽然失守了，但在淞沪战场对日寇的作战中，我陆海空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顽强，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战绩和人物。

在淞沪激战中，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展开战斗。8月16日晚，江阴区江防司令部派出“一 二”号快艇，自江阴经内河潜至上海黄浦江，进至距日军旗舰“出云”号300米处，向该舰施放两枚鱼雷，均命中爆炸，使日军旗舰遭受重伤。中国快艇在返航中被击沉，官兵泗水离艇。8月中旬，中国海军派出“甘露”等舰在江阴下游破除航海标志，堵塞航道，阻止日舰溯江上驶。同时，抽调“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辰宇”、“宿宇”等舰艇，以及国营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集的轮船23艘，合计35艘，下沉堵塞航道。随后，又征用一批民船、盐船陆续下沉，堵补航道空隙，并在江阴一段分布水雷。8月下旬，中国海军为拱卫首都南京，派“平海”、“宁海”、“应瑞”、“逸仙”等舰开往江阴封锁线，协同其他舰艇实施防卫，并与来袭的日本飞机进行了频繁战斗。至11月下旬，共击落日本飞机七架，重伤日本军舰两艘。

中国年轻的空军，在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在“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他们就从河南周家口飞来杭州，经过一番空战，首先击落敌重型轰炸机一架，这是日军的带队长机。这次战斗共击落敌机6架，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打破了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事后得知，木更津航空队长因而自杀。

8月15日，敌方木更津航空队，再次袭击杭州，第四大队当即起飞迎战。从14日下午到15日上午，高志航仅仅休息了一两个小时，体力不支，仍英勇作战。在战斗中，第四大队又获胜，打落了好几架敌机，其中分队长乐以琴一口气击落了4架。杭州空战后，中国空军又频频出击淞沪，与敌机殊死搏斗，沈崇海、任云阁、阎海文英勇牺牲。

沈崇海清华大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入第三期轰炸科，毕业时成绩名列第一，平时总以尽忠报国自勉。当时，他为第二大队第十一中队分队长，接到出击任务后，偕第六期毕业轰炸员任云阁驾驶双座轻轰炸机，率机六架，从广德机场起飞。飞至长江口，发现敌舰，这时飞机突然发生故障。他决定绕道浦东，命令后座任云阁跳伞在我军阵地降落，自己则准备驾机撞毁敌舰。但任云阁坚决表示与沈同生共死。于是，沈开足马力，推下机头，穿过敌人炮火网，带着一枚800磅的炸弹俯冲，与敌舰同归于尽。

阎海文是航校第六期毕业生，在第二十四中队当见习官，从开战那天起，他就天天盼望飞到天空杀敌。8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当他的飞机到达目标上空时，敌人高射炮火猛烈，他的飞机不幸被高射炮打掉一个翅膀，他被迫跳伞，降落在敌军阵地天通阁公墓。敌人四面包围上来，他卧倒在地，伪装死去。等到敌兵快到身边时，他翻身而起，抽出自卫双枪，左右开弓，当场击毙敌兵七名，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太阳穴，杀身成仁。

在上海保卫战中，我陆军将士奋勇杀敌，誓死如归，英雄辈出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以谢晋元副团长为首的800名壮士是一个英雄的集体。在四周全被日军占领、孤立无援的情况下，800名壮士不退让，不投降，激战

四昼夜，打退了日寇使用飞机、大炮、战车进行的多次进攻，歼灭了众多敌人，为祖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7年10月26日，大场失陷，我江湾、闸北地区的守军陷入日军两翼的进攻，第三战区司令部令第八十八师撤至苏州河以南地区，留下一团兵力于闸北地区牵制敌军。师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议，问谁愿挑起这副重担。这时，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说：“我愿留下。”于是委任谢晋元为团长，以该团第一营为骨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排击炮排，对外号称800人。当晚12时左右，该团奉命转移到四行仓库防守。谢晋元对大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现在我们四面被日军包围，这仓库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拼到底！”

四行仓库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银行联营的仓库，全长120米，宽15米，约有6层楼高，紧依苏州河而立，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谢团长率四位连长、一位排长查看了仓库，指挥将所有门窗用麻袋装土堵上，但留有射击孔。待全楼火力、兵员配备就绪已是次日黎明。早晨5时许，成群结队的日军蜂拥而来。团长一声令下，全楼火力一齐射击，打倒了200多敌人，大大鼓起了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接着，敌人又组织了几倍于我的兵力，发起第二次进攻。大楼东南角被敌人火力封锁，西北方向被重兵包围，形势紧迫。但谢团长胸有成竹，当即下令停止射击，节省子弹，等日军攻到大墙脚，用集束手榴弹消灭他们。激战到12时，敌人死伤惨重，尸体累累。下午1时，日军在楼西北角纵火，将附近房屋烧着，并发动第三次进攻。霎时，浓烟滚滚，好像整幢大楼都在燃烧。全团士兵在谢团长指挥下，一面阻击敌人，一面打开仓库内灭火水龙头灭火。战斗到下午5时，大火被扑灭，日军也停止了进攻，拖着几十具死尸沮丧而回。

10月28日上午8时，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又被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打退了。中午，谢团长巡视全楼，他拍着士兵们的肩膀问：“你们饿不饿？”战士们说，我们就是打5天也不饿。谢团长说：“你们真是中国的好男儿！”下午5时左右，敌人又发动第五次进攻，同样遭到失败。战士们奋战了两日，粒米未沾。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守军帮忙，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脚边。战士们在大楼底层打个洞抢运食品，为此阵亡3人，但全体官兵深受鼓舞。

10月29日，日军狂妄地宣称，“苏州河以北地区全部占领，敌人消灭净尽。”然而，就在当天，谢晋元他们又在苏州河以北的四行仓库粉碎了日军的第六次进攻。就在这天晚上，有一位名叫汤慧敏的女童子军，冒着枪林弹雨，冲进日寇包围圈，将一面国旗送到“八百壮士”阵地上。当时四行仓库所在地的闸北地区，已全被日军占领，到处悬挂着血腥的太阳旗。战火中的上海军民，当看到中国国旗飘扬在最高处的四行仓库屋顶时，都激动得流下眼泪。谢团长对战士们说：“兄弟们！我们要和国旗共存亡，誓死不投降！”

翌日黎明，当日军发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这面国旗时，首先用机枪向国旗猛烈扫射，接着又组织了第七次进攻。天亮了，在楼顶警戒的士兵发现苏州河边的敌人在和新垃圾桥北端的敌人打旗语，接着看到二三十个日本兵向四行仓库前进。这时，守在六楼窗口的一等兵石先达，看到那些日本鬼子旁若无人地接近仓库，步枪打不到他们，更来不及报告上级，鬼子一步步逼近了！不能迟疑，心想用一个人的生命去消灭二三十个敌人，不让敌人靠

近仓库，是值得的。他怀着满腔仇恨，取出挂在身上的四颗手榴弹，把盖子扭开，左手把手榴弹抱在胸前，右手拉着绳环；等到二三十个日本鬼子接近楼下窗口时，他从楼上的窗口纵身一跳，正好落在那二三十个日本鬼子当中，右手把绳环一拉，“轰轰！”四颗手榴弹几乎同时爆炸开了，升起一阵又一阵的浓烟。石先达完成了报国的忠诚心愿，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守卫在各窗口的官兵被石先达的英雄行为激动了，个个热血沸腾。石先达壮烈的牺牲就是命令，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射击。战斗持续到下午二时，敌人的第七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战斗结束后，许多中外记者来四行仓库采访，报上登出“八百壮士”坚持抗战的消息，英雄们的事迹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尊重。当时有人编了一首《八百壮士之歌》，隔河高歌，战士们同声合唱。歌词是：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飘扬！
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
我们行动有力，我们志气豪壮。
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那战场，
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在淞沪抗战中，上海人民发扬了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工、学、商、妇女和华侨等各界的群众及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保卫上海的将士们，英勇顽强，寸土必争，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迫使日军从原有的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20多万人。据日本陆军省自己宣布，至1937年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上已死伤4万多人。我军伤亡30多万人。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牺牲之巨、之壮烈都是少有的。

最后由于蒋介石对“国联”存有幻想，战战停停，停停战战，未抓紧有利时机歼灭敌人，结果给日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时机。11月5日，日军三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军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由于蒋介石指挥混乱，朝令夕改，不听前线将领的建议，导致全军溃败，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

上海沦陷了，日本法西斯的气焰更加嚣张，分兵三路，向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发动进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南京的陷落

上海沦陷南京危，接连溃败士气灰；
欲战欲和岂御敌，指挥失误又败北。

话说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分三路向南京进攻。上海派遣军以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沿京沪铁路，第三、第九师团经苏州、金坛西进。第十军沿大湖南岸进攻，其第一一四师团经宜兴、溧阳，第六师团经广德直指南京；第十八师团经广德直趋芜湖。

由于蒋介石幻想国际干涉，指挥混乱，形成淞沪守军溃退的局面。正如前述，在撤退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又突然收回撤退的命令，致使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至南京之间，既不能组织逐次抵抗迟滞敌人的进攻，又无鲜明的退却目标，因而各自为政，拼命西奔。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进抵南京附近。

战局的急转直下，迫使蒋介石急于解决南京的防守问题。为此，他在11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幕僚会议，表面上作出了固守南京的决定，而实际上正迁都重庆。同时勾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同日本进行妥协投降的活动。

第一次的幕僚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参加。当时担任大本营作战厅长的刘斐，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日寇利用它在上海取胜后的有利形势，依仗其海陆空军和重装备的优势，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则南京将处在被敌立体包围之下，而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后方进行较长时间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力。”

“在这种情形下，南京是守不住的。”刘斐说，“基于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应避免在抗战初期与强敌进行决战，更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日寇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争取时间，当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我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的全国的每个县都要拿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基于上述的考虑，刘斐在南京的防守问题上建议：“南京是我国的首都所在，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顶多只用18个团，做象征性的防守，适当抵抗后即主动撤退。”

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支持刘斐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此二人尽量在揣摩蒋介石心理上下功夫，把话说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

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再考虑。蒋介石对是否固守南京虽未作出决定，但决定将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这基本符合刘斐的作战方针的。

过了两天，大约是11月的15、16日，接着召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等人。谈到南京的城防时，唐生智主张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刘斐仍主张只用12至18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讲了一通。实际上当时主

力部队已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从越国大夫范蠡建筑越城算起，已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了。三国时东吴就在南京建都，以后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南京。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六朝时代。在南京建都的还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加上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当时的国民政府，一共有十个朝代建都南京。因此，对这座都城的固守与否的问题，蒋介石一时下不了决心。

到了11月18日晚上开最后一次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这时，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了唐生智的意见，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当时在场的人都默不作声。最后唐生智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介石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介石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唐生智与南京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也可以说在他过去的历史上，南京给他留下的创伤最重，那伤痕还隐隐作痛。1927年，他拥有重兵，以两湖为根据地，全力向长江下游发展，想通过东征讨蒋，称霸东南。当年的威风，真是不可一世。曾几何时，那年10月20日，南京政府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免去他本兼各职。随后，南京政府派了李宗仁、程潜、朱培德为第三、第四、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领西征军进行讨代。同一个时候，冯玉祥的部下樊钟秀、方振武等由鄂北进攻，鲁涤平从宜昌顺长江东下，李福林、方鼎、范石生由广东向湖南挺进。唐生智的部下大部分被收编，由桂系的白崇禧统辖了，他当时虽然恢复了党籍，并委以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训练总监部的总监，但没有实权，更没有兵权，因此整天无所事事，在家念经拜佛，修身养性。现在国难当头，敌兵压境，主动请缨，一来可以为国家效劳；二来可重新掌握一部分兵权，做为将来飞黄腾达的阶梯。一箭双雕，岂不美哉！唐生智就职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并预言：“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的代价！”

且说蒋介石固守南京的方针决定后，11月20日又宣布迁都四川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这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多次空袭，其中有两次轰炸了飞机场。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蒋介石为避免遭敌机轰炸，住到中山陵山下荫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两间房子里，此时，蒋介石明知道南京守不住，为什么还冒着危险留在南京不走呢？原来他们在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

希特勒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法西斯反共同盟，它不仅公开支持日本的侵华战争，现在又出面极力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陶德曼。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共七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四、中、日共同防共；五、中、日经济合作，降低日货进口关税；六、根绝反日运动；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介石对于这样苛刻的丧失主权的停战条件，不敢全部接受。蒋对陶德

曼讲：“中国如果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蒋介石只接受“恢复战前状态”。蒋所说的战前状态，是“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不言而喻，东北广大国土不要了。蒋介石还提醒陶德曼：“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蒋介石这分明是在说，中日在防共问题上应利益一致。蒋介石这时对英美各国能出面调停仍抱着希望。因此，没有向日本妥协，并要求陶德曼对于这次谈判“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乃向蒋介石表示：“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都知道德国从中调停中日战争。既然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国府要员们都认为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11月28日和29日，德驻华大使又衔日府的使命，接连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要求“再次和委员长会面”。这时日军在华北攻占了太原、石家庄、德州。在江南战场上，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占领淞沪后正逼进南京。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日本侵略中国问题未提出任何措施而闭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可能妥协投降了，所以让陶德曼再次出面诱逼蒋介石。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虽然节节败退，但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以如此丧权辱国的条件和日本进行谈判，蒋介石不敢轻易拍板。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事长官会议，把日本政府所提的议和条款交给与会者征询意见。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当天下午，蒋介石与陶德曼进行第二次会谈。蒋介石竟当面表示：“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日寇在原提出的七项条件外，又增加了四条“亡人之国的新条件”，其中竟有日寇所占领地域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的苛刻条款。蒋表示：“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这时他开始明白了：“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如果向日本侵略者妥协，他的国民政府真就要“被舆论浪潮所冲倒了”。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蒋介石又使劲叫嚷抗战。12月4日晚8时，蒋介石召集守卫南京的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开会，作临别训话。他说：“抗战5个月来，虽然军事上是暂时的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也正由于我全体将士英勇抗战，获得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了。”

蒋介石为大家打气说：“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烙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

“为什么要守南京呢？”蒋介石说，“因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蒋介石还告诉大家，现云南三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足，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到达武汉。他将亲自率领这支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蒋介石讲话一个多钟头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最后蒋嘱大家要“效法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服从唐长官的指挥，同心同德，努力完成任务”。

12月6日，正当汪精卫在汉口召开国防最高级会议时，蒋介石在南京由

宋美龄、端纳 陪同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南京危急！保卫南京的战事已经部署完成！”他挥臂高呼，声色俱厉：“我庆幸有个忠心耿耿、自告奋勇守卫南京的大将唐生智，唐将军同进犯南京的日军拼命！”

记者们肃然起敬。蒋介石慷慨激昂地说道：“现在情形很紧急了！自从12月3日丹阳阵地突破之后，我军退守镇江，南京外围尽失屏障。现在日军已经攻下句容，句容离南京只有30公里，日军目前分兵三路向这里进犯。”

“请问蒋委员长，”一个外国记者有点紧张地问：“是哪三路呢？”

蒋介石抓起一根马鞭，在地图上指指点点说：“这一路，自句容以北，绕到阳山镇九华山的背面，沿小路攻我麒麟门；这一路，自句容正面20公里的天王寺，沿石子路直攻我光华部东南12里的淳化镇。这路由日军主力第九师团担任，附有机化兵团，来势很猛；这一路，自溧水犯秣陵关。日本海军也已冲破了江阴封锁直逼镇江，所以日军又企图越镇江、出龙潭而向南京近郊栖霞山进袭。”

“请问蒋委员长，现在战况如何？”

“现在，”蒋介石不悦道，“枪炮声这样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可以不必问了。这七天来，双方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的酸巷镇以南地方，目前我军已转移到牛首山。”

蒋介石在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后，冷笑着反问道：“你们是英美新闻记者，为什么对日本好多事情不说句公道话？日本飞机在芜湖轰炸‘德和’、‘大通’两艘英轮，连同难民一起击沉，你们为什么不对日本攻击！”他起立又说道：“日本炮兵又在芜湖轰击英舰‘瓢虫号’，你们为什么不向日军还击！”蒋介石顿脚道：“倒是苏联帮助我们！”

客人们怔着，宋美龄连忙插话说：“记者先生们，委员长的愤慨是有理由的，我可以为他补充。开战以来，中国并未从任何西方国家获得军事援助。国联和九国公约会议，在政治上、道义上也未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持。你们知道，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正因为它对国际法、对条约、对国际联盟以及对英美信誉依赖过深，以致蒙受了重大的牺牲！”

“请问端纳先生，”一个记者急问，“你也是外国人，而且你也做过新闻记者，请问你对这些问题有何批评！”

端纳眼珠一转，站起来说：“不错，我也是外国人，但我同蒋委员长夫妇的友谊很好，我同情他们。因此，今天中国演变成这样子，日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还不想办法，却让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受人爱戴，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政策太笨，笨到将要同日本同归于尽！”就在招待会进行间，前线炮声隆隆，难民呼号之声不绝，蒋介石在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后，倏地起立，紧绷着脸孔点了点头，同宋美龄离去。端纳刚要举步，记者们一把拖住了他，要他再答复一个德国调解问题。这时宋美龄的声音也响起来：“端纳先生，快来！”端纳匆匆忙忙回答记者说：“德国的调解是个极大的秘密。对此，兄弟无可奉告！”

蒋介石从记者招待会来到唐生智司令部。他对守城将领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是军委会的负责人？你们不要听信谣言，说中日将要停火。”他慷慨激昂：“这个仗我是要打下去的，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

端纳：英国人，1875年生于澳大利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中国期间，曾先后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

东西南北，奋起抗战！一直把日本驱逐出国境！所以我命令唐总司令负卫戍南京之责，把十多万队伍交给他指挥。服从为军人之天职，希望你们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努力杀敌！”

说完，他要唐生智陪他到中山总理陵墓告别。车到陵园石级前停下，炮声震野，哭喊连天，蒋介石作伤感道：“孟潇，想不到啊！想不到啊！”唐生智劝道：“委员长！事已至此，悲伤无益，请委座赶快离开，孟潇等在此子敌，义无反顾！”

“孟潇！”蒋介石作关切状，“南京的一切，就拜托于你了。我一到汉口，一定要把团结御侮的工作做好，请你放心。”第二天，12月7日凌晨5点多钟，乘敌机尚未出动的间隙，蒋介石乘坐“美龄”号，在一小分队飞机的保护下，飞往武汉了。

南京城郊到处硝烟弥漫，炮火冲天。先后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有：宋希濂的七十八军、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孙元良的七十二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邓龙光的八十三军、徐源泉的第二军团、教导队的宪兵团等部，共计10余万人。这些部队大多刚从淞沪战场退下，损失惨重。如第三十六师刚到南京时仅剩3000人，后补充了4000名新兵，但这些新兵多半没有受过训练，有的甚至没有摸过枪，只能边构筑工事边学习射击要领。有的部队还来不及补充就参加了战斗。这样的疲惫之师，战斗力之薄弱是不难想见的。

南京城的防守分为复廓阵地与外围阵地。复廓阵地以第八十八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守备，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守备，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外围以第二军团在栖霞山、乌龙山占领阵地，并接防乌龙山炮台，封锁长江；第七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守备，并向秣陵夫、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镇附近派出有力之前进部队，构成半环形外围防御阵地。

日军凭借优势的装备和旺盛的士气步步进逼。12月5日，日军已到达中国军队外围防线附近。当晚，日军第十六师团约三个联队向第六十六军句容阵地正面进攻，并从土桥镇、牧马场两翼包抄，另以部队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断第六十六军归路。句容守军被围，与日军苦战，损失极大。同日，敌第九师团对湖熟镇中国军队第五十一师前沿阵地猛攻，该师被迫后撤。淳化镇也遭日军飞机轮番轰炸。

12月7日，汤山镇阵地正面受优势日军攻击，中国军队傍晚退守汤山。淳化镇方面，日军7、8两日连续猛攻，并分别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抄，企图断守军归路。第五十一师奋力抵抗，其第五营官兵全部牺牲。至8日午后，该镇终于失守。牛首山阵地也被迫放弃，中国军队只得撤出板桥镇。至此，日军已进入城郊，南京被围。北面敌军攻陷镇江炮台后，其第三师团一部在此渡江，准备从背后攻打南京。

12月9日，敌华中方面司令官用飞机向城内投掷最后通牒，诱迫中国守军司令官投降，唐生智未予理睬。鉴于当时敌情，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

——敌军正迫近南京，我军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以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特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难以武力制止。

12月10日，日军第一一四、第六两师团主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几处同时进攻，战斗更为激烈。光华门被日军突破两次，但冲入城中的百余名日军全部被中国守军歼灭。卫戍司令部第一五六师前往通济门、光华门增援。当夜第一五六师选敢死队坠下城墙，将潜伏在城门洞内的少数日军及盘踞在通光营房的敌军全部消灭，光华门、通济门遂得以转危为安。但是，雨花台、紫金山两处阵地，又被敌突破，守军伤亡惨重。同日，敌第十八师团攻占芜湖，向当涂前进，中国军队后路被切断。

12月11日，城南日军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第七十四军侧背射击，该军撤向水西门。12日，雨花台主阵地完全陷于敌手，第八十八师伤亡惨重。师长孙元良率残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向败退，日军乘机而入，于是南京城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当战争将逼近南京时，曾有些人士及外国传教士等，倡议组织难民区。经卫戍司令长官核准，划中山北路以北地区，即自新街口起至山西路止为难民区，区内约可容25万人。中华门至花牌楼一带，原为居民聚居地区，世代生长在南京的人及无力他徙的贫民多半住在这个地区。12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产生恐慌，纷纷逃往安全区。

12日傍晚，唐生智接到蒋介石电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随即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下令一部渡江，大部向城郊各处突围。然后，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三十六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六十六、第八十三军两部遵照执行，当夜分由紫金山北麓和栖霞山附近突围成功。其他各部都不顾命令，涌向江边。挹江门内挤满部队，“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时混乱”。而丢弃的车辆、驮马使通路更为狭窄。负责把守挹江门的第三十六师一个团因阻止败兵通过，与之发生冲突，一时枪声四起。

随着败兵蜂拥而至，下关也陷入混乱之中。下关至浦口之间，一次可渡七八百人的两艘大的轮渡已撤往汉口，仅剩数艘小火轮及200多条帆船。船少人多，秩序十分混乱，于是“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来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载过重沉没者亦有之”。下关一带到处是退下来的军队，抢着要过江逃难，自相践踏与残杀，长江里漂满了抗战队伍的尸首，伤兵无人过问，景况甚为悲惨！

南京一战，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反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日军乘胜猛进，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路进逼，使南京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中国军队以疲惫之师仓促应战，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又出现了不少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卫戍部队多集中于城郊阵地，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致使本可以作为首都屏障、牵制敌人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不战而陷入敌手。战斗中，中国军队不能主动出击，而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被动挨打。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处境更其险恶。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致使多数部队困于城内而渡不了江，城破之后惨遭日军杀戮。

12月13日，日军入城，南京沦陷。蒋介石在武汉听到这一消息后，十

分忧伤，想起过去他多么欣赏谢朓《入朝曲》里有名的诗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他使用各种手段，收买和瓦解地方势力，希望南京的蒋家王朝能够长治久安。而如今，在金陵当帝王的美梦渺茫了，现在的战局却使他回忆起历史上九个朝代都一个个灭亡了，诚如唐代著名诗人韦庄所写的：“江雨靠罪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真是“六朝旧事随流水”，国民政府也迁到重庆去了。

且说日军进城后，就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六朝古都的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阴风惨惨，殷红的鲜血遍地，腐臭的气味冲天。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三章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滔天罪行数第一，奸淫烧杀花样奇；
兽披人皮行恶道，天也哭来地也泣！

敌酋松井石根，日本侵华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在日军进入南京前，曾命令其部队“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妄图以恐怖手段使中国人民屈服，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于是，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南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震惊世界的烧杀奸淫大比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后，首先将中国未撤退的士兵解除武装，强迫苦役，然后悉数杀死。日军在大屠杀之前，先将中华门、夫子庙、朱雀路、太平路、中山路、国府路、珠江路及陵园新村等地带及大建筑物纵火焚烧，使成瓦砾。日军在难民区内校户搜查，凡被认为容貌像军人者，一律捆绑，每天用大卡车20余辆来回载运，总计不少5万人。这些人被运往雨花台刑场，在那里日本人用大刀斩首，或把他们当作肉靶子射击，惨杀后把尸体投入江中。闻之令人伤心落泪，毛发皆竖！蒋介石却不作正面指责，怕破坏了由陶德曼调解的中日和议。南京被遗弃在敌人的魔掌下，宛如人间地狱。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南京创造了大屠杀的“杰作”，表现了史无前例的兽性行为。

大火烧了一个多月没有熄灭！日寇在杀害中国士兵之后，又搜查有当兵嫌疑的老百姓。在难民区一建筑内，被捕者即有400人，他们被一串串捆绑起来，每串50名，在步枪和机关枪的威逼下，押赴刑场。

据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报道，南京一个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日军的暴行，作了如下的记述：

今天（12月13日），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南京陷入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假如看到兽性勃发或狂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那就决不是安全的事情。我们看到日军劫掠最可怜的穷人，连一个铜子和一件棉袄都不准保存，连人力车夫的车子也无法幸免；我们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加以枪杀，或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们看到大批妇女惊恐万状，悲伤哭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

12月14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时代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问日军司令部，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悉数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痛苦极了。

12月16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100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7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计其数。

12月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有1000人。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婴儿在旁哭声不断，他便把婴儿活活掐死。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

12月18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了。威尔逊报告，一个5岁的女孩子放送进医院，她被日本兵刺了

5 刀；一个男人身上有 18 处刺刀的伤痕。午后，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

12 月 19 日，星期日。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有几处也要烧。一天内日本兵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过 10 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被强奸。难民区中的清洁工人 7 人，6 人被杀，1 人负伤逃出。街道上尸体甚多，全是平民。

12 月 20 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我同史密斯乘车外出，城内重要街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日本兵在店内放火，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人军用卡车。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着。

12 月 21 日，星期二。我们 14 日访问日本使馆的参赞田中，面交 22 个外侨署名的抗议书，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件。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有难民 400 多人，吃的问题愈趋严重。

12 月 22 日，星期三。我同史波林走向离办公处很近的一个池塘，看见 50 具平民的尸体，反缚着手，其中一人被砍去半个脑袋，他们大概是牺牲于军刀下的吧。黄昏，我同李格斯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 54 岁的老妇。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了一件事情：该厂共有 54 个职工，工作很负责任，直到南京失陷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和记银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实属民营），便把其中 43 人拖出枪决。

12 月 23 日，星期四。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难民，又有 70 人被拖出枪杀。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意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有硬茧，就可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

中午从外面送来一个人，头部被烧焦，眼睛被挖掉，耳朵被割去，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人缚在一起，浇灌汽油，用火烧，他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鼓楼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臀部受到同样的烧伤，真是个人不能相信的兽行！12 月 24 日，星期五。7 个日本兵盘踞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强奸妇女。靠近我们的办公处，3 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 12 岁的女孩子！街上被刺伤的人仍然很多。

12 月 27 日，星期一。日军占领南京到今天，已进入第三个星期了。日军仍毫无纪律，骚扰和暴行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而我们所未听到或看到的，更不知有多少。

放火的行为仍未终止。今天南城有两所基督教教会学校被焚毁，德国商人的起士林糖果店也起火燃烧……

我们再看看当年的日本随军记者小侯行男笔下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吧！小侯行男，1912 年生于日本山梨县大月市，1936 年进入读卖新闻社。他在 1982 年出版的《侵略中国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用自己的耳闻目睹披露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地区的滔天罪行。他在书中写道：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

俘虏有 10 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所谓适当处分就是予以处决。因此，俘虏被日本兵

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列，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 2000 多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列，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齐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后来军里传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他苦役。”然而，此时已有不计其数的俘虏被杀了。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日军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究竟杀了多少人？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有一天，我来着救援部队的卡车向盐城进发，沿途所有村庄都被烧光了，到处充满火烧后特有的焦臭味，汽车快驶近盐城时，所见之处是一大片馒头状的土堆。中国都实行土葬，但不像日本人那样挖个坑把人一埋了事，而是把尸体装入结实的木棺里埋入坑内，再堆上土。这些“土馒头”就叫坟墓。这些新坟墓连成一片，成千上万。……盐城是个有 10 万人口的县城，城内已被夷为平地，没有一座建筑物幸免。城内连一粒米都没了，附近的村庄也全被烧光了。

小侯行男在书中说，日本侵华军不仅烧杀抢掠，而且到处强奸妇女。他引证战时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的话说：“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 15—20 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而且强奸后，将她们统统杀掉，简直残忍极了。”

另外，一个外国牧师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记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说：“万人以上赤手空拳的平民已遭枪杀，其中不少是老弱妇孺。据德国同事统计，强奸案有 20000 件，其实多半不止此数。只是金陵大学一处，我知道全案细节者 100 件以上，获有证据者 300 件，这种痛苦与恐怖是无法想象的。只在金陵大学一地，小至 11 岁的女孩子，老至 53 岁的妇女都被强奸。在其他难民群中，72 岁和 76 岁的老太太也难幸免。在校场上，17 个日本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这些强奸案有 1/3 以上是白天干的。几乎城内每一建筑都屡遭搜劫，各种车辆及食粮、衣服、被褥、金钱、钟表、地毯、书画、各式珍玩等都是搜劫的目标，大多数商店被无法无天地明抢暗窃之后，再遭三五成群士兵在他们的长官指挥之下，有系统地用货车把它们洗劫干净，然后放把火烧光。

“这里每天都有好几处火警，很多路段上的房屋被他们烧毁我们手头还藏有一些日本兵放火用的化学品寻火线，纵火的全部过程从头到尾我们都有目睹。大多数难民所有的衣物被日军洗劫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7 年 12 月 27 日，日本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以《紫金山下》为题作了如下的报道：最先攻入南京的谷寿夫指挥下的日军第六师团，有两个准尉，一个叫富冈，一个叫野田，两人约定作砍杀 100 人的比赛。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一个杀了 105 个，一个杀了 106 个，这 106 个就是冠军了。赌一瓶白兰地酒。接着两人又重新打赌，看谁先杀满 150 名中国人。于是杀人竞赛又重新开始。这两个野兽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

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砍杀的人数各自达到 150 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狂欢乱饮，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说的“中日亲善”！

屠杀逾一个月后，日寇复举办所谓良民登记，以诱杀我民众。金陵大学操场及新街口等广场，每天被迫集会的常达万余人。日兵诱令说：“以前充当士兵及无家可归的人，退到两旁，以便给予职业。”有信以为真者，真的迟列两旁。他们被日兵拉出去惨杀了，平均每天遭杀害达千余人。这样的屠杀又继续了一个月之久。

大屠杀之中，日寇觉得单是砍头和枪毙还太平凡，又想出种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新花样来。其中最毒辣的是狗吃刑，将市民的下半身埋在地下，而令狼犬扑食上身。血肉淋漓，人世间实无比此更惨的事了。还有的把人吊起来，用铁钩钩着舌头，名曰“钓鲤鱼”。或用铁床架在一堆明火之上，将人捆放在铁床，名曰“烤全猪”。残忍之状可见一斑。

谈到日寇的强奸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据红十字会的调查报告，山西路一住宅内，当一奴女被日兵强奸时，其丈夫在旁哀求释免，结果夫妇同遭刺死。时值隆冬，有一日兵发现雪地裸妇尸体，乃捉一市民强与交合，市民抗拒，立遭惨杀，那裸妇尸体下部也被戮数刀。有一家屋内注有姑嫂三人，一个少妇，两个少女，日兵五六人闯入，少妇机杆忙往屋内草堆藏匿；两个少女躲避不及，便遭日兵强奸。那少妇只听见那大姑娘喊了一声嫂嫂便不吭声了，那小姑娘大哭大闹一阵后也不响了，只剩下兽兵们狰狞的狂笑声。少妇听得直发抖。两小时后兽兵离去，少妇大着胆子蹑手蹑脚回到房里一看。

只见小姑娘躺在桌底下，下身涂满了血，胸口和肚皮被刀戳穿了两个窟窿，肚肠都流了出来。那大姑娘赤身露体仰卧床上，满身也是血，下身还插着一把刺刀。这少妇受刺激太甚，疯了。

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中华门斩龙桥，又遭日军将其奸杀，8岁幼儿，3岁幼女，因在旁哀泣，被用刺刀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日军在中华门外，在轮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与之行奸，僧侣拒不从，竟被官刑至死。

当时，我南京妇女莫不人人自危，乃相继奔避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金陵女子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原来由国际救济委员会设有妇女收容所，收容妇女约 7000 余人。日兵在挨户搜索妇女而发泄兽欲犹感不足之余，每天到该所用大卡车劫走大批妇女，号哭之声，数里可闻。大凡自 12 岁至 70 岁的妇女都成兽兵奸淫对象，稍加抗拒，即遭惨杀。

难民区妇女为避免受辱而有女扮男装者，但又被日军拉做壮丁，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某次，有二三十个壮丁被敌人捕去，正当绳捆索绑时，一日兵忽触及被捕者的胸部，觉得可疑，便解衣检查，发现都是女扮男装，于是悉数强奸。事后剥光衣服，裸体钉在墙壁上活活钉死，有的削去两乳，有的搅烂下部，有的切开腹部把肚肠挑出来，死状之惨，目不忍睹。更有一批孕妇，也遭兽军强奸，事后再用刺刀开膛破肚，胎儿则取出蒸食！南京妇女被凌辱至少在两万人以上，愤恨羞愧跳江自尽者不计其数！

被俘的中国官兵死得更惨，据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写的《昭和五十年史话》一书记载，中国战俘“集中到市内广场上，用电线捆绑成数行，押到

江岸的围墙里。然后拉出一队人，把这些俘虏作拼刺刀的练习工具。未死的人，浇上煤油点着，看他们在火中挣扎乱蹦，活活烧死。日军官们以日本刀，作把俘虏劈成两半的比赛。因为要杀害的人太多，即命令俘虏们自己挖一个大坑，叫他们排立在坑的边沿，挨个作射击的靶子，使他们掉入坑内……”

书中还写道：“有一伙人，手和脚都被捆绑着，头冲下被倒埋在土里。被砍了头抛进河里或用机枪扫射倒在长江里的人，难以计数。”更为惨者，日本强盗把中国战俘手足紧缚，排倒于地，以军用卡车往来飞驰其上，以致辗压成连环肉饼，不分彼此！或用马匹分尸，然后给军犬分食。

一位幸存者，引用《甲申录闻》中的一首诗，表述了他的悲愤心情：

腐肉白骨满疆场，
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体掩鼻，
活人不及死人香！

日军在南京究竟屠杀了多少中国人？说法不一，据国民党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表明，敌寇残杀南京同胞总数逾 40 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 3/5，约 20 余万人；老弱与幼童约 10 万人；被害妇女达 10 余万人。又据平民控诉登记，已寻得尸体及获得证据者也有 30 余万人。若连无从寻觅之尸体在内已超过 43 万人。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谷寿夫所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日本部队，与其合攻南京的还有中岛的第十六师团，牛岛的第十八师团，末松的第一一四师团。这四个师团在占领初期都驻扎南京，它们的军官士兵都曾野兽般地参加了无法无天的暴行。统率这四个师团攻占南京城的是罪名昭彰的松井石根大将。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他负有直接的最高的责任。

日本的侵华暴行，特别是南京的大屠杀，激起了全国军民无比的愤慨，因而在正面战场演出了“血战台儿庄”英勇悲壮的一幕。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章血战台儿庄

中华男儿志气高，台儿庄役逞英豪；
皇军威风落千丈，遗尸遍野弃甲逃。

台儿庄大战是中国战场徐州会战的高峰，也是徐州会战中最精彩最重要的一役。参加这一战役的将士们，力捍国土、阻滞敌人的进攻，浴血奋战，誓死杀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日军自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于 12 月 24 日和 27 日相继占领了杭州和济南。12 月 14 日，日本在北平建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在此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多次向统帅部提出“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进行徐州作战以及对武汉之敌施加威压”的建议。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心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徐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是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当时的情势而言，中国军队控制着徐州，不仅北可以威胁济南，南可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上的大动脉——陇海路，确保了郑州和平汉路南段的侧背。日军则企图使南北兵力在徐州会合，并沿陇海路西进，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直扑平汉铁路，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的主力，并一举攻占武汉，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长官部曾经制定了保卫徐州的作战计划，其要旨是利用黄河和淮河，对日军的攻势分别加以遏制。但是，韩复榘丢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守鲁西南，使日军得以迅速推进到鲁南，并立即从南北三路夹击徐州。中国军队的计划被打乱，只有临时调兵，仓促应战。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广西来到徐州就任时，鲁南保卫战已进入紧张阶段。敌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正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并策应津浦路南段敌军的攻势，企图合攻徐州。敌军南北两军竞相前进，大有象突狼奔、一举围歼第五战区守军之势。

在此情况下，为了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特派张爱萍将军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前往会见李宗仁将军。张爱萍向李宗仁指出，如今鲁南战役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非常嚣张，骄兵必败，而且还是孤军深入；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有利；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敌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广西军队在整个民众中，特别是在国民党中的威信。中共的建议受到了李宗仁将军的重视，从而促使他下了血战台儿庄的决心。

1938 年 2 月上旬，临沂告急。该地力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并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前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

庞炳勋原来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过第二混成旅旅长，是冯玉祥的干将。他担任了冯玉祥部的第三路总指挥。1930 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暗中收买庞炳勋，庞炳勋倒戈反冯。蒋介石升他为第四十军军长，以后又兼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长城抗战之役，

他又升任第十军团总指挥，接着升为陆军中将，任第三军团军团长。

这时，这位庞炳勋军团长的职位虽比军长高，但他所指挥的军队却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够一个军。庞炳勋已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于抗日以前的内战时期，以善于避重就轻，保存实力著称。此次对其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有些不满，觉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论年龄是他的晚辈，受李宗仁指挥，觉得不是滋味。

对这位显赫的“不倒翁”的到来，李宗仁既欢迎，又保持高度警惕，觉得不易驾驭。他听说庞炳勋来访，一反惯例，破格接待，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庞炳勋见战区司令长官全副戎装出来相迎，受宠若惊，慌忙敬了军礼，弯腰说道：“卑职前来晋谒李长官，怎敢惊动长官出迎，实在不敢当，不敢当。”

李宗仁随即将这位军团长引到客厅，诚恳地对他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所以在公事而言，我是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

接着，李宗仁又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20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迫在漩涡中打转，但是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有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也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一辈子有个抗日报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为一个军人，以终其生。”

庞炳勋听了李宗仁的一番诚挚的话，很受感动，他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随后，李宗仁又询问了部队有何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庞炳勋叹息道：“我原有5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4个团。长官，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我把这个团并到哪里去呢？不能归并，就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时，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似乎也不是统帅部的本意吧！”

李宗仁对这支“杂牌军”的处境甚为同情，并答应呈报中央军委，力争解决。几经交涉，军政部终于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消息传出，全军大喜过望，庞炳勋自更感激涕零，认为本战区主帅十分体恤部曲，非往昔所可比拟，全军开赴前线前，李宗仁亲临训话，只见士卒欢腾，军容殊盛，俨然是一支劲旅。

2月下旬，敌我两军遂在临沂县城发生攻防激烈战斗。敌军以一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庞炳勋部猛扑。第三军团全体将士，据城死守，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守军虽伤亡甚多，然日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随军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和外国使团武官不下数十人，大家都想不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受挫于不见经传的中国“杂牌部队”。一时中外哄传，彩声四起。

日军入攻不下，死伤惨重，遂于3月9日撤至汤头以南阵地。经过整顿补充，并调来援军一部，人数共约5000人，配属大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复又在敌酋板垣师团长指挥下，向我军压来，企图强行通过我临沂防地向台儿庄进攻。敌军先后攻占我沂河以东汤头以南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庄。我军加紧部署，严阵以待，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全军上下虽奋力拼

搏，但因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电告急，请求援助。

临沂系鲁南重镇，距台儿庄 90 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徐，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在日军猛烈攻击下，李宗仁一面电令庞炳勋“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急调张自忠率五十九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

激战到 3 月 12 日下午，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偕参谋长张克侠率部抵达临沂，暂集结于临沂城北诸葛城一带。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已于前一日到达临沂，当即在第四十军军部，召集庞、张两部高级人员军事会议，决定对当前之敌反守为攻，采用正面坚守，两翼迂回，抄袭敌后，一举歼敌之战略。

3 月 14 日，两军配合，向敌发起反攻。是日，张部首先克服白塔及亭子头。当敌发现张自忠军在其背后时，即集中兵力对付张军。庞炳勋军防守部队即乘机举行反击，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暴雨，敌军腹背受敌，飞机、大炮、坦克均失去效用。从 3 月 14 日起，经 5 昼夜激战，敌乃全线败退。我军乘胜跟踪追击至汤头，敌乃向莒县逃窜。同时庞炳勋部第一一五旅亦将临沂城东南之敌肃清。至 18 日上午，临沂反击战全部结束。此役共计毙伤敌 3000 余人，击毁敌机一架，坦克 6 辆，日军尸体遍野，造成台儿庄大战前一出辉煌之序幕战。

李宗仁认为，临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师团孤军深入，为我国围歼的契机。此次临沂之捷，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奋勇赴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张自忠，字荃忱，1891 年出生于山东临清县。1933 年春率部参加喜峰口长城抗战，以劣势装备对付日军机械化部队，所部大刀队近战夜战歼敌，杀出威名。日军步步进逼华北，芦沟桥事变以后，忍辱负重与日军周旋，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七七”事变时，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嗣由宋哲元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长。张自忠以北平市长身份，奉宋哲元密令，与敌周旋，掩护二十九军安全撤退，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自忠力卖国求荣的汉奸。因此，舆论界对他大加攻击，颇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概。迫华北战事失利，一部分国民党军北撤南口、张垣，张自忠部则随大军向南撤退。时张自忠本人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到南京请罪。唯京、沪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擅离职守，不事抵抗，吁请中央严惩，以做效尤。南京街上，竟有人张贴标语，骂他为汉奸的，群情激愤，张自忠百口莫辩。军委会中也有人主张组织军法会审，更有人想乘机收编张自忠的部队。

当时，刚抵南京的李宗仁，闻及此事，乃对张自忠作了一番考察。原西北军同事普遍认为，张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华北事变与敌周旋，完全是奉命而为，断不会当汉奸。在张自忠受难时，李宗仁邀他恳谈。李宗仁有意缓和气氛，先叫了一声“草忱兄”，然后说：“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张自忠这个硬汉子，听到李宗仁这句话，忍不住滴下两滴眼泪，他竭力忍住激动的感情，心想李宗仁竟然知道他受了委屈，可见不是没有人了解他的苦衷。他微微点了点头，默默地听李宗仁说下去：

“现在京华舆论谴责你，因为他们不知道底蕴，等他们明白了事实真相，就不会责骂你了。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想，你会原谅他们的。我是了解你的，当然也谅解你。”

张自忠一直低头沉默不语，听到李宗仁最后一句话，才微微抬起头来，眼光里露出内疚的神情，他只好代来哲元吞下这个苦果。他羞愧他说：“这次个人冒险来京，是以戴罪之身前来投案，等待中央治罪。”

“草忱兄，我劝你不要灰心失望。”李宗仁说，“我小时候背过一些诗文。刘禹锡那首《浪淘沙》有这样的诗句，‘莫道谗言如海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得金。’可见冤假错案自古就有，一时被人误解不要紧，‘淘尽黄沙始得金’。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承蒙李长官为我缓颊，中央能饶恕我，让自忠戴罪立功，我一定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绝不辜负李长官的期望。”

在李宗仁的帮助下，张自忠的问题解决了。在张自忠离京返任前，特来向李宗仁辞行并表示感谢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縲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至1938年2月，鲁南战局吃紧，军令部乃将五十九军调来五战区增援。张自忠军长大喜过望。不过，他来五战区也有顾虑。因

为他和庞炳勋有一段私仇。原来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时，庞炳勋、张自忠都是冯系健将，彼此如兄如弟。不意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而倒戈反冯，且出其不意袭击张自忠师部，张自忠几遭不测。张自忠此次奉调来徐州时，便私下向徐祖诒参谋长陈述此一苦衷，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因庞炳勋较张自忠资望为高，如在同一战场，张自忠必然受庞炳勋的指挥，故张自忠不愿。

然而在目下，庞炳勋在临沂被围请援，李宗仁闻讯，乃将张自忠请来，并诚恳地对他说：“你和庞炳勋有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为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去临沂作战，你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张自忠毫不犹豫，立即大声应道：“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

当第五十九军到达临沂城西一带村庄时，庞炳勋收到李宗仁电报，亲自出城，欢迎张自忠。他紧紧地握着张自忠的手说：“五十九军前来增援，草忱兄，太感激了！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

“同仇敌忾，应该前来支援。五十九军听从庞军团长指挥，绝对服从命令！”

“不要叫我军团长，还是兄弟相称，比较亲切。有事共同商定。”

庞炳勋见张自忠一片爱国之忧，一心对敌，没提过去的事，庞炳勋内心负疚，用商量的口吻说：“第三军团原有5个团，伤亡不小，现在只剩下3个团左右的兵力。我初步考虑：可否请草忱兄率部接替城防，第三军团沿沂河西岸戒备，待敌进犯时，与敌决战。不知徐参谋长和草忱兄意见如何？”

张自忠一惊，号称第三军团，只剩下3个团左右的兵力，怎么能和精锐的板垣师团决战？那不是以卵投石吗？但他又不好向庞炳勋头上泼冷水。根据他在河北省和敌人作战的经验，与其待敌人进攻，不如主动攻击敌人。但为了表示对庞炳勋和徐祖诒的尊重，他没有吭声。

徐祖诒参谋长认为，第三军团守卫临沂已经积累了经验，又熟悉城内情

况，是否要五十九军接替城防，值得进一步考虑。他和庞炳勋再次征求张自忠的意见。

张自忠表示，无论怎么决定，我一定遵照命令执行。然后他说：“我建议以攻为守。与其待敌进攻，不如我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围。”

庞炳勋和徐祖治都同意这一意见。张自忠主动请战。他说：“你下命令吧，更陈兄。五十九军随时可以出动。”

“不！五十九军以急行军速度赶到临沂，非常疲劳，应该休息两天再开始向敌人发动攻击。”庞炳勋坚持说。

“在一般情况下，急行军以后，应该稍作休息，再与敌人作战为好。”张自忠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且，我以劣势装备，面对现代化的精锐板垣师团，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才能奏效，应该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最后，双方商定，3月14日同时行动，向敌人发动反击。

张自忠一返回部队，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动员，他说：“我们在喜峰口、北平、天津等地，先后和日军交战多次。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扬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根据现有条件，集中使用轻重武器，就一定能够打败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板垣，为中国军队争气，为中华民族争光，以尽到我们军人保国卫民的天职，即使战死沙场，也是虽死犹荣！”张自忠的讲话，赢得了营以上军官的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最后张自忠号召大家，既要敢于藐视敌人，也要大胆谨慎，严守纪律，密切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共同打击敌人。

第二天夜里，五十九军迅速强渡沂河，一举插入板垣师团的右侧背，向敌人发起猛烈的反击。板垣师团没料到困守临沂的第三军团，竟然会抽出兵力越过沂河袭击他们坚固的防线，更没料到出现在防线之前的是五十九军的增援部队。一夜之间，敌人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进攻临沂县城企图，转过来对迎面的敌人——五十九军作战了。在三天激战中，双方冲杀多次，毙伤敌人数千人，而五十九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战后，李宗仁说：“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没。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从此，庞、张二人，竟成莫逆，力抗战过程中留下一段佳话，”

临沂一战，津浦路北段敌军，左臂遂为我军砍断，敌两路会攻台儿庄计划遂为我所破，唯日军沿津浦线而下的正面矾谷师团，则因韩复榘不抵抗的影响，日益向南推进，距战略要地台儿庄愈来愈近。值此紧要关头，由邓锡侯将军所率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适自郑州赶来增援。为阻滞敌人南进，我川军以王铭章的一二二师固守肤县城，一二四师在城外策应。然敌军快速部队万余人将滕县包围，并以重炮及坦克猛攻县城。王铭章师长亲自督战死守，决心与城共存亡，血战三昼夜，毙敌2000余人，终因力寡不逮，为敌攻破。王铭章师长以下，全师殉城，至为惨烈。在中华抗战史上，演出了一幕极为壮烈的悲剧。

王铭章，号之中，四川省新都县人，在川军中素以英勇善战著称。抗战爆发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部出川。首战晋东南，继而固守滕县，以数千劣势装备之军抵御万余有飞机、大炮、战车配合的日军，血洒滕县，阻滞了敌人前进，为我军在台儿庄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12日，日军矾谷师团将滕县重重包围，守城将领王铭章将军临危不

惧。他激励将士们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羸劣的武器，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台儿庄、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身为军人，为国牺牲原力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 20 年内战之罪愆！”

3 月 14 日拂晓，日军 30000 多人，在飞机和战车的掩护下，从邹县、两下店分四路向界河猛攻。王铭章部奋勇迎击，与敌激战竟日。15 日，敌人继续猛攻界河，并以另一部由龙山以东向滕县迂回。战至下午，日军突破界河阵地，后由东沙河、北沙河近迫滕县。当时，二十二集团军的兵力大部分在第一线作战，滕县周围只有一个营及三个连的兵力，把县长周同所率警察和保安团也列入王铭章的守城序列，人数也不过 5000 多人，面对上万装备精良的敌军，合力固守滕县的一场恶战开始了。

3 月 16 日黎明，日军在飞机、战车及重炮的配合下，向滕县猛攻。王铭章师长决心与滕县共存亡。他登上城墙，视察了城防工事和兵力配置，向守城官兵致以亲切的慰问。敌人开始猛攻东关大罕，用大炮打开城墙缺口，接着又用机枪扫射，掩护其士兵攻城。王铭章师长冒着枪林弹雨，亲临东关督战。当日军集中向缺口冲锋时，守军官兵用集束手榴弹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下午，日军再次猛攻，发起冲锋。在日军爬上塌口城墙尚未站稳之时，王铭章师长命令战士投掷大量手榴弹，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傍晚，日军发起第三次进攻，火力延伸到城内及西关车站，步兵前后重叠冲击。守城将士前仆后继，同敌人白刃格斗，东关失而复得，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夜晚，守城全体官兵彻夜忙碌，整修工事，补充弹药。

3 月 17 日晨，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滕县，几十门大炮向城内猛轰，20 多架飞机低空扫射，全城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日军在十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寨墙缺口冲锋。全体官兵在王铭章师长的带领下，筑成了血肉长城，顽强阻敌。战至下午 2 时，南关、东关相继失守，守军死伤惨重。王铭章致电军长孙震：“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他在城中的十字街口督战，指挥士兵沿街逐巷与日军激战。鏖战到 5 时，日军攻入西城，从南、西南面向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长率部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拼杀。

由于敌人火力猛烈，无法夺回制高点。这时王铭章师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 45 岁。同时殉国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滕县城内守军与入城日军浴血巷战，除极少数突围外，其余均为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事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王铭章及其所部坚守滕县作了高度评价：“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

继临沂、滕县序幕战之后，3 月下旬，敌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南下。敌军拥有坦克七八十辆，山野饱和重炮百余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台儿庄发起猛攻。台儿庄保卫战由此展开。

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命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的三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命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峰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 月 24 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同时派副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这一战役从 3 月到 4 月，历时一个月。日军投入的兵力有第五、第十两个师团又一个炮兵旅团及伪军两个师另一个旅，总计约七八万人。中国方面

先后投入作战的，有第二十军团、第二集团军等约 40 万人。整个战役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我先后打退敌人 8 次进攻，战况极为激烈。

3 月 23 日，敌军冲到台儿庄泥沟车站。24 日，敌以猛烈炮火轰炸我刘家湖一带工事，然后以坦克为前导，向我阵地猛冲。当晚，敌军一部突破了台儿庄城东北角。中国守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师，在师长池峰城指挥下，以一部坚守城内，将突入的日军迅即赶出城外；然后以大部在城外与敌人展开肉搏厮杀，常为争夺一村一地，与敌军反复肉搏一二十次。至 25 日晨，在援军炮兵和装甲列车的配合下，将台儿庄北丢失的五六个村庄相继收复。日军伤亡惨重，一时无法集中全力攻城。但敌军续有增兵，并倚恃其优势火力，再次以步炮兵向我城周阵地猛烈攻击，一日间落我阵地炮弹达六七千发；更以飞机轮番轰炸，迫使守军逐渐后退。然我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与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英勇坚守阵地。

3 月 27 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发起了第三次猛攻，突破了城东北角。但受到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这时，守军原来的 4 个团死伤近 3000 人，北面的城墙被敌重炮轰毁，城内阵线呈犬牙交错状态。同日，敌福荣大佐指挥的攻坚部队主力南下，汇合攻城部队再次向城内猛冲。28 日，敌军占领了城西北角。城内守军第三十一师全力奋战，由东向西发起反击；城外炮团积极配合，向日军猛烈炮击，遏制了敌军的攻势。

敌人久攻不下，第十师团长矶谷恼羞成怒，于 3 月 29 日亲临台儿庄西范口附近督战。30 日，日军对台儿庄的攻击达到顶点，当晚占据了城内东半部。池峰城师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利用宅院墙垣同敌军展开巷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白刃拼搏，至死不退。城外守军同时发起反击，截击了日军炮兵部队，在城周围与敌人激烈厮杀，以减轻城守军压力。3 月 31 日，台儿庄保卫战进入最严重的关头。

在此紧急情况下，李宗仁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三令五申之后，汤恩伯仍消极避战，在姑婆山逡巡不前，迟迟不进。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严厉警告汤恩伯说：“如再不听命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蒋介石也致电汤恩伯，督令其率师南进。汤恩伯部不得不全军南下，以主力向台儿庄北部开跋。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战局发展越来越严峻。到 4 月 1 日以后，台儿庄守军第三十一师的 4 个团已经伤亡过半；由第三十师调入城内的两个团接替了部分阵地，伤亡也很严重。至 4 月 3 日，台儿庄城西北门、北门、东门、东南门均已陷于敌手，全城 1/2 的面积已被敌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坚守，并组成大刀队夜袭敌人，予敌以很大杀伤。3 日和 4 日，敌军连续发动了第七次、第八次总攻，并且使用燃烧弹，妄图摧毁城内所有房屋和军民，将台儿庄夷为平地。城内各守备队利用地形和断墙残壁，筑起第三道阵地工事，挨街逐巷与敌人周旋搏斗，并组织起 200 余人的奋勇队，偷袭敌人据点，连连突破敌人阵地。守军一面顽强坚守阵地，奋力

杀敌；一面争取时间，等待外线兵团完成对侵入台儿庄日军的反包围。

我台儿庄守军虽然英勇奋战，但伤亡太大，实力愈来愈不支了。4 月 4 日深夜，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向战区司令长官报告说：“第二集团军已伤亡 7/10，敌人人力大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接此电话后考虑了许久。他预计汤恩伯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

因此，他对孙连仲说：“敌已在台儿庄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

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背命令，当军法从事！”在电话中，李宗仁还要孙连仲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而且今夜还向要敌组织夜袭，以打破敌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李宗仁说：“坚持就是胜利，待明天援军到后，我们就可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当时，孙连仲的预备队已全部用完，部队伤亡过大，组织夜袭是十分困难的。但经过动员，轻伤员自动组织起来，主动要求承担向敌人展开进攻的任务。为了表示向敌人反击的决心，孙连仲对池峰城师长命令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过运河者，杀无赦！”

池峰城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战至黄昏，敌人停止进攻，及至午夜，我军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入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部分官兵手持大刀，向敌砍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精疲力竭，不料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日军在慌乱中仓促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军一举夺回3/4，敌人死伤累累。

4月5日拂晓，汤恩伯军团抵达台儿庄以北。我军遂对矾谷师团形成反包围。这时，台儿庄内守军配合外线攻势，由内线反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敢死队冲入敌军阵地，勇猛刺杀敌人。4月6日，我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数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敌除濛谷支队残部数千人逃掉外，其余全部就歼。

台儿庄战役，共歼日军10000余人，缴获各种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步枪10000多枝，及其他战利品。台儿庄的胜利，是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个胜利，不但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以一个有力的打击，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士气，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

台儿庄战斗后，日军将从台儿庄撤退的板垣、矾谷两师团重新集结，补充休整兵力，并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陆续增调13个师团，共30万余人，分6路对徐州形成大包围。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津浦铁路全线，并且还组成了以桥本群作战部长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协调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为了扩大台儿庄胜利成果，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决战，使第五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当时李宗仁认为，在此四面受敌的平原地带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违背不打长期消耗战的既定方针。他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

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汉口最高军事会议商讨，遂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忻口会战之后，中国抗日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从汀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四个多月。虽然最后以中国军队撤退徐州而告终，但是为掩护全国的战略转移，为了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四五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的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徐州会战之后，中共领袖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著作的问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章毛泽东论持久战

深谋远虑毛泽东，克敌制胜赛神功；
持久战略广运用，军民奋起敌寇惊。

徐州会战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为争取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指出了方向。这一著作的问世，澄清了人们的糊涂思想，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这一著作发表时，中国抗日战争已进行了10个月，全国广大军民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进行了浴血奋战，而且无日下在渴望着战争的胜利，但是，战争的发展过程究竟如何，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以及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亟需作出正确的回答，同时，对国内出现的一些错误论调，也需要予以批判和作出必要的解释。

“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之后，有些人盲目乐观，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认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淞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发生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解决。而已他们也绝不相信英美会坐视日本侵犯他们在华的利益而不顾。这些人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台儿庄大捷之后，一些人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提出要改变过去持久战的方针，国民政学系竟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国内对台儿庄战斗的夸张宣扬，也助长了速胜论的气焰。

与速胜论相反，早在抗战之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就散布“中国武器不如日本人，战必败”，鼓吹向日本投降。以孔祥熙为代表的亲美派，则鼓吹“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谬论，国民党秘书长张群则宣扬他的“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的所谓“十四字真言”。抗战开始后，又出现了“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亡国论更为嚣张，失败情绪迅速蔓延开来。

另外，还有一些人轻视和否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怀疑“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而肆意贬低敌后游击战争，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以台儿庄胜利引起的速胜论抬头，到徐州战败时亡国论的嚣张，表明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将近一年，国民党正面战场日益溃败、敌后军民的游击战争日益显示其主要作用的重要关头，为了澄清速胜论和亡国论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夺取抗战的彻底胜利，迫切需要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怎样性质的战争？它的前途到底如何？它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是什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以及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最系统、最科学的说明，也是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总结。这两部著作，全面阐述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和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战略地位的作用。对当时国内有关抗战的各种错误论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一贯提倡持、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把它作为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就指出：“要扫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即提出了持久战

的一些主要论点，提出了抗战的主要方针，预见战争的前途。他指出：“日本在中国长期抗战的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最后“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还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即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中国会亡吗？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不能速胜，战争是持久的。这就是毛泽东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回答。

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呢？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接着他分别剖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写道：“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后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

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关于中国方面，毛泽东精辟地分析道：“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力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总之，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构成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见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看不到其他的特点，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速胜论者则根本忘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夸大了其他的特点，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

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敌我特点在竞赛中继续消长变化着。由于我能运用正确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策略，竭尽最善的努力，促使敌人不断向下变化，即战争越来越使其军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贫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我们则向上变化，即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其群众，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敌人只能占领少数点和线，我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发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这种敌向下，我向上的变化。随着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转化，使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指出的：“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37—438 页。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39 页。

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基于对敌我特点变化发展的科学分析，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为了更好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毛泽东并给三个阶段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轮廓。

在第一阶段，敌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企图攻占广州、武汉等地，进而灭亡中国。中国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这一阶段，敌人虽然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但是造成其大批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消耗，士气颓靡，国内人心不满，贸易缩减，国际舆论谴责。在此阶段中，中国在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方面有相当损失；但是，同时在战争经验、军队发展、政治开展、人民动员、国际援助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尤其中国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使敌人占领区域阻制在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的狭小地带。

在第二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在第一阶段的末期，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持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而我军已大量转入敌后，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区进行广泛的猛烈的游击战争，并想法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在敌后将出现三种地区，即抗日根据地、敌占区、游击区。这样就会呈现内线与外线、前方和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大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大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这一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至于这个阶段的时间长短，要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经过艰难的长期斗争，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这就为下一阶段的战略反攻作好了准备。

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收复失地的阶段。在此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这一阶段的游击战争，将辅之于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收复失地主要依靠本国自己的力量，但还要借之于国际的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加强与斗争的胜利。

我们坚持持久战，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在国际斗争的有力配合下，由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将最后埋葬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对此作了英明的预见和生动的描绘。他说：“如果我们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战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

然的趋势。”

《论持久战》一书，通篇贯穿着人民战争的思想。无论是为了实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还是为了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具体的战略方针，都离不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离不开依靠人民群众、动员全国军民这个基本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又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毛泽东反复多次地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人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入手，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战争与政治、武器与人、战争中的能动性等一般的战争原则和战争规律；尤其深刻地论述了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战争中，如何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以人民战争打败日本侵略军。这部科学著作，连同毛泽东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军事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做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有力地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对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组织和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获得了迅速发展。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至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15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已经把游击战争从山地发展到了平原，创建敌后根据地的的工作也从山区扩大到平原。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日战争打开了新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到1938年4月徐州会战开始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毙伤敌人10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00余挺，毁敌汽车500余辆。而从1938年5月至10月的几个月内，共进行了约1000次战斗，毙伤敌20000余人，缴获步马枪8000余枝，轻重机枪145挺，毁敌汽车800余辆，毁敌飞机24架。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八路军愈战愈强，它抗击与牵制了日寇在华北的13个半师团、约30余万人的兵力。这时，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起陕甘宁、绥远大青山，东达渤海之滨的广大山地与平原地区。八路军也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10月，已由抗战开始时的30000人发展到25万人。这一时期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也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是坚持持久战以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个根本条件。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全国抗日军民思想的趋于统一，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发

展，为胜利地转入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十万大军纷纷溃退，力阻止敌人南进，蒋介石竟决堤黄河，结果不但没有挡注日军的进攻，反而酿成大灾。3个月之后，日寇把它在豫东的军队调往南面，然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从此，在中国抗战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就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章保卫大武汉

九省通行大武汉，日军进攻迫在前；
百万大军御敌寇，国共携手挽狂澜。

早在南京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就开始策划攻占武汉和切断外给线的攻占广东作战，曾计划在1939年上半年实施，但随着徐州作战的进行，这一计划就提前了。他们认为仍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

日军的方针和部署是“以一部沿长江西进，以主力在陇海铁路以南沿淮河流域西进，切断平汉线，尔后南下攻取武汉，另以华北方面军一部向郑州方面进行牵制作战。由于黄河决堤，淮河泛滥，日军遂改变计划，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合围武汉。

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之交，居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交接点，地位十分重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北连河南中原要地，南接山川雄固的湖南，滚滚长江从市内蜿蜒东去，可与赣、皖、苏相呼应，而从宜昌溯江西上，通过三峡，则能背倚巴蜀作大后方。武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华中之战略要地。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机构迁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创办了面目一新的《新华日报》。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徐州会战结束后，保卫武汉问题就在全国突出出来。1938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项建议，“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毛泽东在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的电报中提出：“必须准备在徐州会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紧急的任务为：“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中共代表团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关于保卫武汉的具体意见。所有这些，对于国民党当局下决心组织实施武汉会战起了重要作用。

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蒋介石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说：“南京弃守以后，敌人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武汉，我们在徐州拖住敌人，才延迟了敌人进攻武汉。从长江南北的敌情来看，敌人开始进攻武汉的意图日益明显了。武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衔江南，北带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的地位十分重要。如何进行武汉会战，请大家献计献策，发表高见。”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了下来，看了看何应钦说：“敬之，你作为参谋总长，请先谈谈自己的看法！”

“委座的看法极是。的确武汉形势非常重要。武昌现在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华中经济中心，汉阳是军事工业区，有兵工厂和铁厂。武汉三镇是华中战略要地，武汉会战的确非同小可，是关系战争全局的。对此，健生兄已胸有成竹，还是请白副总长谈谈自己的方案吧。”

白崇禧本来没准备发言，想听听别人的意见，现在何应钦指名要他发言，只好接着说：“武汉周围，湖泊密布，港汉纵横，南边有洞庭湖，东边有鄱阳湖，幕阜山和大别山地势相当险要，蜿蜒南北，交于长江，是东方的门户；大娄、大巴山脉是西方的屏障；北面有大洪山和桐柏山，南面有五岭山，中

间是沼泽平原。保卫武汉，必须守备外域，要是外围不保，武汉就失去屏障了。”白崇禧说到这儿，有意喝了一口茶，停顿了一下。他想摸摸蒋介石的底，看他对武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

蒋介石对这位“小诸葛”的意见十分欣赏。他急忙催着白崇禧说：“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

“长江横贯东西，自然形势把武汉战场分为南北两部，北岸有大别山，可以防守；南面有幕阜山，可以侧翼依托，武汉又有向外放射的公路网，四通八达。不管从地势上说，还是从野战战略上看，保卫武汉，要实施以武汉为核心的内线作战，这对我军比较有利。不过，也必须看到，海军和空军的优势下在我们方面，而在敌人方面，我们空军有限，海军更少，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长江变成了敌人进攻武汉的有利通路。”

白崇禧讲到这里，看了看蒋介石的表情，然后又说：“我军在内线作战，渡河点却没法掌握，长江反而成为战场内部的地障。这样一来，长江南北两岸我军很难集中兵力在一方战斗，内线态势，对我军反而不利。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请委座训示。”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他对何应钦说：“敬之，你有什么考虑？”

“敌人不只是掌握海空军的优势，也掌握陆军优势，外围作战也好，内线作战也好，我看，要想保卫武汉是很不容易的。”何应钦说，“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有迟滞敌人的进攻，也就是说，各战区用现有兵力，就所在地域，适当抵抗，进行柔性作战；同时，把各战区的公路迅速破坏，迟滞敌人前进。这样，敌人进攻武汉的时间就会延迟了！”

“把连接武汉的公路都毁了，固然可以迟滞敌人前进的速度，但在敌人到达以前和以后，我军要转移或者进攻，也就发生困难了。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白崇禧说。

蒋介石也不大同意何应钦的意见，于是他说：“武汉战区辽阔，兵力众多，战场又分成两半，一半在江南，一半在江北，要适应当前的作战状况，增强指挥机构和战斗力，必须调整战斗序列，单靠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了，我考虑由两个战区来指挥武汉战场，江北归第五区，把武汉卫戍司令部改编为第九区，由陈诚担任司令长官，你们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这样太好了，成立第九战区，统一指挥，可以增强战斗力。”何应钦讲完之后，白崇禧也说：“委座指示很重要，否则战区司令长官也不好指挥。”

“现在长江两岸兵力多，第五、第九两战区战斗序列也要调整一下。”蒋介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江北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实施协同作战，阻止敌人进犯。两战区作战地境概略沿长江之线，沿江北岸的武穴、田家镇要塞部分及武汉卫戍司令部，归第九战区统一指挥。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精锐兵力，侍敌深入，在新阵地和敌人决战。”“保卫武汉必须守备外围要域，如果外围不保，武汉就失去屏障。刚才健生兄说的极是。”最后，蒋介石以命令的口气说：“参谋部要根据我的意见，拟出保卫武汉作战指挥方针和计划，准备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讨论一下，最近发下去！”

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参谋部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力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两、皖西、豫

西各山地，配置精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这个计划体现了武汉保卫战的总体构想，即为保卫武汉核心，在外层配置有力部队迟滞日军推进速度；主阵地则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湘鄂赣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界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军委会认为，这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作战的主要意图是“消耗敌人之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

与此同时，军委会还调整了部署：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李汉魂）、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于九江、马头镇、马挡等要地阻击日军溯江而上；从徐州方面撤退的第五战区部队由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7月中旬以后至会战后期，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下辖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和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分别于大别山东麓、北麓阻敌前进，一部于黄梅、广济一带防守和进行机动作战。参加武汉会战的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达130个师，蒋介石任总指挥。6月27日，国民党当局颁发《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一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

为了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阵地，6月7日，日军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在日舰的掩护下，从镇江乘船溯江西进，12日攻占安庆。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即向潜山、太湖方面转移。日军第六师团6月2日在合肥集结后，沿舒城、桐城前进，并向太湖进攻。守军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方向侧击进攻太湖的日军，中日双方即在潜山、太湖之线以西山区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将安（庆）合（肥）公路打通，武汉会战随之展开。

为了加强对进攻武汉各部的统一指挥，日军大本营于7月4日发布命令，变更华中派遣军及第二军战斗序列，编组新的第十一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编入第二军的有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编入第十一军的有第六、第一一、第一一六师团和波田支队，编入派遣军直辖的有第三、第九、第十八、第一一六师团。这样，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达12个师团，共约40万人。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给进犯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唤升、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二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等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首次完成了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

值得指出的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

在与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不少人受了伤，更有不少人为中国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时负责武汉保卫战宣传工作的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道：

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眼看见的一次说吧：4月29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议，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天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Dog-Fighting），怕应该成为“鹰斗战”（Eagle-Fighting）吧。忽然有的放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有30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激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击落了敌机21架，我方损失5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蛟。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12艘，炸毁了16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间布水雷1500余枚。9月8日，炸沉日军军舰两艘。自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敌机15架轮番狂轰滥炸下，“中山舰”用舰上的炮一直与敌机进行激烈的战斗。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官兵无不坚守岗位，在战斗史上写下了壮丽的可歌可泣的诗篇。

武汉会战期间，是国共两党关系较好的时期。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援下，战区军民掀起“保卫大武汉”的运动。国民政府进行了动员，组织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机构，积极参与了关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当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时抗战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武汉就组织了10个抗战演剧队。特别是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由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捐献运动，5天共筹集抗战资金100多万元。参加献金的有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和商人，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那100多万数的数目，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这说明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战热情。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带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的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敢其凶锋，然而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

前途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者注）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须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寇在攻打武汉时，把华南的广州、华北的晋察冀边区，看做与武汉有同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拟定了一个“北围五台，南取广州，中取武汉”的作战计划。五台指的是晋察冀边区，处在山岳地带，东越平汉线，可以袭击平津冀东以至与东北相呼应，南控正太路，可直下豫鲁中原之地，西经同蒲路，与陕甘宁边区只隔一条黄河，北依平缓路，直通塞外大漠，是极端险要地区。蒋介石在政治部向周恩来试探道：“这一次日本人攻打五台，根据华北日军司令杉山元费尽心机，调集5万大军，分25路合击，恐怕八路军这一次很难对付吧？”

周恩来一笑，答道：“不但兵分25路，据前方的消息说，日寇为了害怕我逐个击破，特别加强纵深配备，步步推进，构筑据点。路上只要碰到可疑的森林和山地，就拿大炮乱轰一通，这个名之曰‘威力搜索’；如果发现他进路附近有我们的部队，那他马上畏缩得像一乌龟。”

蒋介石讪讪地笑道：“嘿，嘿！听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你们主动出击，对日军展开了进攻？”

“是的。”周恩来点点头说，“刚才我和陈诚先生曾谈到此事。‘七七’抗战周年那天，我们曾向平绥、平汉、正太各线扩大进攻，血战了好几个昼夜。我们炸毁了北平城外的石景山发电厂，把敌伪吓得紧闭城门。”周恩来指指陈诚说：“陈部长那边有一份报纸可以参考参考。”

陈诚连忙把这份来自敌占区的汉奸报摊在桌上，指给蒋介石看，并道：“诺，恩来兄说的就是这一段：‘共产党军队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彼等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平。……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国民党及共产党之根据地，日军决心一面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

“现在战况如何？”蒋介石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后向周恩来问道，并说：“看来，敌人来势汹汹，你们如果没有把握，犯不着同他们硬拼。”

周恩来说：“前方战事如何发展，此地很难估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抗战！毛泽东同志在5月26日至6月3日那几天

中，曾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论持久战》，他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确立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啊，好极了，好极了！”蒋介石连忙插嘴道：“出版以后，希望先睹为快才好。”双方客气一阵之后，蒋介石就告辞了。

局势发展很快，敌人“北围五台”的计划彻底破产，“南取广州”的行动马到成功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在广灵、易县、涞源、阜平打了好几个大胜仗，5万日本兵不但毫无所得，而且损失了一个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清水、正亚两个联队长。通过这次反扫荡，晋察冀军民经受了新的考验和锻炼，抗日根据地也较前更加巩固了。

然而，广州的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

为策应攻取武汉作战，并切断华南方面的中国国际补给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即决心实施广州作战，并于1938年8月中旬着手此项作战准备。9月7日，当华中日军进逼武汉的时候，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攻占广州的决定。并随即抽调第五、第十八、第一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为骨干组成第二十一军，与海军第五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10月上旬，上述部队相继到达台湾海峡、澎湖岛集结。

10月11日黄昏，日军第二十一军突入南海大亚湾口。当时，广东方面驻军为国民党军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所部，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其大亚湾地区防御力量极为薄弱。10月12日凌晨，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即于大亚湾登陆。是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驻日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次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10月13日，日军登陆之后，连续攻陷淡水、稔山。16日占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10月17日，广州各界人民7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此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该援军未到达战场，余汉谋即已于10月21日奉命放弃广州。当日，日军由队化、东莞进占广州。22日，日军一部由珠江口溯江而上，向广州方向突进，23日占领虎门要塞，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却说日军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内大火达三昼夜不熄，市街被焚40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未纵火前，日兵沿街掳掠财物，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被劫一空。黄花岗附近日兵枪杀外侨一名，陈尸路旁，无人过问。沙面与沙基交通断绝，为防止我方游击队，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区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惠阳县属飞鹅岭日兵，每天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强拉民夫，到广州后便予枪杀。淡水一带日军，捕获妇女600余人，每日轮流奸淫，稍不遂意，即遭枪杀。

对于国民党军不战而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有良心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的，在武汉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一般中国同胞的悲愤更不待言。在军委会会议席上，蒋介石对一连串问题，一时也无从答起。那些发问的部属，一改平日卑躬屈膝的口吻，而是慷慨激昂，一位

曾在《大公报》工作的老记者，记下了这些质问：

“请委员长严查：广州之失，骇人听闻！我驻粤部队有5个师两个旅，外加邹洪保安队18个师以上，仅观日军在数量上比我小得多，为什么不战而退！”

“请委员长严查：日寇侵粤之前，粤境守军几达30万，为什么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有20万人马反而走开！”

“请委员长严查：综计敌人从大鹏湾登陆起，到占领广州为止，为期不过10天，实开抗战后失地之速未有的先例！我们不能光说对不起孙中山先生便算，希望严办失职人员！”

“请委员长严查：听说敌人进入广州之前，广州青年4万多人志愿杀敌，可是没有人去领导。这种现象简直无以形容，难道负责守卫广东的竟是麻木不仁、丧心病狂、禽兽不如的东西！”

10月21日，也就是在广州失守的当天，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特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

对各方的责难、质问，蒋介石无言回答，一筹莫展，只是宠统地说，对失职人员一定查办不怠！

且说广州失陷后，粤汉铁路线即被切断，加之平汉铁路线被切断，以及武汉外围要地失守，武汉三镇即告危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并令撤退武汉外围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10月25日，国民党放弃武汉。是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接见中外记者，指出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数月以来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掩护后方的任务已毕，武汉已失去重要性，因此决定转移兵力，与敌周旋。

武汉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日军共动用12个师团，人数达40万之众。中国军队调动了130个师的兵力，在皖、豫、鄂、赣四省，纵横各数百公里的辽阔的华中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此次会战日军公布伤亡3万多人。国民党官方公布，日军死伤20万人。由于战役指导被动应付，中国军队死伤也很惨重。

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是保卫武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日军的力量受到很大消耗，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此会战中达到顶点，尔后开始走下坡路，从此再无力量举行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了。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所指出的：“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另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便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避免大的不利决战。”

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间，国民党内失败主义情绪日益滋长。这一情况下，日本政府对华采取了威胁和诱降相结合的政策。1938年9月，伪“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筹备建立伪“中央”政权，并发表了认贼作父、投降卖国的反共倒蒋声明，加紧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对地方军阀、地方统治者、反动失意政客进行收买、策反活动，企图分裂和瓦解抗日阵线。

为此，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重

提日、“满”、中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并改变了原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其一贯指导方针，变换人事，实行更新，参加新秩序建设，帝国政府亦不拒绝”。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提出了“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对华三原则。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要求“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没有放弃以军事手段迫使中国完全屈服的企图，但其政策的重心已由军事战略转向政治谋略，对国民党政权由原来的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到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企图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压迫下，通过政治外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了，从而走上了自绝于国家和民族的罪恶道路。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章汪精卫叛国投敌

抗日艰难百战多，牛鬼蛇神唱降歌；
汪逆甘当儿皇帝，举国声讨震山河。

在战争失利、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妥协的情绪在增长，抗战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国民党的主体和大多数成员还是坚持抗战的；但是，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妥协调摇、分裂倒退的活动日趋加剧。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决心要公开叛国投敌了。

为了投敌叛国，破坏抗战，早在1938年7月5日，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辞职密赴日本，会见陆相板垣等人，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敌手”的方针，以利进行议和活动。日本遂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象。11月20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日汪秘密协议规定：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侨民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赔偿日侨损失；日、汪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汪精卫待机成立新的政府。

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为了探听虚实，1938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桂林特派心腹陈布雷前往重庆同汪晤谈。双方见面寒暄过后，汪先问道：“委员长分明今天来重庆，怎么又不来了？是否桂林有什么大事要处理？”

“没有，没有，是因为气候太差之故。”陈布雷心想，此人的确厉害，说话可要小心。于是开始探问道：“东京方面接二连三广播，副总裁一定都听到了。”

汪精卫摸了摸下颌，先入为主道：“不知道委员长有何表示，有何指示？”陈布雷支支吾吾答道：“没有，没有什么。”汪精卫说：“布雷老兄行装甫卸，夤夜贺临，一定有所指教，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委员长听说副总裁最近很忙，但有关日本方面的问题，想和你交换交换意见……”还没等陈布雷说完，汪精卫就故意打岔说：“忙什么，还不是准备这个会、那个会的？可是比起委员长来，他日理万机，兄弟虽忙，差得远了！”

“委员长一到重庆，对日本方面的声明一定有所表示才行。”陈布雷说，“因此，在他来渝开始办公之前，希望听听汪副总裁的意见，一来毒考参考，二来避免同副总裁之间有所歧见。”

“啊，不瞒布雷兄说，这个局势实在令人焦心，有人说要打下去。可是我问你，我们的事情非常明白：我们虽是个大国，但是我们是个弱国，军力、财力都不济，我们凭什么打下去？这一点委员长也是清楚的。……不过日本方面也有困难，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怎样结束这场战争，布雷兄深谋远虑，一定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无法抗战，他们是难以结束。”

说到这里，汪精卫喝了一口茶，又以狡黠的目光看了看陈布雷，然后说：“那么，如果有人在这时候从中另作布置，那么来日大难，不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

“对于眼下的形势委员长是很着急，他希望副总裁在这时候，运用你的智慧，把中国危险的前途扭转过来！”陈布雷说。

“委员长言重了！”汪精卫心中暗笑：“老蒋啊，老蒋，你这个狐疑病，可便宜我了。”于是堆下一脸笑道：“布雷兄，委员长未免虚怀若谷了，兄弟一切唯命是从，只要委员长有什么吩咐，兄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陈布雷见此情形，就直言问道：“日首相近卫最近说过‘若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也不事拒绝’。外面有人说，近卫所指的‘其他人员’，恐怕就是，就是……”汪精卫临场作戏，哈哈大笑道：“布雷兄别兜圈子了，有人是在说我，是不是？”接着双手按膝叹道：“按目前情况，中日再打下去，双方元气大伤，却叫共产党占了便宜，赢得更多的老百姓的拥护。这不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

“汪副总裁实在有眼光！”陈布雷说，“在衡山那一段时光，有几位中央大员在委员长面前谈到有关副总裁的问题，却给委员长一个一个解释了。委员长对副总裁，实在佩服。”

“委员长对我这番厚意，多少年来，我都是记在心里，真是谢谢他了。”汪精卫细辨其中的滋味，机智地说道：“委员长既要领导抗战，又要领导建国，他当然是最高领袖，即是将来和平实现，还是要由他领导么！”

“副总裁真是了不起！”陈布雷忙不迭夸奖道，“对任何事情都有见地，而且是那样的合情合理！”

陈布雷告辞后，汪精卫急匆匆回到内房对老婆低声说：“快收拾行李！快收拾行李！”陈璧君一怔道：“怎么？长沙还没有完，重庆又要忙着撤退吗？”汪精卫把事情交代明白后说：“懂了吧？如果阅府统清，难免启人疑窦，只要你带着孩子们离开重庆，事情就简单了！”

陈璧君轻轻掩上房门说：“话虽这么讲，可是你是副总裁，人家不会说闲话吗？抗战吃紧时，堂堂副总裁把家眷送出国门，是何居心？你不怕人家说你当汉奸！”

“汉奸！”汪精卫脸一反说，“就说我是未来的汉奸，他姓蒋的早已是汉奸了！你看他那一帮皇亲国戚，你看他所作所为，哪一件事不是出卖中国的？说实话，要是我将来真的做了这个，我姓汪的卖国也不会像他那么彻底！”

“我所以这个决心也不容易，”汪精卫说，“璧君，你知道，这十多年来我吃够姓蒋的亏！‘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推翻满清的工作，难道姓蒋的比我做得还多吗？中山先生死后，无论论地位、论功劳，我都比姓蒋的高，民国十四年、十五年，我都做国府主席，可是这家伙阴险毒辣，抓着军队，利用共产党完成北伐，然后把他所有的政敌一脚踢开，培植自己势力，这几下子便奠定了他的地位，我姓汪的就变成这个样子，徒有副总裁的虚名，什么权力也没有！”

“如今时机紧迫，你先带孩子们出去，然后咱们再会师。”汪精卫作贼胆虚地说，“看来，我同近卫之间的往来，姓蒋的有所察觉了。今天陈布雷来，旁敲侧击，多方试探，蒋介石心毒手狠，我们不能再等了，夜长梦多，只好破釜沉舟了！”

却说汪精卫下了当汉奸的决心后，群丑们便分头紧张活动，11月29日，陈公博应汪精卫之召自成都飞重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研究日汪密约的各项文件，一致同意，并电告香港通知高宗武，制定行动计划。12月5日，周

佛海利用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到昆明“视察”，溜出重庆。当飞机起飞时，周佛海还发了一通感慨：“别矣重庆，国家兴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送之时欤。”周佛海简直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身败名裂在所不惜。

汪精卫在周佛海赴昆明后，命他的内侄陈春圃于12月8日飞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至香港，陈春圃则继续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系，并专候汪精卫飞昆明日期的电报，以便通知当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去接待。陈春圃的另一任务是代订由昆明至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外逃人员运送河内。

当汪精卫不能按期逃离重庆时，曾发出这样的电报：“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据密码译出后，不解其意，一再核对，持以问周佛海，周笑着对陈说：“一点不错。”周佛海接着解释说：“‘兰姊’是汪先生的代号，‘秀妹’是对方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对方（日本）发表文告的日期，意思是说他不能依原定日期离开重庆，要通知对方不要因等他而误了发表文告的日期。”周并说，这些代号和隐语在重庆时就口头约定的。并由梅思平回港时通知了高宗武的。

到了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得到机会出逃了。那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这个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是可以不参加的，恰巧，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参谋长来到重庆，他手里有几张飞往昆明的飞机票，在蒋训话时，汪精卫就乘机溜走了。

据汪氏身边人员们的回忆，在汪精卫乘飞机离渝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幕戏剧性的情节。即12月18日上午9时许，陈壁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4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精卫在起飞前几分钟赶到。陈壁君等在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志柔也正拟乘这班飞机飞滇，不过周志柔并未意识到发生什么情况。陈壁君等都非常焦急，她嘱咐曾仲鸣，如汪氏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副总裁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直到起飞前数分钟，汪精卫偕卫士桂连轩才及时赶到机场。周至柔这位空军司令照例上前谒见副总裁，陈壁君这时才告诉周至柔说：“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飞机为了加油之故，迟不起飞，汪精卫故作镇静地在机场上散步。

好不容易熬到飞机起飞，航行中又发生了一个令汪精卫不安的小插曲。周至柔因为有汪精卫在，为要在副总裁面前显示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走入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经过了长一段时间，周至柔兴犹未尽，但陈壁君对周至柔发生了很大的疑虑。她想：是不是蒋介石故意让汪精卫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她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只好暗中告诉汪的卫士桂连轩加强戒备。汪精卫夫人正在忐忑不宁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经过汪精卫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不过这时汪副总裁竟连赞美他一声的兴趣都没有了。

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时，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党政要人前来迎接，街上还挂起了国旗，这使汪精卫更惴惴不安。他私下对陈春圃说：既然托辞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应付，而且待到前来他们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于是就由曾仲鸣转述汪精卫不能接见的原因，说什么，汪副总裁因在飞机上颠簸太甚，脉搏又间歇，只好改日接见等语，敷衍了事。

虽说汪精卫溜出了重庆，但他深知昆明不是久留之地。所以汪精卫急于

向龙云交底。此前，陈壁君作过了龙云的工作。汪精卫操着无赖的口吻对龙云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地告诉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介石，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就这样，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汉奸，包括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等十余人，于1938年12月19日乘坐龙云包乘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开始了他们的汉奸生涯。

在汪精卫抵达河内三天以后，即12月22日，日方发表招降声明——《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3次对华声明。近卫佯称“日本出兵的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且看近卫声明的原文，就可以知道它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货色。“声明”说：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邦交之急务。”近卫声明指出：“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近卫声明说，“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近卫的《调整对华外交方针》的声明，不外是要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在防共的名义下，在内蒙日军拥有驻军权，并加紧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

在近卫声明发表一周后，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的叛国“艳电”。劝诱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妥协求和。公开响应近卫声明的对华三原则，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求蒋介石以近卫声明为基础，实现中日“和平”。表示“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若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可达”。同时，汪精卫要求日本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前，不要与英、美等国引起争端；在汪政权建立之前，每月供给活动费300万元；彻底轰炸重庆，进攻长沙、南昌、潼关等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精卫在“艳电”中，只字不提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反而胡说什么“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犯，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似乎这次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至少负一半的责任，汪精卫采取了各打五十板的姿态。他把日本挑起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等一笔抹煞，其认贼作父的汉奸行径和奴颜婢膝的丑态，真是无以复加了。

汪精卫逃往河内并发出《艳电》，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冲击。为此，当时正在河内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及国民党内与汪精卫有交情的人们，纷纷前往作汪精卫的工作，劝汪改变主意和就此止步，但

遭到汪精卫的断然拒绝。一个月后，谷正鼎再次奉命到河内，他带来了汪精卫需要的出国护照和一笔可观的旅费，蒋介石让谷正鼎转告汪精卫说：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可写文章，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受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 50 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当然听不进去。他不仅不听，还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迫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和壁君的票。我被他逼迫出国，出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精卫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指蒋介石）如把党国搞得不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果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日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军民以及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纷纷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的抗战力量。”国民党的抗战派何香凝，民主党派抗战人士沈钧儒、陶行知、史良等，都通电讨汪。全国规模的反汪卖国的怒潮，使汪精卫汉奸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在对汪精卫争取失败后，为了根除后患，就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派了戴笠手下的大将陈恭澍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汪精卫这时住在河内高朗街 27 号，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

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和服务人员、卫士居住。据陈恭澍回忆，他们为了阻击汪精卫，在住宅对面租赁了一幢房子窥察了一个多月才动手的，因此对汪寓的生活起居状况和各卧室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1939 年 3 月 19 日，刺杀汪精卫的行动组长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紧急电报，要他们对汪精卫开始行动。3 月 21 日午夜以后，6 个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爬进了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但是在 20 日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精卫搬到另一房间住。刺客们显然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仲鸣射击。刺客们以为目的已达到，立即逃走。曾仲鸣则因胸部被击中，伤重毙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曾仲鸣临死前还说过这样的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表明他对汪精卫的“忠心”，汉奸的心声，可悲！可耻！

河内刺杀案的消息传到香港，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等均聚集在九龙太子道周佛海住宅，诚惶诚恐地讨论这个案子，四处打听刺汪的来龙去脉。正当汪精卫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候，3 月 22 日，也就是在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等去河内，将汪精卫隐藏在安全地点。4 月下旬，汪精卫先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回到上海招降纳叛，组织汉奸势力，然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返上海。汪精卫充分意识到进入上海实际上就成为在日本刺刀保护下的傀儡，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拿上海租界作为遮羞布。他在船上，

对这次前途未卜之行颇感渺茫，有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歌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迁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后来汪精卫在《论思》一文中解释这首诗中的背景，极力为他的卖身投靠作辩解。他一方面装出为民请命的样子，把自己说成桓温式的人物，同时借机攻击坚持抗日的救国者，把他们说成像王衍那样清谈误国的人，从而为他的汉奸活动辩解；另一方面，大肆曲解文天祥大义凛然的诗句，似乎文天祥不过是一死报国，而他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倒比文天祥高出一筹，借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5月6日，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一抵上海，就住进上海江湾土肥原的公馆。从此就在日军的保护下，联合南北大小汉奸，进一步策划罪恶的叛卖勾当。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11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东京。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即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决定：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既成政权和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为成员；新政府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日华国交；新政府成立日期以配合战争发展等因素为前提；政治形式采取“分治合作原则”等。并确定五相分别与汪会谈，对汪进行“工作指导”。汪精卫集团向其主子献上《收拾时局具体办法》，乞求各相的支持。

5月16日，五相会议通过汪伪拟定的卖国《办法》，要求汪精卫回国后，“首先与临时、维新两政府首脑及吴佩孚等各方面开始祈冲”，并加紧筹备汪记国民党代表大会，以汪为总裁，提出伪政府名称和首都，“可在中央政治会议中议定”，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规定这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最高指导方针。并与日本正式调整邦交。关于日本控制汪伪的方针，今井武夫后来概括为三条：即一、在国民党（汪伪）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二、国民政府（汪伪）于还都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实际上，日本打着“调整邦交”之名，行独吞中国之实。

日方的这些规定，已远远超出汪、日双方在“重光堂会谈”中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的范围。因此，这个所谓“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都得由日本点头许可，说明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从日本回国后，即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及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就成立汪记国民党、伪“中央政府”等问题，积极勾结策划。汪逆不顾国民政府对其明令通缉，于8月28日在上海召开由国民党投敌分子参加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推选汪精卫为临时主席，通过了以反共为基本“国策”，修订汪记国民党党纲，调整

桓温（312373）东晋大将，素有雄才大略，屡立战功，受人民拥护。后3次北伐，终未如愿。回朝后，意欲受禅自立，未遂，而病死。

王衍（256311）西晋大臣，好老庄玄言，清谈虚无，专谋自保，不以国事为重。

中日关系、和平建国等提案。

日本为使其取得的权利明确地规定下来，12月30日，日、汪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规定：第一，中国承认满洲国；第二，在新国外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第三，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筹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第四，承认日本在内蒙古、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区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第五，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

这个卖国条约的签订，实质上是对中国全部主权的大拍卖。汪逆签约后，即为其登上最高傀儡宝座奔波。1940年1月下旬，汪精卫和华北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华中“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及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等，在青岛会谈，就伪地方政府和伪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等问题达成协议。3月20日，汪精卫召集大小群奸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所谓“实现和平”、“实施宪政”。3月30日，以汪逆为首的全国性伪政权“国民政府”，在日军刺刀的保卫下于南京粉墨登场。这一帮中华民族的败类，通过卖身投靠，甘心充当日本侵略的鹰犬，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就注定不会有好的下场。

汪精卫当汉奸后的心情，通过他在这段时期所制的诗词亦可得到曲折的反映，尽管这些诗词隐晦曲折，但仍可以从中窥见这个卑劣的灵魂。他在《不寐》一诗中写道：

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鸠毒山川亦可怜。

就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粉墨登场、中国战局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要向波兰发动进攻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它宣告了西方“祸水东引”的政策彻底破产。德军侵占波兰后，即挥师北上，践踏北欧，先后侵占了丹麦和挪威。后又挥师西进，首先向中立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开刀，接着进攻法国。由于西方长期奉行绥靖政策，思想麻痹，战备松弛，在纳粹进攻面前一败涂地，不到一个月，号称拥有300万强大陆军的法国就战败投降了。在此情况下，英国局面更加困难，政府改组，丘吉尔临危受命、勇敢地担当起领导英国军民抗战的艰巨任务。

第十八章希特勒图谋波兰

纳粹魔爪指波兰，三军内部紧动员；
绥靖政策告破产，“白色方案”箭上弦。

为了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的步骤相配合，希特勒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一心在盘算着实施征服波兰的“白色方案”了。他认为，凌辱许士尼格和贝奈斯并没有费什么力气，现在要轮到波兰领导人的头上了。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彻底打碎了张伯伦之流的梦幻。

张伯伦曾大肆宣传慕尼黑协定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但和平在哪里呢？历史的纪录如下：

1938年10月21日，也就是在慕尼黑协定后21天，希特勒发布了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

1939年3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

1939年3月23日，德军侵占了立陶宛的默默尔港。

1939年3月24日，希特勒密令三军做好了占领但泽（格但斯克）自由市的准备。

1939年4月3日，希特勒批准下达密令“白色方案”，命令三军在9月1日以前，做好入侵波兰的一切准备。

1939年4月7日，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派兵进入阿尔巴尼亚，这样他在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以后，又征服了这个“山鹰之国”。他因此得到了一块进入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跳板。在欧洲已经十分紧张的气氛中，这使得敢于抵抗轴心国家的小国更加胆战心惊。

这些纪录说明，慕尼黑协定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和平，而是加速了战争的步伐。希特勒本来打算发动局部战争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是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帮了大忙，使德军不战而胜，几个月工夫就连陷两国。这是出乎希特勒和德国将帅们的预料的。于是希特勒决定抓住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并害怕打仗的弱点，继续发动进攻。他对党羽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已经领教过他们了。”他决心以但泽自由市问题为借口，向波兰开刀。这样，围绕着波兰问题就展开了大战前夕一场最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东部，东联苏联，西邻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临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了波兰，德国就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又可以把波兰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集结地和出发基地。波兰有丰富的煤矿，冶金、机器、造船工业都相当发达，通过掠夺波兰的人力物力资源，将进一步加强德国的战争能力。

波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瓜分，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波兰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终于复国，它的领土由俄、德、奥三国操波兰语的居民组成，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北方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泽市，1793年被普鲁士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为自由市，组织自治政府，经济处在波兰支配之下，宗主权也属于波兰。此外，波兰还从战前德国土地上取得通向波罗的海的一条“走廊”地区。

《凡尔赛和约》所缔造的国家，没有一个像波兰那样命运多舛。在刚刚复国以后那几年动荡的岁月里，它对俄国、立陶宛、德国、捷克都曾进行过

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在毕苏斯基元帅死后，波兰主要是由一小群“上校军官”统治着，他们是毕苏斯基麾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俄国作战的波兰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居于魁首地位的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贝克上校负责掌握着外交政策。这帮昏庸糊涂的军人集团，一贯妄自尊大，政治上短见，反苏反共，在希特勒侵捷时，居然趁火打劫，伺机分割了一小块土地。正是因为他们和英国人帮助德国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国家才陷入了军事上无法防守的地位。1939年3月，当希特勒向波兰提出了割让但泽和解决“走廊”问题时，波兰政府才慌了手脚。它坚决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它的盟友法国和英国求援。

在所有同德国接壤的国家中，从长期来说，波兰是最应该有所戒惧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它却是最没有看到德国危险的。“凡尔赛和约》之中，建立波兰走廊，给波兰以出海通道，并且把东普鲁士同德国分开的条款使德国人十分怨恨。把但泽港口从德国分割出去，使它成为处于国际联盟的监督下，然而在经济上又完全处于波兰支配下的一个自由市，这件事情也同样引起德国的怨恨。就是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也把这看成是波兰毁伤了德国的肢体，而不肯予以承认。德国陆军的态度对此更加强烈，早在1922年，冯·西克特将军就这样说过：“波兰的存在对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并存的。……消灭波兰必须成为德国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

然而，贝克上校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有所觉醒的。他同绝大多数波兰统治者一样，对俄国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更不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如此，他也不喜欢法国人。他在1923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曾经被法国当局以出卖同法国陆军有关的文件的罪名驱逐出境，因此对法国人怀有宿怨。他在1932年成为波兰外文部长后，从一开始就对纳粹独裁政权抱有热烈的同情。过去6年之中，他曾尽力使他的国家接近第三帝国而削弱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

1934年，希特勒主动同波兰签订了波德条约，目的就是乘机取得一个如此坚决反苏反共的国家的友谊、而且同时使它疏远日内瓦和巴黎，从而破坏《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欧洲体系。波兰对德国同情友好的关系，使希特勒能腾出手来先办如下的事情：进兵莱茵兰，征服独立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所有这些加强德国、削弱西方、威胁东方的行动，贝克和华沙的其他上校们都以无法解释的完全盲目的态度欣然作壁上观。

如果波兰外交部长，像他自己所说，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已因为希特勒的要求而陷入悲观的话，他的情绪随着春天的到来更大大低沉了，当3月15日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派兵保护“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在那天早晨，波兰南部的边界已被斯洛伐克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就像它的北部边界早已被在波麦腊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一样。仅仅在一夜之间，它在军事上就三面被围，变得无可防守了。

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墨迹未干即撕毁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向波兰提出但泽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系列行动使中欧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重大变化，严重损害了英法在欧洲的利益。慕尼黑政策彻底破产，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指责声，张伯伦丢尽了脸。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张伯伦在下院发表了强烈谴责希特勒侵略的演说，并宣布全力支持并保证波兰的独立。4月，英国又宣布保证希腊、罗马尼亚、丹麦、荷兰等国的独立；同时宣布国民征兵法，加强戒备。法国也跟

着做了相应的表态。由于英法与波兰根本不接壤，要援助波兰，必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于是英法两国曾一度同意从5月份开始和苏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这些都说明，在希特勒侵略得寸进尺的威胁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德政策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希特勒见波兰不肯屈服，而英法又宣布保证波兰的独立，就在1939年4月3日下达秘密指令，要三军做好9月1日以后任何时间进攻波兰的准备。5月22日，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钢铁同盟”。希特勒一贯用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怪影”来吓唬西方国家，阻止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并千方百计地破坏英法同苏联所进行的谈判。

在法西斯威胁日益增长、大战一触即发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一贯坚持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的立场。在一切大小国际会议上，苏联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制止侵略者。当时苏联和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联合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帝国主义战争，而西方国家却企图牺牲弱小国家来姑息法西斯侵略者。苏联政府争取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都被拒绝了。

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三天之后，苏联政府曾建议召开6国会议，来讨论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可是张伯伦认为“还没有成熟”而把它否定了。4月16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以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丘吉尔对英国政府迟迟不接受苏联的建议发表评论说：“如果没有俄国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绝不可能的。”东欧任何国家都没有在那个地区维持一条战线的力量。然而苏联的建议却在伦敦和巴黎引起惊愕。张伯伦一心一意要把苏联排除在欧洲大国集团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时代所做的一样。那些顽固坚持反共的波兰上校们，即使在德国人已经到了华沙的大门口，他们也拒绝接受苏联的援助。

1939年4月7日，墨索里尼派兵侵占了阿尔巴尼亚，这更加剧了动荡不安的欧洲局势，一些军备薄弱的国家愈加胆战心惊。4月中旬，戈林专程到了罗马，同墨索里尼就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问题举行了两次长谈。这次会谈也谈到了在4月15日发到罗马和柏林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呼吁。据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说，墨索里尼开头对这项呼吁连看都不屑一看，戈林说，根本不值得给予答复。墨索里尼认为，“这是小儿麻痹症的结果”；戈林认为“罗斯福害了初期的神经病”。

美国总统在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里，要他们作出保证，声明德意武装部队不会入侵英、法、彼、苏在内的31个国家。罗斯福说，如果能作出这种保证的话，他答应美国将参加世界范围的谈判，来使世界解除“军备竞赛的重负”，并且打开国际贸易的道路。

罗斯福的呼吁，给希特勒正在进行的侵略扩张提出了难题。为了答复罗斯福的质问，德国外交部在一份外交照会中，向除了波兰、苏联、英国和法国4个国家而外的所有罗斯福提到的国家，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是否感到自己受到德国的任何威胁？它们曾否授权罗斯福作这一呼吁？征询的结果，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南斯拉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和卢森堡、都对以

上两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这些答复为希特勒提供了弹药，他利用这些材料，作了足足有两小时以上的“精彩”的演说。

他雄辩滔滔，机锋横溢，对罗斯福的呼吁极尽讽刺挖苦、虚伪狡诈之能事。他的演说，不仅在德国电台上广播，而且在全世界几百家电台上广播；在美国也由各大广播公司转播。在此以前和以后，他都不曾有过那天那么遍及全世界的听众。一上来先诉说一通《凡尔赛和约》的罪恶，和它所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平和长期痛苦，以后，这篇演说首先对英国和波兰作了答复，这个答复震动了忧心忡忡的欧洲。

他先说，他对英国的钦佩和友谊，然后就攻击它对他不信任，攻击它对德国实行新的“包围政策”，并宣布废除 1935 年的英德海军条约。他说：“它的基础已经消失了。”对波兰也一样，希特勒公开了他一直保守秘密的关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向波兰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称做“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象得出的最大的让步”，并且告诉德国国会，波兰政府已经拒绝了这一个“独一无二的建议”。波兰同英国订立了军事协定，因此波兰已经背弃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他认为这一协议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从而已经不再有效。

希特勒接着就转向罗斯福总统，德国独裁者的辩才几乎在这里发挥到顶点。在普通人听来，这些话充满了伪善与欺骗，但是那些仔细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们听来，却真是一番享受。当德国“元首”用越来越动人的效果，几乎无休止地取笑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议员们不断地哄堂大笑。他先把罗斯福来电中的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就一脸奸笑地予以讥讽和诡辩。

罗斯福总统来电说，他认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希特勒就此回答说：“要是这些问题果真能在会议桌上得到解决的话，我将不胜高兴。然而，我的怀疑是有事实做根据的，那就是，最明显地表示不信任会议有用处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会议就是国际联盟。”希特勒还提醒美国总统，德国曾参加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一次会议，它不是去参加讨论，而是去听别人捉弄。它的代表“受到的屈辱甚至比苏安族的酋长所受到的屈辱还要大。”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要求他保证不进攻 31 国中任何一国所做的答复，最后接触到了核心。希特勒反问：“罗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德国政策的威胁，而哪一个国家又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威胁呢？”

他说：“我曾经不厌其烦地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调查了一下。第一，它们是否认为它们自己受到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第二，美国总统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应它们的请求提出来的呢，还是至少在它们的同意下提出来的呢？所有的答复都是否定的……诚然，我并没有对某些国家提出询问，因为这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目前还没有取得自由，而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占领下，因而被剥夺了它们的权利。”

然后，希特勒抓住爱尔兰和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攻击说：“我必须请罗斯福先生注意一两个历史的错误。他提到了，举例来说，爱尔兰，并且要求我声明德国不会进攻爱尔兰。我刚刚读到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的一篇演说，奇怪的是，他在这篇演说里，同罗斯福的意见相反，并没有非难德国压迫爱尔兰，而是谴责英国不断侵略爱尔兰……”

“同样，罗斯福先生也没有注意下面的事实：巴勒斯坦目前并不是在德

国军队占领下，而是在英国军队占领下，这个国家的自由受到了最残暴的武力手段的压制。”

德国国会议员们笑得声震屋瓦，然而希特勒却一丝笑容不露，保持着他那一本正经的神态，以期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在临近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大摆自己的政绩，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毋宁说是讲给德国人听的，他说：

“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和由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

“我曾做到了使 700 万失业工人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团结了起来，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了起来。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地撕毁那长达 480 条的条约，其中包含着任何国家人民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压迫。

“我把 1919 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希特勒最后说：“虽然如此，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进步与和平。”

就欺骗德国人民这一点来说，这篇演说是希特勒“最光辉的杰作”。通篇都是迷魂阵，尽管乍听起来似乎把罗斯福驳得体无完肤，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答美国总统的根本问题：他的侵略是否已经到头？它是否要进攻波兰？

从后来的事实看，这是希特勒一生中在和平时期所作的最后一篇重大的公开演说。迄今为止，这个前奥地利的流浪汉是尽可能以他的口才来建立功业的，从今以后，他就企图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征战的名声了。

希特勒在国会批驳了罗斯福电报之后，就加快了进攻波兰的部署。请看：

——5 月 22 日，在柏林总理府，以相当盛大的排场同意大利签订了“钢铁盟约”。条约规定：“如果违反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有一方陷入与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军事纠纷之中的情事，则另一个缔约国则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予以援助和支持。”条约的第五条还规定，在一旦发生战争时，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媾和。从此，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就紧紧地拴在一个战车上了。

——5 月 23 日，在“钢铁盟约”签字的次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他一开头就对军事首脑们说，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后才能解决，而如果不侵略或者不进攻其他国家的领土，这是办不到的。他直率地告诉他们，若不流血就不可能取得什么胜利，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希特勒决心蹈德皇之覆辙，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不惜冒同英国和法国摊牌的危险。

——5 月 24 日，在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讲话的第二天，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在外交部汇报了纳粹扩军备战的情况。从前的帝国陆军花了 16 年的时间（从 1898 年到 1914 年），才把兵力从 43 个师增加到 50 个师，而第三帝国的陆军在 4 年之内就从 7 个师一跃增加到 51 个师。其中有 5 个重装甲师，4 个轻装甲师，一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代摩托化师。海军在几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两艘 26000 吨的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17 艘驱逐舰和 47 艘潜水艇的舰队。而且还有两艘 35000 吨的战斗舰、1 艘航空母舰、4 艘重型巡洋舰、5 艘驱逐舰、7 艘潜艇即将建

成。空军从完全一无所有开始，建立了一支有飞机 21 个中队、人员 26 万人的力量。至于军人工业，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位将军宣布，事实上，德国重整军备的总成绩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6 月 15 日，德国陆军司令冯·勃劳希契按着希特勒的指示，制定了陆军对波兰进行军事行动的计划。为了征服波兰，勃劳希契成立了两个集团军。南路集团军，由第八军团、第十军团、第十四军团组成；北路集团军，由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组成。南路集团军由冯·伦斯德将军指挥，将从西里西亚发动进攻，“以华沙为总方向，击溃抗击的波兰军队，以尽可能强大的努力尽速占领维斯杜拉河两岸的华沙，目标在于同北路集团军合作，歼灭波兰境内仍然在顽抗的波兰军队”。北路集团军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开走廊，“建立德国和东普鲁士之间的联系”。各个集团军所属各军团和空军及海军都有详细具体的目标。勃劳希契说，在开战的第一天，但泽就要宣布为德国领土，并且将有德国指挥下的地方力量把它拿下来。

同时发布的一项补充命令规定，为执行“白色方案”而部署军队的命令将于 8 月 20 日执行，“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那一天完成”。

一个星期以后，即 6 月 22 日，凯特尔将军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白色方案初步时间表”。希特勒已经把 9 月 1 日规定为进攻波兰的日子。希特勒所计划打的是总体战，它不但要求军事动员，而且要求全部资源总动员。为了统一调度这个规模庞大的工作，第二天，即 6 月 23 日，就在戈林主持下召开了国防会议。要求工业、农业、交通，一切都要为前线服务。为此，希特勒已决定征召大约 700 万人的劳动大军充实这方面的工作。

这时，欧洲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为着不同的目的加紧进行活动。为了掩人耳目，希特勒也在忙于为入侵波兰制造借口。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就要爆发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章挑超世界大战

白色方案剑出鞘，宣传机器大造谣；
贼喊捉贼行诡计，世界大战爆发了。

希特勒为了征服波兰，一方面磨刀霍霍，加紧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准备；另一方面，为了分化西方联盟，孤立波兰，积极与英国、法国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外交活动。正是在张伯伦、达拉第之流鼓动“祸水东引”的情况下，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欧洲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折。

苏联同波兰接壤，德国东进侵略波兰，将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因此，苏联政府对德波关系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的态度不能不给予高度的重视。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张伯伦同希特勒谈判，亲自出马，飞来飞去。但等到英法与苏联谈判时，却只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在最后派夫进行军事谈判的代表团慢吞吞地坐船来到苏联时，还忘了带全权证书。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这一谈判仍非常重视，一开始就提出缔结英、法、苏三国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并要求保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安全与独立，但是英法政府却非常不信任苏联，也不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只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许多义务，而却不对苏联的安全承担任何义务。

到8月中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的谈判，事实上正陷于停顿状态。当英法军事代表团乘船于8月11日抵达苏联首都后，他们不与苏联代表讨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侵略，他们避而不谈缔结军事条约的实质问题，而就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所谓“原则问题”消磨时间。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说，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是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代表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英国代表德拉克斯吞吞吐吐地说，目前英国有5个正规师和一个机械化师。苏联说，战争一开始，它能派出136个步兵师、5000门大炮、10000辆坦克和5000架飞机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到8月14日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的领土去迎击德国入侵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能怎么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他具体问到：“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德军接触？”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后，如坐针毡的英法代表认为，伏罗希洛夫提出了他们所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

在8月21日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再次重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组织三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合作。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只有苏联军队在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它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如果不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他们就无法同英法军队合作。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设想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和总参谋部，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给他们以指示？这只能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有同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的愿望。

杜芒克和德拉克要求本国政府指示回答关于波兰的问题，等了三天都没有回音。在8月17日杜芒克曾给巴黎打电报说：“苏联是想订军事条约的。它不想要我们给它一张没有具体保证的废纸。伏罗希洛夫宣布，只要他所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杜芒克要求巴黎设法使华沙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却遭到英法和华沙统治集团的粗暴拒绝。

这时，英法也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既然苏联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没有成功，那么苏联的急迫任务就是百倍警惕西方国家的“祸水东引”政策。在大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苏联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1939年8月23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一条约的签订，粉碎了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对苏联的包围，对苏联来说，虽然这是权宜之计，但却使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加强战备，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苏德条约之签订，增加了轴心国之间的矛盾，使德、意、日一致投入对苏联的战争成为不可能。条约签订后，日本当局谴责德国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表示抗议，平沼内阁被迫辞职；意大利独裁者认为，德国藐视意大利，从而感到受了侮辱；佛朗哥则发表声明，要在欧战中保持中立。而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也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若干年来英法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彻底失败”。

希特勒所以突然同意签约，宣布停止反苏，互不侵犯，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基本的原因是，希特勒看到英法态度转趋强硬，认为同西方战争不可避免。为了避免在新的世界大战中重犯第一次大战时德军两线作战的错误，希特勒决定先不去碰苏联这块硬骨头，而去首先打垮软弱并且没有战争准备的英法两国。这是他的“各个击破”策略的故伎重演。

希特勒在同英法和苏联外交谈判的掩饰下，进一步加快了侵略波兰的步伐。8月14日，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召集三军司令长官会议，来听他进行战争的计划和预测。他说，“伟大的戏剧，现在已经接近高潮了”。他肯定英国和法国不会打仗，英国没有一个真正有胆略的领袖。他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人物。英国要打仗是为了什么？谁肯为了一个盟国而找死？谈到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的作为，他说，它们硬攻西壁是不大可能的。向北经过比利时和荷兰包抄不可能迅速取胜。这些办法都帮不了波兰人的忙。这些因素都表明，英国和法国不会参加战争，没有什么东西逼它们非打不可。因此波兰很可能单独作战。但是希特勒解释说，仍然必须把它“在一两个星期内”打败，好让全世界都看到波兰已完全垮台，这样就不会再设法搭救它了。希特勒的统帅部最高长官凯特尔，也对进攻波兰会引起大战的看法嗤之一笑。他说：“英国太老朽了，法国太腐败了，美国太不关心了，它们都不会为波兰打仗的！”

这样，当1939年8月下半月开始的时候，德国的军事首脑们全力准备消灭波兰的计划，同时也准备万一西方盟国出乎预料而出兵干涉时保卫德国西部。原定在9月份第一周开始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在8月15日悄悄地取消了。有25万人被征入伍，到西线的军队中去。对铁路提前发出了动员令。陆军司令部已计划迁移到柏林东面的佐森。同一天，海军方面报告，袖珍战斗舰“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及21艘潜水艇已准备好开赴大西洋区。

为了给入侵波兰制造借口，纳粹特务们奉希特勒的指示，炮制了一个代号叫“希姆莱计划”，做法十分简单，也十分露骨。党卫队的秘密警察将利用集中营的死囚穿着波兰陆军的制服向靠近波兰边境格莱维茨地方的德国广播电台发动假进攻，这样就可以指责波兰进攻了德国。8月初，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接到了希特勒的手令，要他发给希姆莱150套波兰军服和若干波军小型武器。

这个党卫队的头目，选定了一个叫做阿尔弗雷德·赫尔莫特·璠约克斯的年轻的党卫队特务，来执行这项计划。对这个奇特的人物来说，接受这样的任务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在1939年3月，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璠约克斯就曾受海德里希指使，把炸药运入斯洛伐克，据他后来供认，这批炸药就是用来制造事件的。璠约克斯，是党卫队秘密警察的典型产物，是一个有文化的匪徒。他曾在基尔大学学过工程，在那里第一次尝到了同反纳粹分子殴斗的滋味，有一次他的鼻子给人打瘪了。他是在1931年参加党卫队的，在1934年保安处成立时就到了那里。像海德里希周围许多别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从事党卫队内被认为是一种花脑筋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和“哲学”。同时他也很快成了一个被认为是难对付的年轻人，可以被委任去执行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设想出来的那种不大光彩的任务。

当希姆莱、海德里希和缨勒在希特勒下的命令下准备利用这批“罐头货”为德国侵略波兰制造借口的时候，“元首”在部署三军方面也作出了第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准备应付可能会打大的战争。在8月19日，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日子，希特勒给德国海军下达了出发的命令。21艘潜艇奉命进入不列颠群岛以北和西北的阵地，“斯比伯爵”号启碇开赴巴西沿岸海面，它的姊妹舰“德意志”号也进驻能切断北大西洋英国海上航路的阵地。

8月22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前夕，希特勒又把他的高级将领召到上萨尔斯堡，向他们宣扬他自己的“伟大”，并且要求他们打起仗来必须“残酷无情”，不要有任何怜悯，并且告诉他们，他很可能在四天以后即星期六，8月26日，就下令进攻波兰，比原定计划提前六天。

不少纳粹将士，虽然相信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机是有利的，但是一个国家无端地入侵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从道义上是讲不通的。为此，希特勒大肆宣扬他的强盗逻辑，他说：“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希特勒越讲越被动，唾沫星子满天飞，他咆哮着：“心要狠！手要毒！八千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谁强谁就对。心要硬，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机器，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为侵略战争大造反革命舆论，肆意欺骗德国人民。德国报纸、电台、通讯社连篇累牍地宣传：“当心波兰！”“华沙扬言要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到希特勒快要进攻波兰的日子8月26日，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顶峰。这天《柏林日报》的标题是：“波兰完全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的边缘！”《十二点钟报》的标题是：“这样的玩火行动太过分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的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了一片火海！”《人民观察家报》8

月 27 日的通栏标题是：“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150 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当然，关于德国的动员情况只字未提。

希特勒经过多次谋划，终于在 8 月 31 日中午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白色方案”第一号作战指令。命令全文如下：

一、现在东部边界的形势已达到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地步，要用和平方式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我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

二、对波兰进攻应该按照“白色方案”执行，只有一点改变，就是陆军方面军事部署几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其限。至于任务和作战目标的分配都维持不变。

进攻日期——1939 年 9 月 1 日。进攻时间——4 时 45 分（用红铅笔注上）。

三、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明明白白地由英法方面来负。开始时，对于对方的不重要的越境侵犯行为，只应采取纯粹局部行动来予以还击。

那天傍晚，当夜幕笼罩着欧洲大地的时候，150 万德国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入波兰边境的前沿阵地，只等次日拂晓出击。这时希特勒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动宣传机器，玩弄一套欺骗伎俩，使德国人民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在精神上有所准备。

当时的德国人民不明真相，正需要这样一付药剂。晚上 9 点，所有的德国电台都广播了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大讲特讲这一建议是如何诚恳，如何公道和切实可行，但却被波兰“粗暴地拒绝”了。可是希特勒从来没有向波兰人提出过这个建议，甚至对英国人也不曾正式提出过，只不过是不到 24 小时以前含糊其词地而且非正式地向英国大使提了一下而已。

希特勒从切身经验中深刻懂得，好的宣传如果要有效果，仅仅依靠言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实际行动。为了给入侵波兰制造行动借口，党卫队的流氓特务瑞约克斯，按照希特勒的指令，于当晚 8 点钟，向靠近波兰边境的德国格莱维茨电台表演了一场伪装波兰方面的进攻。由穿着波兰陆军制服的党卫队人员开枪射击，把事先麻醉过去的集中营囚徒、代号为“罐头货”的一些人放在地上，充当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伤员”。从此，这个“以牙还牙”、“以武力回敬武力”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1939 年 9 月 1 日破晓，也就是在“白色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中规定的拂晓 4 点 45 分，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天空中，德国的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恐怖之中。

这一天，在柏林是一个灰暗的、有些闷热的日子，尽管无线电和晨报号外相继传来重要的新闻，但街上的老百姓却对此非常冷淡。人们不禁想起，这种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 1914 年德国投入战争时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时候是一片狂热。麇集街头的人群表现出如醉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向德皇兼最高统帅威廉二世疯狂地欢呼。

这一次，人们对军队和纳粹统帅都没有这样的表示。上午将近十点钟的

时候，希特勒从总理府驱车驶过冷清清的街道前往国会，去向全国人民报告他刚刚毫无人性地挑起的重大事件。当这位独裁者开始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这一天早上突然投入战争的时候，就连那些由希特勒一手指派、大部分属于党棍的傀儡议员的反应也都不大热烈。他以往在这个华丽的克罗尔歌剧院大厅内，就比较次要的问题发表演说时，所得到的掌声，也比这一次热烈得多。

过去，他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时候，已经不知说了多少谎话，在这个历史的严重关头，他又用混淆视听的谎言来愚弄德国人民和为他荒唐的行为辩护。“诸位知道，”他说，“我曾一再作出努力，争取在奥地利问题以及随后的苏台德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等问题上通过和平途径澄清事态，并取得谅解；但是，一切都归于徒劳。”“在我同波兰政治家们的会谈中”，德国的“诚恳建议”，又“遭到了拒绝”，“整整两天，我和我的政府在等待着，看看波兰政府是否方便，能否派遣一位全权代表前来”，但是，“我再也看不到波兰政府有任何诚意同我们进行认真的谈判”。他说道：“昨天夜间，波兰正规军已经向我们的领土发起第一次进攻。我们已于清晨5点45分起开始还击。从现在起，我们将以炸弹回敬炸弹。”

希特勒不仅肆意欺骗德国人民，而且还对那些亲眼看到是谁首先在波兰边境发动进攻的德国士兵，灌输了一顿编造的谎言。他在9月1日一份冠冕堂皇的告德国军队书中说：“为了制止波兰侵犯边境的疯狂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

在发动侵略战争那天，希特勒只有一次在国会说了实话。“我要求德国人民的，只不过是我自己四年来准备做的，”他说，“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从最后下场来看，这一次希特勒算是言中了，一旦战败，他是不敢正视也不敢承担战败的责任的。希特勒还说，如果他遭遇不测，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他又指定赫斯为继戈林之后的第二个继承人。万一赫斯遭遇不幸，希特勒建议：“就依据法律召开参议院会议，由参议员中推选一位最相称的，也就是说，最勇敢的继承人。”

希特勒一回到总理府，另一种更恶劣的情绪代替了他在国会中的比较克制的态度。他对到处为和平奔走的一个瑞典人达勒鲁斯说，他要打垮波兰，并且要把它全部吞并掉。谈到英国，希特勒挥舞着拳头吼道：“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两年，我就打两年……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10年！”说着他举起一个拳头向下一挥，几乎碰着了地板，尽管这样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嚷了一阵，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非跟大不列颠兵戎相见不可。这时中午已经过了，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深入波兰境内好几英里，正在迅速向前推进，大多数波兰城市，包括华沙在内，都遭到了轰炸，平民死伤数目相当可观。但是伦敦和巴黎却没有任何消息表示英国和法国急于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

9月1日深夜，当德国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国境、德国空军不停地进行轰炸的时候，英法的照会来了，它们要求希特勒必须把他的军队撤回德国境内。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知道，希特勒决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因此正如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可想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点点希望，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1939年9月3日，星期天，阳光灿烂，空气中飘着馥郁的芳香，这是夏

秋之交柏林少有的好天气。天刚一亮，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就收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发给汉德逊大使的一份电报，指示他设法同德国外交部长在上午九点举行一次会晤，把另一份英国政府的照会递给他。

如今，张伯伦政府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它在大约 32 小时以前曾照会希特勒，如果德国不从波兰撤军，英国就将宣战。可是一直没有答复，于是英国政府决心履行它的诺言。正如法国驻伦敦大使查理·考平在头一天下午两点 30 分给那位踌躇不定的庞纳外长的报告中所说的，前一天英国政府就担心希特勒可能故意迟迟不作答复，以便尽量攫取波兰的领土，等到把但泽、走廊等地稳稳地抓在自己手里以后，他就可以提出一个所谓“宽宏大量”的和平方案来。为了不上这个圈套，哈利法克斯要法国人考虑，如果德国政府不在几小时之内对 9 月 1 日英法两国的声明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两个西方国家就对德国宣战。英国内阁在 9 月 2 日下午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后，哈利法克斯就具体建议，在当天半夜由两国一同向柏林提出一个限于 9 月 3 日上午 6 点以前答复的最后通牒。但是庞纳不同意采取这样性急的步骤。

事实上，四分五裂的法国内阁在上星期经过了重重难关，才勉强决定首先要履行法国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但是，在 9 月 2 日，当英国人催促法国人同意在半夜就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总参谋部却踌躇起来了。他们认为，如果德国人在西线立刻发动进攻的话，不得不孤军作战的将是法国。没有一个英国兵会来支援他们。总参谋部坚持要求再等 48 个小时提出最后通牒，为的是“顺利地进动员”。

下午 6 点以后，哈利法克斯打电话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立克·菲普斯，并对他说：“英国政府不能再等 48 小时。法国的态度使英王陛下政府深感为难。”两小时以后，英国政府的处境之难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张伯伦在下院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大多数议员，不论属于哪个党派，对英国方面迟迟不履行它的义务都已经感到极不耐烦。等到听了张伯伦的发言之后，他们几乎快按捺不住自己了。张伯伦告诉议会，英国政府还没有收到柏林的答复。除非德国给予答复，并且保证从波兰撤军，否则英国“必将采取行动”。如果德国人果真同意撤退，那么，英国政府“就愿意认为局势依旧同德军越境进入波兰以前一样”。目前英国政府正在同法国就两国对德最后通牒的时限问题进行联系。

在波兰战事已经进行了 39 个小时之后，下院再也不能接受这种拖延战略了。议员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工党临时议会领袖阿瑟·格林伍德站起来愤慨地说：“在这样的时刻，英国和英国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全人类的文明都遭到了威胁，我不知道我们打算犹豫到什么时候，我们应当和法国人并肩前进。”

问题就在这里。当时，事实证明要推动法国前进是很困难的。下院怒气冲天，使张伯伦如坐针毡，他不得不打断激烈的争论为自己辩护说，要通过电话同巴黎磋商，使“看法与行动取得一致是需要时间的”。他接着说，“如果下院竟有人认为我提出的声明流露出对本政府或法国政府有丝毫的动摇，我就不免感到震惊”。他说，据他所知，法国政府“这时正在开会”，“几个小时以后”将可得到他们的消息。他向激愤的议员们保证，明天他只有一种答复给下院，让大家相信他说的“完全是实话”。张伯伦非常了解，英国人民很不满意他，在这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

张伯伦从下院出来，马上就给达拉第打了个电话。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

最后通牒于明日上午 8 点发出，限中午 12 点以前答复。达拉第回答说，除非英国轰炸机群准备立刻出动，否则法国认为，最好把对德军的进攻推迟几个小时。

过了不到一小时，哈利法克斯在夜晚 10 点 30 分也给庞纳打了个电话。他极力敦促法国政府接受英国的折衷方案，即于 9 月 3 日上午 8 时向柏林提出最后通牒，最后期限为中午 12 点。法国外交部长不仅不同意，而且还对哈利法克斯提出抗议说，英国方面坚持这样迫不及待地行事会给人造成“一种十分糟糕的印象”。他要求伦敦再等一等，至少在中午以前不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

下院将在 9 月 3 日（星期日）中午开会，从星期六晚上那次会议的情绪看来，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明白，如果这个政府想存在下去，他们就必须给予议会所要求的回答。第二天凌晨两点，法国驻伦敦大使考平警告庞纳，张伯伦内阁如果不能给议会以确切的答复，就有被推翻的危险。接着，哈利法克斯在电话中告诉庞纳，英国打算“单独行动”。随后，英国外交大臣于凌晨 4 点左右电示汉德逊大使，叫他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 9 月 3 日上午 9 点递交给德国政府。这份通牒提到英国政府曾在 9 月 1 日的照会中宣布，如果德国军队不立刻撤退，英国就要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份通牒接着指出：“在今天 9 月 3 日英国夏季时间上午 11 点以前，如果德国政府不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并送到伦敦英王陛下政府，则从该时起，两国即处于战争状态。”

正在开会的纳粹头目们，获悉英国的通牒后，个个惊恐不安。希特勒坐着一动不动，瞪起两只眼睛望着天花板。戈林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那就只有靠上帝发慈悲了！”戈培尔垂头丧气地独自站在一个角落里发愣。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忧心忡忡的样子。

继英国之后，经过反复讨论，法国政府也于 9 月 3 日上午 10 点 20 分，向纳粹政府递交了与英国内容大致相似的最后通牒。从此，希特勒想用外交手腕，使英、法置身在战争之外的企图，宣告彻底失败。当天下午，这位独裁者就发布了“第二号绝密作战指令”，并命令德国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轨道”。

3 日中午 12 点 6 分，张伯伦，这个曾经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的政治家，向下院发表了沉痛的演说，宣布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为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命中注定不能看到这一天，1940 年 11 月 9 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

9 月 3 日，英法根据英波互助条约和法波盟约，在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匆忙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战开始时，双方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英法方面。从兵力上看，当时波兰有 40 个步兵师和 12 个骑兵师；法国有相当于 110 个师的兵力。而当时德国只动员了 98 个师。在经济实力方面，英法有广大殖民地，多数战争资源都不缺乏，而德国则缺乏铁砂、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但是由于英法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且不想真正打，行动磨磨蹭蹭，到波兰战争结束 3 个星期后，

英国才派了4个师在法国登陆；法国军队的出动，事实上也只是一种军事示威的性质，完全是防御性的。在背地里，英法仍然通过美国政府出面“调停”，幻想停战。用张伯伦的话来说，当时的战争叫做“晦暗不明的战争”。所谓“晦暗不明”，实际上是“战”与“和”还在两可之间。由于英法领导上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因此战争初期一直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估计波兰可以抵挡数周之久，法国估计波兰可以支持到1940年春，波兰军事当局更是盲目自信。不料，德军突如其来的攻势，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的“闪电战”，使波兰猝不及防，空军来不及起飞，在48小时之内，500多架飞机几乎全部被摧毁。德军很快占领了波兰的主要工业区，把波军分割并就地包围。到9月17日，波兰军队崩溃之势已成定局。

在希特勒的“闪电战”中，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部队初次显露头角。整师整师的坦克横冲直撞，在飞机的掩护下，一天推进三四十英里，能够迅速开炮的摩托化重炮，甚至在坎坷不平的波兰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滚滚推进。150万乘坐机动车辆的法西斯军队，通过错综复杂的无线电、电话和电报网所组成的电讯系统，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构成了人世间前所未见过的机械化大屠杀。

波兰首都华沙的居民，在波兰政府逃亡之后，自动奋起保卫首都，英勇坚持战斗。德国法西斯进行残暴的轰炸和炮击，于9月27日攻陷了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纳粹军队对华沙人民，特别是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性的大屠杀，犯下了滔天罪行。

希特勒军队在波兰的迅速推进，使西方国家大为震惊，也使苏联政府大为震惊。为了防止德军全部占领波兰，9月17日，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命令苏联红军越过西部国境，进入波兰的东部地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一地区在苏维埃国家建国初期被德帝国主义割去，后归波兰统治。9月下旬，苏联红军重新取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9月29日，苏德两国缔约划定了两国占领地区的边界线。此后，苏联就沿着自己的西部边区建立了“东方战线”。

对此，英国丘吉尔曾发表了如下的评论：

“……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战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纳粹德国不敢进攻的一个东部防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这样做，则将违背俄国历史性的生存利益。”

波兰被占领后，波兰政府流亡到英国，人民继续进行游击战争，反击侵略者。1942年波兰工人党成立，在苏联境内组成波兰军团，进一步加强了反法西斯战争。

然而，面对着希特勒对波兰的蹂躏和大屠杀，作为波兰的盟邦英、法两个大国，除了空喊口号外，却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章晦暗不明的战争

英法宣战一场空，西线静坐假战争；
波兰山河夺到手，“元首”高唱和平经。

虽说英国和法国已正式向德国宣战，声明要援助他们的盟国波兰，但是，当纳粹匪徒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残酷屠杀波兰人民时，英法却无动于衷，西线出现了惊人的平静。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作“静坐战争”。在西方，人们也很快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假战争”，或叫“晦暗不明的战争”。正如一位名叫富勒的英国将军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 26 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珂德式的英勇的德国被希特勒消灭了。”

对此，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

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的确，对于这种情况，德国人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在 8 月中旬，曾详尽地估计了—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9 月 7 日晚上，他还记下希特勒那天下午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英、法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

希特勒正是出于这种估计，过了两天，就发出关于西线作战的训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训令”这样写道：

务须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英国人和法国人身上。对不大的越境行动，最初应以纯局部性的行动去回答。

我们答应给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中立地位应切实予以尊重。

如果英国和法国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西线武装力量的任务，将是通过保存兵力，为胜利结束波兰作战创造条件。根据这一任务，必须尽可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及其经济潜力。只有接到我的命令后才能发动进攻。

如果西方国家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陆军应扼守西方壁垒，做好准备，防止它遭到北面的迂回。

英国和法国对波兰作出的保证，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具体的。1939 年 5 月 19 日的法波军事协定明确规定，

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9月1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15天，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总参谋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35个到38个师。但当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941至1942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刻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的确，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够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10月11日，波兰战事结束了三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4个师，共15.8万人，到法国去。丘吉尔讽刺为“象征性的帮助”。

那些纳粹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茵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我们没有在1939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完全按兵不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最高统帅部和法国政府当权派深染失败主义情绪，他们对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怀有恐惧心理，在纳粹匪徒疯狂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果真，正如丘吉尔所说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希特勒遭到致命性的打击。许多纳粹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9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9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作了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1938年在慕尼黑的时候，1936年在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以及1935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和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认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

英国和法国虽然高挂免战牌，但德国的海军却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11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64595吨，几乎等于1917年4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53561吨，第三个星期为12750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4646吨。9月份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舰只为26艘，共135552吨；被水雷击沉的为3艘，共16480吨。

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野的丘吉尔又重新入阁担任海军大臣。这时

他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路程。没一个人曾像我那样感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体会到，当个人威信低落时，如果重要的军舰沉没和事情发生差错，海军大臣会遭到何等的待遇。如果我们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我是否再要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费希尔、威尔逊、巴登伯格、杰利科、贝帝、帕克南、斯特，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
只他一人还在！

我们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无限的苦难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波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英帝国虽然完整，光荣地团结一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我们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但在飞机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

英国从宣战的第四个星期，海军损失所以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9月7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只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战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要一星期。”

对9月3日被德国“L1—30”号潜艇击沉的英国“雅典娜”号邮船，希特勒采取了贼喊捉贼的办法。9月3日晚上9点，也就是在英国宣战10个小时以后，满载1400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雅典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200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德国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了112人死亡，其中有28名美国人。对此，希特勒不仅矢口否认是德国人干的，而且在10月22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竟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第二天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雅典娜号》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构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难堪，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只要纳粹元首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希特勒在基本上消灭波兰主力之后，一方面加紧作入侵西方的准备，一方面又竭力鼓噪“和平”。这个恶魔在9月19日国会上说，“我无意同英国

和法国作战”，“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祈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9月26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极力表明“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同一天，希特勒又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外交部翻译官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

“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又不会丧失面子。”纳粹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认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的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王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

“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与此同时，9月27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决定趁英法还没有做好准备，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但为了欺骗人民，麻痹对方，10月6日中午，希特勒又假装诚挚的样子，再次提出“和平”的建议。

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希特勒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他先用了—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的赫赫战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他说，“德国对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再愿提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于英国“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他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反唇相讥，质问英法，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是为了要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希特勒狂妄地说，《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诸如“解决和了结犹太人的问题”，解决欧洲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易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问

题的限制。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希特勒继续说道，“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

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消耗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希特勒呼吁那些持有相同见解的人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响应，并对主张抗战的丘吉尔进行了攻击和恫吓。他说，“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

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 1918 年 11 月”。

当天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对“和平”也作了一番“精彩”的鼓噪。这家纳粹机关报的标题是：《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外德国再无其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事后盟军从缴获的纳粹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希特勒就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为他的和谈阴谋进行活动。早在 9 月 8 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民普遍厌战，打算一俟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10 月 2 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

这是个很可靠的情报。10 月 7 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10 月 10 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

张伯伦于 10 月 12 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问题”。他说，德国政府的诺言是不能信赖的。如果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10 月 13 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

就在希特勒大唱和平经的同时，却又指示纳粹匪徒们对波兰人，尤其对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巴黎东北贡比涅签订投降协定。规定德国停止军事行动，交出部分陆海军武装，德军撤出占领的土地和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区等。它后来成为《凡尔赛和约》的基础。

犹太人，横加杀戮。10月18日，希特勒对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说，“我们无意重建波兰”，“绝不能让波兰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希特勒恶狠狠他说：“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计划。”

德国确实这样作了。9月10日，当波兰战事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个事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50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太会堂杀害了。纳粹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有42本生活和工作日记。这些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字不漏地都写进去了。他在任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7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嚷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7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为了消灭波兰的知识分子，弗朗克在一次对下属的讲话中说：“先生们，我要求你们，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送到德国的集中营去。”

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罪行。1940年10月7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亲爱的同志们”，他说，“我不可能在仅仅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部肃清。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第二年圣诞节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词时说，“至于犹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350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赶走。1939年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常常是在零下40度的气温下进行的，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刑架上的人还要多。为了加强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镇压和毒害，希特勒于1940年在奥斯威辛建立一所集中营，由党卫队精选的一批恶棍负责监督管理；在这群野兽中，有一个名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1946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250万，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50万人。

希特勒这个杀人魔王，在波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他却老虎念佛珠，伪装慈悲，侈谈和平，其目的只不过是為了欺骗麻痹人民，更好地掩护其侵略扩张计划而已。为了转移英美视线，希特勒把他的侵略矛头暂时指向北欧。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章 欲谋西进 反战多

“元首”下令要西征，反战情绪暗滋生；
陆军图谋搞政变，优柔寡断化泡影。

就在纳粹元首在国会提出“和平倡议”的第四天，10月10日上午11点，他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将领们的意见，就发布了西进的绝密第六号作战指令。

希特勒命令部队为穿越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攻击战作好准备，并要求必须尽早实现这一攻击；进攻的目标在于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同盟国部队。同时，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尽可能多地占领土地，以便作为对英国进行有利的空战和海战的基地。希特勒要求三军总司令尽快根据本指令制定计划，并将进行情况随时向他报告。希特勒在把命令交给他的军事将领们之前，还向他们宣读了10月9日签署的一项秘密“备忘录”。

将领们对这样仓促地在西线发动进攻，曾经表示反对。可是希特勒告诉他们，时间是在敌人那一边的。他提醒他们，波兰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实际上只有一条战线。这种形势仍未改变，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

至于意大利，“备忘录”说，“意大利支持德国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活着，以及德国是否有更大的新胜利去吸引那位领袖。在这里，时间也是个因素。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压力下放弃中立，这是德国不能坐待其发生的事情。甚至就美国来说，“也应当认为时间是不利于德国的。”

希特勒承认，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性，他列举了好几个危险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国家，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被拉到敌对的一边去。而德国“有限的粮食和原料基地”，也会使德国难于取得物资进行战争。他说，最大的危险是鲁尔区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一旦德国这个工业生产的心脏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德国战争经济的崩溃，从而丧失抵抗能力”。

在这篇备忘录里，这个前奥地利下士对战略战术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纳粹坦克和飞机在波兰战役中所发展的新战术，并且详细说明这种战术如何在西线战场上运用，以及具体地在什么地方上运用。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保持大军通畅无阻地前进，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他说，“惟一可能进攻的地区”是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首先应该记住两个主要的军事目标：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从而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立足之地，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从这里起飞对英国进行“无情的轰炸”了。

至于进攻的时间，希特勒告诉他的那些满心不情愿的将领们说：“不能开始得太早。但是只要有可能，无论如何必须在今秋发动。”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与陆军将领们不同，尽管英国舰队占有压倒优势，但是他们在采取攻势方面却无须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实上，从9月末到10月初的那些日子里，雷德尔一直不断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对海军活动的限制。这一点是慢慢实现的。9月17日，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西南击沉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勇敢”号。9月27日，雷德尔命令袖珍战舰“德意志”号和“斯比伯爵”号离开待命地区，对英国船队开始进攻。到10月中旬，它们已

经击沉了7艘英国商船，掳获了美国商船“弗林特市”号。10月14日，德国潜艇“U—47”号在占恩特·庇里少校指挥下，突破了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弗罗港看来无法突破的防御，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皇家“橡树”号，这艘战舰上有官兵786人殉难。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军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尔博士利用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陆军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希特勒给他们写了一长篇考虑周密的“备忘录”，尽管发了第六号作战指令要他们做好准备，以便立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但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规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有什么道德上的顾虑，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在这个时候进攻是否能取得胜利深为怀疑。但是也有一个例外。在莱茵河上和沿着马奇诺防线与法军对峙的C集团军司令威廉·里特·冯·李勃将军，不仅对于西线的胜利深为怀疑，而且就战后盟军获得的材料看，当时惟有他至少部分地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进攻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希特勒召见陆军将领们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李勃自己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把它分送给勃劳希契和其他将领。他写道，全世界都反对德国，因为“它在25年之内第二次进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国政府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并尊重这种中立”！当他从军事上详细申述了不能在西线发动攻击的理由之后，最后他发出了和平呼吁。他说：“全国都渴望和平。”

这时候，希特勒正迫不及待地发动进攻，他认为将领们的那种怯懦是不可原谅的，使他感到腻烦。10月14日，勃劳希契同哈尔德聚首长谈了一次。那位陆军司令觉得目前有“三种可能：进攻、观望、根本性的变化”，哈尔德在战后解释说，所谓“根本性的变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生性怯懦的勃劳希契认为，这种激烈的办法“本质上是消极的，并且会使我们处于挨打的地位”。他们最后认为，这三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决定性胜利的前景”。惟一可做的是在继续说服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劳希契于10月17日再次谒见了“元首”，但是他的争辩毫不起作用。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英国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后才会坐下来谈判。我们应当尽快地给他们几下子。进攻日期最迟不得超过11月15日到20日。”

在希特勒发疯似地准备西线进攻的面前，密谋分子们认为，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時刻到来了。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有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坦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职了。

当时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地的佐森，成了酝酿密谋活动的地方。这次的中心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他的上司勃劳希契甚至比他还要胆小怕事。

11月5日是关键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11月2日和3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刊。”

于是，陆军总司令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的大量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等人的意见汇集成一份“备忘录”；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 10 月 9 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 10 月 5 日这一天，他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但是结果跟以前一洋，他们的估计全错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官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

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必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无计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 1917 至 1918 年的情况相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希特勒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他让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唬希特勒改弦更张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回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 18 英里外佐森司令部时还惊魂未定，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了，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入侵荷兰、比利时的行为提出辩解。

纳粹“元首”虽然急着要对西线发动进攻，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再推迟了。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 14 道推迟进攻的命令。他第一次推迟进攻，是因为 11 月 7 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利时和荷兰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很难取信于人了。

接着在 11 月 8 日晚间和 11 月 9 日那天下午，接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力，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提高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 月 8 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里，为纪念 1923 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年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 12 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伤 70 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跟着希特勒匆匆地离开了会场。第二天早晨，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报》独

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除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

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打电话给社塞尔道夫的一个年轻的特务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施伦堡同璩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S·潘恩·贝斯特上尉和R·N·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夏梅尔少校”，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双方约定，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里见了若干次面。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哪些人，以及他们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联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11月8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流氓特务弗雷德·璩约克斯又登场了。原先他曾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次“波兰袭击”，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下午4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啜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等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璩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陪同这两个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璩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后面，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于是，在11月21日，希姆莱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害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子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个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荷德边境上”被捕。实际搞爆炸的据说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他和他的同志坚决反对希特勒对内镇压进步力量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罪行。但是，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后来格奥尔格·艾尔塞就被秘密警察无声无息地杀害了。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11月20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制定了入侵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

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便在 11 月 23 日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这次会议的宗旨，”希特勒一开始便说，“是要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希特勒说：“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他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杀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地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当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对他作出的“坚决的决定”要迟出国联、宣布征兵制、占领莱茵兰以及吞并奥地利等下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彼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他说：

“我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德国人口，要求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的人口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无济于事，刀剑是惟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 1914 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他继续说道，“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 1914 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最后要求全体将士要鼓起勇气来。他说：“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从各方面来说，1939 年 11 月 23 日，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

出一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希特勒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地手脚的人。过了不久，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就完全变成希特勒听话的奴才了。欲知希特勒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章纳粹践踏北欧

纳粹确保铁矿砂，挥师北欧行欺诈；
谎言破产匕首见，丹麦挪威遭践踏。

德国是一个缺少铁矿的国家，为了坚持其侵略战争，希特勒必须确保从瑞典进口铁矿砂的供应线，为此，他暂时推迟了向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挥师北上，向丹麦和挪威开刀了。

丹麦和挪威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在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给它的海军军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逻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垮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的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水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英国海军的封锁，曾把德意志帝国窒息得喘不过气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指挥规模不大的德国海军军官们，仔细考虑了这一经验和这个地理事实，认为将来再对英国作战，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击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为德国海面 and 海底舰艇打开通往广阔的海洋之路，从而使德国能够扭转局势，对不列颠群岛实施有效的封锁。

1939年10月10日，德国海军司令雷德尔元帅，再次向希特勒提出取得挪威基地的重要性。当时由于纳粹元首正忙于准备向西线发动进攻，以及设法克服他的将领们的犹豫动摇，挪威问题，他显然顾不上了。但是过了两个月，严冬即将降临，德国铁矿砂的供应受到新的威胁，因此，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日程。德国的生存要仰赖瑞典铁矿砂的进口。战争的第一年，德国每年消耗的1500万吨铁矿砂中，就有1100万吨要从瑞典进口。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铁矿砂还可以从瑞典北部经波的尼亚湾越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即使在战时，这一条线路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波罗的海已经破有效地封锁起来，英国的潜艇和舰只无从进入。但是到了冬天，这一条海道运输线由于结了厚冰，就不能使用了。在严寒的季节，瑞典的铁矿砂只好改由铁道运到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用船沿挪威海岸运到德国。德国运铁矿砂船只的整个航行路线都在挪威领海以内，这就给英国海军舰艇和轰炸机的破坏提供了机会。

在伦敦，英国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看到了这一着。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周中，他曾经努力说服内阁批准他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以便阻止德国运输铁矿砂。但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不愿侵犯挪威的中立，这个建议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的爆发，根本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局势，大大增加了它对西方盟国和德国战略上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都在苏格兰着手组织远东军，准备帮助芬兰进攻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但是远征军只有通过挪威和瑞典才能到达芬兰，而希特勒也立即看出，如果盟军被允许通过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北部，那么他们就会以维持交通为名，留驻足够的兵力在那里，以便完全截断瑞典铁矿砂对德国的供应，同时也一定会从北方对德国进行包围。这就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为了实现征服挪威的计划，希特勒已经在挪威找到了一个叫作维德孔，阿拉拉罕·劳里茨·吉斯林的内奸。这个人生于1887年，在挪威军事学院毕

业。当地还是 20 岁的时候，就被派到彼得格勒担任陆军武官。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这位年轻的挪威军官颇为心眼。因此，当他回到奥斯陆的时候，他就向工党毛遂自荐，愿意效劳，当时工党还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他曾建议由他来组织一支“赤卫队”，但是工党对于他和他的计划并不信任，拒绝了他。于是，吉斯林就掉转方向，走到另一极端去了。他在 1931 年至 1933 年期间担任国防大臣之后，就在 1933 年 5 月，贩卖刚在德国获得了政权的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创建了一个叫作“国家统一党”的法西斯政党。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吃不开，吉斯林自己甚至连一个议员的席位也没有弄到手。他在选举中被本国人民唾弃以后，就转而投靠纳粹德国去了。

他和德国纳粹运动的官方哲学家罗森堡建立了关系。这个哲学家曾担任过许多职务，其中之一就是纳粹党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希特勒的启蒙导师，以为他已经在这个挪威军官身上找到了机会，因为罗森堡醉心的幻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和一切“不纯”种族的北欧大帝国，在纳粹德国领导之下，最后统治全世界。从 1939 年以后，他一直和吉斯林保持联系，给吉斯林灌输了纳粹的荒谬的哲学理论。

1939 年 6 月，当欧洲正是战云密布的时候，吉斯林乘出席在卢伯克举行的北欧协会会议的机会，要求罗森堡不仅在理论上而巨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从此·吉斯林就经常来往于奥斯陆和柏林之间，为希特勒征服北欧效劳。

在 12 月份，吉斯林就带着一个政变计划来到柏林，他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得到柏林的重视。因为它是从德奥合并事件抄袭过来的。按照这个计划，吉斯林的一些冲锋队员将在德国由“有经验的、顽强的、善于这种活动的国社党人”加以紧急训练。这些人受到训练回到挪威之后，将占领奥斯陆的战略据点，同时，德国海军和德国陆军分遣队，应挪威新政府的特别要求，将在奥斯陆的一个预定的港湾出现。

这是德奥合并策略的全部重演，只是由吉斯林担任赛斯-英夸特的角色而已。

希特勒和雷德尔曾多次会见了吉斯林，并对他留下了“可靠的印象”。这个挪威的卖国贼对他的德国主子们说：“英国计划在斯塔瓦格尔附近登陆，而克里斯丁散则被提出可能作为英国的基地。挪威的现政府、议会以及整个外交政策都控制在英国的亲密友人、著名的犹太人哈姆勃罗（挪威议会主席）手中。”关于英国占领后对德国所造成的威胁，他作了详尽的叙述。

为了在英国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吉斯林建议，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他说，在整个沿海地区的铁路、邮政和交通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已经为这一目的而被收买过来了。他和挪威另一个卖国贼哈格林到柏林是为了建立“将来和德国的明确关系”，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的问题。

希特勒反复研究了北欧的形势之后，随即于 1 月 27 日在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由海陆空三军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一军事行动计划的代号是“威塞演习”，并委任曾在北欧作过战的福肯霍斯特将军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总司令。希特勒对这位总司令说，陆军将交给他五个师，由他指挥，目的是占领挪威的几个主要港口。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就于 3 月 1 日发出“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

斯堪的纳维亚局势的发展，要求作占领丹麦和挪威的一切准备。这一作

战行动，可以防止英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侵犯。此外，它还可以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的更为广阔的出发线……

从我们的军事、政治力量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来看，使用于“威塞演习”的兵力越少越好。数量上的弱点，应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

在原则上，我们应当竭力使这一行动像是一次和平占领。它的目的是以武力维护斯堪的纳维亚国的中立。相应的要求将于占领之初的最后通牒递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必要时将举行海空军示威，以便为这些要求提供必要的压力。如果示威不行，遇到抵抗，就用一切军事手段加以击溃……越过丹麦国界和在挪威登陆，必须同时进行……

最重要的是，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和西方的敌人，应该用奇兵袭击……只有在海上出发的时候，才让部队知道实际的目标。

早在3月间，挪威政府就从驻柏林大使馆和瑞典人那里接到关于德国军队和海军舰艇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集中的警告。4月5日从柏林收到了一份确实的情报说，德国人即将在挪威南部海岸登陆。但是，奥斯陆的麻痹自满的内阁还是对之抱怀疑态度。不祥的消息，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4月1日就开始传到伦敦了。4月3日，英国战时内阁讨论了最新的情报，尤其是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情报。这些情报说，德国人在它的北部港口集中了相当多的兵力，目标在于向斯堪的纳维亚推进。但这消息似乎并没有受到认真的考虑。

据丘吉尔说，英国政府这时认为，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口内增兵的目的，只是为了一旦英国为截断从纳尔维克运送铁矿砂的航道而到挪威领海布雷，同时也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其他一些港口时，使希特勒便于反击。

事实上，英国当时的确正在考虑进行这样的占领行动。经过7个月的挫折以后，海军大臣终于获得了战时内阁和盟军最高军事会议的批准，于4月8日在挪威水路上布雷，这是一个代号叫做“维尔弗雷德”的军事行动。由于看来德国人可能对于他们的纳尔维克铁矿砂运输线受到封锁这一致命打击，采取有力的对策，因此决定派一小批英法联军到纳尔维克去，并且一直挺进到附近的瑞典边境。另外还要派一些军队去更远的南方的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瓦格尔登陆，以阻止这些基地被德国人占领。这样，在4月的第一周，当德国军队已经登上各种舰艇准备开赴挪威的时候，英国军队虽然人数要少得多，也已经在克来德河登上运输舰，在弗尔斯河登上巡洋舰，向着同一目标前进。

4月2日下午，希特勒在同戈林、雷德尔和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规定“威塞演习”在4月9日上午5时15分开始。同时他还发布了另一道指令，要求“占领时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丹麦和挪威两国国王逃到国外”。同一天，最高统帅部还把秘密计划告诉了外交部，对里宾特洛甫发了一道详细命令，指示他准备采取外交措施，劝诱丹麦和挪威在德国军队到达的时候不战而降，并编造了一些理由为希特勒的最新的侵略辩护。玩弄诡计的工作还不限于外交部，海军也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将自己的军舰和运输舰伪装成英国舰艇开过去，必要时甚至悬挂英国国旗！德国海军在秘密命令中已为进攻挪威时进行欺骗和伪装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样，在1940年4月9日上午5时20分整（丹麦时间上午4时20分），天亮前一小时，德国驻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

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它说：

因此，德国部队不是作为敌人登上挪威的国土的。德军最高统帅部除非出于被迫，无意利用德国军队占领的据点作为对英作战行动的基地……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北方，以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

本着德国和挪威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良好关系，德国政府向挪威王国政府宣布，不论现在和将来，德国都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王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因此，德国政府期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将不得不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

这个最后通牒，可能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起草的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的文件。

德国的期望在丹麦实现了；但在挪威落了空。挪威政府复电柏林说：“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

傲慢自大的里宾特洛甫被激怒了。10点55分，他拍了一封特急电报给驻奥斯陆的公使库特·勃劳耶：“你应再次说服那里的政府，挪威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这位为难的德国公使并没有能够转达这句话。这时挪威国王、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都已经撤离首都，转移到北方的山区去了。不论形势怎样不利，他们都决心抵抗下去。事实上，随着天亮时德国舰艇的到来，有些地方的抵抗已经开始了。

丹麦人则处于更为绝望的境地。这不仅因为这个国家太小，地势太平坦，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王室陷于一片混乱，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吓破了胆，惟有陆军总司令普莱奥尔将军主张抵抗，但他的意见却被国王和首相给否定了。因此，海军不论从舰艇上或者从它的海岸炮台里，都没有发过一炮一弹，甚至当德国的运兵船只从它的炮台底下驶过，一开炮就可以把它们轰得粉碎的时候，也是如此。陆军则在日德兰稍有接触，禁卫军在首都王宫周围只放了几枪。到丹麦人吃完一顿早餐之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国王听从了政府的劝告，不顾普莱奥尔将军的反对意见，还是投降了，并且下令停止任何抵抗。

希特勒用欺骗和突袭的手段占领丹麦的计划，是经过周密准备的。负责进攻丹麦的特遣部队参谋长库特·希麦尔将军，于4月7日就身穿便服乘火车到达哥本哈根侦察，并作了必要的安排，为部队运输舰“汉斯施塔特·但泽”号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停泊码头，为运输少量供应品和一台无线电发报机找到一辆长车。负责攻占哥本哈根的那一营的营长，也在两天以前就穿着便服到哥本哈根来侦察地形了。

因此，这位将军和少校首长的计划能够几乎毫无困难地顺利完成，是不足为奇的。部队运输舰在天亮前不久就到达哥本哈根港外，经过港口炮台和丹麦巡逻舰队的时候，没有遭到任何留难，安然停靠在市中心的兰盖里尼码头，离丹麦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一箭之遥，离国王所居住的阿玛连堡宫也很近，这两处地方都很快就被一营孤军夺取了，没有遇到值得一提的抵抗。

丹麦就这样地被征服了。在那天下午 2 时，希麦尔将军由德国公使西锡尔·冯·伦特芬克陪同，造访了那个已经不再是一国之主然而自己还没有体会到的丹麦国王。当时那位 70 岁的国王，虽然表面上还装得很镇静，并且在接见的时候保持了绝对的尊严，但内心显然已经支持不住了。他全身发抖。他说，他和他的政府一定会尽可能地维持国内的和平秩序，消除德军和他的国家之间的一切摩擦。他希望使自己的国家免遭进一步的不幸和苦难。

挪威的情况与丹麦有所不同，一开始就进行了抵抗。在瑞典铁矿砂运输铁道线终点纳尔维克港口，驻军司令康拉德·孙德洛上校是一个吉斯林分子，他一枪不发就投降了德国。海军指挥官却是另外一种有骨气的人。当 10 艘德国驱逐舰向着长长的峡湾迫近时，港内的两艘古老的装甲舰之一“艾得斯伏尔德”号发了一炮作为警告，并且用信号通知驱逐舰，叫它说明身份。德国驱逐舰的指挥官弗里茨·邦迪海军少将，以派遣一名军官乘汽艇向挪威舰艇招降作为答复。当汽艇上的纳粹军官用信号通知德国海军少将，说挪威人表示他们要进行抵抗的时候，邦迪等到汽艇一离开，马上就用鱼雷把“艾得斯伏尔德”号炸毁了。第二艘挪威装甲舰“挪奇”号于是就开了火，但也很快就给打沉了。这两艘舰的 300 多名挪威水兵，几乎全部阵亡。到上午 8 时，纳尔维克就落入德国人之手，把它攻下来的是偷偷溜过强大的英国舰队防线的 10 艘驱逐舰，占领它的是由爱德华·狄特尔准将指挥的纳粹军队中的仅仅两营兵力。这位准将是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时结交的一个巴伐利亚老友，当第二天在纳尔维克的工作开始感到棘手的时候，他的行为表明他不愧是个足智多谋、心狠手毒的指挥官。

南部海岸的克里斯蒂安桑对德国人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抵抗。那里的海岸炮台两次击退了由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是这些要塞很快地就被德国空军炸毁了，港口也于午后 3 时左右陷落。“卡尔斯卢台”号在当天晚上离开港口的时候，也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终于沉没。

在此前后，挪威西海岸中部的特隆赫姆、与奥斯陆有铁路相通的第二大港卑尔根、西南海岸的斯塔瓦格港也相继沦陷了。这样，到了当天中午或稍晚的一些时候，沿挪威西部和南部海岸，从斯卡格拉克到北极圈长达 1500 英里地区的五个主要城市和一个大机场，都陷入了德国人之手。这些地方都是由力量远较英国海军为弱的德国海军输送的少数军队所攻占的。大胆、欺诈和突袭，使希特勒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煊赫一时的胜利。

但是，在奥斯陆这个主要目的地，这位纳粹元首的主要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都遇到了意外困难。在 4 月 8 日寒冷的夜里，德国舰队原计划当夜抵达挪威首都，希特勒派人在码头上彻夜等候迎接，然而这些大军舰却一直没有到达。它们在 50 英里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后者打沉了一艘德国鱼雷艇，打伤了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德国舰队在派了一小股兵力登陆压制了岸上的炮火以后，继续向峡湾前进。在奥斯陆以南约 15 英里的地方，海面狭隘，只有 15 英里宽，它们又遇到了困难，那里有古代的奥斯卡斯堡炮台，它的守军十分机警，出乎德国人的意料。

天亮之前，炮台上 28 厘米口径的大炮对德舰“卢佐夫”号和“勃吕彻尔”号开了火，还从岸上发射了鱼雷。万吨级的“勃吕彻尔”号由于舰上弹药的爆炸，着火燃烧起来，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 1600 名官兵，其中包括好

几名秘密警察和行政官员以及他们所带的全部文件，他们是奉希特勒的命令去逮捕国王和政府人员，接管首都工作的。“卢佐夫”号也受了伤，但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在“勃吕彻尔”号上面的舰队司令奥斯卡·孔茨海军少将和平领第一六三步兵师的埃尔温·恩格布尔莱特将军勉强游到岸上，成了挪威人的俘虏。于是，这个残缺不全的德国舰队只好暂时退回去医治自己的创伤。它的夺取德国的主要目标挪威首都的任务没有完成。直到第二天它才到达那里。

事实上，奥斯陆是陷于一支空降到当地未加防御的机场上的德军部队之手的。从别的海港传来的不幸消息和 15 英里外奥斯陆峡湾外传来的炮声，使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匆匆坐上专车于上午 9 时 30 分撤到奥斯陆以北 80 英里的哈马尔。20 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 3 辆载着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也同时开出。这样，奥斯卡斯堡守军的英勇抵抗就挫败了希特勒企图俘虏挪威国王和政府官员的计划。到了中午，一队纳粹伞兵和空运步兵，以一支临时拼凑的军乐队为前导，开进了首都。这样，挪威的最后一个城市就陷落了。但这并不是整个挪威的陷落。整个挪威还没有陷落，爱国志士们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不屈的反抗。

挪威首都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后，卖国贼吉斯林就开始露面活跃起来。他闯入电台，广播了一个公告，任命自己是新政府的首脑，命令所有挪威人立即停止对德军的抵抗。吉斯林的叛国行为更加激怒了挪威人民，后来这种抵抗变得十分顽强。

挪威国王率领他的政府撤出首都之后，德国空军武官斯比勒上尉奉希特勒之命，带领两连德国伞兵，从福纳比机场向哈马尔进发，企图俘虏“顽固的国王”和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事轻而易举，仿佛一场游戏。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哈马尔附近却遇到了强烈的抵抗，斯比勒受了致命的重伤。德军在遭受严重损失后，便狼狈地退回奥斯陆了。

次日，4 月 10 日，德国公使勃劳耶博士奉命单枪匹马从奥斯陆去见国王。他遵照训令行事，对国王施行了谄媚和威胁并用的手法。他说，德国希望保持王朝，它所要求的只不过是要挪威武装部队放下武器而已。并威胁说，对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是愚蠢的，这只会造成对挪威人的无益的屠杀。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回到奥斯陆去。

挪威国王哈康是个坚贞不屈的人，不畏强暴，与他软骨头的哥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迥然不同。他不肯任命以吉斯林为首的政府，严正拒绝了希特勒的无理要求。那天晚上，从附近乡村的一个电力微弱的小电台（那是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惟一工具）发出了挪威政府对强大的纳粹敌国的挑战。国王宣告挪威决定不接受德国的要求，并号召为数只有 300 万的人民起来抵抗侵略。

但纳粹征服者并不十分相信挪威人真会说到做到。他们又作了两次尝试，企图劝阻国王。4 月 11 日早晨，吉斯林的一个密使伊尔根斯上尉，前来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他保证吉斯林一定会效忠国王。但国王以无言的轻蔑拒绝了他的建议。

下午，勃劳耶拍来了一份急电，要求再见国王，商谈“某些建议”。这位被上面追得很紧的德国公使，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他告诉国王：他“想给挪威人民最后一次达成合理的协议的机会”。这一次，外交大臣科特博士在请示国王以后回答说，如果德国公使“有某些建议”，他可以用电报

向外交大臣提出。

希特勒在这样一个现已陷于困境的小国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勃然大怒，马上采取不脱强盗本色的攻击。德国人要想俘虏国王和政府人员的企图既失败在先，要想说服他们投降的尝试又碰壁在后，于是就想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他们杀掉了事。4月11日很晚的时候，德国空军奉命出动炸平纽伯格宋村。纳粹飞行员先用炸弹和燃烧弹炸毁该村，又用机枪扫射那些企图从烈焰中逃生的人。德国人显然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已经把国王和政府人员都杀光了。后来在挪威北部俘虏的一名德国空军人员在4月11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纽伯格宋。奥斯陆政府。已被完全消灭。”

村子的确是夷平了，但国王和政府人员却安然无恙。纳粹的飞机快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躲到附近的森林里了。他们站在深可没膝的雪地里，看着德国空军把这个小村庄夷为平地。然后，他们毅然决定沿着崎岖的古德勃兰德斯山谷北上，经过哈马尔和刊勒哈默尔，越过高山峻岭到达西北海岸的昂达耳斯内斯，这地方在特隆赫姆西南100英里。沿途他们把那些失散了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军队组织起来，继续抗战。

就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周旋、苦战，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了。希特勒虽然征服了挪威，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在20艘驱逐舰中损失了10艘，8艘巡洋舰中损失了3艘，主力巡洋舰“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脑”号及袖珍战舰“卢佐夫”号都负了重伤。尽管损失严重，但仍然是希特勒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它使德国得到冬季运输铁矿砂的道路，进一步保护通往波罗的海的进出口，使得德国海军能够打开一个缺口进入北大西洋，并为它们的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对英作战中提供优良的港口设备。它还使希特勒的空军基地与主要敌人之间缩短了几百英里的距离。而最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威望”，好像它是不可战胜的。继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后，现在又加上了丹麦和挪威，都被希特勒的武力征服了。当时在西方上层人士中，流行着一种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苟且偷安，无所作为。他们哀叹：“未来的潮流看来是属于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了。”但是真正的力量还是属于觉醒的人民，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西方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希特勒更加发疯发狂，迫不及待地要向西线进军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章 入侵中立国家

低地国家遭侵犯，保证中立是谎言；
英法“静坐”不抗战，纵狼行凶招祸端。

希特勒在征服丹麦和挪威之后，就开始向西线发动进攻，首先向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两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进击了。

1940年5月10日，天刚破晓不久，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和荷兰公使被召到外交部。他们得到里宾特洛甫的通知，德国部队即将开入他们的国家，以“保卫”他们的中立，抵御英法即将开始的“进攻”。这正是一个月以前对丹麦和挪威所提出的站不住脚的借口。德国发出的一份正式最后通牒，要求两国政府不要进行任何抵抗。若有抵抗，一定会遭到粉碎，而流血的责任，“完全要由比利时王国和荷兰王国政府负责”。

在布鲁塞尔和海牙，德国使节分别将同样内容的电报送交各驻在国的外交部。在海牙送交最后通牒的是德国公使尤利乌斯·冯·齐希—布尔克斯罗达伯爵。

在布鲁塞尔的外交部，当德国的轰炸机在头上呼啸，炸弹在附近机场爆炸，把窗口震得咯咯作响的时候，德国大使贝劳—许汪特踏进外交大臣的办公室，正从自己衣袋里取出一张纸来。保罗·斯巴克阻止了他。

“请你原谅，大使先生，让我先讲，”斯巴克愤怒他说，“德国军队刚刚进攻了我们的国家。德国对信守中立的比利时进行罪恶的侵略，这在25年之中，已经是第二次了。目前发生的事情，较之1914年的侵略，也许更加可恶。既没有向比利时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也没有提出照会或任何抗议。比利时是通过进攻本身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它自己承担的义务……历史将追究德国的责任。比利时已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

接着，这个为难的德国外交官开始宣读正式的最后通牒，但是斯巴克打断了他的话。“把文件交给我，”他说，“我愿意免掉你这个痛苦的任务。”

德国人对于这两个低地小国的地位曾作过无数次保证。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曾经在1839年得到欧洲五大强国“永久”保证，到1914年德国撕毁为止，这个条约被遵守了75年。魏玛共和国曾答应决不进攻比利时，希特勒上台以后，也继续重申过这个政策，并且也给了荷兰同样的保证。1937年1月30日，这位纳粹总理在废除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公开宣称：“德国政府已经向荷兰和比利时进一步保证，它愿意承认和保证这两国领土的不可侵犯的中立。”

希特勒虽然在口头上一再声称要保证低地国家的中立，但他从来也没有打算履行自己的诺言。相反，他却要求德国三军尽快做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目标在于尽量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就这样，在挪威战役接近胜利结束，5月初天气转暖时，希特勒部署了人数众多的强大兵力，在西线待命进攻。单从数量上来看，双方势均力敌，德国136个师，法、英、比、荷142个师。守方工事坚固，南方有难以超越的马奇诺防线，中间有绵亘不断的比利时要塞，北方有荷兰的水上防线。即使在坦克数量方面，盟军也足与德军匹敌。但他们并没有像德军一样把坦克集中起来。同时，由于比利时和荷兰拘泥于恪守中立，他们没有举行联合参谋会议，以致守方不能充分协调自己的计划和力量。德国的有利条件则是，

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操有进攻的主动权，对侵略行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他们还有在波兰作战的经验，德军在那里的战斗中已经尝试过

自己的新技术和武器。他们知道俯冲轰炸机和大量使用坦克的价值。同时他们也知道，正如希特勒一直不断指出的，法国人虽然会保卫自己的国土，但对未来的发展却毫无信心，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全军。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决定在5月10日发动进攻。那天深夜21时，他发出代号“但泽”的命令。5月10日，天刚破晓，希特勒就由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其他人员陪同，到达了纓恩施特莱菲尔附近，他称之为“鹰巢”的大本营。德军在西面25英里之外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边界长驱直入。在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175英里战线上，纳粹的部队已突破了三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粗暴地违反了德国人曾经庄严地一再作出的保证。

就荷兰方面说，这只是一场五天的战争。至于比利时、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也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决定了命运。就德国方面说，在战略和战术的执行上，一切都是按计划行事的，甚至执行得比预定的还要顺利。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希特勒最高的希望。他的将领们都给自己的胜利的闪电速度弄乱了章法。就盟军的领袖们来说，他们被一点也没有料到的事态发展弄得不知所措，在一片慌乱之中感到事态不可理解。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改革。”

盟国军队所以陷于如此狼狈之境地，主要是过于麻痹，思想上缺乏战备观念，在希特勒磨刀霍霍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时，英国和法国却在睡大觉。它们的参谋总部不相信布鲁塞尔和海牙传来的警报。伦敦方面当时正忙于应付持续了三天的内阁危机，这个危机到5月10日晚才由丘吉尔接替张伯伦出任首相而得到解决。英法两国的总部，一直等到德国轰炸机在头上的咆哮声和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刺耳尖叫声冲破黎明前的宁静的时候，才得知德国的进攻。过了一会儿，天大亮了，又从荷兰和比利时政府那里收到拼命求救的呼吁，后者曾把盟国疏远了八个月之久，而没有同它们采取一致步调，进行共同的防御措施。

法国是在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极差的情况下仓猝应战的。虽然1940年3月23日，保罗·雷诺组织了新政府，出任总理，但达拉第仍担任国防部和陆军部长。据当时因公在政府里住了几天的戴高乐将军回忆：“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在政党、报纸、行政机构和工会组织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赞成停止战争的意见。”所以法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很差。法国是航空事业的鼻祖，那时汽车产量每年超过30万辆，可是到战争发生时，飞机和坦克都不充裕，其他军事器材也很缺乏。法国统治阶级认为静坐观望政策卓有成效，不会和德国真正打到底。

法国军需处对工业动员漫不经心。许多军火工厂大战爆发后仍然不开夜工。制造飞机大炮的熟练工人，被派到地方军营作扫院子或剥马铃薯皮一类的事情。如雷诺工厂，平时雇佣3万多工人，到大战爆发时却减少到不足8千人。法军总参谋部迷信他们所谓“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为建造这条防线花了2000亿法郎，占法国1919年到1939年全部国防费用4000亿法郎的一半。他们自以为进了保险箱。大战爆发后，几十万法军按兵不动，整天吃喝玩乐，高枕无忧，听凭希特勒德国把自己的盟国波兰消灭，然后掉过头

来，集中力量对付西欧。

英国张伯伦政府，长期姑息养奸，使希特勒德国实现军备计划，制造潜艇，发展海军，对于大战同样缺乏充分准备。陆军少得可怜，装甲师刚刚开始筹建。上次世界大战，英国派到欧洲大陆上作战的部队达 85 个师，可是 1940 年，它派到大陆来支援的只有 10 个师。皇家空军拥有 1800 多架飞机，但绝大部分要用于本土防御，无法派往欧洲大陆。

西欧国家的军事劣势，还因战略计划失算而显得更为严重。英法认为，德国还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取道比利时发动进攻，因此把主力都部署在色当以西到海峡的法、比边境上。这条防线从西北到东南，依次是法国第七集团军、比军、英国远征军、法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其余的法国部队则部署在面向瑞士、莱茵河和马奇诺防线的背后。他们根本不认为，德国的庞大的坦克部队会从马奇诺防线的北端法、比边境的阿登山区突破，因为那里森林密布，道路难行，因此在阿登山区以南的色当一线防守极差。但这正是希特勒拟用重兵突破的地方。

希特勒进攻荷、比、卢，既是他称霸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也是进攻英法的序幕。它宣告了英法“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早在 5 月 7、8、9 三日，英国下院就对英军在挪威的败局展开了辩论，不仅反对派批评张伯伦政府，保守党人也对他进行抨击。5 月 10 日，希特勒进攻西线的消息传到伦敦，这不啻火上加油，英国舆论大哗，张伯伦政府受到猛烈冲击，立即垮台。一贯主张对德国采取强硬路线的保守党人、原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组成了保守党、工党、自由党等的联合政府。丘吉尔虽然决心改变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用全部力量对法西斯暴徒进行战争，并且充满着胜利的信心。然而，丘吉尔政府是在英国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上台执政的，它所面临的局势确实是严峻的。

由于英法政府长期奉行反动的绥靖政策、由于西欧盟军缺乏周密的协作和严格的训练，再加上他们战略上的保守、陈腐，因此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溃败了。不仅英法空军在开始几小时就遭到严重的损失，而且陆军也处于非常狼狈的境地。从那时起，离心力量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比利时国王急于考虑投降，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忙着准备登船撤退，而法国魏刚将军则想谈判停战。荷兰军队，仅仅到第五天就乖乖地投降了。

其实，希特勒征服荷兰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这次战役主要是由伞兵和空运部队降落到广大的洪水防线后面而取得成功的。德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以一支强大的部队从天而降，在海牙附近的机场着陆，立即占领首都，俘虏女王和政府人员，跟一个月前进攻挪威的计划一样。但是，在海牙，正如奥斯陆一样，这个计划失败了，虽然原因有所不同。荷兰的步兵从初期的惊惶和混乱中清醒过来，到 5 月 10 日晚上，在炮兵的配合下，终于能够把德国两团之众的军队驱逐到海牙周围的三个机场上。这样就暂时挽救了首都和政府，但却使后备部队被牵制住，不能调到其他迫切需要的地方去。

德国计划的关键，在于用空运部队，夺取鹿特丹正南尼维·马斯河上和东南方马斯（缪斯）河在多德莱希特和莫尔狄克两处出海口上的几座桥梁。从大约 100 英里之外的德国边境向前推进的格奥尔格·冯·库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桥梁攻入设防的“荷兰要塞”。“荷兰要塞”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德勒支、鹿特丹和莱伊登在内，设有重重水道防线，如不通过这些重要桥梁，是不可能轻易迅速地夺取这个“要塞”的。

5月10日清晨，空运部队包括从旧式水上飞机降落在鹿特丹河上的一个连在内，在那些冷不及防的荷兰守军来不及炸毁以前，就夺下了这些桥梁。但是，坦克通不过鹿特丹的那些桥梁。原来荷兰人这时已经封锁了桥梁的北端。5月14日清晨，荷兰人的情况非常危急，但还没有绝望。“荷兰要塞”还没有被突破。这时希特勒一方面命令比利时前线的第六军团调来一些部队，加速夺取“荷兰要塞”，另一方面命令空军猛炸鹿特丹。在纳粹空军匪徒狂轰滥炸、居民死伤惨重的情况下，鹿特丹投降了，接着就是荷兰武装部队的投降。威廉敏娜女王和政府成员，乘坐两艘英国驱逐舰逃亡伦敦。5月14日黄昏时分，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H·G·温克尔曼将军，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次日上午11时，他签署了正式投降书。只五天的工夫，就一切都结束了。

荷兰既已投降，比利时和法国以及英国远征军的命运也就决定了。5月14日，离发动进攻虽然只有五天，但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囊到色当之间的缪斯河对岸的四

个桥头堡，并且进占了色当。这是1870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次日，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一支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展到莱茵河后面100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一批又一批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首先削弱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推进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旅。装甲师的后面紧跟着摩托化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这个钢与火的密集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所能阻挡的。在缪斯河上迪囊的两侧，法军被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装甲军击败了。这个军的两个坦克师中，有一个坦克师是由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准将指挥的。在河的南面，由第四十装甲军所组成的两个坦克师也采取了同样的战术。

法军受到的打击以在色当四郊最为沉重，这对他们来说，真是十分悲惨。5月14日晨，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装甲军的两个坦克师，一拥而过当晚才在缪斯河上匆促地搭起来的浮桥，向西挺进。法国军队和英国的轰炸机虽然拼命企图炸毁这座桥梁。

但是皇家空军71架轰炸机在一次攻击中就给打落了40架，大部分都是给高射炮击落的。法国坦克则被击毁了70辆。结果并没有炸毁这座桥梁。到了傍晚时分，德军在色当的桥头堡已经扩展到30英里宽、15英里深，防守在盟军中央防线上的法军已被击溃了。没有破围和被俘的队伍在仓皇后撤。北部的英法联军和比利时的22个师，都已陷于被截断后路的极端危险的境地。

比利时的军队虽然在他们的东北边境沿线上打得英勇顽强，但并没有支

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德国军事家。1857年起任普鲁士参谋总长。主持改革军制，扩充军备，并策划和指挥丹麦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1871—1888年任德军参谋总长。后任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

持得像预期的那么长久。他们也像他们北面的荷兰人一样，简直无法对付德国武装部队的崭新技术。德国人在这里，也如在荷兰一样，大胆地使用了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在黎明时由滑翔机上悄悄地着陆，去夺取重要的桥梁。在马斯特里赫特后面的艾伯特运河上有三座桥梁，他们制服了其中两座桥的守军，后者连扳动电钮炸掉桥梁都来不及。

德军在夺取埃本·埃马尔炮台一役中，甚至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个炮台控制着缪斯河和艾伯特运河的交叉点。盟军和德军双方都认为这个现代化的、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塞是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它比法国在马奇诺防线或德国在西壁防线建筑的任何工事都更为坚固。它是由一系列深入地下的钢筋混凝土的交通壕所构成，它的炮楼有厚甲板保护，共有 1200 人防守。原来预计它可以抵抗威力最大的炸弹和炮弹的连续不断轰击，但是却在 30 小时之内就落入由一名上士指挥的 80 名德国士兵之手了。他们乘坐九架滑翔机，降落在工事的顶部，结果只以 6 人死亡、19 人受伤的代价，就把这一重要的炮台攻克了。

为了夺取这些桥梁和要塞，早在 1939 年至 1940 年的冬天，希特勒就指示其空军在希尔德斯海姆建筑了艾伯特运河的桥梁和要塞的复制品，训练了大约 400 名滑翔部队，教他们怎样攻取的战术。有三个小组负责攻打三座桥梁，第四小组去攻打埃本·埃马尔炮台。这第四组的 80 个人，后来在炮台的顶上着陆，把一个特制的“空心”弹安放在装甲的炮楼里，这不仅使炮楼失去作战能力，并且使下面屋内满是火焰和瓦斯。在炮门和了望口处使用了手提的火焰喷射器。一小时之内，德国人就进入炮台的上层，使这个巨大炮台的所有轻炮和重炮都失去了作用，使它的了望台烟雾密布。要塞后面的比利时步兵无法打退这一小股进攻者，自己反而被施图卡式轰炸机和增援的伞兵打退了。到 5 月 11 日中午时分，1200 名惊慌失措的比利时守军，举着一面白旗，鱼贯走出炮台投降了。

这次奇袭的成功，桥梁被夺取以及冯·莱希瑙将军的第六军团的猛烈攻势，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深信，德军攻势的主要锋芒是在右翼。结果，直到 5 月 15 日晚上，比利时、英国和法国的部队还坚守在从安特卫普到纳缪尔的代尔河防线上。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就给希特勒大规模歼灭盟军创造了条件。5 月 19 日，一支由七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疯狂地向松姆河北挺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场，进抵到离英吉利海峡只有 50 英里的地方。到 5 月 20 日晚上，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松姆河口阿布维尔了。此时，约有 40 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如虎似狼的追兵。盟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对此，希特勒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和它的指挥员备加赞扬。他认为盟军就要被消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的确，盟军要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的包围圈中逃出去是不容易的，惟一的希望在于：困守比利时的军队立即转向西南，摆脱正在向自己进攻的德国第六军团，突破那伸入法国北部到达海边的德国楔形装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从而与从松姆河向北推进的法国生力军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记起了霞飞元帅 1914 年 9 月在马恩河会战前夕下达的命令。当时甘末林还是总参谋部的一个青年军官，在霞飞的大本营供职，现在轮到甘末林对自己的士兵说这些当年曾导致“马恩河奇迹”的慷慨激昂的话语了：“祖国在危难中！不能前进的军队，宁可战死在坚守的疆场，也不放弃托付

他们保卫的每一寸法国土地。同祖国的一切历史性的时刻一样，我们此时的口号是：不胜利，毋宁死！我们必胜！”

但是，这一命令没有达到目的。甘末林是在与 1914 年毫无共同之处的形势下发出这一命令的。1914 年，意志坚强的霞飞元帅，在法军各集团军退却的情况下，没有让敌人突破它们的正面，尔后还将它们投入了进攻。而如今法国各部队之间的联系陷于一片混乱，各军在强大敌人的压力下，行动也乱成一团。

法国政府下再信任甘末林，于 5 月 18 日撤了他的职，任命马克西姆·魏刚将军为他的继任者。这个名字在整个法国再次激起了希望的浪花。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福煦的得力助手，1920 年曾以自己的天才挽救了华沙，现在他该把法国的命运置于自己强有力的掌握之下了。

当 5 月 19 日魏刚由遥远的叙利亚回到法国时，德军正在继续畅行无阻地扩大突破口。德军快速兵团以每昼夜 50 多公里的速度迅猛西进。5 月 18 日傍晚，德军快速兵团进至莫伯日以南地域，夺占了勒卡托和圣康坦，从而保证了在拉昂以北的德军南翼。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已把所有能用得上的步兵都投入战斗，以巩固并扩大装甲部队突破的缺口。5 月 24 日，从阿布维尔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分别攻占布伦、包围加莱这两个主要港口，并进抵格腊夫林，这个地方距敦刻尔克只有 20 英里。英国和法国的盟军，现在要想从陆上突围的希望已经没有了。惟一的希望，就是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

5 月 24 日，德国装甲部队已经望见敦刻尔克，并且沿阿运河在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摆好阵势，准备投入最后厮杀。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一个奇怪的命令，要部队停止前进，这对于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是费解的。这是第二次大战中希特勒犯的第一个指挥上的大错误。这道停止进攻的命令，给盟军，尤其是英军，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导致了敦刻尔克的奇迹。但比利时军队并没有因此获救。

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 5 月 28 日清晨投降。5 月 27 日下午 5 时，他派遣比利时副总参谋长罗骚将军到德军那里要求休战。10 时，这位将军带回德军的条件：“元首要求无条件放下武器。”下午 11 时，国王决定无条件投降，并建议于次日上午 4 时停止战斗，结果在 5 月 28 日上午 4 时停止了战斗。

比利时国王的投降，犹如火上加油，给盟军增加了巨大的困难。在绝望的时刻，他抛弃了英法，打开了大门，让德国军队在已经受到很大压力的英法部队侧翼长驱直入。结果是：英法军队遭围歼，敦刻尔克陷重围。就在德军大举西进，盟军节节败退的危难时刻，丘吉尔临危受命，重新组阁，举起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大旗。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章丘吉尔临危受命

西部战场风雷激，法军惨败如卷席；
低地国家遭践踏，临危受命执战旗。

在短暂的波兰和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和不幸的事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在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跃、最迟钝的人们当中，也有些人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辩论决定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激动、心情悲痛的议员。张伯伦首相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故意的浪潮。他的发言被嘲笑打断。

人们回忆起，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首相，在4月4日保守党中央扩大会议上，曾以异常乐观的神情，发表了既对国防“玩忽职守”又对形势“估计错误”的演说：

经过7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10倍……我觉得在这7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与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了那些被我们搁置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体制而必需的激烈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实施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确实是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因此，在我们度过的这7个月中，我们能够纠正并消除我们的弱点，增强并充分发挥各种进攻的和防守的武装力量，大大地增加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对付将来发生的任何局势了……但是，敌人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是张伯伦对重大战略性问题的无数次的错误估计之一。在他声明“胜利已有保证”的五天之后，纳粹德国向丹麦和挪威发动了进攻，并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国家。英国想用自己的海军、空军和陆军在挪威抵抗德军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在辩论会上，愤怒的人们要张伯伦回答，他在4月4日所说的“希特勒错过了时机”是什么意思。

在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厉和激愤的态度，批评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四面八方的抨击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当代看到局势的演变如此不妙时，我就始终不间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

并领导舰队进攻。”他身穿海军元帅制服，以非常愤懑的态度，以专家的权威，详细提供技术性资料，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

坐在后排的著名保守党人利奥波德·埃默里，在响彻下院的叫喊声中，引用克伦威尔曾向议会说过的话：“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

丘吉尔在辩论中没有发言批评张伯伦。这种表现不仅仅因为作为政府大臣，对政府的行动负有集体责任，而且他对英国在挪威失败的个人责任也不比其他人小。丘吉尔在微妙地、小心翼翼地玩弄政治把戏。他需要向保守党人表明，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委以责任。因此，他甚至想保护张伯伦，强调自己对失利应负的责任。对张伯伦持鲜明反对态度的劳合·乔治提醒丘吉尔，要他“不要变成防空洞”，把张伯伦和他的同伙掩护起来。

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只获得 81 票。这是惨重的失败，因为支持政府的多数票通常达 240 票之多。许多保守党党员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投票结果表明，张伯伦政府必须辞职。国内和议会多数人的心情是，只有丘吉尔可以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丘吉尔了解这种心情，但同时他也知道，张伯伦和保守党的许多领袖不会提他作为候选人。保守党人不喜欢他的独断专行，丘吉尔多年来对这些人的凌辱，他们记忆犹新。当然他们也不相信丘吉尔能按照他们的意愿领导战争。总之，保守党人想从拥护慕尼黑政策的人当中选择信得过的人作为首相候选人。因此，各色人等在围绕着新政府的组成和首相的人选问题上进行着激烈的角逐。

张伯伦不顾信任投票中没有取得足够支持的事实，赖着不肯交权，并施展阴谋诡计，阻止丘吉尔组阁。

1940 年 5 月 9 日，张伯伦会见丘吉尔、哈利法克斯和马杰森。后者为保守党议会的主要组织者。马杰森秉承张伯伦首相的意旨，提议由号称“绥靖大公”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这时张伯伦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丘吉尔是否同意参加哈利法克斯的政府？能言善辩的丘吉尔这时却沉默不语。哈利法克斯懂得，沉默就是反对。所有在座的人也都是这样理解的。这使哈利法克斯等不得不改变主意。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一旦丘吉尔拒绝入阁，那么，新内阁就会被愤怒的群众风暴所埋葬。因此，这位“绥靖大公”首先打破沉默。他说，在当前这种战争条件下，首相必须是下院议员，而他是上院议员，所以不宜组织政府。

正当英国保守党领导集团的这场空前的夺权斗争进行得难解难分的时刻，欧洲战场出现了新的形势。德国征服北欧后，又在西线发动攻势，袭击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5 月 10 日天亮以后，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军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

临近中午时，荷兰的一些大臣和政府要员陆续从阿姆斯特丹逃至伦敦。他们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地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混乱的状态；准备已久的防御

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溃决，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荷兰的大臣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到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一夜过后，竟突然发动了可怕残酷的袭击。

形势对一向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极为不利。人民要求同法西斯德国进行坚决的、积极的斗争，而在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卓越才能。

形势发展急转直下，盟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张伯伦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好被迫宣布辞职，解散政府。就在那天——1940年5月10日下午6时，国王紧急召见丘吉尔。

丘吉尔下午6时准点抵达皇宫，国王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着丘吉尔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丘吉尔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国王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丘吉尔表示欣然领命。他立刻感到责任重大。在这非常时期，只有组织一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举国一致进行抗战的政府，才能应付“摇摇欲坠”的局面。丘吉尔告诉国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并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他答应在午夜以前，将内阁名单呈报国王。

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立即邀见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同他们讨论了新政府的组成问题。丘吉尔建议，工党在政府中应占1/3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有两名工党阁员。他要艾德礼提供一个名单，以便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丘吉尔还提到贝文和亚历山大等人。邀请他们出任高级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丘吉尔多少处于独立的地位，与保守党和张伯伦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他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和自由党的冲突。这天晚上，他同工党领袖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工党领袖拜别丘吉尔后，很快在电话里把消息通报给了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

为了减少组阁的阻力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丘吉尔继续邀请张伯伦担任枢密院院长，并决定在当晚9时前，请张伯伦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张伯伦这样做了。在广播讲话中，他宣布自己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帮助他的继任者。大约在10点钟左右，丘吉尔按照他作的许诺，把战时五人内阁名单呈交给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实为重要。这三部大臣的人选，丘吉尔心中早已决定。反对绥靖政策的前大臣艾登主管陆军部，工党的亚历山大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主管空军部，工党领袖艾德礼担任掌玺大臣。丘吉尔自己兼任国防部大臣。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丘吉尔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后来，他回忆自己“被授予主持国政大权”时的心情时写道：“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约3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丘吉尔始终认为，他命中注定要高居众人之上。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当上了英国首相，并对自己所处的独特地位充满信心。他写道：“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

不必在梦中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但是，丘吉尔所面临的形势，确是严峻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英国人还习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6个星期，英国人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掐住了英国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法西斯强盗，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疯狂地对 中国进行侵略。正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丘吉尔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在内的政府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 办法来处理英国内外事务。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的确责任重大。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 120 余席。张伯伦是他们推选的领袖。丘吉尔说：“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丘吉尔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 的；他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大臣人选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丘吉尔是他们的主要对手。接受他为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国难时期，“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大敌当前还不能这样做，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 1/3 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是保守党的领袖，开展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丘吉尔竭力进行抵制，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迫害异端的人们”。

5月11日清晨，丘吉尔在给张伯伦的信中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的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丘吉尔继续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他的临时总部。“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 10 号的旧居·并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丘吉尔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哈利法克斯在晚间 12 时 30 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查看地图，进行商谈，掌握前线情况。”

丘吉尔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进行战争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关系。那时，英国政

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 60 到 70 位大臣，需把他们像拼图片似地拼成一体，而且还要考虑三个政党的不同要求，实非易事，不但需要会见军政界所有主要人物，而且还要会见大批新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

这种困难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丘吉尔希望由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相信他能做出卓越的贡献。起初，比弗布鲁克本人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也不愿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把主动权操在别人手中。还有其他的阻力妨碍这一任命。丘吉尔确信英国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战争需要比弗布鲁克这样有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的实干家。丘吉尔竭力疏通关系，排除障碍，坚持了这一任命。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开始只有五个人，这些人都是主要政党的政治家。大部分部长（大臣）不是内阁成员。为了便于处理事务，某些大臣要经常出席内阁会议。但是，主要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战时内阁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丘吉尔除了担任首相以外，还兼任下院领袖、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是英国战时名副其实的三军最高统帅。制定战略计划和日常的作战指挥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日益提高。

战时内阁得到了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由于形势所迫，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其实，这不仅仅是形势所迫，也是丘吉尔本人的无比自信促成的。他说：“我想做的所有事情，经过阁员的明智讨论之后总能按我的见解得到通过。”丘吉尔所谓的“明智讨论”一般都要接受他的观点和意见才能结束。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可是这些例外的情况并不影响大局。

战时在丘吉尔政府担任过许多职务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有一天晚上 10 点，丘吉尔在战时内阁的地下指挥部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丘吉尔昂首挺胸地走进来，这预示着即将开始一场争论。他提议审查某一问题，然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作为军需大臣的利特尔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丘吉尔听后大发雷霆。他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国王的老臣竟会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其实，利特尔顿的建议是很现实的。它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丘吉尔无可奈何，只好在午夜过后宣布结束会议，他说：“简言之，我们一致通过了军需大臣的愚蠢建议。”

丘吉尔的同事们非常不喜欢首相为自己规定的工作制度。所有最重要的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往往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丘吉尔在他还是一名年轻的

伦敦塔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骑兵军官的时候，在古已发现西班牙人每天在最热的时候休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部工作时也养成了午休的习惯。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事，就是头一沾枕头就入睡，他每天从不放过这一享受。他白天休息，晚上可以工作得很晚。丘吉尔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同事们宣传午休的好处，然而他在回忆中说，很少有人效仿他。只有海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是个例外。不过，这位上将效仿得走了样。他坐在圈椅里嗜睡成癖，甚至在战事内阁会议上他也能打盹入睡。

丘吉尔通常在早晨8点钟左右醒来，躺在床上阅读报纸、电报和其他紧急文件。他阅读报刊非常仔细。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回忆说：“他总想知道关于他，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丘吉尔常常躺在床上办公，直到中午。他躺在床上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长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这些命令、指示立即送给战时内阁的副秘书长——丘吉尔在参谋长委员会内的私人代表伊斯梅将军。的确，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丘吉尔深感武器不足，尤其缺乏驱逐舰和新式作战飞机。于是，经内阁同意，在5月15日下午起草了他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向罗斯福紧急求援的电报。为了保持他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丘吉尔在署名时仍自称“前海军人员”。他在电报中写道：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同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火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对文明国家的劫掠。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已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丘吉尔在电报中还说：

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也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

随后，丘吉尔就提出，要求美国借给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提供数百架最新式作战飞机，以及一批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这位英国首相还说：

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

5月18日，丘吉尔收到罗斯福的复电，对他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对首相提出的要求，美国总统说，借用或赠予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意尽力使英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材。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系，双方还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便进一步加强战争中的合作。

当时，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重大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的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而抓紧训练陆军和空军，动员全民抗战，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不久，西线进一步出现险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被德军截断。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会上，丘吉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英国的全部历史中，还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丘吉尔说。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位首相说，“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的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丘吉尔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议员一致投赞成票。从此，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经受着艰苦抗战的历史考验。欲知战事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章援救敦刻尔克

海上突围创奇迹，戮力同心战顽敌；
艰难险阻无所惧，丘氏誓言壮威力。

话说盟军在加莱地区被希特勒军队团团围住之后，在处境险恶、异常绝望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在海上突围创造了奇迹。这就是震惊全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丘吉尔新政府为挽救欧洲西方战局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重要举措。

在德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英法军队退守在从安特卫普到纳缪尔的代尔河防线上。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就给希特勒大规模歼灭盟军创造了条件，5月19日，一支由七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疯狂地向松姆河以北挺进，进抵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50英里的地方。到5月20日晚上，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此时，约有40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对此，希特勒高兴地认为，盟军就要被消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是在这令人揪心的日子里，为了鼓舞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发布了如下的通令：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不过，无论大陆上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

当5月20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突然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盟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丘吉尔见势不妙，随即命令海军调集船只，积极为英国远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港口做准备，并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渡过海峡前往英国。

到5月24日，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在南方，从阿布维尔沿海岸向北猛扑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攻克布伦、包围加莱以后，已经到达距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阿运河。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9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的10个师都夹在中间了。这里虽然运河、沟渠和泛滥地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坦克的行动，但古德里安和来因哈特的装甲军已经在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的运河上建立了五座桥头堡，准备给盟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受到从东北面推进过来的德国第六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夹攻，从而完全消灭他们。

说来也巧，就在5月24日这天，纳粹最高统帅部突然发来了一道奇怪的紧急命令。命令要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向前推进。当时，究竟希特勒为什么发布这一命令，对此众说纷纭。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曾声称，此刻希特勒对于战事曾亲自作了唯一一次有效的直接干预。据这位权威人士称，希特勒“为这些装甲部队担心，因为他们进入一个运河交错、处境不利的地区，要冒很大的危险，可能得不到任何重大的收获”。希特勒觉得，不能让这些装甲部队作无谓的牺牲，因为它们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相信他的空中优势能够制止从海路的大规模撤退的。据

哈尔德说，希特勒因此就通过勃劳希契给他一个电报，命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先头部队甚至可以撤回”。哈尔德说，这样就给英国军队让出了一条通往敦刻尔克的通道。

“无论如何，”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5月24日上午11时42分截获了一份德军的明码电报，大意说目前暂停向敦刻尔克—哈兹布鲁克—梅维尔一线进攻。”这就给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一个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机会，他和英国海军及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组织了海上大撤退。

哈尔德将军对希特勒这一命令持有异议。他代表陆军最高司令部拒绝对龙德施泰特集团军群的行动进行干预，该集团军群奉有明确的命令制止敌人到达海岸，他争辩说，这一地区作战的成功越快越彻底，以后补充所损失的坦克也就越容易。第二天他奉命同勃劳希契一同参加一次有关这一问题的会议。

这场激烈的争辩，最后由希特勒发出一道明确的命令而告结束。希特勒说，他要派一名他本人的联络官到前线去监督执行他的命令。凯特尔将军奉命乘飞机前往前线各指挥所。“我始终不能理解”哈尔德将军说，“希特勒怎么会认为装甲兵团是在冒无谓的危险？凯特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呆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希特勒的这些想法，很可能是根据他讲的故事而产生的。”

其他德国将领也曾谈过相类似的情节，甚至暗示说，希特勒下这道命令是出于一个政治动机，以便在击败法国之后，同英国有更好的媾和的机会。现在，发现的龙德施泰特总部当时记载的日记，却是另一种说法。23日午夜，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从最高统帅部带来命令，指示第四集团军仍由龙德施泰特指挥，以便进行“包围战”的“最后行动”。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到龙德施泰特总部，龙德施泰特对“元首”说，他的装甲部队已前进了那么远，速度那么快，力量已大大减弱，需要停下来整顿，重新部署，以便对敌人进行最后的打击；他的参谋日记中写道：这个敌人“打仗非常顽强”。而且，龙德施泰特还预见到，他的很分散的兵力有遭到南北两方夹击的可能：事实上，魏刚计划实行的话，就显然是盟军的反击。希特勒“完全同意”阿拉斯以东的攻击应由步兵执行，机动部队应继续扼守朗斯—贝顿—埃尔—圣奥梅尔—格拉夫林防线，以便截击受到东北方B集团军群压力的敌人。他考虑到，为以后作战计，保持装甲部队的兵力是极为必要的。然而，25日很早的时候，勃劳希契送来一份新的命令：总司令命令装甲部队继续前进。尤德施泰特仗着有希特勒的口头答应，竟对这命令置之不理。尤德施泰特后来才体会到，这个喘息机会导致了战事几个重大转折中的一个。

5月26日夜间，虽说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同意这样的意见：由于在比利时的德军进展迟缓和其他原因，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前进。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被围的英法盟军已经得到加强自己防务的时间。他们一边抵御，一边开始偷偷地逃到了海里。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以及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熟悉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30多万人。

5月26日晚上7时差3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那天晚上，德国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对这个

海港的进攻。但当时装甲部队发现进攻很是困难。戈特将军已经有时间部署了三个步兵师，可以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德军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撤退工作开始了。由 860 多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第一天，5 月 27 日，他们撤走了 7669 人；第二天，17804 人；第三天，47310 人；5 月 30 日，第四天，53823 人，四天总共撤退了 126606 人。这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的人数。撤退开始的时候，海军部以为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只指望撤退 4.5 万人。

“发电机计划”执行到第四天，即 5 月 30 日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才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天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一直在重申，被围敌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在 5 月 29 日的一份公报中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进攻之下走向毁灭。”但英国军队并没有走向毁灭，而是向海上走去。当然，他们没有带走重武器和装备，不过可以肯定，这些人将会活下来，有朝一日再投入战斗。

5 月 30 日早晨，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满有信心地写道：“我们所包围的敌人正在继续崩溃。”他承认，有的英国人“打得很猛”。其他人则“逃至海滨，想用不管是什么漂浮在海上的东西渡过英吉利海峡”。下午，在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以后，总参谋长终于发觉这许多运载英军逃跑的小得可怜的船只的意义。勃劳希契面对这一情景十分懊丧，他和总参谋长认为，要是德国的装甲部队没有被希特勒阻止的话，早已在海岸边把袋形阵地的口封上了。恶劣的天气使纳粹的飞机不好活动。现在他们只有站在一旁，眼看着成千上万的敌人，不顾猛烈炮火的袭击，在他们的鼻子底下逃到英国去。

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不管德国人对袋形阵地增加多么大的压力，英国的防线还是巍然不动。撤退的部队更多了。5 月 31 日，是撤退人数最多的一天，有 6.8 万人上了船到英国去，其中 1/3 是从海滩上撤退的，2/3 是从敦刻尔克港撤退的。现在总共已撤退了 194606 人，比原来估计能撤出的人数多出三倍。

由于敌人已经发觉，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了。英国海军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沿海船民积极参加营救敦刻尔克的行动。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都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动手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5 月 29 日开来的小型船只的数目还不多，但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 400 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 400 来只船起了重大作用，从 31 日起，把大约 10 万人从海滨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丘吉尔没有见到他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两三个经常见面的人。后来发觉，他们也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四天内运送了 800 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 860 艘。

在援救敦刻尔克的这些日日夜夜里，丘吉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亲自指挥这一震惊世界的英勇行动。这段时期，他一直没有到下院去。他认为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向首相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英国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决定了。丘吉尔对大臣们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

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

在这些日子里，丘吉尔的战时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这种表现，既代表了下院，也代表了全体人民。丘吉尔说：“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到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代表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当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残酷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掩护海上撤退，守卫部队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四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盟军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最后一击之用。

戈林的空军所以没有按着“元首”的意图充分发挥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据哈尔德记述，它有一部分时间是由于天气不能出动。其余的时间则是遭到英国皇家空军意外的袭击，后者从海峡对面基地起飞，第一次成功地向德国空军挑战。英国新式的喷火飞机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证明胜过麦塞施米特式。笨重的德国轰炸机被英机击落。有少数几次，戈林的飞机乘英机未来的间隙飞到敦刻尔克上空，使这个港口受到很大损失，一时无法使用，部队不得不完全依靠从海滩上船。德国空军对船只也进行了几次强袭，在 860 艘中有 243 艘沉没，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空军炸沉的。但戈林向希特勒许下的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却没有实现。6 月 1 日，德同空军进行最大的一次攻击，炸沉了英国驱逐舰 3 艘和一些小型运输舰，但这一天撤退的人数仅次于最多的一天，达 64429 人。到 6 月 2 日黎明，只有 4000 名英国部队还留在包围圈中，由当时守住防线的 10 万名法军掩护他们。

这时英法军队处在德军中程炮弹的射程以内，白天不得不停止撤退工作。当时德国空军在天黑之后并不进行活动。6 月 2 日、3 日夜，余下的英国远征军和 6 万名法军成功地撤了出来，6 月 4 日早晨，敦刻尔克还有 4 万名法军固守。到那一天为止，共有 338226 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军的虎口。

据丘吉尔分析，希特勒围歼远征军的阴谋所以没能得逞，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弹片被沙子包住，不易散开。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英军吃惊地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后来，士兵们对空袭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

第二个因素是英国飞机顽强战斗，造成德军飞行人员大量伤亡，这掩护了英军的地面部队。英国的战斗机在战场上空不间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给敌机以重创，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无论哪里出现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英机便立刻向它们进行攻击，往往英国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下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战斗最激烈时，英国连“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都全体出动，投入战斗。战斗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

第三，是因为有大海，如果没有海，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海面平静。岸上、船上秩序井然。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丘吉尔说，“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敦刻尔克的突围，挽救了英国军队。但是，丘吉尔 6 月 4 日在下院提醒议员们说，“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英国的处境确实是严重的。它没有陆军保卫岛屿，空军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挪威战役已经表明，大型战舰是很容易遭到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的攻击的。德国轰炸机从基地飞越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只需 5 分钟到 10 分钟的时间。当然，法国还坚守在松姆河和安纳河以南的地域。但是，它的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装备已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损失殆尽；它的数量不多，陈旧过时的空军也大部分被摧毁了。而领导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已不再想和在各方面占有优势的敌人打下去了。

当 1940 年 6 月 4 日丘吉尔在下院起立发言的时候，这些严酷的事实，使他的心头十分沉重。但是，他并没有被压垮。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发表了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演说：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英国继续战斗的决心，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不安。他确信，在他把法国干掉以后，英国就会改变主意的，而他现在就要干掉法国了。欲知法兰西战争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章法国战败投降

法国投降举世惊，贝当之流留骂名；
屈辱事敌丢尽脸，力挽狂澜看英雄。

世界一些著名的军事评论家认为，现代战争的特点，是形势往往会大规模地急转直下。1940年春天，德国武装部队只花了七天时间，就打乱了世界秩序。5月10日，英国和法国还仍然是《凡尔赛和约》的胜利者，仍然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到5月17日，法国已经是一个被打败的、束手无策的国家，而英国也濒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按照一般的推理，纳粹进攻法国的“黄色方案”，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上看，英法很可以感到自慰，而伤脑筋的一方应该是德国。但是经过实践，“黄色方案”获得了“巨大胜利”。德国最高统帅部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坦克营击败的教训，充分利用集中使用大量装甲车和利用柴油发动机所具有的机动性这些优势，改变了战争进程。

在评价希特勒时，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察觉到了对方的弱点，而军方参谋人员的估计却是错误的。当时，这些人以为，英法会不误时机地紧急备战，来对付德国的挑战。只有希特勒认为情况不是这样。

希特勒不理睬军方参谋人员悲观的反对意见，下令发动进攻。而且几乎是在最后一分钟。决定采用大胆的曼施坦因计划：使用装甲部队大举进攻，穿过难行的阿登地区，迂回到马奇诺防线左侧。这个计划背离了传统的战法，但获得意外的成功。伦斯德以惊人的速度横越法国北部直抵海边，把盟国切成两半，迫使英国用游艇、平底运煤船和渔船临时拼凑了一支小舰队渡海逃回本国，法国本来就动摇了的斗志也就此全部丧失。此后，纳粹向南进军，直捣巴黎，沿途遇到的抵抗一触即溃。就这样德军在一名前“上士”的指挥下，于几个星期之内完成了威廉皇帝二世经过四年的拼死战斗尚未能完成的事业。

德军所向披靡。在战斗的第一天，5月10日，刚刚接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被弄得目瞪口呆。5月15日早晨7点钟，丘吉尔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从巴黎打来的电话惊醒。雷诺用激动的声音告诉他：“我们打败了！我们打败了！”丘吉尔不相信，伟大的法兰西军队一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简直弄不明白，运用大量快速装甲部队进行袭击这种战术，在上次大战以来会引起这样剧烈的改革。”

丘吉尔接到雷诺总理关于法国战场情况危急的报告后，于5月16日下午3点乘“红鹤”式飞机前往巴黎。随行的有帝国副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一下飞机就看到局势比所想象的要坏得多。迎接他们的法国官员对伊斯梅将军说：“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就会进入巴黎。”

丘吉尔在英国驻法大使馆听取了关于局势的汇报之后，就乘车去法国外文部。在那里，会见了总理雷诺、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末林将军。大家都站着，一直没有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十分忧悒。在甘末林面前挂着一幅军用地图，约有两米见方。这位总司令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战场的情况，在色当以北和以南，大约五六十英里的一条战线被德军突破了。迎击的法军已被消灭或被击溃。法西斯的装甲部队和大约10个摩托化师正向阿布维尔和巴黎方向推进。这位将军说了大约有5分钟，中间没有一个人插话。他说完以后，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丘吉尔不禁问道：“战略后备

队在哪里？”没有人答话。接着他又毫不在意地改用法语说：“机动部队在哪里？”甘末林将军转过脸来，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窗外，在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火冒出滚滚黑烟，隔窗望见官员们正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他们已经在准备撤出巴黎了。

面对这种情况，丘吉尔说什么也不能理解：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而且是关系到法兰西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竟没有战略后备部队！他们的马奇诺防线是作什么用的？它本来是可以在一长段国境线上使军队得到节约使用的，它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局部反攻的出击口，还可以使大批的部队留作后备力量。可是现在却没有后备部队。丘吉尔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令他吃惊的事情之一。

丘吉尔接着又问甘末林将军，打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向敌人突出部的侧翼发动进攻。甘末林的回答是：“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占劣势！”然后耸了耸肩膀表示毫无希望。在场的人除了雷诺总理坚持打下去外，其余的人都对战争前途丧失了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丘吉尔说：色当被突破是严重的，但并不是致命的。1914—1918年间，曾有过多次“突破”，可是全都被顶住了，而且一般都是通过对突出部的一侧或两侧展开反攻来顶住的。因此，他坚决认为，目前局势虽然很糟，但绝不是不可挽救。为了鼓起法国盟帮再战的勇气，他征得伦敦内阁的同意，决定再派遣10个战斗机中队前来助战，希望法兰西战场能有个好的转机。

在国内外积极力量的影响下，雷诺对法国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改组。5月18日，贝当元帅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雷诺把达拉第调去主管外交，由他自己接任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5月19日晚7时，他任命刚从中东地区回来的73岁的老将魏刚接替甘末林将军。雷诺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能够振作起来，领导人民进行抗战。

魏刚当上总司令的那一天，他在广播上乐观地宣布：“贝当元帅将同我一起战斗，直到取得胜利。”但是，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胜利。实际上，他在很长时间里好像已完全没有能力来思考问题了。贝当当时已经84岁，比魏刚大11岁。他年事日高，越来越陶醉于自己的光荣历史，陶醉于凡尔登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战败民族的保护人。雷诺所以请他入阁，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代表了1918年胜利的法兰西，还因为正是他在1917年使抗命不从的法国军队恢复了士气。他受到任命时，还在西班牙当大使。佛朗哥将军劝他不要接受任命，理由是：贝当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名字和一场应由别人负责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这我知道，将军，”年迈的贝当说，“但是，我的祖国在向我召唤，我责无旁贷。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为国效劳了。”

魏刚上任后就到前线视察。北方司令部的混乱，法国第一集团军的明显的瘫痪，以及前途的未可预料，都使战时内阁感到极端焦虑。对于德军推进的方向，现在已经看得更加清楚了。装甲车辆和机械化师不断通过缺口涌向亚眠和阿拉斯，然后西折沿松姆河推向海边。5月20日夜间，德军越过并切断北方各集团军所有的交通线后，进入阿布维尔。防线一旦突破，就很少遇到抵抗了。德军的坦克在开阔的田野里自由往来，在机械化运输的协助和补给下，每天前进30到40英里。它们经过了几十个城市和几百个村庄，丝毫没有遇到抵抗。法西斯的军官们从坦克打开的炮塔伸出头来张望，得意洋洋

地向居民招手。目击者看到成群结队的法国战俘跟在他们旁边走着，有许多人还带着步枪。这些步枪不时地被收集起来，放在坦克下面轧毁。

令人吃惊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用几千辆坦克会彻底打垮几个强大的集团军，而法国却完全没有和他们进行厮杀，战线一被突破，法国的一切抵抗便迅速瓦解。德军的整个行军路线都是沿主要公路前进的，然而在这些公路上似乎没有一处设有障碍。

对于这种情况，雷诺十分焦急。5月22日，丘吉尔再飞巴黎。在万森法国最高统帅部，魏刚向雷诺和丘吉尔讲述了他的作战计划。他不想让北方各集团军开向南方或向后撤退。他们应该从康布雷和阿拉斯一带向东南圣昆廷的方向进攻，以便在侧翼歼灭目前在他所谓的圣昆廷—亚眠袋形阵地上作战的敌军装甲师。同时一个拥有自阿尔萨斯、马奇诺防线、非洲和其他各个地区调来的18个到20个师团组成的新的法国集团军，在弗雷尔将军统率下，将沿松姆河建立一道战线。他们的左翼要通过亚眠向前推进到阿拉斯。这样。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同北方各集团军会师，向敌人的装甲师展开进攻。雷诺和丘吉尔对这个计划感到高兴。但是，事后才知道，这仅是纸上谈兵。由于最高统部没有下达任何作战命令，战事的演变已使敌人取得了支配权，致使40多万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地区陷入德军的重围。27日下午2时，法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对所属各军发出一道命令：“在利斯河阵地上战斗到底，绝不后退！”电讯到此就中断了。

其实，魏刚将军早就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5月26日，魏刚对一位内阁部长说：“我想得很多。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不再打下去的意见”，得到新任副总理、国家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贝当元帅的支持。

6月1日，魏刚将军在蒙特里城堡总部召见戴高乐。尽管这位总司令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对戴高乐本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他的战绩却感到高兴。事实上，他刚刚在—项嘉奖令中，赞扬了这位在新组建的坦克师担任师长的年轻将军。嘉奖令说：“该师指挥官戴高乐将军英勇果敢，实堪钦佩，他于5月30日及31日率部向敌军—桥头堡发起攻击，突入敌防线14公里，俘敌数百，缴获甚多。”

魏刚向戴高乐于表示祝贺，接着便证询他的意见，问他怎样才能使现有的1200辆坦克发挥最大的作用。但魏刚对戴高乐保卫巴黎和阻敌南进的详细计划不感兴趣，相反，却列举了一大堆条件，认为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则无法取胜。魏刚说：“如果事情不致发展得太快，如果我能及时地使敦刻尔克方面退下来的法军恢复元气，如果我有武器供给他们，如果英军重新装备后回来参战，如果英国皇家空军答应全力投入大陆方面的战争——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否则，就没有什么指望了。”戴高乐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辞了。

1940年6月5日，雷诺任命戴高乐将军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他与部队告别后前往巴黎，他到了首都，发现雷诺信心十足，目光犀利，但在内阁中日益陷于孤立。贝当元帅听说要任命坚持抗战的戴高乐担任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曾百般阻挠，他不厌其烦地宣传他的投降理论。戴高乐回到巴黎后，第一次同雷诺见面时就警告说，他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会后悔莫及。戴高乐承认，1940年的战争也许已经打输了；但他又说，仍然有可能打赢另一场战争。

戴高乐向雷诺建议：“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政策：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领导这项工作；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戴高乐还建议必须撤销魏刚将军的总司令职务。戴高乐说，只有洪齐格尔将军才能胜任此职。在戴高乐看来，洪齐格尔有能力从世界战略的高度来指挥战争。雷诺的回答闪烁其词，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认为眼下进行人事变动是不可能的。

6月5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天早晨，法国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了。希特勒在松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这整个400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只能用65个师去抵抗包括10个装甲师在内的德军143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一个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布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为这场战争提供的飞机也是有限的。再说，目前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国最高统帅部已经弥漫了失败主义情绪。虽然如此，有些法国部队还是极为勇敢和顽强战斗着，在一些地方甚至暂时阻止了希特勒的装甲部队的推进，并且坚决不向德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屈服。

但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希特勒在消灭了法军的主力之后，德军像潮水一般地涌向法国。6月10日，法国政府匆忙地撤离巴黎。6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雷诺发给丘吉尔一封电报，他也曾致电罗斯福总统，法国的悲剧愈演愈烈。雷诺电告，他能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接待英国客人。政府已从巴黎迁到图尔。法军总司令部设在布里阿尔附近。丘吉尔于当天下午2时飞抵指定地点。这是在不到一个月之内，丘吉尔的第四次法国之行。因为这次主要是了解军事情况，因此随英国首相前往的有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帝国总参谋长迪尔将军和伊斯梅将军。他们在一个小机场降落后，就开往指定地点会谈。当时法国人面色阴沉，颇为冷淡。情势恶化，与一周前他们访问巴黎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法方参加会谈的是雷诺总理、贝当元帅、魏刚总司令、空军上将维那曼、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这次会谈的主题是战与降的问题。英方力劝法国政府保卫巴黎，强调在大城市内逐房抵抗对入侵的军队有巨大的消蚀力量。丘吉尔向贝当元帅追述1918年英国第五集团军惨败后，在博韦他的列车中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并提醒他，克雷孟梭如何说过：“我决定在巴黎的前面作战，在巴黎的城里作战，在巴黎的后面作战。”贝当元帅回答说，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调动60个师以上的大军，可是现在一个师也没有。他说那时战线上有60个师的英军，就是把巴黎化为灰烬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局。

英方重申了自己的立场，无论在任何险峻的情况下都坚持继续作战，相信他们能够无限期地打下去，而最终能取得胜利。丘吉尔建议法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他说：“德军在接触点上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如果所有的法国军队，每一个师，每一个旅，在他们的战线上都不遗余力地作战，就可以使敌军的活动全部陷于停顿。”但是，贝当却回答说：公路上的状况十分可怕，难民拥挤，遭到无法抵御的德国飞机的无情扫射，大量居民成批地逃难，还有政府机构和军事机关在继续崩溃。谈到这里魏刚插话说，法国将不得不要求停战。雷诺立即喝阻他：“那是政治问题！”

看来，贝当、魏刚之流投降的决心已经定了。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说：“如果法国在苦难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止它的陆军投降，那就不必为了我们而有所犹豫，因为不管你们怎样做，我们将永远、永远、永远地打下去！”当英国首相提到法军不管在任何地方继续打下去就能牵制或消耗德军 100 个师时，魏刚将军答道：“即便是那样，他们也可以拿出另外的 100 个师来进攻和征服你们。到那时你们又怎么办呢？”

英国代表团走后不久，贝当和魏刚就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6 月 14 日，这个伟大的具有光荣历史的法兰西首都，就被希特勒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的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就在巴黎沦陷的前夕，6 月 13 日，丘吉尔又对法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访问。法国政府这时已撤到图尔，形势愈来愈紧张。丘吉尔带着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和伊斯梅将军，马克斯·比弗比鲁克勋爵也自愿随他们前往。当他们的飞机在弹坑累累的机场着陆时，机场上没有人来欢迎他们，也不像有人希望他们到来。他们从机场卫戍司令处借了一部军用汽车，驱车进城，开往市政府，据说法国政府的总部就设在那里。那里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但是据称，雷诺就要从乡下乘车赶来会见他们。

这时已经两点钟了，他们先到街上一家小餐馆随便吃了些东西，等候这次不祥的会见。这次雷诺显得十分沮丧，魏刚将军向他报告，法国的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了。贝当也认为，应当趁法国还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到和平来临的时候，要求停战。军方逼迫政府下停战令。

雷诺接着说，内阁会议曾在前一天指示他问一问：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英国将采取什么态度。他自己深深知道这一庄严的誓约：任何盟国之一都不能单独媾和。魏刚将军和其他一些人则说：法国已经为共同事业牺牲了一切。它已经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它也成功地大大削弱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不承认法国在力量上已无法继续作战，如果还希望它打下去，从而使法国人民听凭那些玩弄手法牵着被征服的各国人民鼻子走的无情专家们的摆布，陷入必然的坠落和恶化的境地，那将是使人感到震惊的。这就是雷诺现在要提出来的问题。

根据英国官方的记录，英法双方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丘吉尔：大不列颠认识到法国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的牺牲是多么大。现在该轮到英国来作出牺牲了，英国对此已有所准备。由于在法国北方采取双方所同意的战略，战事遭受挫折，英国发现它目前在地面作战方面的贡献太小，因而感到悲痛。英国人还没有尝到德国皮鞭的滋味，但是完全知道那是多么厉害的。虽然如此，英国人只有一个念头：打赢战争，消灭希特勒主义。一切都要服从这个目的，没有任何困难和顾虑能阻挡英国人民。他确信，英国人有能力忍受一切，坚持下去，反攻敌人，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他们希望法国从巴黎以南一直到地中海继续战斗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就从北非进行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时间。等待的时间不会是没有尽头的。……无论情况如何，英国都要继续战斗。英国并没有、也不会改变它的决心：决不讲和，决不投降。对它说来不战胜毋宁死！

雷诺：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英国的决心。可是，我急于要知道，当遇到某种意外的情况时，英国将怎样反应。法国政府——现在的政府或是另一个政府——可能说：“我们知道你们会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我们看到有胜利的希望，我们也会继续战斗下去。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早日胜利的充分希望。我们不能指望美国的援助。在隧道的尽头没有光明。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人

民，让他们永远受德国人的蹂躏。我们必须妥协。我们别无他法……”时间已经太晚了，已不能在布列塔尼半岛建立防御基地。在法国本土上，没有一块地方能使真正的法国政府可以逃脱当敌人的俘虏……因此，要对英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国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努力，贡献了它的青春和鲜血；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了；法国已经再拿不出什么东西贡献给共同的事业了，因此它有权单独媾和。这并不违背三个月前签订的庄严协定中包含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你是否承认呢？”

丘吉尔：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非难和互相指责上。但是，这并不是说，英国就同意与最近签订的协定相违背的行为。第一步应该由雷诺先生再致函罗斯福总统，将目前形势如实地告诉他。在考虑采取任何步骤以前，请你们先等一等回信。如果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法国就会恢复它的尊严和伟大。

虽然如此，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请求在我作出答复之前，让我和我的同僚出去商议一下。

于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比弗鲁克勋爵以及其随行人员就走出来，到一个满布阳光的花园中去，在那里谈了半个小时。他们回来之后，又重申了英国如下的立场：

“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不能同意单独媾和。我们作战的目的是要彻底击败希特勒。我们认为，我们仍然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赞同解除法国的义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责难法国：但这和同意解除它履行诺言的责任是两码事。”

临行之前，丘吉尔又向雷诺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有400多名德国飞行员（其中大部分是英国皇家空军击落的）现在囚禁在法国。考虑到目前的形势，应该把他们交给英国看管，雷诺欣然允诺。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已经没有权力履行这个诺言了。这些德国飞行员后来又都参加了对不列颠之战。

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对法国政府的危机一直忧心忡忡。为了阻止法国单独媾和，英国的一些内阁成员和雷诺总理的特使法国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几经协商，草拟了英法《联盟宣言》。除了从总的方面谈到联盟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雷诺提出一些活生生的振奋人心的新事实，使他能够把大多数阁员迁到北非去继续抗战。经英国战时内阁批准后，就将宣言草稿由戴高乐将军用电话通知雷诺总理。雷诺回答说，由两国政府发表这样一篇宣言，将使法国政府的决策有所改变。戴高乐将军于6月16日携带副本回法进一步征询意见。

《联盟宣言》草稿如下。

在当今世界历史这一紧要的关头，联合王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谨发表宣言，宣布两国结成永久的联盟，在共同保障正义和自由的事业中，有毫无退缩的决心，反对把人类陷入机械生活和奴隶状态的制度。

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英法联盟。

联盟的宪法将规定执行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联合机构。

每一个法国公民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的公民身份；每一个英国臣民也将成为法国的公民。

无论两国领土的任何地方遭受战争的破坏，恢复的责任将由两国分担，两国的资源将同等地并像一个国家似地用于这一目的。

在战争期间，只设一个单独的战时内阁，所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

不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都将置于该战时内阁的指挥之下。最宜于从什么地方指挥，就从什么地方指挥。两国议会正式合并，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国家已在组织新军。法国将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继续维持其现有的兵力。联盟将向美国呼吁，大力补充盟国的经济资源，并为共同的事业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

不论战斗发生在什么地方，联盟将集中全力打击敌人。这样，我们必将战胜敌人。

谁知这样一项真诚的建议传到法国之后，遭到投降派的坚决反对。雷诺对于《联盟宣言》所寄托的希望顷刻之间便消失了。以贝当元帅为首的一帮失败主义者甚至拒绝对它加以宣读。他们提出了种种强烈的指责，说它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拿出来计划”，是“突然袭击”，是“一个把法国沦为保护国或者夺取它的殖民地的计划”。他们说，这会把法国的地位贬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

除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论点。魏刚没有多费唇舌便说服了贝当，认为英国已经完了。法国的最高军事当局说：“不出三个星期，英国就会像一只小鸡似地被人拧住它的脖子。”照贝当看来，同英国联盟无异“同死尸结成一体”。内阁成员伊巴纳加雷大叫大嚷说：“还是做纳粹的一个行省好些。我们至少明了那是怎么一回事。”魏刚将军的一个亲密朋友、参议员雷贝尔宣称，这个计划意味着法国的彻底灭亡，总之分明是让法国家属于英国。雷诺虽然回答说：“我宁愿同盟国合作而不愿同敌人合作。”但白费唇舌。当天夜里，雷诺在投降派的逼迫之下宣布辞职。投降派的首领贝当组织了“新政府”。

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6月17日，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希特勒于同一天答复说，他首先要和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商量。墨索里尼这个趾高气扬的斗士，在弄清楚法国军队已经受到绝望的打击后，就像鹰犬一样在6月10日投入战争，企图分得战利品。

希特勒和法国的停战谈判，是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地方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1918年，法国福煦元帅就是在这里博物馆保存的一节卧车上同德国签订的停战条约。如今，工兵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用风镐把墙壁推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这就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使节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切地点。

6月21日下午3时15分，希特勒乘着他的曼赛德斯牌汽车来了，同行的有纳粹要员戈林、勃劳希契、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部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他们在离空地大约200米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希特勒看到那把大剑，那是1918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一把大剑，插在一只只有气无力的鹰身上，这鹰代表霍亨佐仑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他走过这块小小林间空地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给离地约三英尺高的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他们站在6月的阳光下，在一片沉静中读完

了它。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希特勒面部的表情。他的脸上流露着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的神情。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希特勒坐在 1918 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五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二军团司令查理·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一个空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尔。利昂·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起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会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

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人把法国本上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和约为止。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法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贝当肯定认为，英国在三个星期之内将被战败，到那个时候，法国俘虏即可释放了。这样一来，他就使 150 万法国人在战俘营中呆了 5 年。

停战条约中最难处理的是法国海军问题。在法国将要崩溃的时候，丘吉尔曾经表示，法国如果把海军开到英国来，过去不单独媾和的诺言就可取消。希特勒决心不让这件事情实现。他在 6 月 18 日对墨索里尼说，他充分认识到，这将大大加强英国的力量。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他不得不对这个被打败的敌人作一些让步，或者至少给一点保证。停战协定规定：法国舰队必须复员，解除武装，并把舰只停泊在本国港口废弃不用。德国“无意使用在德国监督下的港口所停泊的法国舰队来为自己作战”。

最后，希特勒给法国政府一块未占领区，它在法国的南部和东南部，表面上可以自由处理。这是一种狡猾的手段。这不仅可以从地理上和行政上分裂法国，还可以使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并且可以打消在波尔多的政治家们想把政府迁往北非的任何计划。但破坏这个计划的不仅是德国人，而主要的是法国的投降主义者：贝当、魏刚和赖伐尔之流。还有，希特勒明白，目前在波尔多控制法国政府的这批人是法兰西民族的败类，可以期望这些人跟他合作，帮助他在欧洲建立纳粹新秩序。

就这样，这个曾经拥有 300 万大军、号称拥有欧洲头等陆军的大国，这个在上次战争中曾有四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爆发 6 周以后就投降了。这是法国统治集团长期推行绥靖政策的直接后果。在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侵略气焰日益嚣张、严重威胁欧洲安全时，法国政府伙同英国张伯伦政府，执行了一条损人利己的对外政策，企图靠牺牲别的国家来满足侵略者的欲望，换取自身的安全。它同英国一起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当希特勒的侵略矛头转向波兰以后，法国政府仍不改弦更张，不肯派出一兵一卒去援助波兰。法国政界和新闻界许多人还为这一叛卖政策叫了好。

为了讨好德国法西斯，法国统治集团对内加紧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早在 1939 年夏天，外长庞纳就向德国大使作了保证：“选举一停止，任何形式的公共集会都将被禁止，共产党员要镇压。”在大战爆发后的 6 个月里，法国投降政府就剥夺了 2278 个共产党议员、市议会议员的席位，封闭了 161 家报刊和 629 个工会组织。

另一方面，在统治阶级的上层却是贪污腐化，荒淫堕落。尽管德国大军已经压境，巴黎还是歌舞升平，达官要人还是优游终日。无线电台广播的是巴黎名菜馆的菜谱，淫猥的歌声。庞纳和赖伐尔之流，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股

票涨落。军火生产无人问津，战争动员无声无息。军政首脑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因此，防线一被突破，就兵败如山倒，不可收拾。

面对着贝当投降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丘吉尔忧愁满腹，思绪万千，他高声朗诵了查尔斯·默里的著名诗句：

城堡里下了半旗，昨晚奏了城堡首领的挽歌，许许多多被夺走丈夫的村妇，孤独地祝祷她们的征人。

为了自由，为了尚未达到的目的，把山谷中的人都集合起来，达到前方，砍掉那恶毒的鹰爪，把它们的羽毛扔进大海。

城堡和市镇上英勇的人们，离开他们的店铺和作坊，愉快地辞别朋友，勇在地冲向敌人，老苏格兰仍然不可轻侮。

这时，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民，强烈地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丘吉尔写道：“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果敢精神。”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地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丘吉尔成了英国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英国人民大众反法西斯的坚定立场，使丘吉尔的行动更加坚决果断。6月18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英帝国就是存在1000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法国的抗战虽然被贝当之流出卖了；但是，法国还是有希望的。在贝当政府投降的第二天，戴高乐将军就在伦敦发表声明，号召人民继续抗战，为反对法西斯暴政，为争取法兰西民族的解放而斗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章 “应运而生的人”

国家危亡岂彷徨，匹夫有责勇承当；
庄严召唤如火炬，戴氏聚众举刀枪。

1940年的6月，是一个熬人的月份，就在法国内阁就战降问题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戴高乐找到一个机会问雷诺是否真正求和。雷诺答道：“当然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让英国人震动一下，以便取得他们更广泛的合作。”之后，戴高乐闷闷不乐地返回自己的住地。这时雷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电报，呼吁美国出面斡旋，以免法国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在这段时间里，戴高乐焦急如焚，吃睡不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愤慨之下，他打算脱离这个失败的政府。他起草了一份辞呈，但还没有来得及递交，就接到内务部长乔治·芒代尔的一封信。芒代尔是仍然主张打下去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他获悉戴高乐打算辞职，便十分严肃地加以劝阻。他说，戴高乐如果辞职，就将失去为法国服务的最后机会，这是投降派们所乐意看到的。现在采取行动或许还为时不太晚，政府还可以作出迁往阿尔及尔的决定。戴高乐被打动了，同意再等等看。他后来承认芒代尔的劝告是非常宝贵的。

6月12日，戴高乐参加了法英两国领导人的紧急会晤。在举行会谈的时候，法国众议院议长爱德华·埃里奥和参议院议长让纳瑞在隔壁休息时等候消息。会谈后，雷诺陪同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穿过休息室。这两位议长慷慨陈词，力主法国血战到底。通往庭院的过道挤满了人。戴高乐身材高大，特别引人注目。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和他打招呼，称他是“应运而生的人”。

到了6月14日，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领导人开始了又一次长途跋涉，目的地是波尔多。这一次比前一次更令人沮丧，道路也更加拥挤不堪，败兵、难民络绎不绝，秩序十分混乱。雷诺剩下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瓦解。在他的高级阁僚中，全力支持他的只有芒代尔一人，贝当这个庞然大物给斗志涣散的内阁罩上一层忧郁的阴影。魏刚唯一的愿望就是停战，而失败主义影响则几乎无处不在。当时这伙民族败类，正像蛀虫一样腐蚀着这个非常虚弱的法兰西领导集体。与此同时，雷诺的情妇波尔特夫人也闯进了法国的历史。她一直闹着要雷诺停战，在她看来，那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这个风骚的女人，在关键的时刻，也充当了希特勒的“第五纵队”，起了瓦解军心的作用。

面对着丑恶的群体，戴高乐十分憎恨。到了波尔多后，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想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行政措施。他对总理说：“我曾竭尽绵薄之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同意求和。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雷诺答应坚持抗战，并同意把政府迁到非洲去。戴高乐对此十分高兴，他说：“那么我得马上到伦敦走一趟，作为你的特使，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坚持就是胜利！”

谁知当6月16日晚9时30分，戴高乐乘机返回波尔多时，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了。他的助手告诉他，雷诺已经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织政府。这只能意味着投降。戴高乐立刻怒火中烧，他毅然决定第二天早晨离开法国。他恨贝当，恨魏刚，同时也恨雷诺的软弱！他想，天塌下来，有地顶着，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

为了防备局势突变，他已经采取了一个稍越出常规的行政措施四分五裂，许多人毫无斗志。戴高乐此时还是无名之辈，实际上孑然一身，既无部属又无组织，毫无威信可言。说实在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和品格而外，他唯一的便利条件，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愿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

经过反复考虑，戴高乐认为，当时首要的工作是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号召人民起来战斗。6月17日下午，戴高乐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发表讲话。丘吉尔慨然允诺。两人商定等贝当向德国人求和之后进行广播。当晚传来消息说，贝当已经要求停火。第二天，6月18日下午6时，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坐在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事实上，从那时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国的战斗旗手，成了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他的讲话震撼人心，激励着法国人民进行战斗。广播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们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的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决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毫无保留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展望未来，更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还有待决定。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同一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本人也发表了一个十分著名的讲演。他回顾了法兰西战役，预见不列颠战役即将开始，并且大声疾呼：“让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我们英勇奋战。这样，如果不列颠帝国和英联邦存在1000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

戴高乐和丘吉尔两人的讲演，曾使过去一代的听众和读者热血沸腾，情绪激昂。戴高乐广播完这篇讲话，他内心感到，他和波尔多政府和军队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年近半百，又开始了冒险生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我开始进行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以后，我有责任首先确定，没有比我更有资格使法国和法兰西帝国回到斗争中去。当时停战协定还没有生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我们还是渴望波尔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会选择战斗的道路。我们必须加以鼓励和争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7日下午刚一到伦敦，马上就打电报给波尔多，表明我愿意继续效劳，在伦敦进行前一天开始的关于从美国运来战争物资问题、德国俘虏问题以及迁往北非的问题的谈判。”

波尔多对戴高乐的回答是一个命他马上回去的电文。为了争取魏刚，劝他继续抗战，6月20日戴高乐还给这位总司令发了一封信，请他来领导抵抗运动，希望这位将军离开法国本土，到海外继续战斗。后来得知，魏刚在投降过程中，已给自己安上了“国防部长”的头衔。戴高乐这封信几个星期之后又给退回来了。6月30日，所谓“法国大使馆”又传来了一项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投降，交战争委员会审判。这个委员会起初判戴高乐一个月徒刑，后来由于魏刚的坚持，把戴高乐缺席判决了“死刑”。

戴高乐虽然发表了广播讲话，但他所处的地位却非常虚弱。虽然他的讲话充满着激情，但听的人并不那么信服。他们怀疑一个不知名的新提拔的年轻准将能领导法国人民进行抗战，更怀疑他在国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反法西斯武装。不过，他总算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他要做出最后一次尝试，看看被他留在海峡彼岸的那些人心中是否尚存抵抗的星星之火，并试探一下海外的法国头面人物的态度。6月19日，他曾打电报给北非总司令兼摩洛哥总督的诺盖将军，如果他拒绝投降，他戴高乐愿意在诺盖的麾下效劳。那天晚上，戴高乐又一次代表法国在广播中发出呼吁：“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撤离军事基地，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一片领土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6月24日，戴高乐又一次向诺盖将军发出呼吁，同时向地中海东部地区总司令密特奥塞将军和高级专员皮奥先生以及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将军发出了类似的电报。电文内容是一样的，即戴高乐正在筹建一个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以协调所有抗战组织的行动，要求收电人参加这个委员会。过了三天，戴高乐发现法国驻突尼斯总督佩卢东的一次讲话，有抗命拒绝投降的迹象，便也给他发出了邀请参加拟议中的这个委员会电报。但是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对戴高乐的呼吁作出反响。

这些殖民地的总督们，认为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追名逐利、不久以前被临时提升上来的准将”，他在官场中“唯一足以挂齿的经历只是在已经下野的雷诺内阁中担任过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而已”。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只有少数人与戴高乐观点相同，认为政府一旦投降就丧失了一切权利，而大多数人对贝当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认真地提出过疑问。这些高级的旧官僚基于陈腐的等级观念和法统思想，确实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保持沉默。但是过了不久，这些人都服从了贝当和魏刚的号召，同意停战协定。唯有印度支那总督卡特鲁和索马里兰海岸军队的指挥官勒让蒂约姆将军坚持抵抗。但他们都被撤换了，他们的部下也没有怎么支持他们。

这时，英国人也为振作法国的抵抗精神而努力，但与戴高乐一样毫无成效。6月25日，丘吉尔派遣新闻大臣达夫·库珀到拉巴特去，想和出走的前内阁大臣芒代尔取得联系，或许还想影响诺盖将军，使他能与在伦敦的法国

人共命运。但是诺盖不让他们和芒代尔接触，并且拒绝接见他们。英国驻北非的军事联络团团团长狄龙将军的态度也同样消极。如果说英国人曾经希望动员一个更有名气或更有代表性的法国人士来领导法国抗德事业的话，这种希望正在消逝。

6月23日，英国政府宣布，他们不能再把波尔多政府看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因为它已完全屈从于希特勒，丧失了代表自由法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同时声明：“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到组织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提议，该委员会将充分代表决心进行战争以履行法国的国际义务的独立的法国人民。英王陛下政府宣布，它将承认这一临时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继续代表一切决心与共同敌人战斗的法国人，它将就一切与进行战争有关的事项和该委员会来往。”

法国的崩溃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人民都怵目惊心地看着这个伟大明星的陨落。作家查理·摩根的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文章也曾使许多人流出热泪，但各国还是很快就承认了既成的事实。无疑，所有与轴心国家作战的政府，都从法国召回自己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坚持抗战的戴高乐的一种支持。没有宝剑就没有法国。面对着接二连三的挫败，戴高乐加紧为自己建立一支战斗队而努力。这时，大约有10万吨法国船舶到英国港口避难，船上至少有1万名水手。此外，还有几千名在比利时负伤的士兵正在英国医院里逐渐康复。这些士兵和水手中的大多数人一心想回家，因为在他们看来，战争已经结束了。贝当政府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绝大多数人都乐于从命，英国当局把白城体育馆借给戴高乐，作为志愿人员集合的地方。但在6月18日的召唤广播后的一个星期，才只有几百人集合到自由法国的旗帜之下。在英国方面，除了丘吉尔本人和斯皮尔斯将军外，与戴高乐打交道的大多数人，始终对他持怀疑态度，不愿与他合作。

但是，在困难面前，戴高乐并没有低头，更没有灰心丧气，他坚信正义的事业一定能胜利。6月29日，他去利物浦附近的特伦特姆公园活动，那里驻扎着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他经该师指挥官同意，招募了外籍军团第十三旅两个营的大部分，200名阿尔卑斯山步兵，一个坦克连的三分之二以及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几天之后，两艘潜艇和一艘巡逻艇宣布拥护戴高乐。驻在圣阿塔恩的几十名飞行员后来成了自由法国空军的核心。

这时，每天都有志愿看到英国来。他们大都来自法国。有些是乘最后的班船离开的，有些是弄到一只小船之后逃出来的，还有些则是克服重重困难通过西班牙逃来的。他们如果被警察抓住，就会被关进米朗达集中营。有些飞行人员掌握着飞机，没有让它沦入维希政府的控制，并且设法飞离北非而到达直布罗陀。有些商船的海员抓住出航的机会就会开出法国港口，或者用小船逃出来，如“卡博·奥尔摩”号就是这样。他们都要求为法国的独立而战斗。6月末，有一个渔船队到了康威尔，把塞翁岛上所有能行动的人都带到戴高乐将军的营地来了。这些青年志愿战士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戴高乐反法西斯战士们的信心。与此同时，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也加强了，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的信件，大大提高了戴高乐在海外的声誉。

正当戴高乐的抗战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忽然有一件令人悲愤的事情阻遏了这一潮流。7月3日，英国舰队突袭了停泊在米尔斯克比尔的法国舰队，给英法关系和反法西斯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法国沦陷以后，丘吉尔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法国舰队的命运。法德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法国舰队应在德

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退役并解除武装。诚然，在同一条款中，德方宣称，他们无意在战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些舰只。但是，从希特勒的以往作为来看，这一诺言既不可信，也毫无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毅然决定必须摧毁或夺取法国舰队，或者使之失去战斗力。

当时，这支强大的作战力量正散泊在英国、地中海、非洲和马提尼克等地的港湾内。7月3日清晨，英国以占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停在朴茨茅斯和普利茅斯的法国舰艇，俘获战列舰两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8艘、潜艇若干，以及大约200艘小型舰只。唯有大型潜艇“苏尔古夫”号进行了抵抗，双方各死一人，三名英军受伤，当天，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附近的奥兰，法国海军上将让苏尔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随后发生的战斗中，从“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飞机炸毁了战列舰“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搁浅了，战列舰“普罗旺斯”号冲上了沙滩。“斯特拉斯堡”号被击伤，但从阿尔及尔开来的几艘巡洋舰逃到了土伦。

7月4日，丘吉尔向下院报告了米尔斯克比尔行动的经过，议员全体起立，朝野党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丘吉尔显然对这种显示其无情打击力量的行动感到自豪；然而，戴高乐从报纸和广播中获悉这一消息时，好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的。他觉得这并不完全是出于正当的保障安全的动机，而且还由于“多年海上竞争的积怨、法兰西战役开始后日益加深的不满以及因维希政权缔结停战协定而爆发出来的愤恨”。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赞扬了英国新闻大臣达夫·库珀，说库珀“极为明智”地让他在1940年7月8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演说中谴责了这个“可悲的、可恶的”行动，同时又吁请人们谅解英国人。他说，有朝一日德国人无疑会用法国军舰来打击英国和法兰西帝国。因此，“把它们毁掉还是上策”。不管怎么说，这个事件，对于战斗的法国刚刚萌芽的希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军人和平民，本来打算参加到戴高乐这边来，这时都跑掉了。此外，北非法兰西帝国各行政当局以及保卫帝国的海军与陆军的态度，大部分都由犹豫变成反对了。维希政府当然不去不尽量利用这一事件。其后果对于戴高乐争取团结非洲肯定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戴高乐还是以顽强的毅力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13日，他宣布说：“法国同胞们！请认清这一点，你们还有一个战斗的队伍存在。”7月14日在齐集白厅的深为感动的群众中，戴高乐检阅了这支拥有7000多人的队伍，并率领他们在福煦元帅的像前献了三色花圈。7月21日，有几百名飞行员参加了鲁尔区的轰炸。戴高乐宣布自由法国重新投入战斗了。8月24日，英王乔治六世前来检阅了这支队伍。人们看到这支队伍，就看到法国的未来和希望，并相信它会在战斗中日益发展壮大！

战斗的法国在苦难中挣扎，在战斗中成长。热情的言论从法国大量涌来。许多诚挚的人们用极巧妙的方法，有时就是通过检查者本身，把信件和其他邮件寄给戴高乐他们。其中有一件是7月14日在星形广场拍的一张照片。上面写着那一天德国人到了那里以后，有一群男女在无名将士碑周围沉浸在悲哀里。7月19日，他们把这张照片寄来，并写了这样几句话：“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在等待你！”另外是一张路过的人献满了鲜花的坟墓。这就是戴高乐母亲的坟墓。她在7月16日向上帝奉献了她的苦难，祈求挽救法国和庇佑她的儿子的使命以后，就在班朋死去了。

戴高乐决不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们肩负着祖国的重托，坚韧不拔，英勇

前进！在他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后，就把注意力转向了非洲。法兰西帝国在非洲有众多的殖民地，而且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将来反攻时，这里可以作为解放欧洲大陆的跳板。

在早些时候，戴高乐就曾经希望在法兰西帝国会爆发一场反德大起义，这种希望几近实现，结果却成了泡影。虽然戴高乐招兵买马的工作困难重重，但他的号召还是感动了一些有识之士。例如卡特鲁将军就从西贡前来听候他的吩咐。当卡特鲁9月来到英国的时候，戴高乐已去非洲。卡特鲁巧妙地拒绝了英国内阁的建议：希望他能取代一位若明若暗、不合适的准将的建议。英国内阁的那些建议，权衡过这位可爱而闻名的上将在中东所起的作用。同时，勒让蒂约姆将军、德拉米纳上校、达尚利尔海军少校、布洛赛少校、德奥特屯洛克上尉都先后前来报到。

为了尽快打开非洲局面，8月2日，戴高乐派勒让蒂约姆将军，带了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前赴“非洲三角”的索马里半岛开辟工作。尽管北非法兰西帝国仍在追随贝当政府，但在西非和赤道非洲，整个局势对戴高乐来说似乎较有希望。从那些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地区，人们给戴高乐将军写来了许多鼓励的信件。

在喀麦隆和乍得，掀起了最强烈的反投降浪潮。在法国委任统治地喀麦隆，人们立刻意识到，要是德国获胜，这块殖民地就会重新落入德国人手中。尽管布律诺总督不愿表态，但在公共工程局长莫莱尔领导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宣布支持戴高乐。在乍得，被戴高乐称为“热情的法国黑人”的费利克斯·埃布埃总督有许多理由反对希特勒，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深恶痛绝。埃布埃表示，他随时准备公开声明支持戴高乐。

还使戴高乐意外高兴的是，他一回到拉密堡就遇到卡特鲁将军。这位学识渊博的五星上将是在戴高乐离开伦敦后到达这里的。丘吉尔在伦敦接待他时对他大事吹捧了一番。据戴高乐猜测，丘吉尔甚至提出让这位将军接替戴高乐。9月22日，丘吉尔电告戴高乐，他已经作主“以你的名义”请卡特鲁将军去叙利亚。卡特鲁到了开罗，感到他最好先去拉密堡听听戴高乐的意见再去叙利亚。在那天的晚宴上，戴高乐向他祝酒，说“我对这位伟大的领导人素来怀有崇敬的友情”。卡特鲁将军的答词十分感人。他说，他接受戴高乐本人的领导。出席宴会的埃布埃总督和其他人都认识到，在卡特鲁的心目中，戴高乐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他的军阶。卡特鲁得到戴高乐的赞同，便返回开罗。

在戴高乐看来，此间最使他不放心的是，丘吉尔和艾登给他发来电报，告诉他维希大使德拉博姆和英国大使霍尔爵士开始在马德里谈判。德拉博姆要求保证不阻挠北非供应的物资运往法国，并说德国人已经“保证”他们决不染指。他接着说，如果德国人背信弃义，维希政府就迁往北非，站在英国一边重新参战。戴高乐提醒英国人不要轻信那些花言巧语。果然，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瓦会晤，表明维希准备积极与纳粹勾结。到11月初，维希政府和英国之间的会谈也就停止了。

在戴高乐看来，当前仅仅谴责维希政府，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是不够的。他本人必须成为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保护人，自由法国必须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行使一个主权政府的职责。于是，1940年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法属赤道非洲的首都，当时也是进行抵抗的法国首都，发表了庄严的宣言。

他在宣言中一面谴责维希那个“政府机构”违反宪法，对侵略者唯命是从；一面向人民庄严保证，一旦法国人民能自由地选出自己的代表，他的一切行动将向代表们负责。五年后他确实兑现了这个诺言，向临时议会交了权。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戴高乐将军还在10月27日这一天，颁布了两项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成立国防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第二项法令，任命卡特鲁将军、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德拉米纳将军、埃布埃总督、索托总督、军医西塞将军、卡森教授、达尔让利厄神父和勒克莱尔少校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由戴高乐本人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为了让全体法国人认识到布拉柴维尔宣言和同时发表的两项法令的重要意义，戴高乐在离开布拉柴维尔之前，于11月16日又郑重地发表了一个“组织宣言”，宣布他掌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整个法国，同时根据1884年的法律谴责维希炮制的所谓“法兰西国家”是违反宪法的。就这样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戴高乐有了自己的“土地”，再也不是寄人篱下的流浪汉了。在非洲他建立了一个辽阔的作战基地和一个精干的行政机构，这是些实实在在的成就，而达喀尔惨败的耻辱此时已渐渐地为人们忘记了。而且，一个以戴高乐为当然领袖的自由法国人的国家业已建立起来了。

戴高乐一回到伦敦，就在考虑和英国一同进军中东的问题，想乘胜扩大成果。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是怀着简单的想法飞向复杂的东方的。”在他看来，心中想着两点就够了：一点是，那里将发生重大事件；另一点是，法国应该参加这些事件。苏伊士运河是中东门户，又是地中海的门户，因此是控制非洲的关键。所以，戴高乐的头两个目标是争取法属索马里的卫戍部队和亚历山大港的海军部队。他首先在喀土穆着陆，那里是苏丹和厄立特里亚的作战基地。不久，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自由法国新建旅和一个印度师协同作战，在克仑击溃了意大利军队。但这支自由法国部队随后不久就改编为自由法国第一师派往埃及了。

中东的地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苏伊士运河。这个地方一失，小亚细亚和埃及就对轴心国家打开了大门。相反地，如果能保住这儿，总会有一天能从东方进至突尼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这就意味着一切都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作战，而运河则是战略要冲。戴高乐知道，从黎波里到巴格达，中间包括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等地，再从亚历山大港到内罗毕，中间包括吉达、喀土穆和吉布提等地，其中的政治、种族和宗教上的情绪与野心，由于战争的刺激而尖锐化了。法国在这方面的地位已经削弱，而且“为各方面所垂涎”。戴高乐认为，当一切都在沸腾的时候，如果法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处于被动，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保住其中的任何一块土地。因此，他在这儿的任务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行动起来，以代替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人。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尼罗河流域的角逐使得英、法、意三国近60年来一直互相冲突，结果英国胜利了。现在意大利人如果最后被打垮，而法国人又显然一直处于被动和无力的地位，今后的局势对英国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地区来说，将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在这一段时期，戴高乐在非洲的部队，捷报频传，连续取得战果。在他的指挥官中，战绩辉煌的那位勒克莱尔上校正成为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勒克莱尔骁勇善战，而且是一位天生的将才，但由于装备极差而无法充分施展他的才能。1941年1月，勒克莱尔派出一支部队佯攻木祖克，他的真正目标却

是远离拉密堡的库弗腊绿洲，两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公路。勒克莱尔很明智地征集了大约 120 辆卡车，运了几百名士兵，带了仅有的一门 75 毫米的加农炮，几门口径较小的 37 毫米炮以及几挺不好使的机枪。3 月 1 日，勒克莱尔迫使库弗腊的意大利守军投降，意大利人只是在投降以后才发现，打败他们的那支部队少得可怜。

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作战基地，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不久前占领了意大利在基朗高地的防线。蒙克拉尔上校的那一旅和阿斯蒂埃·德·维拉特队长的空军在这一战役中建立了奇迹。至于吉布提的维希军队，勒让蒂约姆将军虽然和他们接了头，但他们还没有下决心反正过来。领地长官诺勒塔则用尽一切办法来镇压倾向于归附的人，甚至连死刑也用上了。戴高乐决心解放这一地区。3 月 29 日，他乘机前往厄立特里亚视察，那里的部队正进行着紧张的战斗。他到达的第二天，普拉特的部队就一举攻克多角堡。4 月 7 日，由蒙克拉尔上校指挥的旅，首先攻入城区，并在碉堡里抓住了敌军上将，使蒙克拉尔上校得到了接受敌军红海舰队司令投降的光荣。法国分遣队在战斗中总共俘虏了 4000 人，到马萨瓦接受了 10000 多人的投降。

就在戴高乐高举战旗、斗争形势正在急剧变化的时候，希特勒又把他的侵略魔掌伸向了英国。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矛头指向英国

击败法国又打英，“海狮计划”早出笼；

英国军民齐奋战，空军健儿立奇功。

话说希特勒征服法国之后，更加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如今德国的军队驻守着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边的布格河。希特勒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这个奥地利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已经成了德国征服者最显赫的人物了。现在他又准备对英国做最后一击，以便尽早征服号称“太阳永不落”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对盟国来讲，当时的形势可谓严峻。希特勒的盟国意大利已向英国宣战，并正在地中海和中东进行侵略扩张；在远东，日本心怀叵测，并将侵略战火烧到东南亚；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已占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并随时有可能向英国宣战，用大炮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在波尔多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新近迁至维希，随时有可能被迫向英国宣战。土伦港残存的法国舰队看来行将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确，情况十分危急！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尽管形势艰难，英国政府和人民仍决心战斗到底！然而，在英国虽说不存在士气不振的问题，可是又如何克服这些严重的困难呢？丘吉尔深知，英伦三岛上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事实上，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 500 门，中型和重型坦克不到 200 辆。至少半年以后军工厂才能制出他们在敦刻尔克损失的那些武器。难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狂妄地叫喊：“英国的末日已经到了！”

面对重重困难，丘吉尔以大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说：“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发现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丘吉尔说，现在垦做出安排、清除这些影响的时候了。大敌当前，他们一点也不感到沮丧，他们藐视那些法西斯征服者，他们宁愿血染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正如伦敦军人俱乐部的一名侍者对一个垂头丧气的会员说的：“不管怎么说，先生，我们已经参加了这场决赛，而且就在咱们自家运动场上决赛，我们一定要奋力拼搏，赢得这场决赛的胜利！”

丘吉尔说，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了解这一点的英国人并不多，而外国人则更少；甚至在战前那些举棋不定的年代里，怎样在海防以及后来的空防上保持重要设施这一点，也不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土地上看到敌人的营火，已是将近 1000 年的事了。在不列颠抗战的高潮时，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沉着，宁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全世界无论是敌是友都逐渐认识了这一点。”丘吉尔说，“这种心情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只能用暴力回击暴力，才能保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

即使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德国最高统帅部也没有低估英国人的决心和潜力。齐亚诺说，1940 年 7 月 7 日，他在柏林拜会希特勒时，曾和凯特尔将军作过一次长谈。凯特尔同希特勒一样，向他谈到进攻英国的问题。他一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他认为登陆是可能的，但又考虑到这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战斗，必须要非常谨慎，因为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岛国

的军事准备工作和沿海防御工事的情报少得可怜，而且也很不可靠”。对大不列颠的飞机场、工厂、主要交通枢纽进行大规模空袭，看来还容易做到，而且也有必要。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英国空军的战斗力极强。凯特尔估计，英国人准备用于防御和反攻的飞机约有 1500 架。他承认，英国空军最近大大加强了攻击行动。执行轰炸任务时准确异常，而且出动的机群一次就达 80 架之多。凯特尔极力主张进攻直布罗陀，以便瓦解英国体系，至于战争要持续多久，凯特尔和希特勒都没有提过。

7 月 19 日，希特勒在征服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之后，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得意洋洋的演说，对英国大肆攻击和恫吓。他预言丘吉尔很快就会到加拿大去避难，接着提出他的所谓“和平建议”。希特勒说：“在这个时刻，我扪心自问，觉得我有责任再次向大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呼吁，希望它们诉诸理智和常识。我认为我自己有发出这种呼吁的地位，因为我并不是乞求恩赐的败军之将，而是胜利者，是在代表理智说话。我觉得没有理由使战争继续下去。一想到战争造成的创伤，我便感到悲痛。……也许丘吉尔先生对我这次讲话会置之不理，说这不过是出于对最后胜利的恐惧和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受良心的谴责。”

在纳粹头子作出这副姿态以后的几天里，德国在瑞典、美国和梵蒂冈的外交使团便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希特勒在使欧洲屈服于他自己的意志以后，自然很乐于取得英国对他所干的事情的承认，从而结束战争。事实上，他的建议不是和平，而是要英国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当德国驻华盛顿代办试图和英国驻美大使接触时，丘吉尔首相在 7 月 20 日发出如下电令：“我不知道哈利法克斯勋爵今天是否在华盛顿，但应该通知洛西勋爵，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

最初，丘吉尔还想在上院和下院对于希特勒的演说进行一场严肃的正式辩论。后来他和同僚们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这样未免小题大作。于是决定由外交大臣通过广播拒绝希特勒的姿态。²²

日晚，外交大臣就把希特勒那个“按照他的意志投降的劝告撇在一边了。”英国外交大臣奉命宣告：“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比政府先行一步。收听到希特勒的演说以后，没等官方表态，它们已经对举行谈判的任何想法进行了驳斥。

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谈到他在 7 月 20 日与希特勒的另一次会晤时说：“英国的报纸对希特勒昨日演说的反应表明，根本没有取得谅解的前景，因此，希特勒准备对英国给予军事上的打击。他强调说，德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它的势力范围和经济控制范围早已大大削弱了大不列颠抵抗的可能性，因此，在第一个回合里大不列颠就会崩溃。空袭已在几天前开始，并且在不断加强。英国防空设施和战斗机的迎击不能有效地阻击德国的空袭。德国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了。”

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也曾记述：“19 日晚，当英国的冷淡反应第一次传来时，在德国人中弥漫着一种遮掩不住的失望情绪。”希特勒“愿意和大不列颠取得谅解。他知道对英国的战争是一场艰巨的血战，他也知道各地的人民对流血抱有反感”。因此，德国继续在幕后进行外交活动。8 月 3 日，瑞典国王以为和英国政府商谈此事的时机已到，但丘吉尔即令外交大臣坚决拒绝和希特勒的德国进行任何和谈，并发表了官方的正式复文：

1939 年 10 月 12 日，英王陛下政府曾就德国的和平建议向议会作了深思

熟虑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从那时起，纳粹德国侵犯了其邻近的小国，犯下了一连串新的万恶的罪行。挪威遭到蹂躏，现在被一支德国侵略军所占领。丹麦受到袭击和掠夺。比利时和荷兰虽尽力满足希特勒先生的意愿，而且德国政府还对它们作过种种尊重中立的保证，但是仍被德军所奴役。特别是在荷兰，种种蓄谋已久的阴险残酷的行为，在鹿特丹的大屠杀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次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杀害，这座城市的重要部分惨遭破坏。

这些可怕的事件在欧洲的史册上留下了黑暗的记载，给它抹上了无法洗刷的污点。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事件中认识到，没有丝毫理由背离他们 1939 年 10 月所通过的决议和确定的原则。相反，他们决心要竭尽所能用一切手段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粉碎希特勒主义，把全世界从一个恶徒所带来的灾祸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不移：他们宁愿同归于尽，也不畏缩或逃避自己的职责。同时深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去束手无策，这个任务也许是长期的；但是，在提出任何这类要求或建议之前，德国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话作出有效的保证，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生活，同时在全面和平中对大不列颠和英帝国提出有效的安全保障。

复文发出后，丘吉尔感到文件有些流于繁文缛节的形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与有关问题的肃穆和朴素的气氛。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误解和涣散国内的斗志，同一天，这位战时内阁首相又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决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布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决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弛。

为了发动全民抗战，防备敌人入侵，敦刻尔克战役结束以后，丘吉尔就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到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进行视察。他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三师和南方前沿指挥部。在本土防御问题上，丘吉尔除了加紧组建和整编正规军外，并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在各党派各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下，全国很快组织了 150 万人的国民自卫军。

在这些日子里，丘吉尔除了担心敌人的空袭外，还特别担心德国坦克部队的登陆。因为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或反坦克弹药，甚至连普通的野炮也没有。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要军需大臣莫里森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各种常规武器，以便尽快武装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要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每周报告有关设计和生产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的情况，并要他力争每月生产不少于 1000 架军用飞机。丘吉尔还要求海军部，至少把 50 名经过训练和经过部分训练的驾驶员暂时调到空战司令部；要求陆军部除了加速筹建支援法国抗战的两个师外，还要按照荷兰流亡政府的愿望，制定编组荷兰旅的计划；催促外交大臣，承认比利时国王的政府为比利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要求外交大臣鼓励南斯拉夫进行动员，以对抗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胁。

希特勒对英国的“和平攻势”，在英国坚定不移进行抗战的强硬态度下碰壁后，希特勒遂于 1940 年 7 月 16 日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

的第十六号指令，即所谓“海狮计划”，叫嚷要“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他命令全部准备工作要在8月中旬完成。

为了贯彻这一指令，德国在一个月之内，沿欧洲北海岸集结了168艘运输舰，1910艘驳船，419艘拖轮和1600艘汽艇。陆军方面，也在海峡沿岸集结了13个师，并进行了登陆演习。

为了对付德国的登陆入侵，英国人民广泛地动员起来了。到8月20日为止，有200万人手中有了步枪和刺刀，其中3/4的人被编入正规军的军事组织。庞大的国民自卫军，有的持步枪，有的拿棍棒，随时为保卫英伦三岛而战斗。当时英国使用的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不够精密，只能在敌机飞近国上空时发出警报，而实际上敌机飞临上空后就无法报告了。为了弥补雷达装备的不足，群众自动报名参加了对空监视组织。他们手拿望远镜和步话机，从各个角落向指挥中心报告敌机的活动情况，配合飞行员作战。参加这种对空监视工作的男女就有5万多人。在保卫英国本土的战斗中，英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顽强战斗，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将领们，对征服英国有一种盲目自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在法国投降后写道：“德国对英国的最后胜利，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敌人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了。”希特勒宠信的这个战略家认为，法国在一周前已经投降，丢下英国单独作战，显然已经孤立无援。因此，在短期内打败英国是“稳操胜券”的。

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中攻势“鹰计划”是在8月15日发动的，其目的在于把英国空军逐出空中，从而完成入侵的一切必要条件。已成为帝国元帅的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在7月中旬，他深信倾其全力进攻，能够在四天之内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入侵开辟道路。戈林对陆军总司令说，要完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任务则需要稍长一点时间：二至四星期。这个勋章满胸的德国空军统帅甚至认为，单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膝，而不必动用陆军发动进攻。

戈林拥有三支庞大的航空队可以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第一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之下，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起飞出击；第二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基地在法国北部；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挪威和丹麦。前两个航空队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第五航空队拥有轰炸机123架和双引擎ME—110型战斗机34架。而当时，英国皇家空军可动用的战斗机为700—800架。

英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不列颠的一切计划，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英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港口，掌握运输船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因此，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7月31日，希特勒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的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势必要推迟到1941年5月。”

丘吉尔说：“我个人在心理上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毫不畏惧。”他在6月4日对议会说：“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就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是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

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这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

在对法战争中，德国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德国海军在前段战役后，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休整。这段间歇对英国是有利的。因为绝大部分英国战斗机中队，也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在法国崩溃以后，希特勒对不列颠顽固地不接受和平建议——投降，百思不解。像贝当、魏刚以及法国的其他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的、不依靠外援的智慧和能力；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英国人的意志力。六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决心实施这个征服英国的“海狮计划”，否则他就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

在整个7月里，德国空军对海峡里的英国舰只和英国南部的港口进行的攻击日益频繁。这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尽管在入侵开始以前，肃清狭隘海峡里的英国舰只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初步空中袭击的目的，在于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来作战。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机智地只出动了很小的一部分战斗机来应战，结果舰只和一些港口遭到了很大的损失。4艘驱逐舰和18艘商船被击沉，但是这个初步交锋使德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是296架飞机被击毁，135架被击伤。英国皇家空军也丧失了148架战斗机。

在8月间，德国空军已经集结了2669架作战用的飞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战斗机。8月5日，纳粹元首的第十七号指令批准对英国加紧进行空战。戈林从来没有把“海狮”作战计划放在眼里；他的心思全部用在“绝对的”空中战争。他后来对各项布置的“胡乱更动”，使德国海军参谋部感到困惑。德国海军参谋部认为，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及其飞机工业，只不过是达到整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完成这一任务后，空战便应该转向攻击敌人的军舰和船舶。他们对戈林把海军排在次要地位感到遗憾，而且对空军出击的一再拖延而感到苦恼。8月6日，他们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由于英国空军的不断威胁，德国在海峡敷设水雷的准备工作已无法进行。8月10日，海军参谋部的作战日记写道：

“‘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扫雷工作，由于空军停止活动而受影响，空军目前因为天气恶劣不能出动，而且由于海军参谋部所不知道的原因，空军曾经失去了最近极为有利的天气所提供的机会……”

在希特勒的督促下，戈林于8月13日下令实施“鹰计划”。作为战斗的序幕，12日对英国的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袭击，五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一个雷达站被炸毁。但是，德国人这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的防御的重要性，因此，没有继续袭击这些雷达站。在13日和14日两天，德国人大约出动了1500架飞机，主要是袭击英国空军的战斗机机场。虽然德国人说已经“完全摧毁了”其中的五个，但是它们所受的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德国空军损失了47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13架。

8月15日德英双方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德方把他们所有三个航空队中的大部分飞机都投了进去，轰炸机出动了801架次，战斗机1149架次。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动的第五航空队遇到了灾难。德国人满以为东北沿海是无防御的，因此派出约800架飞机对英国南部海岸进行大规模空袭，而只派100架轰炸机在34架双引擎ME—110型战斗机掩护下去袭击东北沿海，但是这支队伍在飞近太恩河畔时，意外地碰上了英国7个中队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机群，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30架德国重型轰炸机（“亨克尔111”式，每架

飞机有4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被击落,而英方则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伤。这是戈林第五航空队在不列颠战役中的末日。它从此一蹶不振,没有重新参加这场战役。而且从那以后,没有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

那天,德国人在英国南部的攻击比较成功。他们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袭击,有一次几乎飞到伦敦。他们击中了克劳伊登的4个飞机工厂,并且炸坏了英国空军5个战斗机机场。

8月15日的空战,是“海狮”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500英里的战线上进行了5次大的战斗。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在南方,英国所有的22个战斗机中队全都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有的还出动三次,甚至四次,德国损失了76架轰炸机,英方损失飞机34架。这对德国空军来说是明显的惨败。

英国战斗机同处于很大优势的德机作战,靠的是机智地运用雷达。德国飞机刚从西欧的一些基地起飞,它们的影子便在英国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它们的航程被精确地划出来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完全知道在什么地点和在什么时候迎战最为有利。雷达是战争中的新发明,它使德国人感到迷惑。在发展和运用这种电子装置方面,德国人远远落后于英国人。德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阿道夫·加兰后来作证说,“我们意识到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一定受到地面某种新装置的控制,因为我们听到指挥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同德国机队的作战命令是非常熟练和准确的”,“这种雷达对战斗机的控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惨痛的意外”。

但是,在8月12日使英国雷达站遭到巨大损失的攻击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8月15日戈林受到第一次挫折后,便完全放弃了这种攻击。他说:“继续攻击雷达站是否还有意义,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失去作用。”

英勇的英国空军,成功地保卫了南部上空的第二个关键是扇形站。这是地下神经中心,这个中心根据雷达、地面观察站和空中驾驶员获得的最新情报,用无线电话指导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作战。正如加兰指出的那样,德国人能够听到扇形站和空中驾驶员之间经常进行的无线电通话,并且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些地面控制中心的重要性。8月24日,德国人便改变战术,去摧毁这种扇形站。其中七个扇形站设在伦敦四周各机场,它们对于保护英国南部和首都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战术改变,对英国空中防御系统是一个打击。

直到那天为止,战斗看来对德国空军不利。8月17日,德国空军损失了71架飞机,英国空军则损失了27架,曾在波兰和西线为陆军的胜利铺平道路的行进缓慢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遇到英国战斗机出击时毫无招架之功。8月17日,戈林把它们撤出了战斗,这样便使德国轰炸机的力量削减了1/3。8月19日到23日,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停止了五天。戈林于19日在柏林附近的乡村别墅卡林霍尔回顾了局势后下达命令,待天气一好,德国空军立即集中力量专门攻击英国皇家空军。他说:“我们在对英国的空战中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击败敌人的空军。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战斗机。”

为了鼓舞士气,8月20日,丘吉尔向议会报告说:“当然,敌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新飞机的生产已大大超过了他们,美国生产的飞机刚刚开始运来。我们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力量,在经过了这样几次战斗以

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空战继续打下去，敌人愿意打多久就同他打多久，而且打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能迅速地由空中与敌人势均力敌，然后转入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空中优势。”不过，当时英军空军的情况并不能令人乐观。

戈林和他周围的人认为，英国的地面设施、飞机工业和皇家空军的战斗力已遭到严重的损失。他们估计，从8月8日算起，英国损失了1115架飞机，而德国只损失了467架。9月间，天气一直晴朗，戈林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空军从8月24日到9月6日每天平均派出1000多架飞机。英国空军驾驶员一个月来每天要出动好几次，已经很疲劳了。他们虽然进行了英勇战斗，但是德国方面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发挥效力。英国南部的5个前沿战斗机场遭到了严重破坏，更糟的是，七个关键性的扇形站有6个受到十分猛烈的轰炸，整个通讯系统几乎已处于被摧毁的边缘。更令人担忧的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防御力量开始变弱了。在8月24日到9月6日这关键性的两周中，英国被摧毁或受伤的战斗机有446架。而且皇家空军有103名驾驶员被打死，128名受重伤，为当时全部驾驶员的1/4。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那样，“局势已对战术空军不利……人们感到十分焦虑”。

这种情况再持续几个星期，英国在天空就会失去有组织的防御力量。但是，戈林又接着犯了第二个战术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可与希特勒在5月24日停止用坦克进攻敦刻尔克相比。它拯救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皇家空军，并且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错误就是：在英国战斗机防御力量在空中和地面遭受损失而无法长期支持的情况下，德国空军9月7日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因此而喘了一口气。这种战术上的改变，给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8月24日晚上，也就是在戈林轰炸伦敦的第二天，丘吉尔为了报复德方滥炸首都的野蛮行为，随即派出81架皇家空军飞机轰炸了柏林。物质损失虽不严重，但对德国的士气影响极大。英国人还扔下一些传单。传单说，“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希特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这是很好的宣传，但是炸弹的爆炸声是更好的宣传。

8月28日的夜间，英国皇家空军派了更多的飞机袭击柏林。

官方统计数字说，炸死了10人，炸伤了29人。纳粹要人大为震怒。

在第一次袭击时，戈培尔曾命令报纸只用几行字报道空袭消息，现在则指示就英国飞行员“野蛮地”袭击柏林手无寸铁的妇孺大肆宣传。首都的大部分报纸都用了同样的标题：《怯懦的英国袭击》。过了两个晚上，在第三次空袭之后，标题为《柏林上空的英国空中强盗！》。

一星期来，英国连续不断地进行夜间轰炸的主要作用，是在德国人民中引起普遍幻灭的情绪，在他们心里播下怀疑的种子。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们相信了他。

因此，他们今天感到的失望程度就更大了。他们害怕战争，渴望和平。

9月4日，冬赈运动在体育馆开幕这天，希特勒认为他有必要向人民发表讲话。他要出席会议这一点，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分钟。这显然是担心英国的飞机可能利用云层进行轰炸，以破坏这次集会，虽然集会是在下午干黑以前一小时举行的。希特勒在会上冷嘲热讽，称丘吉尔是“那个著名的战犯记者”，是“一个神经质的老母鸡”。他需要答复德国人民心中想得最多的两

个问题：什么时候进攻英国，对于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遭到的夜袭将采取什么行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滑稽地说：“在英国，人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来？’别着急，别着急。他就来了！他就来了！”他的听众觉得这句俏皮话很好笑，但是他们相信这是毫不含糊的保证。

关于轰炸问题，希特勒首先捏造了谎言，最后进行了可怕的威胁。他说：“丘吉尔进行这些空袭，是因为他的空军不能在白天飞临德国上空，但是德国的飞机则每天飞临英国领土上空。英国人看见一点亮光就扔下炸弹，扔在住宅区、农场和乡村里。”他继续说：“我们要以夜袭来回答夜袭。当英国空军扔下 2000、3000 或者 4000 公斤炸弹时，我们将在一夜间扔下 15 万、23 万、30 万或者 40 万公斤的炸弹。”希特勒发誓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夷为平地！希特勒最后说，“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有一个会求饶，但这决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这时疯狂般的纳粹听众由狂呼乱叫转为齐声高喊：“决不是！决不是！”

就在希特勒下达了滥炸伦敦和其他一些军事设施的命令之后，9 月 11 日，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除了号召军民粉碎敌人的空袭外，还提醒人们注意海上入侵。英国首相说：

每当天气适宜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往往一次就三四百架，向我们这个岛，特别是肯特海角蜂拥而来，企图在白天袭击军事目标及其他目标，企图毁灭我们的首都。但是，它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中队的迎击，几乎来一次就被击溃一次；他们的损失与我方的损失相比，平均飞机 3：1，飞行员是 6：1。

德国人为了取得英格兰上空的白天制空权所作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决定整个战争的关键。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们却感到比以前强大了，的确比这次激烈战斗开始的 7 月强大多了。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进犯我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虽然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地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斯开湾的法国港口。

除此以外，由每 10 艘或 10 多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正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在德军新建的法国海岸炮台的掩护下，躲

躲闪闪地从—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港口，从汉堡一直到布雷斯特，现在也集结了为数可观的船舶。最后，他们还准备一些船只，打算从挪威的港口运送一支入侵的部队。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快要打完—

德雷克（1545—1596），英国海军将领。1587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普组织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德雷克奉命在霍华德勋爵统率下迎击。传说，当时他正在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西班牙进攻的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道：“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

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仑大军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在纳粹头子的指令下,9月7日傍晚,德国空军开始了对伦敦的大规模轮番轰炸。这一天,德国人投入了625架轰炸机和648架战斗机。在下午5点左右,第一批320架轰炸机在德国所有战斗机的掩护下,飞到泰晤士河上空,开始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几英里的码头扔下了炸弹。这一片广大地区立即成为火海。锡佛尔镇的居民被火包围了,不得不从水路把他们撤出来。天黑以后,在8点10分,第二批250架轰炸机再次进行袭击,接着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一直进行到星期天早晨4点30分。第二天晚上7点30分,又来了200架轰炸机,继续炸了一整夜。据英国官方的报告说,在最初这两天夜里,约有842人死亡和2347人受伤,这个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

戈林元帅在“胜利”的鼓舞下,不满足于晚上轰炸,决定在白天接着轰炸,决心把这个城市夷平。这便导致了9月15日的这次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天中午时分,200架左右的德国轰炸机在三倍的战斗机掩护下,在海峡上出现,飞向伦敦。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在雷达荧光屏上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并且作好了准备。德机在逼近英国首都以前就遭到拦截,虽然有几架飞机穿过去了,但是很多飞机被驱散了,另外一些还没有把炸弹扔下就被击落。两小时后,一支更为强大的德国机队来了。它们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据英国宣布,这天击落了185架德国空军的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仅丧失了26架飞机。

9月15日这一天,是不列颠战役的转折点,正如丘吉尔后来所估计的,是不列颠战役的“关键”。戈林在第二天下令改变战术,规定白天使用飞机不再是为了进行轰炸,而只是用它们来作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吹嘘说,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但是,德国海军参谋部却非常关切他们本身的利害和责任,早在9月10日就在他们的“战斗日志”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南英格兰和海峡地区的上空已经击败敌方的空军,这一点对进一步判断局势是极为重要的。空军在初期的进攻确曾显著地削弱敌方战斗机的防御力量,从而使德国战斗机在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然而……我们迄今还没有获得海军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指出的冒险进攻所必需的作战条件,即在海峡地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消除敌方空军在德国海军及辅助船只集结区域上空的活动……如果空军现在减少对伦敦的袭击,而加强对朴次茅斯和多佛尔以及作战地区以内或其附近的军港的攻击,那就符合‘海狮’作战计划的预定步骤了……

这时,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的袭击具有决定的意义。他不理睬海军参谋部申述的意见。海军参谋部一直感到不安,到9月12日遂得出如下的阴郁的结论: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由于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而被阻。后来演变为1805年10月21日的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

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掌握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未曾看到德国空军对英国舰队的舰只进行任何袭击，它们现在在海峡中几乎可以畅行无阻，不受干扰，这对于渡海运输是极端危险的。因此，要防御英国的海军，就主要靠敷设水雷区，但是正如一再向最高统帅部解释过的，不能把布雷区当作掩护航运的可靠手段。事实上，迄今为止，猛烈的空战并未对登陆行动有所裨益；因此，从作战方面和军事方面看，目前还不能考虑登陆计划的执行。

伦敦从9月7日到11月3日连续57个夜晚遭到恐怖袭击，每天平均有200架轰炸机前来轰炸。尽管遭到巨大的残酷破坏，但英国军民的士气并没有瓦解，军火生产也没有下降。作为德国轰炸机首要目标之一的英国飞机工厂的产量，在1940年实际上仍然比德国多，其比数为9224架对8070架飞机。希特勒在英国上空损失了大量的轰炸机，它们一直没有能恢复原来的数目。

德国海军首脑们一直承认，海军自从初春在挪威海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来，不能够为入侵英国提供海上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没有空中的优势，德国陆军要想横渡这狭窄的海峡是无能为力的。战争发生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被制止住了，他的征服英国的“海狮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欲知英国首都伦敦军民的战斗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章 “伦敦精神”

全民皆兵尽英雄，伦敦精神呈光明；
军民一齐来上阵，奋搏顽敌争先锋。

在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的那些日子里，英国首都人民表现了临危不惧的精神。誓死抵抗的空气弥漫全城。大街上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些机关、工厂和学校门口，还用大字书写着莎士比亚的话：“这块天佑的土壤，这陆地，这国家，这个英吉利，就是我们神圣的祖国。”

让我们看看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当年所写的报道吧：

星期一晚上又是不得了的——这是9月9日之夜。星期二那天，恐怕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伦敦的人们忽然好像受了神的指示一样。伦敦600万人民骤然觉得，要是意志坚定，任何艰难险阻，总可以受得了，啸声弹、强力炸弹、烧夷弹又落了一晚，已是接连第三个晚上了。然而在星期二早晨，大家突然感觉到，星期一晚上没有星期天晚上那么可怕，而星期天晚上，又不如星期六晚上那么凶。恐怖的效力渐减性定律发现了。从这时起，伦敦具有自信——伦敦可以受得了。

星期一，大家还是照样紧张地工作着。人们丝毫没有沮丧的心情。这样，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日复一日，夕复一夕。首相已经下令，从全国各地，把高射炮集中到伦敦来。总是天色一黑，高射炮炮火便响起来了，没有个停止。据说一夜所消耗的炮弹就值200万美元，伦敦屋顶到处都掉着碎片。这种铿锵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伦敦人听了，勇气更高一些，伦敦的一个星期，就是9月7日至14日，是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星期，简直眼瞧着挨不过去。但这一个星期终于过去了，而伦敦还是岿然存在——闪电战的威风，并不像意料的那样可怕。在这个星期的最后，伦敦的灯光还是光明的，阴沟还是通的，公共汽车和地铁仍按班行驶……公园里仍是百花怒放，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热闹中心之一）里，居然还有音乐演奏。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为了表示无畏精神起见，不时地举行音乐会。理发匠还是理他的发，洗衣的女工还是做她的活。

到处都是炸弹坑和瓦砾场，但伦敦在这苦难中已得到自信；虽然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生活过。到处都是英勇的表现。这一向过着平凡生活的600万市民，忽然觉醒了，世界文明是必须急救而使其不衰落的。天破晓时走到街头，吐一口气，你真觉得世界是你自己赎救出来的。

慢慢的伦敦是习惯于这种围城生活了。无数的人们都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场所，往往是央求顺路的便车带着去。伦敦全城到处都可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在百货公司卖衣服的女店员，现在觉得她对国家的重要，不亚于公园中的高射炮手。坚韧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

一夜又一夜，炸弹无尽下。英国人的精神未衰，他们始终毫不动摇。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炸的一天，我留心观察他们。我看见人们站在铁栅外面，寂无一声地望着屋顶的一个大洞。我深切地懂得了。伦敦人所讲的，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无耻地保住巴黎。巴黎圣母院今日在伦敦人

看起来已是死的东西——一个屈辱的城中的一个死教堂。伦敦不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它已是一个精神之都，那约翰森博士（18世纪文坛权威）、卫斯雪（19世纪宗教家）、莎翁的伦敦。伦敦现在是存在于伦敦人的精神中了。

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整整持续了57个昼夜，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丘吉尔说：“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个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但是，所有这些目的，敌人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勇于战斗的精神，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都很优秀、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美德，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向全世界表明，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从9月7日到11月3日，平均每天晚上有200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当时，首都的防御力很低，全城只有92门高射炮。在夜间战斗机队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还处在幼稚阶段，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鉴于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48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这样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到来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的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9月10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开始，这轰隆隆的炮火虽然给予敌人的损害不大，但却大为振奋人心。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反击了。从此，高射炮队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捍卫首都的雄鹰。他们个个英雄虎胆，争先立功。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另一位航空队员在决心书上写着：“我活得毫无成绩，但我决心要死的值得；我不想做一个英雄，但我要像男子汉般的死！”这种报效国家、视死如归的精神到处皆是。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丘吉尔和几个同事正在吃晚饭。这时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用餐后，丘吉尔和同事们向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走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他们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丘吉尔的朋友急忙把他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随后，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

还有一个晚间，即 10 月 14 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

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 250 多人，全部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大臣们诙谐地说：“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 500，受伤的也只是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百感交集。当居民认出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 1000 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将军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 40 米宽，20 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内阁。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离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 年 9 月 5 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他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

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自己的妻子。

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决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1940年，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既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心中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到9月中旬，敌人对伦敦及其周围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造成交通中断。因此，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就成了当时一项最迫切最危险的工作。为此，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由萨福克伯爵所组成的三人小组——他的私人女秘书和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事迹传遍了伦敦，传遍了全国。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往哪里去。不幸的是，在他们排除第35颗定时炸弹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10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迄今为止，敌人的空袭多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10月15日的月夜，480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了380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7万颗烧夷弹。在此以前，政府督促首都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为“到房顶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的防火瞭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瞭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瞭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为了教会防火瞭望哨处理敌人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政府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燃烧，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了。人们虽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莫里森大臣决定把1400多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瞭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募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当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和器材标准，一旦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现场，成为防空救火的主力军。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莫里森大臣得到了里丁夫人的大力帮助。她每天昼夜不断地出入防空壕，积极组织民间消

防队，在她的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进入 11 月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1 月 3 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警报。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例如，他们训练了一个飞行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企图破坏英国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

这种新的轰炸战术是从 11 月 14 日夜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的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 14 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 500 架德国飞机共投了 600 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吨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英国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400 人被炸死，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英国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居民的军事训练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1 月 15 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这次空袭造成的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从 11 月 19 日到 22 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 800 人被炸死，2000 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人民在生活和精神上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丘吉尔来到这个城市视察工厂和敌人轰炸的恶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使他感动的事。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女工向首相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马上叫汽车停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你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信任的表示，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之后，丘吉尔又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那里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的、明察事理的 100 万居民则丝毫未被他们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所吓倒。这是伦敦战斗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 12 月初，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的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炸弹的考验。丘吉尔说，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的国家都是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 月 29 日，星期天。这以后的几个星期内空袭又一次在伦敦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在这次轰炸中用上了。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本身。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伦敦军民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 1500 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和其他一些重要建筑，全靠大

家的英勇努力才得以保住。

然而，正当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英国高射炮与德国飞机之间进行激战时，另外一场斗争也正在一步一步、一月复一月地进行。这是一场秘密战争。人类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战争。30年代一位有才智的科学家写道：“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智的极限，可是各种有线通信都不中用了，他们只能用无法理解的信号同我们通讯。”然而，当时大不列颠民族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对这种信号的领悟，取决于针对所获得的印象采取正确和及时的行动。

自从1939年以来，雷达每个部分的技术一直在继续不停地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从1940年7月到9月进行的不列颠之战，主要还是靠人的眼睛和耳朵打仗的。在这几个月里，丘吉尔曾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英国冬季常有的浓雾和密云，会像一件披风似地遮往我们这个岛屿，至少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掩护，不致在白天，尤其是不致在夜间遭受准确的轰炸。”

有一个时期，德军轰炸机主要靠无线电定向信标导航的。在大陆上的许多地点建立了几十座这种像灯塔的定向信标，每一个定向信标有不同的呼叫信号，德国人利用普通的定向无线电台，就能根据传来的这种电波的任何两束的角度来确定它们的位置。作为反措施，英方很快建立了一系列的电台。这些被称为“梅康”的电台拾取了德国电台的信号，并加以放大后再从英国某地放送出去。结果，常常把这些试图利用他们的定向信标导航的敌机引入歧途，有许多敌机就这样损失了。的确曾有一架德国轰炸机自动地在德文郡降落，以为那里是法国。

“然而，我在6月间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林德曼教授向我报告说，他认为，德国人正在制造一种仪器，不论白天或黑夜，也不论天气好坏都可借助于这种仪器进行轰炸。目前似乎德国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无线电射束，这种射束就像是看不见的灯光，能够相当准确地把轰炸机导向它们的目标。”

戈林元帅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克尼克拜因”装置上，并使德国空军相信，不论阴天、下雾或黑夜，都能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并且还可使进攻的飞机免遭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截击。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依恃他们“有条理的头脑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规模计划”，把他们空战胜败的赌注押在这么一种新发明上。他们认为，这种新发明也像磁性水雷一样，可以打败他们的对手。

丘吉尔听了科学家们的介绍，觉得这种秘密武器的魔力，真比福尔摩斯或勒科克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后，丘吉尔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立刻采取行动，及时在国内建立干扰电台，使敌人经常发生误差；另外，还在一定的地点设置了一种重复发射器，加强分裂射束的一半信号，而不加强另一半信号。这样，试图在分裂射束两半边的信号都相等的航线上飞行的敌机驾驶员，就要逸出正确的航线。可炸毁一座城市或至少可严重破坏一座城市的大批炸弹，便会落在距离城市15或20英里以外的旷野里。

大约在8月23日，德国人在迪埃普和瑟堡附近新建的一批“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射向伯明翰，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开始几天，敌人十分猖狂，破坏力极大，但自从受到这种反措施的干扰后，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即最危险的9月和10月，德国轰炸机在英格兰上空绕来绕去，盲目投弹，命

中率最多不过 1/5。这对英国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经过内部的一番斗争后，德国人员终于修改了他们的方法。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大队，即“第一百作战小组”，使用的是它自己特有的一种射束。他们称之为“X 装置”，这是一种神秘的名称。敌人利用这个小组引路，在目标地区投掷烧夷弹，引起大火，起火的地方便成为其余的已经不再受“克尼克拜因”信号指挥的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

到了 1941 年切，经过刻苦钻研，英方科研人员终于治服了“X 装置”。后来敌人又使用了一种称为“Y 装置”的新装置，英国科学家又紧追不放，随即发明了一种“反 Y 装置”的干扰手段，将敌机引入迷途。因此，德国空军人员对这一新发明的信心，从一开始就丧失无余，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便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就这样，法国沦陷后敌人企图征服不列颠的三次重大尝试，都被英方成功地击败或阻止了。第一次是德国的空军在 7、8、9 三月的不列颠之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敌人不但未能毁灭英国所赖以生存的空军、机场和飞机工厂，反而使自己遭受到难以忍受的损失。

第二次的胜利是德军未能取得制空权，因而未能实现其横渡海峡入侵英国的计划。

第三次是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在夜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英国战斗机驾驶员的无限忠心和他们的技术以及人民群众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又战胜并挫败了敌人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科学家们所起的令人难忘的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高空和烈火熊熊的街上所作的种种巨大努力也是徒劳的。

不可征服的“伦敦精神”在战争中得以发扬光大，使英国人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欲知欧洲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章竞相掠夺

恶狼扑食露凶相，竞相掠夺日夜忙；
妄将非洲抢到手，墨氏玩火更疯狂。

法兰西的投降，墨索里尼的参战，更加剧了盟国在欧洲抗战的困难局面。德、意法西斯军队进攻的矛头，眼下主要指向大不列颠和它的殖民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个法西斯强盗，像恶狼一样，竞相掠夺，他们认为击倒英国是不在话下了。

由于法国退出战争，英国正在本土作着生死存亡的斗争，墨索里尼以为他控制地中海和重建古罗马帝国的美梦就要实现了。他既然用不着防御在突尼斯的法国人，就可以进一步加强他为进攻埃及而集结的大军。当时，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于英伦三岛的命运，注视着入侵德军的集结和制空权的斗争。

墨索里尼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为了称霸非洲，掠夺英国在那里的殖民地，早在 1940 年 6 月 10 日向英国宣战前，就在北非集结了大量的部队。据英国情报机关当时的估计，意大利除了在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驻兵以外，还有 215000 人驻在北非沿岸各地。具体分布如下：在黎波里塔尼亚有 6 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在昔兰尼加有两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此外还有边防部队相当于 3 个师。英国在埃及的兵力计有：第七装甲师，第四印度师的 2/3，新西兰师的 1/3，此外还有 14 个英国营和两个皇家炮兵团，共约 50000 人。而且防守西部边境和保持埃及内部安全的兵力，都要在上述单位中抽调。因此，英国在战场上是以寡敌众，而且意大利的飞机也远比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多。

早在 1940 年 7、8 月间，墨索里尼就命令意大利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采取积极行动。英方处境愈来愈困难，来自卡萨拉方面的威胁正向西面的喀土穆伸展，惊惶的情绪弥漫于肯尼亚，深恐意大利远征军从阿比西尼亚向南进军 400 英里，朝塔纳河和内罗毕推进，侵入英属索马里。但是，所有这些忧虑同意大利侵袭埃及引起的忧虑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显然，意大利正以最大的规模准备入侵埃及。不久前，墨索里尼曾不断地向埃及东面调派军队。甚至在参战前，就沿海岸修筑了一条宽阔的公路，从黎波里的主要基地起，通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到埃及的边境。好几个月以来，沿着这条公路的军运十分繁忙。在班西加、德尔纳、托卜鲁克、巴迪亚和苏卢姆逐渐建起了军火库，军火堆得满满的。这条公路长达 1000 多英里，沿路都有意大利兵营和供应站，夜间灯光闪闪，活像一串珠子。

沿着这条公路，靠近埃及边境的一端，意大利不动声色地慢慢集结和部署了一支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人的军队。在这支军队的前面，就是争夺的目标——埃及。在它的后面是通向黎波里的漫长的公路；再后面就是大海！墨索里尼心想，他这支拥有现代装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如果能继续东进，战胜所有企图拦路的军队，开罗的金字塔就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如果它能取得三角洲的肥沃地带，征服埃及就可稳操胜券了。到了秋季，野战军和沿海岸一系列庞大供应站中的意大利人，至少有 30 万。墨索里尼命令前线司令格拉齐亚尼元帅，要以最快的速度攻占埃及，把英国人消灭在大沙漠中。但是，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哩！

那时，在英国方面，在北非最前方的防御据点是在马特鲁港的兵站基地。

那里向西有一条很好的公路通西迪巴拉尼，但是由此到苏卢姆的边境却没有一条能够维持在边境长期驻扎大量兵力的公路。中东司令韦维尔将军组建了一支机动灵活的精锐的机械化掩护部队，包括第七轻骑兵团、第十一轻骑兵团、第六十步兵旅的两个汽车营和一个步兵旅以及两个皇家摩托化炮兵团。墨索里尼一宣战，他们就马上进攻意方边境上的前哨据点。因此，在 24 小时以内，第十一轻骑兵团就越过了边境，出其不意地袭击尚未听到宣战消息的意军。接着，6 月 12 日，6 月 14 日，他们和第七轻骑兵团以及第六十步兵旅的一个连，攻陷了卡普措和马达累纳边境上的碉堡，并且俘虏意军 220 名。16 日，他们又深入袭击，击毁了 12 辆坦克，截击了托卜鲁克—巴迪亚公路上的运输队，并俘虏了一名意大利将军。

这支小小的机动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 60 英里的战线上，穿插在意大利大兵团之间，继续打击敌人，取得愈来愈大的成果。在战争的头 3 个月，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 3500 人，被俘 700 人；而在英国方面损失只有 150 余人。这样，在墨索里尼对大英帝国宣战的第一阶段，战事一开始就对他不利。

恼羞成怒的墨索里尼，决意攻下埃及，攻下索马里，要把英军赶出非洲。在他的驱使下，格拉齐亚尼元帅的 6 个步兵师团和 8 个战车大队，向英军展开了全面进攻。8 月 3 日，意大利的 3 个步兵营、14 个殖民地步兵营、两个山炮大队和配备中型坦克、轻型坦克和装甲车辆的几个支队攻进了英属索马里。8 月 10 日 这队人马继续向纵深发展。8 月 15 日 英国守军司令戈德温 奥斯汀将军决定撤退，他认为这是免遭惨败和被歼灭的唯一途径。但是，丘吉尔却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一行动将作为英国败于意大利之手的战役而载入史册。

索马里的攻陷，法西斯军队深入埃及领土，这使墨索里尼喜上加喜。他在急切地等待着格拉齐亚尼的军队攻陷希吉巴拉尼并从马尔沙马德向亚历山大进击的消息。齐亚诺在 9 月 17 日的日记中写道：“埃及局势似乎越来越好。英国人正以料想不到的速度撤退。据军事专家们估计，在马特鲁会遇到抵抗。但是，也有人认为，在亚历山大会遇到抵抗。墨索里尼满面春风，他已肩负起进攻的全部责任，并为自己做得正确感到得意。”

墨索里尼虽然因为一时的胜利而兴高采烈，但他知道，要称霸非洲并非易事。此时，丘吉尔也在绞尽脑汁，他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的。在西线，希特勒在对英国本土狂轰滥炸；在东线，墨索里尼在夺取非洲，他简直有些顾此失彼了。双方的处境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在下面的问题上认识一致：要确保或夺取非洲，必须首先夺取地中海，双方的武器、弹药、粮饷和军队都是从这里运去的，因而，保证自己在地中海的自由通航对确保或夺取非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样，地中海的争夺就成了非洲之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法国崩溃之前，地中海是由英国和法国舰队共同控制的。英国在直布罗陀驻扎了一支包括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内的小舰队，防守海峡。英地中海舰队部署在东地中海，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这年年初，当意大利的态度变得咄咄逼人的时候，英国加强了这支舰队，共有战列舰 4 艘、巡洋舰 7 艘、驱逐舰 22 艘、潜艇 12 艘，另外还有一艘航空母舰。法国地中海舰队除一艘航空母舰外，还拥有主力舰 5 艘、巡洋舰 14 艘以及许多小型舰只。现在法国退出了地中海，而意大利进来了。数量上声势浩大的意大利舰队包括战列舰 6

艘，其中4艘是最新式的，配备有15英寸口径的大炮，但在较老的战舰中，有两艘正在改装，不能马上使用。此外，意大利舰队还拥有现代化的巡洋舰19艘，其中7艘是装有8英寸口径大炮的，另有驱逐舰和鱼雷艇120艘，潜艇在百艘以上。

此外，墨索里尼还有一支强大的意大利空军在对付英国舰队。6月底，形势对英方是险峻的，以致海军起初竟打算放弃东地中海，而将力量集中于直布罗陀。丘吉尔说：“我反对这一打算，虽然根据意大利舰队表面上的力量看来，这样的打算是有道理的，但与我印象中的战斗素质并不相称。而且，如果执行这一策略，就等于宣布马耳他的完蛋。”于是，英国决定在两头都打下去。7月3日，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关于地中海的文件。他们在文件中强调了中东作为一个战场的重要性，但是认为英国目前的策略大体上应采取守势，必须认真考虑法西斯军队进攻埃及的可能性；不过，只要能将这支舰队留在东地中海，他们现有的部队便能应付任何纯局部性的进攻。

7月8日，当英方舰队掩护着一支运输船队从马耳他开往亚历山大的时候，坎宁安海军上将发现了强大的意大利舰队。从意大利空袭的猛烈程度来看，显然敌人正在采取重要的军事行动；他们企图把这位英国海军上将诱至某一海域，让意大利空军和潜艇倾其全力，集中对它猛攻。坎宁安海军上将立刻抓住机会，先发制人，虽然他的舰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非常大胆地穿插到敌舰和敌方基地的中间。经过一场激战，结果击中意大利一艘战舰、两艘巡洋舰，而英国舰队则未受任何损失。在当天和其后的两天中，意大利猛烈的空袭未曾间断，但是妄费徒劳；英国的运输船队，尽管时常遭受猛烈轰炸，却终于安抵亚历山大，这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战斗，确定了英国舰队在地中海的优势，而墨索里尼的海军却受到了较沉重的打击，从此威望下降，一蹶不振。

到1940年底，可以说，英国的海军已稳固地立足于地中海了。马耳他的防务，因萨默维尔上将远道运去高射炮及其他设备而大大加强了。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东地中海的攻势策略，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墨索里尼的空军强大，主动权却操在英国人手里，而马耳他岛在局势的演变中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在对意大利及其驻非洲部队之间的交通线采取攻势行动时，该岛是一个前进的基地。

由于意军在北非接连失利，加上英国军援源源不断从地中海运到前线，埃及的防务正大大加强。担任非洲前敌总司令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对执行“领袖”进攻埃及的任务颇为踌躇不安。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940年8月8日。格拉齐亚尼来访。他在谈话中，把进攻埃及当作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并且说，我们目前的准备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他攻击巴多格里奥，说他没有抑制领袖的进取精神”

这件事‘表明对于一个了解非洲的人来说，他必定是优柔寡断的，或者更往坏处说，是居心不良。那里的水源大感不足。我们会走向失败，在沙漠中，一打败仗就必然引起迅速而全面的崩溃’。

“我把这件事报告了领袖，他极其烦恼，因为他上次同格拉齐亚尼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是：好像日内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进攻。格拉齐亚尼并没有向我提到日期。他根本不愿意发动进攻，或者无论如何在这两三个月内是不进攻的。墨索里尼在结束谈话时说：‘应该把任务交给那些希望提升一级的人去做，而格拉齐亚尼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他的元帅的位子。’”

一个月以后，格拉齐亚尼元帅要求把进攻的时间再延期一个月。但是墨索里尼回答说，假使他不在星期一进攻，就撤换他。元帅答应遵命。齐亚诺说，“从来没有一次军事行动是在司令官如此不愿意的情形下进行的”。

9月13日，意大利军队的主力开始了期待已久的行动，越过埃及边境，向前推进。他们的军队共有六个步兵师和八个坦克营。

英方的掩护部队包括三营步兵，一个坦克营，三个炮兵中队，两个装甲车队。他们奉命边战边退。由于他们的素质和有适应沙漠的优点，所以宜于这种战法。意大利军队，是从猛烈轰击苏卢姆这一边境城市附近的英军阵地开始进攻的。当硝烟和尘土消失以后，英军看见法西斯军队的阵容异常整齐。在阵地前面，前后左右整齐地排列着摩托车部队，后面是轻坦克和几排摩托车辆。用一位英国上校的话来说，这番景象就好像“奥尔德肖特的长谷地举行的诞辰庆祝会”。面对这样堂堂的阵势，英军第三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缓缓撤退，英军炮兵则对准摆在他们面前的无数目标加以猛烈轰击。

再往南，墨索里尼命令两个纵队向绵亘的山脉以南的辽阔沙漠移动，这条山脉与海岸平行，只能在哈尔伐亚——“地狱的火山口”——穿过。此处英军在历次战斗中都起了作用。每一个意大利纵队都拥有好几百辆车，还有坦克和反坦克炮。前面是炮兵，乘坐卡车的步兵在中央。英国人把意军屡次运用的这种阵势称作“刺猬”。在这一支庞大的队伍面前，英军撤退了，他们利用每一个机会袭击这群行动古怪、举棋不定的法西斯敌人。后来格拉齐亚尼解释说，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计划，不在沙漠上进行包围运动，而“把我的全军集结于左翼，以便沿着海岸火速到达西迪巴拉尼”。因此，这支庞大的意大利队伍便缓缓地按两条平行的路线沿着岸边公路前进。他们用乘坐卡车的步兵分批进攻，每批50辆。在四天当中，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队巧妙地从苏卢姆撤退到互相连接的阵地上，边退边给意军以重创。

9月17日，意军到达西迪巴拉尼。在这一战斗中，英军伤亡40人，而意军的伤亡则10倍于英军。另外被破坏的车辆有150辆。这次进攻，使意军的交通线延长了60英里。他们停顿下来，打算在这里驻守三个月。他们不断受到英方小机动部队的袭击，在给养补给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齐亚诺说，墨索里尼起初是“欣喜欲狂”。他已负起这次进攻的全部责任，并且很骄傲地说他做得对。但是，当辗转了几个月以后，他的兴头便逐渐消失了。不过，丘吉尔对当时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估计：在两、三个月之内，墨索里尼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埃及三角洲。另外，德军随时有出现在非洲其他战场的可能！

正当墨索里尼准备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西线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差不多要破产了。但是，丘吉尔并未放松戒备。10月4日，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我不能认为入侵的危险已经过去。那位绅士已脱光衣服，穿上浴衣，可惜水越来越冷，而且空中也有秋季的寒风。我们保持着最高的警惕。”

西线的缓和，为英军在中东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创造了条件。丘吉尔集中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墨索里尼。强大的援军和大量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地中海运到韦维尔将军的指挥部。两个坦克团已到达沙漠。统率称为“尼罗河集团军”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对于运到的“马蒂尔达”坦克的威力评

奥尔德肖特为英国汉普郡的一个市镇，距伦敦35英里，为英国著名军事学校的所在地。诞辰指英王诞辰。

价很高。这时，英军在马特鲁港的防御阵地已大为巩固，中东司令部的参谋和计划人员已开始在酝酿一些新的打算了。显然，他们下一步的重要任务是从英国和印度抽调兵力，加强英国在中东的部队，尤其是西非沙漠的部队。

这时，陆军大臣艾登前来北非视察，10月15日抵达开罗。他同韦维尔将军和指挥沙漠兵团的梅特兰·威尔逊将军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对于击退墨索里尼的进攻充满信心。威尔逊将军估计，意大利能够用来进攻马鲁特港的最大兵力不会超过三个师，受到限制的因素是给养，尤其是水和交通。针对意军的攻势，他拥有第七装甲师以及新调来的坦克团、第四印度师、由五个步兵营组成的马特鲁港驻屯军、一个机枪营和八九个炮队。第十六英国旅团和新西兰旅团已经从巴勒斯坦开到。一个澳大利亚旅团驻扎在亚历山大以西，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团也正向那里移动。此外还有一个波兰旅团。艾登写给丘吉尔首相的报告说，威尔逊将军认为，如果空军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这些军队的集结足以应付意军的威胁，并击败敌人。艾登还说，他以前建议的造成泛滥区阻止敌人进攻的计划业已实施，并已设置反坦克障碍物。如果意大利按兵不动，他们打算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丘吉尔看了艾登大臣的报告，深受鼓舞，现在这位英国首相脑子里所想的是急欲在西非沙漠地区转入攻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一章入侵希腊

垂涎欲滴巴尔干，墨氏出兵岂等闲；
迫不及待攻希腊，事与愿违丢尽脸。

正当墨索里尼要大张旗鼓攻打埃及的时候，忽然从柏林传来希特勒要进军罗马尼亚的消息。这使得意大利“领袖”气愤不已。希特勒的这个小伙伴，虽然力不从心，但他对巴尔干的野心却像希特勒一样疯狂。很早以来，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就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垂涎欲滴。如今听到希特勒事先不打任何招呼，擅自进军罗马尼亚好不生气。他大声吼叫：“希特勒这只鬼狐狸，老是强迫别人接受既成事实，这一回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不久，他就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占领希腊的大标题了！”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地中海东部。西北同阿尔巴尼亚接壤，北与南斯拉夫相连，东北与保加利亚及土耳其相邻，东、南、西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而曲折，多半岛和岛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占领希腊，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他的伙伴的“光辉的胜利”，而且对控制地中海、争霸非洲，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位高傲的法西斯“恺撒”，越想越得意，决心要一不做，二不休了。

1940年10月15日早晨，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秘密召开了次意大利军事首脑会议。他在会上口若悬河，指着一张大型军用地图，大讲希腊地位的重要和它对意大利法西斯的使用价值。他说：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说明我决意发动进攻希腊的这一行动方针。首先，这一行动在性质上既具有海上的目的，也具有领土的目的。领土的目的在于占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全部海岸……和爱奥尼亚群岛，这里包括扎金索斯岛、克法利尼亚和科孚岛，还要占领萨洛尼卡。当我们达到这些目的时，将使我们在地中海和英国对峙的局面为之改观。其次，……要全部占领希腊，使它失去行动能力，并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将处于我们的政治、经济范围之内。”

墨索里尼对这一战役的目的、作战意图做了阐述之后，又对开战的日期和要求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决定于本月26日行动，”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是一个钟头也不能拖延。早在我们参战之前，早在冲突开始之前，我经过了几个月的深思熟虑，现在已经把这一行动考虑成熟了。”

随后，墨索里尼又对战争的有利条件和周围邻国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and 说明，“我预计在北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他说，“南斯拉夫由于种种利害关系将保持缄默，土耳其方面也不会发生什么麻烦，特别是因为德国在罗马尼亚已经站住了脚，而且保加利亚的实力已见增长。保加利亚可以在我们这场角逐中充当一个角色，我将采取必要的步骤，利用当前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好机会，使它觊觎马其顿和获得一个出海口的企图得到实现……”

10月22日，墨索里尼重新决定在10月28日对希腊进行突袭。他在同一天写信给希特勒，却故意把信的日期写为10月19日，暗示他打算采取的行动，但是对这个行动的确切性质和日期则含糊其辞。齐亚诺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担心“元首”可能命令他住手。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法国会谈回来各乘专车回国的时候，风闻墨索里尼出击希腊的计划，纳粹外长奉“元首”的命令，在进入德国以后的第一个车站就停下来，打电话给在罗马的齐亚诺，主张立即召开轴心国领导人会议。墨索里尼建议10月28日

在佛罗伦萨开会。当他的德国客人在那一天上午从火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墨索里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元首，我们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经在今天的黎明，越过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了！”

墨索里尼想来个一箭双雕。即有一天，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雅典城，再隔不久，大奏胜利之曲进入开罗。他深知埃及与伊拉克是英国最重要的原油供给地，因而埃及的占领实在比占领伦敦更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希腊的占领并非意味着对埃及的占领已经放弃。对新罗马帝国来说，攻击希腊似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墨索里尼认为，当时的希腊孤立无援，因为上土耳其宣布自己为“非交战国”，英国虽与希腊结盟，但它忙于非洲及英本上的防御作战，不会给希腊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墨索里尼也收到情报说，希腊的抵抗指日可以摧垮。因此，这位独裁者更加飘飘然了。

10月28日拂晓前，意大利驻雅典公使把最后通牒送交希腊首相梅塔克萨斯将军。墨索里尼要求希腊对意大利军队全境开放。同时，意大利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也从数处进犯希腊。然而，希腊军队在边境上绝不是没有准备的，所以希腊政府便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从此，一场激烈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就在希腊国土上爆发了。在纳布巴克多斯港，希腊的驱逐舰和潜水艇，不时地遭到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在地中海，希腊的各种船只亦屡遭意大利潜水艇的暗算；在第诺斯港口停泊中的一艘希腊巡洋舰，也突然地遭到意大利鱼雷的攻击。所幸，大部分的人员都到了岸上教堂，参加圣母升天的大祭典，否则不知要有多少人丧生哩！

其实，在入侵之前，墨索里尼曾接到严正的警告说，意大利军队对希腊的进攻，必将遭到坚决的抵抗；但是，墨索里尼无视这一点，认为希腊的抵抗不至于太激烈，而且时间也不至于拖得太长，当时，驻屯于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司令官维斯孔蒂·普拉斯卡将军、副总督法兰吉斯格·雅科莫尼将军以及外交部长齐亚诺，都曾积极地敦促墨索里尼早日进军希腊，以便给希特勒一个下马威。

那时，意大利的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们却持另一种态度。他们都恐惧地对墨索里尼劝告说，现在已经交秋，实施山岳作战有诸多困难。然而墨索里尼仍旧我行我素。即使对于能够信赖的谍报部，由于他们不断以数目字显示预想的希腊军的抵抗，并主张意大利军队步步警戒、缓慢前进，也使墨索里尼觉得他们过度的悲观，因此多次给予非难。

陆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曾多次叮咛齐亚诺，务必使墨索里尼打消入侵希腊的念头，他如此说：“单靠现在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是不够的，同时布列贝萨又属于浅海，海军是无法登陆的。万一我们的进攻不能一时获胜，那么战争势将延长下去，意大利已感到匮乏的资源将荡然无存。如果我们的忠告仍是马耳东风，意大利仍下放弃攻击希腊的话，我只有辞职一途。”

原先，格拉齐亚尼元帅在埃及的胆小畏缩，已使墨索里尼寝食不安了。现在巴多格里奥又以辞职要挟他，使得他“七窍生烟”，怒不可遏了。墨索里尼声色俱厉地说：“我将亲莅希腊，瞧瞧惧怕希腊人的我军丢人的嘴脸！”当时如果巴多格里奥提出辞职，在盛怒之下，墨索里尼一定会毫不考虑地予以批准的。事实上，巴多格里奥不仅没提出辞职，而且根本不再对墨索里尼进言，使他对侵略希腊一事，三思而后行。

这样，墨索里尼如同往日所做的一样，无视所有的反对意见，受着一群喽罗的支持，冒然地发动了这场罪恶的、丢脸的战争。

希特勒听到墨索里尼“已经胜利地向希腊进军”的消息，不觉怒火冲天。他认为，这不是好时机，对一个顽强的敌人采取这样轻率的行动，会打乱他在巴尔干的计划。正像他在稍后写信给墨索里尼时所说的，“我赶往佛罗伦萨是希望能防止这个行动，但是我来得太晚了。”据在场的“元首”的翻译施密特博士说，这位纳粹领导人还是设法克制住了心头的怒火。施密特后来写道，希特勒那天下午回国时心中极为气愤。近一周来，他已失望了三次：一次在汉达伊，一次在蒙都瓦，这次是在佛罗伦萨。这些劳顿的长途旅行，是他气愤地责骂忘恩负义的不可靠的朋友、轴心伙伴和“骗人的法国人”时经常出现的话题。

说来话长，随着法西斯侵略战线的延长，反法西斯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希特勒实在感到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因此，想方设法在搜罗炮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和墨索里尼曾经帮助过的伙伴佛朗哥。但是这个奸诈的狐狸，却看风使舵，总不肯轻易下水。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的政策完全是“自私的和冷酷的”。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这位心肠毒辣的暴君，只想怎样使他的精血已枯的国家机器摆脱另一次战争。长期的内战使100万西班牙人丧生；贫困、高昂的物价和艰难的岁月使这座荒凉的半岛毫无生气。“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西班牙人再也不能轻易地卷入战火了”，这个独裁者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应付当时震撼全世界的巨大动荡的。

法兰西的突然沦陷和英国之可能崩溃或毁灭，使佛朗哥大为惊喜。在6月间，他曾表示，准备加入法西斯战胜者的行列，分享战利品。一则由于他的欲壑难填，再则由于他的老谋深算，他明白指出，西班牙的要求颇高。但是，这时希特勒觉得没有争取同盟者的必要。他也像佛朗哥一样，估计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之后，便可结束大的敌对行动，英国即将求和。因此，他对于马德里的这副积极拉拢的姿态并不怎么感兴趣。

到了8月，局势变了。英国将坚持战斗，而这场战争很可能是长期的。由于英国轻蔑地拒绝了希特勒7月19日的和平建议，于是，希特勒便开始寻求同盟者；他除了去找他过去曾经援助过，而最近又表示要同他站在一起的这位独裁者以外，还能找谁呢？但是，佛朗哥这时却提高了要价。8月8日，德国驻马德里大使告诉柏林，佛朗哥要求：首先保证将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包括奥兰在内，划归西班牙，并且要扩张西属非洲殖民地的某些领土。此外，还需要适当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因为西班牙的粮食只够食用8个月。最后，佛朗哥认为，要等到德国人在英国登陆以后，西班牙才能参战，“以免参战过早，战火拖延，使西班牙无法忍受，并且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危及现政权的根源”。

同时，佛朗哥又致函墨索里尼，重申他提出的要求，并请他给予支持。墨索里尼于8月25日回信，劝告这位总司令“不要置身于欧洲历史之外”。

9月份，看来大下列颠是能够抵御德国的空中攻势的。50艘美国驱逐舰的移交，在欧洲各国造成了极力深刻的印象，西班牙觉得，美国在逐步走向战争。因此，佛朗哥和西班牙便采取百般苛求的政策，并且明确指出，必须预先答应他们的要求。对此，德意两个法西斯头子进行了会商，他们一致同意，当时主要的目标是击败英国。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击败？何时击败？墨索里尼说，“要么，战争在春季以前结束，否则就要拖到明年”。他当时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因此，一定要有效地利用西班牙这一张牌。里宾特洛

甫认为，先同日本结盟，接着西班牙就宣战，这对英国将是一个新的沉重的打击。

当西班牙方面越来越表示冷淡，越来越贪得无厌的时候，希特勒争取他们支援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10月4日，为劝说西班牙参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再次举行会晤。他们认为佛朗哥要求太高，步调迟缓。如果答应西班牙的要求便可能产生两种直接的后果：英国占领加那利群岛上的西班牙基地；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加入戴高乐的运动。这样就会迫使轴心国家大大扩大它们作战的范围。因此，必须尽快把西班牙拉过来。为了说服佛朗哥，“元首”决定亲自出马。

10月23日，希特勒风尘仆仆地前往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汉达伊，同西班牙独裁者会晤。佛朗哥不但不因希特勒屈尊就驾感到满足，反而提出了“与他的实力极不相称的要求”。西班牙要求修订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属加塔落尼亚、阿尔及利亚由奥兰直到布兰科角的地方，还要求几乎整个的摩洛哥。会谈是通过译员进行的，历时9小时之久。双方仅仅达成了一项含糊其辞的议定书，为军事谈判进行了安排。后来，希特勒在佛罗伦萨对墨索里尼说：“我宁可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再进行这样的谈判！”这是希特勒碰到的第一鼻子灰。也是他感到“失望”的第一件事。

纳粹元首从汉达伊回国途中，约贝当元帅前往图尔附近的蒙都瓦去见他。这次会晤是赖伐尔安排的。希特勒和赖伐尔两人都想鼓励法国为击败英国出一臂之力。元帅和他左右的大多数人最初对此事大吃一惊。但是赖伐尔却把这次事先安排的会谈说得天花乱坠。这次会晤是10月24日下午在一个隧道附近的希特勒的装甲火车上进行的。“元首”说，“我很高兴同一位对这次战争没有责任的法国人握手”。双方就共同击败英国问题举行会谈。贝当承认合作的原则，但是解释说，他不能规定其范围。当时的会谈记录说，希特勒表示，他与意大利领袖一致，“决心要看到法国在新欧洲中占有它理应占有的地位”。在尽快击败英国这一点上，轴心国同法国有共同利益。他们承诺在同法国缔结和约时，为法国在非洲保留一块“基本上等于它目前拥有的”殖民地。

根据德方的记录，希特勒“非常失望”。连亲德的赖伐尔也祈求希特勒在法国的舆论未酝酿成熟以前，不要硬逼法国对英国作战。后来希特勒曾说赖伐尔是“一个卑鄙的民主主义的小政客”。据说，贝当元帅回到维希的时候曾说过：“讨论这个计划需要6个月，忘掉这个计划又需6个月。”但是，这场不光彩的交易，在法国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忘掉。这是第二件使希特勒“失望”的事。

希特勒第三件不高兴的事，就是意大利领袖也像“元首”惯常做的一样，背着盟友悍然发动对希腊的进攻。他对此又气又恼，但为了照顾双方的关系，还是克制住了。直到意大利的进攻受到挫折时，他在11月20日才写信给墨索里尼说，“当我请求同你在佛罗伦萨会晤的时候，我怀着这样的希望踏上征途：希望在你对希腊箭在弦上的行动任始以前阐明我的看法”。“但是，在我到达之前，你早已开始行动了”。

事后证明，墨索里尼“满怀信心”发动的这场入侵希腊的战役，是一次丢脸的行动。这是意大利在地中海、在非洲遭受失败的开始，虽说意大利舰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国和希腊，但是英国在地中海的实力也有显著的增长。9月间，英舰“英勇”号、装甲航空母舰“光辉”号和两艘拥有防空设

备的巡洋舰，安全地通过地中海，加入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亚历山大的舰队。在这以前，坎宁安的舰只的行踪经常被敌人发觉，并时常受到占优势的意大利空军的轰炸。配备了新式战斗机和最新式雷达设备的“光辉”号，击落了意大利一些侦察机和攻击机后，英国舰队的行踪就不易被发现了。为了增援希腊前线，英国参谋总部除了抽调几个空军中队、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和一些象征性的军队以外，再也拿不出什么来了；而且就连这些微不足道的兵力，也是从利比亚战场上急如星火的军事计划中忍痛缩减下来的。这时，丘吉尔首相突然想到了一项战略上的大事—克里特岛！“绝不能让意大利人拿去。我们必须先下手，而且马上下手”！丘吉尔认为，为了夺取这个战略要地，值得冒一次危险。

1940年10月29日，也就是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二天，丘吉尔给在苏丹喀土穆的英国陆军大臣艾登发了一个急电，电报说：“看来，最重要的是在苏达湾占有最好的飞机场和供应海军燃料的基地，成功地保卫克里特岛，对保卫埃及有莫大的帮助。克里特岛如丧失于意大利，将大大增加地中海的一切困难。这样大的战利品值得冒险，而且其价值几乎相当于在利比亚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势作战。同韦维尔和史末资将军全面研究这一问题后，务请毫不犹豫地提出大规模行动的建议，即使影响其他战区也在所不惜。”就这样，应希腊政府的请求，克里特岛最好的港口苏达湾，于两天之后被英军占领了。

11月2日，丘吉尔电告英国空军参谋长，令他速派四个轰炸机中队取道马耳他岛飞往克里特岛或希腊。人员和地勤物资则由巡洋舰运送。务必尽早使这些空军中队从希腊领土的基地出动，袭击墨索里尼在塔兰托的舰队，并且普遍地骚扰意大利南部。第二天，即11月3日，丘吉尔又电告艾登和中东司令部，向他们进一步阐明援助希腊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坐视希腊崩溃，不助一臂之力，这将对土耳其和战争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德国军队还没有出现在那里。必须使建立于克里特岛的燃料基地和飞机场逐步发展为永久性的作战要塞”。如果“我们在埃及按兵不动，兵力还日益增添，而对希腊的局势以及取决于它的一切，弃而不顾，那是不会有人感激我们的。丧失雅典，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丧失肯尼亚和喀土穆，我们并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墨索里尼的舰队对英军占领克里特岛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应。而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早就急欲利用他目前已经大为加强的舰队飞机，袭击停泊于塔兰托的主要基地的意大利舰队。这次袭击是在11月11日发动的，事前进行了一系列妥善配合的军事行动：部队到达了马耳他；另一批增援的舰只，其中包括“巴勒姆”号战舰、两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开到亚历山大港；最后，作为高潮，发动袭击。

塔兰托位于意大利的靴形半岛的后跟，与马耳他相距320英里。它的宽阔的港口层层设防，足以抵御所有现代化武器的攻击。英国有几架快速侦察机到了马耳他，因此能辨识他们所要袭击的目标。英国的计划是从“光辉”号出动两批飞机，第一批12架，第二批9架，其中有11架携带鱼雷，其余的或携带炸弹，或携带照明弹。夜幕降临不，“光辉”号就从距塔兰托170英里左右的海域派出了飞机。在意大利舰队一片人光和毁灭声中，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小时。尽管高射炮火炽烈，但英国飞机只有两架被击落，其余的都安全返回“光辉”号。

就打了这么一仗，便使地中海海军力量的对比顿时改观。空中拍摄的照片证明，意大利有 3 艘战舰、1 艘巡洋舰被击中，而且造船厂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此，墨索里尼的战舰，至少有一半在 6 个月不能恢复战斗力。恰好在这一天，意大利空军奉“领袖”之命，竟参加了对大不列颠的空袭，结果在途中有 13 架意大利战斗机被击落，从而为英国空军袭击培兰托一事，增添了一点含有讽刺意味的色彩。

意军之取道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使墨索里尼又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首次进攻的部队被击退，损失重大，而且希腊立即发动了反攻。在北部马其顿战区，希腊军队攻入阿尔巴尼亚，于 11 月 22 日进占科尔察。在平都斯山脉北部的中心战区，意大利的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在沿海地区，意军刚开始长驱直入，但又匆忙从卡拉马斯河撤退。在帕戈斯将军统率下，希腊军队在山地战中显示了高超的战术，他们出奇制胜，从两翼包抄敌人。到年末，他们英勇善战的结果，迫使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了 30 英里。

战争刚开始时，希腊的总兵力仅有 15 个师团，而其中的 12 个师团，是在入侵之后才接到动员命令，11 月 1 日，在希腊共产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希腊政府遂下令反击。经过一周激战，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被赶回阿尔巴尼亚领土。在埃皮鲁斯地区，主动权也转入希军手中。希腊军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奋起为民族解放而战，士气昂扬，把意大利侵略军打得狼狈不堪。11 月 7 日，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但墨索里尼一心梦想征服希腊。于是，又调兵遣将，在集结大量的侵略部队之后，又于 1941 年 1 月和 3 月发动两次大规模攻势，但都被英勇的希腊军队所击退。这时，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游击战正蓬勃发展，不断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法西斯军队受到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军民的前后夹攻，被打得十分狼狈。

希腊军队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劣于敌人，但他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英勇顽强，连续出击，他们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境内 5 公里的毕索德里，同时还包围了墨索里尼的精锐的阿尔卑斯“朱利亚”师团，造成了意大利军 20000 名的死伤、5000 名被俘的巨大损失。被希腊军的勇猛吓坏了的墨索里尼，恼羞成怒，对着怯懦无能的维斯孔蒂和雅科莫尼两个败将，辱骂不已。最后，维斯孔蒂被免掉了总司令官的职务，由威巴德·索杜接任。但后者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只有被动挨打，无力扭转战局。

墨索里尼本想旗开得胜，一举攻下希腊，借以提高身价，从而和希特勒可以平起平坐，不料希腊人的勇猛顽强，不屈不挠的抵抗，震撼了整个世界。相反，意大利侵略军却招致了无脸见人的败北，此种下吉利的战局给这位意大利独裁者带来了严重的忧虑和不安。正是：偷鸡不着折把米；扬威不成，反招懊丧气。

12 月 4 日，心情烦躁的墨索里尼把齐亚诺召进威尼斯宫，沮丧地说：“别无他途，看来我们不得不通过希特勒要求停战了。”

“这是不可能的。希腊将以要求元首亲自担保他们不再受到侵犯为先决条件。”这位驸马外长气呼呼地说：“我宁愿让子弹打穿脑袋，也不愿给里宾特洛甫打电话！”

齐亚诺力主打下去。他说：“严峻的逻辑告诉我，尚未全面崩溃之前，仍有可能在发罗拉设置桥头堡，并以新的兵力在斯库姆维尼河岸建立一道安全防线。现在，要紧的是顶住，坚守阿尔巴尼亚。时间会带来胜利，如果我

们放弃，那就一切都完了。”

墨索里尼听了这位驸马爷的劝告，忽然又打起了精神，决定继续增派兵力，调整前线指挥人员，重新发起进攻。但是，所有这些措施，仍未给他带来令人鼓舞的消息。

希特勒越想到墨索里尼对希腊的“轻举妄动”，心里就越气，认为这是一次不可挽回的大失败。他在给墨索里尼的信里，严厉指责了意大利的失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由于阁下的此举，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法国的贝当政府，越不想加入轴心国的阵营作战了。然而，却引起了苏联对巴尔干的关心。如此，势必在东方产生一种新的威胁。”希特勒进一步指出：“由于贵国进攻希腊，使梅塔克萨斯将军更加死心塌地地倾向于同盟国的阵营，英国也得以在希腊设置了海、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及意大利南部实施破坏轰炸。”

希特勒最后说：“这次行动对在埃及即将进行的沙漠作战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看情势，这场攻势必得延长到来年举行了。虽然我们老不愿意，但到了来年，势必得派遣军队到希腊帮你收拾残局。”

墨索里尼在反复读了希特勒的书信之后，痛苦地对齐亚诺说：“希特勒又在责怪我们，简直把我搞得不知所措了。”然而，他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卸给他无能的部下以及意大利士兵身上。

由于前线接连失利，这一阵子墨索里尼的情绪很坏。他时常发牢骚说：“我的时运多么不济啊，使唤的人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窝囊废；大凡每一个人，一生都有一次致命的失败，我是由于过度信赖维斯孔蒂·普拉斯卡将军，以致弄到这种狼狈的境地。”

墨索里尼决意非难陆军参谋总长巴多格里奥元帅，骂他是“背叛者”、“政权之敌”，借此把他搞掉。这是由于文化部长帕沃利尼的一次谈话引起的。这位部长把他与巴多格里奥交谈的内容，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墨索里尼。巴多格里奥如此说：“雅科莫尼和维斯孔蒂，固然要负起希腊问题的大部分责任。不过，必须被非难的另有其人。那就是墨索里尼统帅。墨索里尼不曾掌握过指挥权。既然他把所有的事情推给我们，我们却无法使他如意，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只好处罚担当责任的人了。”

听了这些话之后，墨索里尼已勃然大怒，驱逐“叛逆者”的心益切，终于接受了巴多格里奥的“辞呈”。这位法西斯独裁者起草的文件上说：“巴多格里奥因健康和年龄原因提出辞职。”齐亚诺说，这种提法与巴多格里奥的情况不符，但墨索里尼坚持己见。

墨索里尼任命古佐尼当作战部长兼副总参谋长。这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前线仍然吃紧，希腊的压力继续增加，最要紧的是意军的抵抗日益无力。若希腊人有足够力量突破意军防线，前景更加险恶。意大利军民人心惶惶，对前方战局十分担心。为了稳定民心，墨索里尼特意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详细介绍形势。会上，“领袖”宣读了一些文件。他本人对政治决定承担了责任，并就军事行动狠狠地批评了巴多格里奥。

会后，墨索里尼即召见卡瓦莱罗将军，这表明了他的意图。卡瓦莱罗是个“乐天派”。他不相信在阿尔巴尼亚会遭到失败，并对意大利有能力再举进攻信心十足。墨索里尼对他的观点很欣赏，当即任命他为总参谋长，代替巴多格里奥。

12月上旬，希腊军再度突入意军阵地的消息，经前线指挥部传到罗马。

墨索里尼甚为惊恐。齐亚诺说，他从未看见过墨索里尼如此落魄的样子。刚刚回到罗马的意驻德大使阿尔菲那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说“我未曾看到过他那种颓丧的样子。他的面孔呈青白色。不断地痉挛，表现得很悲哀，但却又故意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他几乎是神经质地用右手抚摸他的下巴，同时好像求人支持他的想法似的，老是把脸朝向我和齐亚诺”。

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又认为事态尚可挽救。于是把卡瓦莱罗派往前线，并命令他一定拼死顽抗，严守阵地。他说：“这是祖国的命令！”他还不时地对身边一些心腹发牢骚说：“如今我手下的一些将领都是饭桶！不是窝囊废，就是江湖骗子，没有一个人能为我扭转战局，这怎能让我相信他们！”

齐亚诺的日记记载了12月23日墨索里尼的表现，说“发现领袖对于星期六的撤退很气愤，这次的撤退与卡瓦莱罗的期望相反。对发罗拉的压力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大了。领袖再已不相信卡瓦莱罗的话了。他说：‘这些将军似乎成了乡下的客栈老板。他们在墙上画一只雄鸡，下面写着：房客要除帐，等这雄鸡唱。我也是这样，要我信赖军人，也要他们以实际行动证实局势已经改变。’在谈到我军的表现时，领袖又说：‘我必须承认，1914年的意大利军队比现在强得多。这并不是夸奖当时的制度，情况确实如此。’”

1940年的圣诞节.对法西斯匪徒们来说，是个难熬的圣诞节。外面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墨索里尼望着窗口，一愁莫展地说：“看来要扭转局势，只好求靠希特勒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章德意首脑会谈

为挽救局急会商，德意首脑费思量；
联合出兵行鬼道，烧杀掠夺丧天良。

事到如今，墨索里尼这位一贯傲然自视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虽不愿甘拜下风，但要扭转希腊战局，只好求助于希特勒了。自然，“元首”早已愿意充当征服巴尔干的主帅。1941年1月10日，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接见了德国大使，洽商两位首脑会晤的日期。双方确定，会谈于1月19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别墅举行。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

恰好，就在此时，意大利海军又传来捷报，在西西里海峡进行的海空战役打得很好，一艘英国航空母舰和两艘驱逐舰受创起火。眼下战事还在进行。墨索里尼说：“月色终于变了。出来了好月亮！”他还谈到必须经常把真情告诉民众，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提高士气，其次是为了取得民众的信赖。“民众必须知道生活是件严肃的事情，战争则是生活中最严肃的事情”。

墨索里尼认为时来运转，一时心血来潮，又要发动新的进攻了。他急急忙忙跑到总参谋部，要与卡瓦莱罗讨论反击计划，但一涉及计划的细节时。又感到颓然万分了。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决定再派两个师开往希腊，展开新的攻势。虽则如此，连号称乐大派的卡瓦莱罗也没有信心能够扭转战局。

一连几天，又是失败、退却，墨索里尼所盼望的好消息迟迟没有到来，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他以悲凄的语调说：“从政治方面来说，希腊可以说是我们俎上的一块肉，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在使希腊孤立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只好铤而走险，孤身战斗。只是意大利军队使我们泄气万分，他们完全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期待。”

随着与希特勒会晤日期的逼近，墨索里尼的意志消沉，日复严重。因为下一次，他势必以“明显低下的地位”来参与“元首”的会晤。墨索里尼一心期待着前线的佳音捷报，于是把会谈的日期推迟了两次。然而，延期总是有限度的。会谈的日期终于来临了。1941年1月18日，墨索里尼又被意大利军后退的消息轰得头脑发胀。数日之前，两个意大利的新的精锐师团，虽然在克里索拉展开了反击，但却遇到希腊军队的强烈抵抗。意军死伤惨重，失却的地区多于掠夺的土地，就连光荣的“鲁比·帝·托斯卡纳”师团也无法建立功勋了。“领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会见希特勒的。忧愁、烦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

1月18日，陪同“领袖”前往的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上火车时，眉头紧皱，神情紧张。阿尔巴尼亚的消息使他震动。没有什么大过于戏剧性的事，不过是我们又一次受到侮辱，被敌军俘去很多人。严重的是涉及‘托斯卡纳之狼’这个赫赫有名和具有伟大传统的师。它刚在阿尔巴尼亚登陆，我们曾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一切，领袖都一一详谈了。他反复谈到他对军队和意大利民众感到悲观。他未能对此作详细解释。他不断重复说，‘如果有人能在10月15日就预言到后来果真发生的事情，我早就把他枪毙了’。然后，他转了话题。他读了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名为《罗马的樱桃树》这一喜剧，他觉得很有趣。喜剧的题材是写卢库卢斯，并证明即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可以有细腻的鉴赏力的，也可以喜爱舒适的生活。墨索里尼把这个喜剧的成功，归于它暗含的政治讽刺情调，而这种讽刺逃过了纳粹的审查。”

“领袖还一再谈他的处世格言，”齐亚诺继续写道，“大意是说，德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爱吃喝玩乐。他还说，当他有时间享乐时，他也要纵情享乐一番。”

这次随同墨索里尼前往的，除了外长齐亚诺外，还有副总参谋长阿尔弗雷陀·古佐尼，此人是个大腹便便、头戴染色假发的庸才。齐亚诺认为，把这个人带到德国人面前，肯定是丢脸的。

当墨索里尼一行所乘的火车抵达普赫车站时，希特勒和他的外长里宾特洛甫，穿着长的皮外套，把帽子戴到耳朵下面，已在冰天雪地等候着墨索里尼。“领袖”缓慢地走下火车，朝着希特勒移动着脚步，他的面孔硬绷绷的，犹如一块冻肉。两个人默默地握着手，以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对方。然后由希特勒先开口：“欢迎！欢迎！”墨索里尼强堆起笑容，面孔的紧张劲儿稍见缓和了些。意大利代表团到此方才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不仅显示出了他对墨索里尼的谅解，而且甚至表露了亲切之情。然而，对“领袖”来说，“元首”的这种亲切的态度，有如非难一般，委实叫他难以忍受。

墨索里尼把希特勒的这种态度解释为“硬要人家领情”，因而在他内心里作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绝不接受德国自愿提供的任何援助。当会谈快开始之前，意大利大使阿尔菲那里把墨索里尼拉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耳语说：“看样子希特勒会很乐意接受任何援助的要求，‘想不到墨索里尼严厉地打断了他的话，大嚷着说：‘我不会要求他什么的！’”

即使墨索里尼不好开口提什么要求，然而希特勒的话可多着哩！他面对坐在椅子上的墨索里尼，发挥了他身为“大战略家”的才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墨索里尼只是冷冰冰地听着，很少插话。而他的随从古佐尼副总参谋长却显得十分活跃。这个大腹便便的小人物，戴着假发，摇尾乞怜，对于希特勒的口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唯独墨索里尼硬是不公开承认希特勒具有“天生的才能”，因为他的嫉妒心几乎使他发狂了。

为了打破会谈的沉闷气氛，“元首”一开始就表示了主动。他的态度“既客气，又热诚”，丝毫没有当众责备意大利在战场上的可悲表现。第二天，希特勒又花了两个多小时，向他的意大利客人和两国的一些高级将领作了讲话。据约德尔将军写的关于这次讲话的一项秘密报告证实，虽然“元首”急于想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帮助意大利人，但是他的主要矛头仍指向苏联。希特勒说：“即使美国参战，我认为它也不会形成很大的危险。大得多的危险是俄国这个大家伙。虽然我们同俄国签订非常有利的军事和经济协定，但我宁愿依靠我所拥有的强有力的手段。”

至于希腊，双方会谈时希特勒坦率地指出，意大利在那里的进攻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并且不幸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不过，他向墨索里尼表示，德国一定帮助他的盟友共同对付这个危险。为了扭转战局，希特勒命令德国参谋总部立即制定计划，开始至少用10个师的兵力通过保加利亚入侵希腊，这10个师将首先派往罗马尼亚，随后还要继续增加。“元首”决心在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之前，彻底解决巴尔干半岛的问题。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的东南部，西临亚德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东濒黑海和爱琴海，地势险要，资源丰富，素为列强争夺之地，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如果占领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便可控制东地中海，进而夺取英国在近东和北非的殖民地，也可封锁苏联的黑海出口，建立进攻苏联的南方战略

基地。

在会谈时，墨索里尼将意大利最新的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包括意大利国王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过，他强调说明，这种态度并未影响别人。最后还谈到巴多格里奥事件。总的来说，“领袖”对这次会谈表示满意，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希特勒强烈的反俄情绪；美中不足的是，对今后怎样对付大不列颠的态度不太明确。不过，他意识到，已不准备在英国登陆了。希特勒特意解释说：此举非常困难，如果第一次失败，以后就不能再干了。“英国现在已害怕德国人这支装上了子弹的手枪；而我们如果登陆失败，英国人就会明白德国人手里握着的只是一支空枪了”。

最后，双方言定，轴心国绝对团结一致，应在巴尔干半岛共同前进。至此，会谈“胜利结束”。回国之后，墨索里尼就着手组织新的反击，他抽调了7个意大利师团，在160架轰炸机和159架战斗机的支援下，在长达32公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领袖”一心想在德国介入之前获得胜利，结果还是无法得逞。

开战以来，墨索里尼深深感到整个机器运转不灵，有些问题积重难返。军队与军队之间，军队与政府之间，甚至内阁成员之间，互相扯皮，不是协作，而是拆台，实在不能适应当今的战争形势。为了改变这种颓废的官僚习气，墨索里尼决定走出威尼斯宫，直接与官员们一道工作；让部长们都离开首都，到前线去体验一段生活，齐亚诺外长首先报名到空军去服务。这一决定，在政府高级官员的圈子中，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有的部长竟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由领袖发动的政变，以便摆脱法西斯主义，而把他的依靠寄托在别的潮流上”。

1月25日，外长向领袖告别。明天晚上，齐亚诺将离开罗马参加在巴厘的空军大队。“领袖”对他未来表现出应有的热情。近日来，墨索里尼开始觉察到把部长们送出罗马的命令未获公众的支持。如同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决定就更为强硬，讲话也更加粗暴。

中午，齐亚诺见到岳母——墨索里尼之妻拉凯莱夫人。事态的发展使她惊慌万分。由于她头脑简单，不了解大局，听信流言和墨索里尼的鬼话，分辨不出真伪。反正她认为晴雨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并断言每件事和每个人都会找她的丈夫“领袖”扯皮。她说，她爱猎取的“燕八哥已经飞离了托隆尼亚别墅的松林，随风朝萨沃亚别墅（国王的别墅）的丛林中飞去了”。

齐亚诺和家人暂时离别，感到依依不舍；但使他更加忧虑的是当前的形势。这位年轻的法西斯外长说：“所有被迫参加志愿队的同志都有这种感受。许多同志并不掩饰他们的心情。”

前线的接连失利，严重动摇了军民的士气。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对外进行侵略战争，国内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要进行一次大的洗涤，”墨索里尼对齐亚诺说，“要干得彻底，至少需要一个星期。”这就是说，墨索里尼至少要用一周多的时间进行大清洗了。他审阅了“在最近几周内因为人和职业方面缺乏价值而被撤换的将军和上校的名单”。他由此作出对军队及其人事所进行的严格鉴定。接着，他在法西斯中央执委会议上提出一项议事日程，得到一致通过。议程最后的措词是颇有意思的：向意大利群众——“无产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呼吁。“敌对而抱怨的中产阶级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齐亚诺说，“中产阶级不了解墨索里尼，没有觉察到，他吃得苦头，也藏得住深怨大恨。如果他得胜——其实可以说当他得胜的时候——捣

蛋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同这位来自罗马的老社会主义者打交道了。”

按照墨索里尼的指示，新任总参谋长卡瓦莱罗确定在阿尔巴尼亚前线马上发动进攻。这次进攻，即便是局部的，或很有限度的，但对日益丧失人心的意大利法西斯来说，却具有鼓舞士气的作用。

然而，在德国方面，希特勒早已暗自决定：如果“巴已罗萨”计划能够在春天开始，那首先必须把巴尔干半岛的南翼掌握在于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1941年2月的第三周，德国人已在罗马尼亚集结了一支68万人的大军。但是在南面，希腊人仍然使意大利人不能越过雷他一步。希特勒担心，盟国可能在萨洛尼卡以北形成一条战线，对于德国来说，这条战线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遇到的问题更加麻烦，因为它将使英国人得到一个基地，从那里派飞机去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此外，这条战线还将危及“巴已罗萨”计划。事实上，柏林方面早已在1940年12月就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当时希特勒曾发布了关于“马丽他计划”的第一道指令，规定德国集结在罗马尼亚的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大举进攻希腊。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对准是胜利者没有看准而吃了很大的亏。如今它们又打错了算盘。保加利亚政府相信了希特勒所谓他已经打赢这场战争的保证，并对得到南边的希腊领土而获得一条通向爱琴海的通道的前景感到眼花缭乱，因此它同意参加“马丽他行动”，保证允许德军过境。德方李斯特陆军元帅和保加利亚的陆军参谋总部，在1941年2月8日秘密达成了一项大意如此的协定。2月28日晚上，30万德国大军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三国条约，成了希特勒的小伙伴。

对于强悍的南斯拉夫，希特勒企图强迫它参加德、意、日三国同盟，把它绑在法西斯战车上。纳粹分子通过南斯拉夫国内“第五纵队”的积极活动和不断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南斯拉夫就范。1941年2月，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外相马尔科维奇应召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去会见了希特勒；3月5日，南摄政王保罗亲王又赴德国进行谈判。德国法西斯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终于在1941年3月25日迫使南斯拉夫首相和外相前往维也纳，在德、意、日、保、匈、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们的参加之下，正式签署了关于南斯拉夫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议定书。为了帮助南斯拉夫统治集团掩盖这一卖国行径的真相，纳粹政府佯称：“将永远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不可侵犯”；轴心国政府“将不要求南斯拉夫允许它们的军队通过南国领土”。然而，法西斯分子的这些花言巧语骗不了热爱祖国的南斯拉夫人民。在茨维特科维奇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南斯拉夫人民群情愤慨，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许多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游行示威。以空军司令社顺·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一批军官，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法西斯情绪，于3月26日夜发动政变，推翻了旧政府，把摄政王保罗和内阁成员驱逐出境。17岁的王子彼得二世宣誓即位，西莫维奇将军受命组织新政府。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决心踏平这个不驯服的国家。3月27日半夜，他急电墨索里尼，要求他必须用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之间的重要关口，增援他在意大利南斯拉夫战线上的军队。他在电报中说：

领袖，情况迫使我用这个最快的办法，把我对局势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的估计告诉你。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南斯拉夫在同希腊的争端中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此，我尽了一切努力，使南斯拉夫参加我们的大家庭……不幸，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今天的消息使人毫不怀疑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马上就要改变。

因此，我已在军事上安排了一切必要的措施。现在我真挚地要求你，领袖，在今后几天不要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我认为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最重要的关口……我还认为，领袖，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极其迅速地增援你在意大利—南斯拉夫战线上的军队。

我还认为，领袖，对我们所采取的和下令要采取的一切行动，应该严守秘密。这些措施如果为人所知，就会毫无价值。领袖，如果你能保守秘密，那么我毫不怀疑，我们两人就可取得不下一年前在挪威所取得的那种成就。这是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就这样，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墨索里尼前后抽调了43个意大利师在巴尔干各地和德国纳粹军队协同作战。贝尔格莱德被夷为平地。戈林的轰炸机在这个南国首都掠过房顶，低飞肆虐，炸死17000平民，炸伤的人更多，使该市成为硝烟弥漫的一堆瓦砾。南斯拉夫陆军参谋总部，由于缺乏精神准备，没有认真地动员他们的军队，他们被打垮了。4月13日，德国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贝尔格莱德。17日，南斯拉夫陆军的残余部队在萨腊耶伏投降，国王和首用乘飞机逃到了希腊。但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6个月的战斗中，曾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由15个师组成的纳粹第十二军团，其中4个师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了大约4个师，共53000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中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4月23日向德国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投降了。4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卐字旗。到4月底，在三周内，除克里特岛之外都被占领了。

墨索里尼在整个冬天遭到惨败的地方，希特勒在春天的几天之内就取得了成功。虽然墨索里尼摆脱了困境而感到宽慰，但是他丢了脸，因为全靠德国人才使他摆脱困境的。希特勒现在开始瓜分南斯拉夫了。而墨索里尼得到的一份是使他失望的。欲知德、意、法西斯肢解巴尔干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三章肢解巴尔干

强盗结盟为掠夺，分赃不均争吵多；
尔虞我诈狗咬狗，巴尔干岛被分割。

随着德、意征服南斯拉夫和侵占希腊大陆之后，在法西斯集团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和掠夺战利品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了。正如墨索里尼所说的：“希特勒这个恶棍，把肥肉都抢光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小堆骨头了。”

早在“被蝗虫吃光的年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法西斯强盗，就存有染指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当时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曾发表关于维护奥地利独立的联合宣言。那时，墨索里尼就狂妄地提出：“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

为了实现他的誓言，同年3月17日，意大利同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到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奥国政府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成一个报告，送到罗马，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纳粹元首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帽，从飞机上走下来，走向排列整齐、穿着法西斯制服的人群。率领欢迎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意大利领袖看到这位“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恭维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性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元首”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领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样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会谈的一个收获是，他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奥地利压力的若干保证。

后来，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张中，需要互相支持、相互配合。但是，在争夺巴尔干问题上却存在不少矛盾，尤其表现在南斯拉夫问题上。

南斯拉夫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4年10月，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在马赛遇刺身亡后，这个国家就进入了分崩离析的时期，独立地位下降。法西斯意大利在政治上对它所抱的敌对态度，以及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势力的侵入，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在国内，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互相敌视，内部已失去稳定，遂使这个巴尔干的大国力量消耗殆尽。在保罗辛王的摄政下，南斯拉夫王国的声威日益下降。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麦契克博士，坚持推行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合作的政策。克罗地亚人中的分裂分子在墨索里尼的保护下，从海外基地策划使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在多方的压力下，贝尔格莱德政府不再同巴尔干小协约国合作，以便奉行它同轴心国取得谅解的“现实”政策。

新任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他的外交大臣马科维奇，想要安抚正在膨胀中的新轴心国势力。1939年8月，他同克罗地亚人达成协议，于是麦契克参加了贝尔格莱德政府。国内的亲法西斯势力蠢蠢欲动。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威胁利诱之下，1940年8月，在维也纳会议上，强行把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

引自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一个生动的比喻。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却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此语原出自《圣经》一书。

牙利。法西斯轴心国对南

斯拉夫撒下的罗网正在收紧。1940年11月，马科维奇首次秘密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访问。德、意虽对他进行威胁，但他设法脱身离夫，没有正式签订对轴心国承担义务的协定。

在这些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日子里，英、美对巴尔干的形势十分关心。1941年1月底，罗斯福总统的朋友多诺万上校，奉美国政府之命，到贝尔格莱德探听、了解南欧的舆情，这时人人自危，大臣们和主要的政界人物都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保罗亲王谢绝了英国外交大臣提出的对南斯拉夫的访问。在武装部队的军官团中，只有西莫维奇是代表民族主义分子的重要人物。他的空军司令部设在与贝尔格莱德隔河相对的泽蒙，从12月起，这里就成为反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侵入巴尔干、反对南斯拉夫政府依附轴心的秘密中心了。

2月14日，茨维特科维奇和马科维奇应召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他们一同倾听了希特勒关于“胜利的进军”的讲话。希特勒提议，如果南斯拉夫依附三国同盟条约，那么，在对希腊发动军事行动时，将不假道南斯拉夫进军，而仅仅使用它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军用品。这两个大臣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贝尔格莱德。当时的情况是，加入轴心国就可能触怒塞尔维亚人；对德、意作战则可能在克罗地亚引起有关“效忠”的矛盾。在巴尔干半岛上可能是惟一盟国的希腊，正与墨索里尼的20多万法西斯大军激战，而且受到德国即将进攻的威胁。英国的援助似乎靠不住，最多不过是象征性的。希特勒为了促使南斯拉夫政府就范，已着手对南斯拉夫进行战略上的包围。3月1日，保加利亚依附了三国同盟条约，当晚，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抵塞尔维亚边境。那时，南斯拉夫为了避免挑衅，依然没有动员它的军队。现已到了抉择的时刻了。

3月4日，保罗亲王秘密访问了贝希特斯加登。他在纳粹的强大压力下，口头上答应南斯拉夫将步保加利亚的后尘。他回国以后，在一次王室会议和同军政首脑分别举行的谈话中，发现有反对意见。辩论异常激烈。持反对意见的西莫维奇将军，应召到保罗亲王可以俯瞰贝尔格莱德的山上白宫；他力主塞尔维亚不能接受这样的决策，而且这会危及王朝。但是，屈膝于法西斯脚下的保罗亲王，已经使他的国家实际上承担了义务。

在此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想方设法鼓励南斯拉夫抵抗德、意。3月22日，他致电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阐明利害，指出：“如果南斯拉夫自愿落得罗马尼亚的下场，或者甘犯保加利亚的罪行，成为蓄意危害希腊的同谋者，那么它肯定会遭到万劫不复的毁灭。”但是，南斯拉夫政府未接受忠告，在3月20日夜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依附三国同盟条约。三位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辞职。茨维特科维奇和马科维奇于3月24日秘密离开贝尔格莱德，从郊区的一个火车站登上开往维也纳的火车。第二天，他们就在维也纳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这一消息在贝尔格莱德广播后，大祸即将临头的风言传遍了贝尔格莱德的大街小巷。

数月以来，西莫维奇身边的少数军官一直在讨论，如果政府向德国投降，便采取直接行动。他们缜密地制定了一个政变行动计划。起义首领是南斯拉夫空军司令博拉·米尔科维奇将军，协助他的几百名爱国人士中有一位是陆军军官克尼兹维奇少校和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是位教授，借助于自己在塞尔维亚民主党里的地位，同各方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知道这一计划的人只限于少数可靠的军官。联络网从贝尔格莱德伸展到全国的主要驻防地点，如萨

格勒布、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等地。起义者在贝尔格莱德掌握的部队计有：王室近卫军两个团，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一个营，在王宫值勤的一连宪兵，首都高炮师的部分人员，一些士官学校和某些炮兵以及工兵部队的人员。

3月26日，在贝尔格莱德传开了关于南斯拉夫首相等人自维也纳归来和签订协定的消息。这时，政变指挥部发出信号，要在3月27日黎明以前夺取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地点和王室府第。当军队在果敢的军官们指挥之下，封闭位于首都郊区的王宫时，保罗亲王已在开往萨格勒布的火车中。这次政变没有流血，某些高级军官被逮捕。茨维特科维奇被警察带到西莫维奇的司令部，被迫提出辞职书。保罗亲王也被勒令回到首都。然后，他同其他两位摄政同时在退位书上签了字。他获准于当夜同他的家属一起去了希腊。

这一计划是由一部分秘密结合起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军官们制定和执行的，他们的心情和公众的舆论情绪是一致的。他们的行动使公众热情奔放。贝尔格莱德的街头，立刻挤满了塞尔维亚人，反复地呼唤着：“宁要战争，不要协定；宁愿死亡，不作奴隶！”广场上，英勇无畏而手无寸铁的群众，洋溢着同仇敌汽的情绪，高唱塞尔维亚国歌。德国公使受到怒斥，群众向他的汽车吐唾沫。这个长期处于倒行逆施的统治之下、惟恐遭人陷害的民族，现在却在暴君和征服者势力最盛的时刻，起来进行英勇无畏的反抗了。

南斯拉夫的武装政变和群众的反对，犹如晴天霹雳，使希特勒大为震怒。27日早晨，希特勒召见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向他们讲述了这次剧变后南斯拉夫的局势。他说，在即将对希腊的军事行动中，南斯拉夫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因素，而且在以后对俄国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中，它甚至更靠不住。他指出，在发动“巴巴罗萨”以前，“南斯拉夫人暴露了他们的本性，这是一件大幸事”。

希特勒决心在军事上摧毁南斯拉夫，并使它不复成为一个国家实体。“不必进行外交上的探询，也不必送交最后通牒。对于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的保证当予注意，但这些保证在将来是无论如何不足信赖的。只要军队准备好，便立刻开始进攻。”希特勒喋喋不休他说，“从政治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的打击应该残酷无情，并以闪电战从军事上去摧毁它。这样便可以充分地威慑住土耳其，并在以后进攻希腊时也可起到有利的影响。”

德国元首要求意大利、匈牙利，并在某些方面要求保加利亚，在进攻南斯拉夫时提供实际的军事支援。罗马尼亚的主要任务是“防御俄国”。此事已经通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大使，并于当日致电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希特勒认为，对南斯拉夫战争将会受到轴心国大小喽罗的支持。因为，他决心要肢解这个国家，意大利将获得亚得里亚海沿岸，匈牙利获得巴纳特地区，保加利亚获得马其顿。

希特勒布置就绪后，就于当天发表了入侵南斯拉夫的“第二十五号指令”。他的意图是，采取从阜姆和索非亚地区向贝尔格莱德和更南的地区进行强力突破的方法，进入南斯拉夫，其目的在于使南斯拉夫军队遭到决定性的挫败，使南斯拉夫南部同其他地区隔绝。希特勒担心德国的最大危险是盟国从背后进攻意大利军队。因此要求墨索里尼提供大量的军队支持这一行动，以保证战争的胜利进行。

德、意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的关系。立刻直接受到影响的是匈牙利。自从慕尼黑会议起，匈牙利就追随德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而取得“外交胜利”，并扩张它在1920年后的边

疆，同时在国际范围内则力求维持“中立地位”。如今，希特勒要求匈牙利总理泰来基伯爵，必须撕毁他亲手签订的《匈南友好协定》，保证德、意大部分武装假道匈牙利进攻南斯拉夫。希特勒还以割让南斯拉夫一部分领土作为诱饵。正在泰来基左右为难之际，匈牙利总参谋部从他手中夺去了处理国事的主动权。总参谋长韦特将军是德国血统，他已背着匈牙利政府同德国最高统帅部作出了安排。

泰来基得知情况后，立即指责韦特将军的行为是叛国。1941年4月2日晚，他收到英国外交部声明，“如果匈牙利参加德国对南斯拉夫的任何行动，它就必须预期大不列颠即将对它宣战。”因此，匈牙利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徒然反抗德国军队过境，或者公然站在轴心国一边出卖南斯拉夫。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下，泰来基总理于当晚9点自杀了。

南斯拉夫悲剧的元凶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但是，软弱无能、袖手观望的南斯拉夫政府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在大难临头之时，仍然无动于衷。他们既不发动群众，又不动员军队，而是坐以待毙，任人宰割。他们坐失了大好机会，那就是：没有对驻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的后方予以致命的打击。如果他们及时行动，便可能在军事上完成一件大事，将有助于打乱德、意法西斯的军事部署。

4月6日清晨，德、意轰炸机出现于贝尔格莱德的上空。它们从罗马尼亚被占领的飞机场起飞，对南斯拉夫首都进行毁灭性的轮番轰炸达三天之久。它们擦着屋顶飞行，残酷无情地摧毁了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市民横尸街头。一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惩罚”过去之后，4月13日德军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在这之前，国王、大臣和将军们，带着国库中的黄金，纷纷乘飞机逃亡国外，4月17日，南斯拉夫军队大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转入山林，打起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旗号。但实际上，这部分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根本不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而是保全和扩大实力，妄图在战后恢复剥削阶级的统治。在战争期间，他们经常袭击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队，成为危害极大的内部敌人。

在德、意法西斯军队击败南斯拉夫之后，纳粹军队奉“元首”之命大肆抢劫，重要的物资和战利品都运回德国去了。希特勒取得了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统辖，占领了南斯拉夫最重要的部位，剩下的某些边缘地带则分给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小喽罗了。因此，在轴心集团内部就引起了讨价还价的狗咬狗的争吵。

随着法西斯在南斯拉夫、希腊取得的胜利，希特勒更加头脑发热，飘飘然了。他5月4日在德国国会发表了演说，对丘吉尔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是历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战略家，”纳粹元首说，“五年多来，这个人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追逐，寻求他能够放火焚烧的东西。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糟糕的政客：作为一个政客，他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军人。丘吉尔先生的天才就是善于装成一副虔诚的样子说谎，歪曲事实，直到最后把惨收说成是光荣的胜利。丘吉尔对战略是一窍不通的，因此他马上就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战场上吃了败仗。在其他任何国家，他都会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他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只能表明他患了瘫痪病，或者表明他是一个说胡话的醉汉了。”

“元首”对于丘吉尔的这些挖苦、讽刺，连“领袖”也是不以为然的。墨索里尼说：“如果说丘吉尔是个糟糕的政客的话，希特勒就是一个十足的

流氓加恶棍了。”近来这位意大利领袖心事重重。5月6日，他和齐亚诺坐在前往蒙法尔科内的火车上，陷入了沉思。他翻来复去地考虑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希望战争速战速决，不要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他希望侵略扩张，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啊！如今希腊大陆在德军的参与占领下算是被征服了，然而在克里特岛、在非洲、在地中海仍在进行着激战，前景如何，他实在不敢多想。现在他已开始感觉到，和纳粹元首绑在一个战车上日子是不好过的。欲知克里特岛的激战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章激战克里特岛

一波未平又一波，克里特岛激战多；
海陆空军齐出动，英雄鲜血染山河。

虽说雅典城里挂起了白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武力占领了希腊大陆，但是在爱琴海和克里特岛，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双方不仅动用了大批陆军，而且出动了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在克里特岛上，进行着海、陆、空的立体战，演出了希腊战役史上最壮烈、最紧张的一幕。

早在 1941 年 3 月底的时候，盟国方面就已明显地看出，墨索里尼的舰队即将向爱琴海大规模出动。英国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暂时让他的运输船队避开，而他自己则于 3 月 27 日薄暮乘“沃斯派特”号，并率同战舰“英勇”号与“巴勒姆”号、航空母舰“可畏”号和驱逐舰 9 艘驶离亚历山大港。28 日黎明，从“可畏”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报告说，意大利巡洋舰 4 艘和驱逐舰 6 艘正向东南方驶去。英军舰队赶上前去，进行攻击。在墨索里尼这支舰队中，有 3 艘装有 8 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而所有英国的巡洋舰装的是 6 英寸的大炮。经半小时的不分胜负的战斗后，意舰退去，英国巡洋舰尾追不舍。两小时后，又发现意大利的战列舰“维多利奥·威尼托”号；从“可畏”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队战斗机袭击了这艘意大利战列舰；该舰受创后，立即向西北退去。晚间又发动第三次袭击，击中意大利重巡洋舰“波拉”号。该舰退出战斗序列，停泊下来。

入夜，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让驱逐舰出击，并甘冒用主力舰队进行夜战的危险。以求击毁受伤的意大利战列舰和巡洋舰，不让他们驶入从本国海岸基地起飞的飞机的掩护范围以内。在黑暗中行驶时，他出敌不意地向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发动了袭击。这两舰是驰援“波拉”号的“阜姆”号和“扎拉”号。它们都有 8 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近距离内，“阜姆”号立即被“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舰大炮偏舷齐射的炮火所压倒，并被击沉。“扎拉”号受到英 3 艘战列舰的围攻，旋即在熊熊的大火中烧毁了。经过这次战斗，墨索里尼不敢再轻易向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挑战。

在这次海战之前，盟国的陆军就已陆续抵达希腊进行支援，开往希腊的派遣军包括英国第一装甲师、新西兰旅和第六澳大利亚师。这些部队都是用中东其他部队的武器而充分装备起来的。接着开赴希腊的有波兰旅和第七澳大利亚师。部队从 3 月 5 日起开始行动。计划要据守自阿利阿克蒙河口起，经佛里亚埃德萨直达南斯拉夫边境的阿利阿克蒙防线。盟军将与部署在这条战线上的希腊军协同作战，当时大部分希腊军队，约计 15 个师，正在阿尔巴尼亚。他们击退了墨索里尼于 3 月 9 日发动的一次攻势。其余的希腊军队，计有 3 个师与边防军，则在马其顿，帕普哥斯将军不肯把它们撤回。等德军进攻时，盟军抵抗了四天后被击溃。随后开去的希腊第十九摩托化师也被歼。

英国驻在希腊的空军，在 3 月间只有 7 个中队 80 架作战飞机，而且由于缺乏降落场地以及信号联络欠佳，行动大受影响，虽然在 4 月间派去少数增援飞机，皇家空军在数量上还是远远不及敌人。其中的两个中队在阿尔巴尼亚前线作战；其余的 5 个中队，在由埃及调来从事夜战的两个“惠灵顿”式轰炸机中队的支援下，必须应付所有其他的作战需要。而同它们相对阵的是一支拥有 800 余架作战飞机的德、意空军。

1 月 6 日凌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联合进攻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对比

雷埃夫斯港发动了猛烈的空袭。英派遣军的运输船队正在该港卸货。停泊在该港码头的英国船“弗雷泽氏族”号上载有烈性炸药 200 吨，这只船发生爆炸，几乎完全毁坏了这个港口。单单这次空袭，就使英国和希腊损失船舶 11 艘。从此以后，盟军便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空袭下继续从海路维持军队的给养，而对于敌人的空袭竟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海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墨索里尼在罗得岛的空军基地，但是当时盟军抽调不出充足的兵力来执行这一任务，幸好最近马塔潘角海面战役，已给了意大利舰队一个教训，使它们在年内不敢轻举妄动。在这一时期，如果墨索里尼的海军积极参与战斗，将使英国海军根本无法在希腊执行任务。

4 月 17 日南斯拉夫的投降，使希腊人的希望顿成泡影。丘吉尔所力促采取的联合行动失败了，局势险恶已极。其后的几天，是具有决定性的日子。梅塔克萨斯逝世后继任首相的科里西斯，自感无力挽救祖国于危亡，同匈牙利的总理泰来基伯爵一样，他决心以死自赎，在 18 日自杀了。这样一来，局面更加混乱。

向德摩比勒退却，是一次很困难的军事行动，因为法西斯军队已经封锁了坦波谷、奥林匹斯山口以及其他地点，而盟国所有的部队必须通过狭窄瓶口的拉里萨。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第五新西兰旅和澳大利亚旅，在这里坚守了三天，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作出了重大牺牲，终于保证了后撤任务的完成。

4 月 24 日，希腊政府投降。现在英军又面临另一次在 1940 年曾遇到过的海上撤退。在一般情况下，从希腊有组织地撤退 50000 余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普里德姆·威佩尔海军中将和贝利·格罗曼海军少将会同陆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英国海军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敦刻尔克战役中，制空权总的来说，是操在英国人手里的；而在希腊，却是德国人完全地、绝对地控制着天空。因此。他们可以对港口和撤退中的军队进行几乎连续不断的袭击。军队显然只能在夜间登船，而且在白天，军队在海滩附近必须避免被敌机发现。丘吉尔说，这是挪威纳姆索斯一幕的重演，但其规模则大了十倍。

撤退工作连续进行了 5 夜，一共安全救出 50662 人，其中包括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和数千名塞浦路斯人，巴勒斯坦人、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原来派往希腊部队人数的 80%。这些成果应完全归功于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商船队海员们的果敢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他们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英勇顽强，毫不畏缩。从 4 月 21 日到撤退结束时止，他们在敌人的空袭中，丧失船舶 26 艘，其中 21 艘是希腊的船只，并且包括 5 艘医疗救护船。其余的是英国与荷兰的船只，英国空军配合从克里特岛出动的一支海军航空队，力图减轻撤退的困难，但因敌机占压倒优势，无能为力。虽然如此，从 10 月起就被派往希腊的为数极少的空军中队却战绩卓著。他们击毁敌机 231 架，虽然自己也损失飞机 209 架，但他们是顽强的战斗的。

希腊人民虽然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是英勇不屈的。在 4 月间，他们在双方实力悬殊下进行的 3 个星期的战斗，是他们对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进行 5 个月的苦战中最艰苦的一段，而他们在对意作战中几乎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有生力量，10 月间，他们突然受到兵力至少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进攻，他们最初击退意大利侵略者，随后又在反攻中追击敌军 40 英里，把敌军赶回阿尔巴尼亚境内，整个严冬，他们在山区同人数较多、装备较好的敌军短兵相接。驻

守在西北部的希腊军队，既没有运输工具，又没有公路，无法进行快速行军，以便在最后的时刻对抗德军从其侧翼和后方发动新的强大的新攻势。它的实力几乎在一场保卫祖国的长期战斗中消耗殆尽了。他们虽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却依然闪耀着光芒，鼓舞着欧洲人民奋力反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在希腊战役的重心转至克里特岛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他鼓励人民切忌悲观失望、惊慌失措，而要英勇顽强，继续进行斗争。最后，他朗诵了罗斯福总统亲笔写给他的朗弗罗的诗句：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时，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征服希腊后，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最后的立足之地，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所。德、意法西斯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岛屿。对于盟国说来，它是埃及和马耳他岛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据点；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来，克里特岛是扎在他们喉咙中的一根刺。因此，保卫和夺取克里特岛的斗争，就成为两军在东地中海斗争的焦点。

丘吉尔早就知道，戈林一直在努力建立和发展一支能够进行大规模着陆的强大空降部队。这正投合德国那班狂热的纳粹匪徒的心愿。德国伞兵师是一支精锐部队，英国在研究如何防御德国进犯本土问题时，曾考虑过它的作用。但是，德国的所有这类计划至少需要暂时取得日间的制空权。德国在不列颠的上空没有得到这种制空权。克里特岛的情形却不同了。敌人在巴尔干和爱琴海享有充分的而且看来是持久的空中优势，尤其是墨索里尼所控制的罗得岛要塞，对守卫克里特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4月28日，英国情报机关获悉，德、意即从海上和空中进攻克里特岛。法西斯在巴尔干各国，可能凑集到315架远程轰炸机、60架双引擎战斗机、240架俯冲轰炸机和270架单引擎战斗机，以供各种用途；敌人在第一次袭击时，可能投下伞兵或空降部队三四千名，而且可能每日从希腊进行两三次突击，从罗得岛进行三四次突击，都以战斗机掩护。在空运和海运部队到达之前将有猛烈的轰炸，而且要进行海上袭击。

丘吉尔立即将上述情况电告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要他加强战备，坚守该岛，准备大量消灭敌人的伞兵部队。并建议英国参谋总部，任命弗赖伯格将军为克里特岛驻军司令。伯纳德·弗赖伯格同丘吉尔结识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新西兰一名青年志愿兵的身份经历艰辛，辗转来到英国。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任命他为“胡德”营中的一名海军中尉。在战争期间，他屡建赫赫战功。因此，他在前线作战的4年中，被提升为旅长，并于1918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紧急关头，被任命为所有据守巴叶尔正面缺口部队的司令官，部队人数几达一个军。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带有两条金线的殊勋勋章，以及他身上的30处伤疤，标志着他出类拔萃的功勋。

克里特岛的地理形势确使防御甚感困难。它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

一旦这条公路被敌人切断，盟军就不能把后备军随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从南岸到北岸，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廷巴基有从南部海岸向北的一些小路，它们不适宜摩托化运输车辆的行驶。当有关军事领导人开始感到危机临头时，才百般设法向该岛运送增援部队、给养和武器，特别是大炮，但为时晚矣。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从希腊及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了日间封锁。它们袭击来往该岛的一切船只，特别是对唯一设有港口的北岸封锁得尤其严密。在5月的头三个星期中，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27000吨，到达该岛的还不到3000吨，其余的物资不是被迫转回，就是损失在途中。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力量非常薄弱，来自各方面的军队总共只有28600人。

德国参加进击克里特岛的有第十一空军军团，大约有16000人将空投着陆，另有7000人从海上登陆。此外，还有第八空军军团提供空中支援。可以参加作战的飞机数目是：轰炸机280架，俯冲轰炸机150架，战斗机180架，侦察机40架，滑翔机100架，“容克五二”式运输机530架，共计1280架。

法西斯空降部队的进攻，是计划在三个区域进行的东部在伊腊克林，中部在雷西姆农、苏达、于尼亚，最重要的是在西部的马利姆。在发动进攻前，纳粹重型轰炸机，首先用重达1000磅的炸弹，对地面及防空设施集中轰炸一小时。接着，乘滑翔机或用降落伞着陆的主力部队从天而降。再接着就是用运输机载运的增援部队。在他们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关键的一着就是把马利姆机场夺到手。这不但是为了飞机的着陆，而且也是为了飞机的再度起飞。他们只有借助于多次往返飞行，才能够运来作为他们整个计划基础的大量军队。

从作战时的多方面情况来看，克里特岛战役是古今无双的，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战斗。在战争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国空军军团表现了希特勒法西斯青年运动的狂热。他们要为1918年的战败而复仇的“条顿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拼命凶狠的、受过严酷训练而忠诚不二的纳粹降落伞部队的身上。他们死心塌地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纳粹的光荣”和世界霸权的祭坛上。

敌人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倾注了可能调动的全部兵力。战斗于5月20日晨开始。在德国历来发动的进攻中，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不顾一切，这样残酷无情。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夺取马利姆飞机场。在一小时之内，敌机对该机场周围的据点进行最猛烈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其猛烈程度前所未见。几乎在刹那之间，盟军大部分的高射炮便失去了作用。在轰炸停止之前，滑翔机就开始在马利姆飞机场的西南面着陆。上午8时，敌机从300英尺到100英尺的上空向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的地区投下大批伞兵，敌机川流不息地飞来飞去，在上午投下一个团，共四营人，下午又投下一个团。法西斯的滑翔机或军队运输机，在海滩上、在丛林中或在烈火熊熊的飞机场上着陆或撞毁。

第一天，在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及其附近着陆的德国伞兵共计5000余名。他们在新两兰军队的炮火下和殊死的肉搏战中损失惨重。在盟军防区内，几乎所有着陆的德国伞兵都已死亡，多半是被击毙的。当日入夜之前，守军仍然保有飞机场。

这天早晨，敌机大举空袭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接着便在下午空投伞兵，在两地分别投下两个营和四个营。激烈的战斗立即展开，但是，到傍晚时分，盟军依然坚守着那两个飞机场，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依然有较小的空降部

队着陆，战斗激烈，德军伤亡惨重。但是，对德军来说，第一天的战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一群群全副武装的德军，这时已能自由地出没在各个地区了。敌军进攻的威力远远超过英国司令部的预测。下面是5月20日下午10时守军司令弗赖伯格将军向韦维尔将军的报告：

今天竟日苦战。我军受到极大压力。我相信，我们至今还据守着雷西姆农、伊腊克林与马利姆的飞机场和两座港口。守住这些地方的希望甚微，如果我把情况说得很乐观那就错了。战斗激烈，我们击毙了大批德军。交通极端困难，对于干尼亚的空袭非常厉害。此间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将战斗到底。

第二天，5月21日，敌人继续进攻，军队运输机又出现于该岛上空。马利姆飞机场虽仍处于英军大炮和迫击炮密集的炮火下，敌运兵飞机却继续在飞机场及其东面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着陆。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不计损失，在这一区域内，至少有100架飞机撞毁在地面上。虽然如此，飞机还是不断地飞来。到了第三天，敌军已经有效地利用了马利姆飞机场。运兵飞机继续飞来，每小时达20余架次。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时敌机已能够飞回去继续载运援军了。据英军司令部估计，在这几天及其以后的几天内，共有600多架运兵飞机降落在这个机场上，有的降落时被撞毁。5月20日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而集中主要兵力进攻苏达湾地区。

在英国海军少将罗林斯指挥下的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包括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由8艘驱逐舰掩护，部署在克里特岛的西面，以便监视预料中的墨索里尼的舰队参战。21日，英舰竟日遭受猛烈空袭。驱逐舰“朱诺”号被击中，两分钟后沉没，死亡惨重。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猎户座”号也受创，但仍继续作战，夜间11时30分，英海军少将格伦尼率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

号和“阿贾克斯”号以及驱逐舰4艘，在于尼亚以北18英里的海域截住了德国运兵船队，激战两个半小时，击沉满载德军的轻帆船不下12只和轮船3艘。据估计，当夜溺毙的德军达4000人。

英国海军在保卫克里特岛的战斗中，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22日和23日，是英国海军损失惨重的日子。计有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被击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长期不能使用，此外还有“英勇”号及许多其他舰只受到重创。虽然如此，克里特岛的海防仍很巩固。在克里特岛战役结束之前，没有一个德国人能从海上登陆该岛。

但是，由于众寡悬殊，守军的局势越来越困难了。26日深夜。英国中东军总司令韦维尔收到了克里特岛总指挥弗赖伯格将军发来的情况严重的电报。弗赖伯格说：

我很痛心，不得不向你报告！我认为在我的指挥下，防守苏达湾的部队已经到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了。无论各位总司令根据军事观点作出什么样决定，我们这里的阵地是守不下去了。像我们这样一支装备不良而缺乏机动性的人数不多的部队，是抵挡不了我们在过去7天中所遇到的集中轰炸的。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从后勤观点来看，要全部撤出这支部队有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立刻作出决定，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登船。这一战区一旦被攻陷，敌人用同样的方法拿下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将不过是时间问题。除了威尔士团和突击队外，所有我们的军队都已经不能采取任何攻势。如果你从整个中东局势考虑，认为争取时间是有用的，那么，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我却不得

不考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苏达湾可能在 24 小时之内处于敌军炮火之下。又有新的严重的伤亡，我们的炮兵阵地多半已经丧失了。

丘吉尔看到中东总司令部转来的弗赖伯格的电报后，于 5 月 27 日立即回电予以鼓励：“你所进行的光荣的保卫战受到各地人民的敬佩。我们知道敌人已处于困境。我们正尽一切可能向你提供各种援助。”但是，当夜这位首相获悉，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已破灭了。英军和其他盟国的部队，不得不再次面临惨痛地撤退守军的任务以及所必然蒙受的重大损失。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空军和海军的严密封锁下，要将 22000 名战斗人员从克里特岛运出，的确是一大难题。不仅运输船队难以登陆，而且还必须驶过墨索里尼的空军所控制的 350 海时的海域。登陆地点斯法基亚，是南部海岸一个小小的渔村，位于高达 500 英尺的峭壁之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部队必须隐匿在峭壁边缘附近，等到召唤时则出来登船。在阿利斯海军上校指挥下的 4 艘驱逐舰于 5 月 28 日夜间接达，载去 700 人，并为现已集合起来的大批官兵带来食物。在返航中有战斗机掩护，因此只有一艘驱逐舰受到轻伤。至少还有 15000 人隐藏在斯法基亚附近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弗赖伯格的后备部队一直在进行战斗。

但是，一场惨剧正在等待着另一支同时出动的舰队。这支舰队包括巡洋舰“猎户座”号、“阿贾克斯”号和“代多”号以及 6 艘驱逐舰，在罗林斯海军上将指挥下前往营救伊腊克林的守军。从上午 5 时直到薄暮，从斯卡潘托岛起飞的敌机不断地猛烈袭击该舰队。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驱逐舰“帝国”号几乎被击中，前者不得不驶回。驱逐舰于午夜以前驶抵伊腊克林，把军队载运到等候在外海的巡洋舰上。到凌晨 3 时 20 分，任务完成。4000 人已经上船，于是开始返航。

半小时后，受创的驱逐舰“帝国”号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险些与巡洋舰相撞。全部舰队必须在黎明时分尽可能驶入南部海域。但是，罗林斯海军上将却命令驱逐舰“赫脱斯保”号驶回。把“帝国”号驱逐舰上所有军队和乘员接走，并将“帝国”号击沉。早晨 6 时 25 分，“希尔伍德”号又被一炸弹击中，不能跟随护航舰队同行。在其后的 4 小时内，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和驱逐舰“诱敌”号都被击中。“猎户座”号舰上的情况即使听来也令人毛骨悚然。舰上除了船员外，还有军队将士 1100 名。一颗炸弹穿过舰桥，落到拥挤不堪的下甲板上，约有 260 人被炸死，280 人受伤。舰长巴克海军上校遇难，船受重创并起火焚烧。到 29 日止，运出的军队已将近 5000 人，但是还有大批人员躲在通往斯法基亚所有的路口上，仍在等待援救。

5 月 30 日，丘吉尔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营救残留在该岛的军队作出最后的努力。这天清晨，阿利斯海军上校率同 4 艘驱逐舰再次驶往斯法基亚。途中有两艘驱逐舰不得不折返，但是他率领“内皮尔”号和“尼赞”号继续前进，成功地使 1500 余名士兵登上了船。在返航中，这两艘驱逐舰都差一点被炸弹炸沉，它们以损伤之躯，满载着 1500 余名士兵安然驶抵亚历山大港。几天前，希腊国王在历尽艰险后也和英国公使一起离开该岛。当夜，根据驻开罗总司令的命令，弗赖伯格将军也乘飞机最后离开了克里特岛。至 6 月 1 日，共有 17500 人被安全地运到埃及。没有救出的分散在岛上的 5000 人，除了少数向敌人投降外，大部分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党徒杀害了。

克里特岛战役，除了具有争夺战略据点的意义以外，也是在艰苦不懈的

斗争中获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例证。据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一书披露，在这次保卫战中，英国及其盟国共死伤 15000 多人。德、意法西斯军队的伤亡当在此数以上。自从这场战争开始以来，据统计，在马利姆和苏达湾区域内共有德军坟墓 4000 多个，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另有坟墓 1000 多个。此外还有大量的德军溺毙在海中。约有 170 架运兵飞机被击毁、击伤。希特勒为了赢得这次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墨索里尼这个老奸巨猾的法西斯头子，狐假虎威，借希特勒之力赢得了征服希腊的胜利。虽然高兴了一时，但为时不久，非洲的厄运就像报丧神一样，一个一个地降临在他的头上了。恰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又制定了令人振奋的《租借法案》。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章《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办法鲜，水龙救火作军援；
甘当抗敌军火库，远见卓识备称赞。

就在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不列颠、巴尔干和北非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40年11月5日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日后不久宣布战时实行“租借法案”。这不仅对英国，而且对全世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国家，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重大喜讯。

丘吉尔对罗斯福重新当选，更是喜出望外。他说：“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在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二天，1940年11月6日，丘吉尔又向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的电报：

我认为，在选举进行之际，我身为外国人，对美国政治发表任何意见都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我相信你不会责备我，如果我说我曾经祝愿你取得成功，并且现在为你取得了成功感到庆幸。这并不是说，在我们两国都有义务来挽救的岌岌可危的世界大局上，除了你充分公正而自由地运用你的智谋以外，我还有其他的希求。我们正面临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出任海军部长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成长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去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美国是一个“孤立主义”十分严重的国家。在二战爆发之前，美国受中立法的约束，使总统不得不在1939年9月3日颁布禁运令，禁止把武器运往任何交战国家。十日之后，他召开国会，举行特别会议，考虑撤销禁令，因为这项禁令表面上似乎很公允，实际上却剥夺了英国和法国在运输军火和供应品方面拥有制海权的优越条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讨论和争执，直到1939年11月底才撤销中立法，而代之以“现金购货，运输自理”的新原则。这样，在美国方面，仍然保持着一副严守中立的样子，因为美国人既可以把武器自由地卖给盟国，也可以自由地卖给德国。然而，事实上，盟国的海军力量阻止了德国的海上运输，而英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只要他们有“现金购货”就可以购买美国的武器了。

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美国与抗击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火交易的限制逐渐放宽。从罗斯福当选第三届总统到日本袭击珍珠港为止的这一年内，美国的中立已经名存实亡，美国处于“愈陷愈深的非交战状态”。罗斯福不只一次地说过：“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巨大军火库。对我们来说，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情况。我们必须以我们将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和献身精神，致力于完成我们的任务。”

“租借法案”一事就在实际上表达了罗斯福的这种信念。大选之后，他登上“塔斯卡卢萨”号巡洋舰，动身前往加勒比海度假。12月9日，海军的

一架水上飞机在这艘巡洋舰旁降落，带来了丘吉尔的一封紧急信。这位首相后来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写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他在信中透露，英国财政资源眼看就要枯竭，英国已经不能再用现款支付运费和购买其他供给品的时刻即将到来。截至 1940 年 11 月，英国付清了它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贷款。为此，他们已经卖掉了价值 3.35 亿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他们还支付了 45 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如今只剩下 2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丘吉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即使我们卖掉了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贷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 10 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急用。”

根据美国中立法和其他立法的条款，交战国必须用现款购买武器，并且不准向没有偿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英国用于现购自运的基金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丘吉尔紧急请求美国拨出几千架飞机，几百万吨船只，并为此作出“史无前例的努力”。

经过英国内阁的充分讨论，12 月 8 日，丘吉尔才给罗斯福总统撰写了这封长达近万言的信。信中，丘吉尔全面陈述了英国的抗战形势，特别详述了英国在经济上的困难。最后，这位首相说：“我不相信美国政府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原则的。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是决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的，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总统先生，”丘吉尔说，“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这封信还附有一个统计表，列明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同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遭受敌人的袭击共损失 583 艘，总吨数为 245 万吨。其中英国损失为 382 艘，总吨数为 171 万吨。此外，还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军舰、坦克和大炮。

当时英国的形势的确是严重的。11 月中旬，在不列颠之战中，遭到败北的德国空军，对考文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造成 1000 多人的死伤，令人惊骇地显示了它的力量。这种饱和式轰炸，从英国一个城镇扩大到两个城镇，柏林的宣传机器吹嘘说，要有计划地把全岛加以“考文垂化”。同时，敌人以非常凶猛的方式，对伦敦继续进行闪电战袭击。再加上希腊、北非战局吃紧，这的确对丘吉尔增加了难以估量的压力。

丘吉尔的这封信给罗斯福以深刻影响。当此信送到美国总统的手中时，罗斯福正乘美国军舰“图斯卡露莎号”在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游戈。据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罗斯福总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而且，经过了两天两夜他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他绞尽脑汁，默默沉思。

罗斯福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

国家跟着他走，如何克服孤立主义者的阻挠，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接受他的议案。据斯退丁纽斯说，早在那年夏季，总统就在船舶资源防务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过：“在困难情况下，英国无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经过和财政部、外交部和有关方面长期讨论酝酿之后，终于提出了“租借法案”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罗斯福在12月16日从加勒比海归来后，第二天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说：“无可置疑，在压倒多数的美国人的脑海里都认为，保卫美国的最好的直接办法就是英国能保卫其本身。”然后，他突然离开这个话题，转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情景。他说：“历史上还没有一次重要战争是因为缺钱而被打败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给英国贷款，以便购买美国物资；另一些则认为，我们应该干脆把物资全部赠送出去。”罗斯福把这种想法描绘为“陈词滥调”。实际上真正提出这两种建议的人为数极少，不论哪一种，在国会里都没有被采纳的希望，可是罗斯福却把这两种建议都提到了，以说明他真正是一个怎样通情达理的走中间道路的人。

他说：“现在我正想要做的就是取消美元的标记。这在在座的各位心目中是一件崭新的东西。我认为——要把这无聊的、荒谬的以及老牌的美元标记取消。”

在这之前，罗斯福早就非正式地向他的顾问们提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不给英国需要的物资和装备实行出租或出借呢？他用一个朴素的比喻透露了租借法的大概轮廓。他说：“假如我的邻居失火，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截浇园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就对他讲：‘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15元，你得照价付钱。’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要15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他就会连声道谢，原物奉还。但是，假设它被弄坏了——搞了些窟窿，我们也不必讲客套，就对他讲：‘我很高兴地借给你这水龙带，现在它被弄坏了，不能用。’他说：‘一共多少英尺？’我告诉他：‘150英尺。’他说：‘好，我照赔不误。’现在如果我拿回来的是一条可用的浇园水管，我就不吃亏。”

接着罗斯福言归正传：“换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军火完好如初，没有损坏，你就不吃亏；如果它们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干脆丢失了，只要借的人认赔，在我看来，你就没有吃亏。”

罗斯福这一番浅显易懂的话，却使四座皆惊，支持罗斯福的人听后击节赞赏，认为是个高招；“孤立派”则目瞪口呆，满腹狐疑。曾经表示要与孤立主义告别而实际上还紧紧拥抱着孤立主义舍不得松手的范登堡嘟嘟囔囔地说：“出借武器就像出借口香糖一样，你就甭想再收回来！”

记者招待会之后，为说明战争局势的严重性，罗斯福决定通过广播发表“炉边谈话”。他在这次讲话中，一反常态，对鼓吹姑息的人痛骂一番，对纳粹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他说：“我们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去回避危险或对危险的害怕。任何想通过谈判来取得和平的尝试都是极其愚蠢的。”

“一个国家要想同纳粹和平相处，只能以全面投降作为代价。”罗斯福进一步指出，“这种受人支配的和平，决不是什么和平。它只能是又一次休战，会导致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军备竞赛，最富有破坏性的贸易战争。”“我

们南北美洲各国所有的人，可能就要在纳粹的枪杆子威胁下过日子——这枝枪装着爆炸性子弹，不但是军事方面的子弹，而且还有经济方面的子弹。”

这就是罗斯福深刻的信念。这就是他制定的全部战时政策中的精髓。他一面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精髓。但是，当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里，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英国还是向纳粹投降的好，中国还是向日本投降的好。

1941年1月6日，在对这项建议进行最后润色的时候，总统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罗斯福说，美国不会由于轴心国喊我们向盟国提供援助，违反了国际法，是战争行动，而不敢提供援助。

“提供援助并不是战争行动，即使独裁者单方面宣布它是战争行动也没有用。当那些独裁者准备向我们发动战争时，他们不去等待我们采取战争行动。”

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

第一，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全面加强国防。

第二，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全面支援抵抗侵略从而使战争保持在本半球之外的各地一切坚定的民族。通过这种支援，我们表达着我们务必要使民主事业取得优胜的决心；我们也要加强我们自己国家的防务和安全。

第三，根据充分表达出来的公众意见，而不去考虑党派偏见，我们保证贯彻这样的主张，即从道德原则和对我们自身安全的考虑，决不允许我们默然同意由侵略者颐指气使和由绥靖主义者发起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的和平是不能以别人的自由为代价买得来的。

在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还提请本届国会授权并拨给充分的款项，去制造更多的军火和多种军事物资，以供移交现在同侵略国家进行实际战斗的国家。

四天以后，罗斯福总统把决定实行的代号为“H·R—1776”的《租借法案》提交国会，标题是《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就这项法案展开的辩论非常激烈，远远超出了国会的范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和主张援助盟国的“保卫美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利用电台、广告、传单和报纸上的声明来制造声势。国会收到了成吨的信件，好斗分子还在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里静坐。双方都认识到，《租借法案》标志着一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局面，如果批准这项法案，那就意味着美国已经从一个慎重的中立国变成了一个活跃的非交战国。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威尔基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露面，对这项法案表示支持。一些心怀敌意的参议员则援引他在竞选中对罗斯福的指责来回敬他。他反驳说：“我曾想竭尽全力击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也曾设法不手软。结果他却当选了总统。现在他是我的总统了。”在座的人都为他鼓掌。

林白上校是反对派的主要作证人。他说，英国的抗战毫无希望，美国应该用它的武器进行自卫。参议员惠勒把《租借法案》比作1933年毁坏农作物的做法。他宣称：罗斯福的对外政策“将毁掉1/4的美国青年”。尽管国会内“孤立派”用各种方式进行阻挠，国会外“美国第一委员会”这类组织大叫大嚷进行煽动宣传，但是英国处境确是岌岌可危，西半球已难隔岸观火，

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颁布的。这里用《H·R—1776》来称《租借法案》，以表示重视之意。

罗斯福一再警告，重洋已非美国的可靠屏障。总统的警告使美国人民得到深刻印象。民意测验表明，72%的人支持这个法案。

形势逼人，大势所趋。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将它签署为法律。欣喜若狂的丘吉尔为《租借法案》欢呼，说“这是任何国家历史上最好的行为”。《租借法案》不仅支持了英国的抗德战争，而且在以后，还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斯大林在1945年6月13日对《租借法案》作了很高的评价：“根据这一协定，美国在整个欧战期间作为租借向苏联提供了武器、战略物资和粮食。这一协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大大促进了反对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的战争顺利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盟国提供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

罗斯福在取得《租借法案》的重大胜利后，抓住时机，趁热打铁，保持前进的势头。3月30日，总统命令将停泊在美国港口的84艘德国及其附属国的船只予以没收。在5月15日通过相应法律时，民主党议员支持率达92%，共和党议员也有40%表示支持。

为了保证《租借法案》的实施，为了确保运输物资送到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手里，罗斯福宣布采取海军护航措施。海军作战部长史塔生透露，在罗斯福作此宣布之前，美国海军已经在远达2000英里的海洋上游弋。华盛顿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和金特纳认为，护航决定势必增加美国海军与德国潜艇冲突的机会，因此他们断言罗斯福此举是用来制造美国采取强硬行动的借口。

罗斯福的护航决定是根据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作出的。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后，希特勒称霸西欧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英国了。而英国在西欧战争中已遭受严重的损失，陆军正在整编，国民警卫军还在受训，武器弹药奇缺，只剩下500门炮、200辆坦克。西欧战争时，英国硬着头皮保留下来的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要保护数千里长的海岸线，简直是顾此失彼。希特勒诱降失败后，决心用武力摧毁这个国家。他调动数千架飞机对英国的港口和城市轮番进行狂轰滥炸，但都被英雄的英国人民粉碎了。尽管孤立主义分子林白声称德国的空军不可战胜，希特勒还是不能夺取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于是他放弃对英国的入侵，转而设法切断它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1941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击沉了756艘驶向英国港口的商船，还打坏了1450艘。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损失的吨位不久就会超过英美两国造船厂的补充能力的两倍。史汀生和诺克斯敦促罗斯福命令美国海军开始护送船队，以保证安全运送美国补给品。陆军部长说，派船出去让潜艇击沉，就好像把水倒进有漏洞的浴缸里一样。他主张必须采取相应的强硬行动。

1941年的整个夏季，罗斯福在船队的问题上一直曲折地前进。5月27日，他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向美国人民公布了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目。总统根据大多数人怕卷入、怕打仗的思想，发表了长篇广播讲话。他说：“我们面对的迫切问题是陆地和海上的军事问题。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不能从一厢情愿或伤感主义出发，我们面临的乃是铁一般的冷

据美国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向苏联提供了价值为108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几乎占合众国一切租借援助总额的1/4。其中大约一半是飞机、坦克、军用汽车和其他军火包括大约1.5万架飞机，17000辆坦克，5.2万辆吉普车，38.5万辆卡车。此外，还让苏联租借了大量通讯器材和其他车辆。

酷现实。”

“谁也不能在今天晚上预言，独裁者们的行为什么时候将会发展成为对本半球和我们自己的进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静候他们进入我们的前院就等于自杀。”总统进一步指出：“在你的敌人乘坐一辆坦克或一架轰炸机来向你袭击时，如果你等到看得见他的白眼珠时才开枪，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罗斯福说：“对于现代战争的突然打击力量有一定了解的人，等待敌人去取得进攻的立足点乃是人之常情。据此，我们已经在南北大西洋水域扩大了巡逻范围。我们在稳步地增加执行这项巡逻的舰艇和飞机。大家部知道，大西洋舰队的实力在过去一年里有很大的增强，现在还在不断地充实。”总统强调关系生死存亡的战争现实，正迫使各国从单纯自保出发，作出严峻的抉择。

罗斯福重申美国关于海洋上自由航行的传统主张。他说：“我们正在把我们的武装力量置于战略性军事地位；我们不会对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退进攻有所迟疑。”总统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并且要求“竭尽国力和授权的最大限度去增强我们的防务”。罗斯福这篇讲话发表在珍珠港事变前的半年多。它受到了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人们纷纷给白宫打电报，表示支持这种强硬立场。总统惊讶地对舍伍德说：“95%的电报表示支持！我估计，对我这次讲话要是支持的和反对的人各占一半，我就够走运的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立即引起了美国朝野各方面的关注。美国有些部长和高级将领，力主乘机向法西斯展开进攻。陆军部长史汀生说：“直接率领大家去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的大门已经为你敞开。”然而，罗斯福仍然希望保持一种半交战状态，不想同纳粹德国发生公开冲突。这位总统本能地认识到，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进程，并认为这是在美国不直接卷入的情况下促进他抵抗希特勒的政策的一个机会。他对陆军部长说：“我认为，向俄国提供各种合理的弹药援助，对美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罗斯福虽然紧锣密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他仍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强大压力：参战派的有力人士如伊克斯、史汀生、诺克斯、摩根索等都认为如解救被希特勒奴役的国家，美国非参战不可，越快越好。“孤立派”则大声喊叫，对英国只能采取除战争以外的援助方式，绝对避免投入战争。罗斯福本人的态度是，一方面对德国保持强大压力，同时却谨慎从事，走一步看一步，既注意德国可能采取的反应，又十分注重公众舆论的动向。罗斯福曾对急不可耐的参战派谈了自己的心事：“我从伍德罗·威尔逊那里得到了经验，以巨大的分裂使国家投入战争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如果我们要投入战争的话，我要大家团结一致。”他还引用威尔逊的话说：“当我们要同德国打仗时，我们必须弄清楚，全国人民不仅同我们一起打，而且还愿意同我们一起打到底！”

《租借法案》的通过和强有力地实施，不仅使罗斯福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而且为英国以及后来为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欲知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章非洲捷报频传

意军败北举国惊，离心倾向日日升；
盟军准备大进击，乘胜追歼不留情。

就在意大利军队入侵希腊的同时，墨索里尼又贸然发动了对非洲的进攻。他妄图乘英国之危，一举攻下埃及，以便称霸非洲。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墨索里尼之意。在非洲担任意大利统帅的格拉齐亚尼，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法西斯老将。他虽然赢得了征服阿比西尼亚的桂冠，受到“领袖”的嘉奖、喝彩，并被提升为元帅，但这次却忧虑满腹，他想：英国人最近不战自退，一打就跑。可能是个陷阱。因此，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辱骂，仍不轻举妄动。可是，就在格拉齐亚尼踌躇不前时，英国人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罗盘”战役的准备工作。

开战之前，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亲自检查战备之后，对将士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说：“我们虽然在人数上抵不过敌人，但我们经过高度的训练，装备好，习惯沙漠作战，有着‘伟大的光荣传统’，而且富于坚韧不拔的精神，这是我们攻无不克的胜利保证。”

在一个重大行动开始之前，真是度日如年，全体将领兴高采烈，决心打赢这场战争，以振士气，也好给墨索里尼一个教训。1940年12月6日，英国那些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受过锻炼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陆军，约25000人挺进了40多英里，并于翌日一动也不动地整日蜷伏在沙漠荒野之中，未被墨索里尼的空军发现。12月8日，他们又兼程前进，部队在当夜才被告知，这不是沙漠中的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日拂晓，揭开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序幕。

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英、印联军展开了攻势。仅仅在数分钟之内，意大利的25辆战车就陷入瘫痪状态。当时在西迪巴拉尼南部的尼贝瓦作战的意大利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意军师团长马利蒂将军一出战壕，即被打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英军攻克该城。下午1时30分开始进攻图马尔兵营，到傍晚几乎整个兵营地区全被英军占领，大部守军被俘。同时，第七装甲师在西面切断了沿地中海的公路，从而孤立了西迪巴拉尼。驻防马特鲁港的部队，也同时准备停当，待命出击。10日天刚破晓，他们便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正面的意军阵地。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到10时，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指挥部报告说，俘虏太多，已无法清点，被俘的士兵和军官占了约有200多英亩大的一片地方。

自1940年12月11日起，英军第七装甲师，接着是英军第十六步兵摩托化旅与澳大利亚第六师，继续乘胜追击。几天后，布克·浦克和西迪巴拉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便落入盟军之手。当时，丘吉尔从前线获悉，至少有三师墨索里尼的精锐，不是被歼灭，就是被俘获。

在西迪巴拉尼的胜利已最终确定的时候，即12月12日，韦维尔将军又主动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他不是把刚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留在战场上作为总后备队，而是立刻把它调往厄立特里亚，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该师一部分由海道前往苏丹港，另一部分则乘火车再换轮船溯尼罗河而上。其中有一部分几乎是直接从西迪巴拉尼前线开往他们登船的地点。他们到达700英里以外的战场后，很快又投入战斗。如果没有韦维尔将军先见之明的决策，不但阿比西尼亚要塞

克伦之战的胜利难保，就是阿比西尼亚的解放也会遥遥无期。

北非前线的胜利，使丘吉尔欢欣鼓舞，他急忙向前线将士表示祝贺，并催促他们不遗余力地围歼敌人。他在 1940 年 12 月 13 日发给韦维尔的电报说：

“我衷心祝贺你获得的光辉胜利，它实现了我们的最高希望。当我在下院讲述需要进行多么高明的参谋工作和陆军如何勇敢地执行这一艰巨任务时，大厅里欢声雷动……”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自然，在你的思想里，追击敌人占首要地位。当胜利者精疲力竭之日，正是可以从失败者身上取得最大的补偿之时。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利比亚的失败更使墨索里尼战栗的了。无疑，你曾经考虑，在意大利领土上占领几处港口作为新的跳板，以便沿着海岸追击敌人，直至遇到真正的抵抗为止。看来，这些人就像是成熟的庄稼，等我们去收割了。”

到了 12 月 15 日，英联邦军队已从埃及境内扫荡了所有的意军。留在昔兰尼加的敌军，大部分撤退到已被孤立的巴迪亚防御阵地以内。这样便结束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第一阶段，使墨索里尼的 5 个师大部被歼，俘虏敌军 38000 余名。英军自己的损失是：阵亡 133 人，受伤 387 人，失踪 8 人。

为了乘胜扩大战果，12 月 16 日，丘吉尔电示韦维尔：“现在，你们的首要目标，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努力把他们驱逐出非洲海岸。前曾得悉你们有进攻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之意，现在又获悉你们攻占苏卢姆和卡普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深信，你只有在确知你不能再向前进以后，才放弃主要的目标转而在苏丹或多德卡尼斯群岛采取辅助行动。……但是，不要让这两个行动使进一步击溃墨索里尼主力的最大任务受到影响。”

墨索里尼在非洲惨败的消息，使全意大利人惊恐不已，离心倾向愈加严重。饱受折磨的意大利人民“根本不能冷静地接受这一巨大的打击”。从齐亚诺那几天的日记里，可看到妄自尊大的墨索里尼对这一打击的反应和它对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所产生的影响。

“1940 年 12 月 10 日。进攻西迪巴拉尼的消息像晴天霹雳。初看并不严重，但是格拉齐亚尼随后拍来的电报证实我们惨败。会见领袖两次，他故作镇定……但在国内外都是严重的。在国外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从格拉齐亚尼电报的口气来看，他并未从受到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再准备反攻。”

“1940 年 12 月 11 日。利比亚局势确实不妙。可以说四个师已被全歼，格拉齐亚尼报告了敌军的士气和决心，却闭口不谈他将如何避开敌人的打击。……墨索里尼仍然希望格拉齐亚尼能够而且一定会阻止英军前进。他认为只要把英军截在边界上局势就不严重，如果英军打到托卜鲁克，他认为局势就会发展到悲剧的边沿。”

“晚上有消息说，卡但扎罗师不但未能阻止英军的前进，反而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五个师竟在两天之内即溃不成军，这对我军就非同小可了。”

“1940 年 12 月 12 日……在利比亚，干得很糟。格拉齐亚尼来电，无消息可报，更无详情。他尚未从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此外，自从那次在亚的斯亚贝巴有人企图谋害他以来，他的神经似乎受惊极大。别人告诉我，就是在意大利，他对暗室也是如此害怕，至少派了 18 名士兵守护他在阿尔奇鲁佐的别墅。他在奇雷内的一座罗马古墓内，建造了一处深达六七英尺的避

难所。现在他心烦意乱，拿不定主意。他寄希望于敌手疲竭，而不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力量。这不是好兆头。领袖已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们在利比亚遭到了真正的失败。这次再也不能怪罪政治。我已给军事当局充分的行动自由。’……”

“1940年12月14日……墨索里尼说：‘在利比亚，5名将军被俘，1名被打死。这就是有军事素质的意大利人与没有军事素质的意大利人的百分比。我们将来要建立一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军队，从波河流域和意大利中部的一千二三百万意大利人中挑选部队。其余的人去替武士贵族制造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晚上又传来坏消息。”

“1940年12月17日。领袖给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一封信，语气严厉，命令部队与阵地共存亡。‘这不是我个人的命令’，他写道，‘而是我们国家的命令。’但愿这一鞭子能够奏效。”

从齐亚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在最初，这个刚愎自用的墨索里尼，还装模作样，尚能“保持平静”；但到了12月12日，他也严重地动摇了起来，承认事态的严重性。他曾对他的左右心腹说：“我们真的被击垮了！这回并非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完全是军事将领们的无能所造成的。”在这以前，墨索里尼对于格拉齐亚尼要求提供更多的战车、大炮和空军支援，总以为那是某种借口，而置之不理，现在失败了，不仅不严以律己，反而怪起格拉齐亚尼来了。他憎恨地说：“尽管我瞧不起他，但他却摆出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实在可惜！”

墨索里尼一向不大信任格拉齐亚尼，总以为他保守、怕死，因而开始听取了巴迪亚司令官贝尔索利将军的意见。“领袖”在一封致这位半白胡子将军的热情洋溢的电报里说：“闪电胡子以及他勇敢的士兵是有口皆碑的。我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会旗开得胜，为党国尽忠！”

然而，格拉齐亚尼却不以为然，他对意大利军队能够保持巴迪亚一事，颇表怀疑，于是他提议放弃此城，撤退到托卜鲁克，这样可以有充裕的时间构筑防御工事。然而这一建议却被墨索里尼拒绝了，他认为不交战就把利比亚广大地区放弃，未免太便宜英国了。他命令部队必须坚守阵地，不准后退！

在意大利领袖下令“坚守阵地”不久，英军就把巴迪亚作为他们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了。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格拉齐亚尼布置了四个意大利师，防御工事是由连续不断地反坦克壕和铁丝网障碍物构成的，每隔一段有一座混凝土的碉堡，后面还有第二道防御工事。袭击这样强大的巩固阵地需要准备。第七装甲师阻止意军向北方和西北方向逃跑。为攻击这一阵地，英军可以调用的军队有第六澳大利亚师，英军第十六步兵旅，皇家坦克团第七营，一个机枪营，一个野炮团和一个中程炮团。从1941年1月3日清晨开始攻击。一营澳大利亚部队在强大的密集炮火掩护下，在西边的外围阵地攻占了一个据点。在他们的后面，士兵冲进了反坦克壕。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东面和东南面扫荡。

战事进展十分神速。1月4日下午，英国“马蒂尔达”坦克，在步兵的支援下攻克巴迪亚；1月5日，守敌全部投降。共俘敌45000人，缴获大炮462门。翌日，1月6日，轮到了托卜鲁克，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它的交通；1月7日，领先的澳大利亚旅已进抵该城东部防线的前沿。这里的外围阵地长达27英里，与巴迪亚的阵地相似，只是在许多地点反坦克壕的深度不够，起不到作用。驻防的意大利军队包括一个完整的步兵师、一个军司令部和从前

沿阵地撤下来的大量残余部队。直到1月21日，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军才得以发动攻击。另一个澳大利亚旅，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入南面的外围阵地。该师的其他两个旅，进入临时建立的桥头阵地，向左右两翼扩大。傍晚，防区的1/3已被英军占领，第二天凌晨一切抵抗都停止了。俘虏近30000人，缴获大炮236门。

就这样，英勇善战的英联邦沙漠兵团，在韦维尔将军的指挥下，于六个星期内，在缺水缺粮的地带前进了200余英里，攻占了两座经常驻有海、空军部队的设防巩固的港口，俘虏意军11.3万名，缴获大炮700余门，至此，妄图侵略征服埃及的墨索里尼的庞大陆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只是由于交通和供应上的莫大困难，才延迟了英军向西长驱推进。

在所有这些战斗中，舰队曾给予有力的支援。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依次受到舰队的猛烈袭击，舰队的飞机也参加了陆上作战。尤其是海军，除了为运送军事人员进入被占领的港口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之外，还每天为陆军先头部队输送3000吨供应品，支援陆军的前进，英国陆军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英国空军对意大利空军的优势，他们虽然在数量上逊于敌人，但是飞行人员勇于进攻的精神，迅速地使他们在士气上完全压倒敌人，从而享有空中活动的自由，击毁意大利飞机数百架之多。

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两个重要港口的失守，在意大利引起了更大的震动。群情更加不满，统治集团内部的埋怨、争吵较前更加激烈。且看齐亚诺的日记：

“1941年1月5日。从昨日下午4时起，巴迪亚广播停止。我们只能从英国的战报了解情况。我军的抵抗是短暂的，只抵抗了几个小时。但是并不缺少武器，仅大炮就有430门。战斗为何不能坚持更久一些呢？难道还是跳蚤斗大象吗？‘一个奇特的跳蚤，’墨索里尼说，‘它跳动在西迪巴拉尼、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之间，有1000多门大炮供它使用。总有一天我将决定开闸，向那些被无数谎言所迷惑的意大利人说明全部真相……’”

“1941年1月6日。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又见到了国王。他一心注意着利比亚局势，并为它感到震惊。他不相信部署在托卜鲁克和德尔纳附近的军队足以阻止英军的前进。他对德国盟友表示怀疑。即使我告诉他，希特勒对我们的态度是完全忠诚的，他仍然怀疑。‘他对你们那样谦恭有礼，仅仅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别的办法。’他说，‘但是，他正像其他的德国人一样，是在蛮横的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同意大利打交道的。我也不相信希特勒有力量为所欲为。德国的军队很强大，像俾斯麦那样真有见识的人也不得不服从于它。’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军事组织。‘在意大利，长期以来把椅子叫做宫殿，’他说，‘但这并不能改变椅子仍然是椅子这一事实。这样一来，我们人数少、装备差的师，就只是空有其名了。’后来，他谈到英国可能在意大利登陆，这一点说明了他反对过分削弱国内战线的理由。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认为，德国最终会取胜，因为希特勒已统治了欧洲大陆，用来对付英国。”

“1941年1月7日。巴迪亚的失陷，又一次动摇了公众的士气。国内局势变得严酷起来。墨索里尼决定进行‘清洗’……敌对而抱怨的中产阶级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1941年1月22日。托卜鲁克失陷。又进行了一番战斗，但也仅仅是打了一下。领袖听任自己的幻想哄骗自己。我看有必要不揣冒昧对他宣言相

告。‘在西迪巴拉尼，’我说，“人们谈论突然袭击。当时你指望着巴迪亚，因为贝尔贡佐利——英勇的贝尔贡佐利在那里。两小时后，巴迪亚丢了。于是，你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卜鲁屯，因为炮兵之王皮塔西·马内拉在那里。托卜鲁克也轻易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现在你又充满信心地谈到德尔纳悬崖。很抱歉，我不同意你的危险的幻想。麻烦是严重的、玄妙的、深切的。’我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其中并无奥妙。今日意大利人这次可怕的失败的原因，与1918年的意大利人那次失败的原因比较，对每一个谨慎的观察者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不要战争，这点没有错。”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丘吉尔觉得，有必要通过广播对意大利人民讲几句话，借以鼓动意大利人民群众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不满。因此，1940年12月23日夜，英首相首先向他们述说了英、意之间的传统友谊，接着指出：“意大利人，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这都是因为一个人，一个人，就是那一个人使意大利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情和友谊，我不否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他毫无约束地执掌大权18年之后，把你们的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的边缘，这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这一个人……违背根本就不想打这次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使古罗马的继承人和后裔与凶恶残暴的异教徒为伍。”

丘吉尔讲到这里，又向意大利人民宣读了他出任首相时致墨索里尼的信和这位“领袖”1940年5月18日写给他的回信。接着英国首相进一步指出：“这位领袖在执掌独裁政权18年之后，把信赖他的人民领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出路是多么不妙？要么准备在海上、空中和非洲遭受整个大英帝国的炮击，遭受希腊民族的猛烈反攻；要么换一个办法，从勃伦纳山口请阿提拉率领贪婪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占领、镇压和保护意大利人民，而他和他的纳粹党徒对意大利人民是直言不讳地极端蔑视的，种族与种族之间像他们对你们这样蔑视的情形还从未见过。”

“一个人，而且只有那个人使你们遭遇的结果就是如此。”最后，丘吉尔大声疾呼：“我将等待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一天，而且我坚信这一天必将到来！”

十分巧合，就在丘吉尔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说的这一天，墨索里尼懊丧地对齐亚诺谈到意大利陆军的士气时说：“无论如何，我将承认，1914年的意大利人比现在意大利人好。这不是夸赞那时的制度，只不过讲实话罢了。”第二天，他望着窗外沮丧地说：“这场雪和寒冷的天气多好！这样，我们这些不中用的意大利人，这个劣等民族，将有所改进。”这一阵子，这个法西斯魔王情绪很坏，显然是意大利陆军在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失败折磨着这个邪恶人的心。

北非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欧洲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斗争，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迸发出奔腾的激情。正义的事业一定胜利。公理决不会永远被人蹂躏。万恶的法西斯强盗必定会遭到更大的失败。

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指出：对于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经过艰巨的斗争，形势定会愈来愈好。欲知墨索里尼“非洲帝国”的命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阿提拉为5世纪匈奴帝国国王，曾攻掠高卢，侵入意大利，致使两罗马乞和，此处比喻希特勒。

第三十七章“非洲帝国”的溃灭

杀声阵阵震地来，意军到处鬼神哀；
死亡被俘无其数，非洲帝国崩溃哉。

巴迪亚、托卜鲁克失守之后，墨索里尼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英联军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进击，战事急如星火。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犹如惊弓之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墨索里尼的非洲帝国眼看就要崩溃了。

1941年，对丘吉尔来说，是形势开始好转的一年。沙漠地区中的胜利使这一年头几天笼罩着一片喜悦的气氛。巴迪亚于1月5日被攻克，敌守军40000人投降。紧接着托卜鲁克又被攻陷，俘虏意军近30000人。19日，英军收复了苏丹境内的卡萨拉。20日，进入意大利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几天之后，夺获敌方兵站重要基地比夏。20日，流亡在国外的海尔·塞拉西皇帝返回阿比西尼亚。

盟军乘胜前进，连续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丘吉尔指令英国参谋总部，必须以迅速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部队作为1941年最初数月内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一旦摧毁昔兰尼加的意军，尼罗河集团军即可向阿比西尼亚和苏丹进军，并在阿比西尼亚境内发动更广泛的起义；同时肯尼亚的部队也可沿鲁道夫湖向北挺进，尽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迫使意大利尽早退出战争。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致电墨索里尼，向他的伙伴发表新年感想并解释轴心国的战争布局。这个纳粹元首除了埋怨佛朗哥忘恩负义，迟迟不能应约参战外，还要墨索里尼在非洲努力支持。希特勒认为，在这一地区内，目前还不能发动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准备这样一个行动，至少需要三个月到五个月的时间。现在即将进入在本年中德国装甲部队不能有效从事战斗的季节，因为在那样的高温下，装甲车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于需要整日行驶的远距离战术性作战的。“元首”还要求墨索里尼派出大量空军，去削弱英国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地位。

敌我双方都在加强战备，准备决战。为了确保海上运输，支持非洲大陆作战，英国统帅部试图设法在意大利本土与敌作战。丘吉尔认为，在墨索里尼的本土攻打他们，将使敌人更加沮丧，而使盟军所期望的意大利的崩溃能早日实现。2月9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对热那亚的港口发动了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袭击。H舰队，其中包括“声威”号、“马来亚”号和“谢菲尔德”号，出现在热那亚附近的海面，对该城猛烈袭击达半小时。同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飞机对里窝那和比萨进行轰炸，并在斯佩西亚海面敷设水雷。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奇袭，仅仅遇到热那亚海岸炮台的火力微弱而且完全无效的还击。意大利的港口设备和船舶受到很大损失。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在低云层的掩护下撤退，成功地躲开了在撒丁岛以西进行搜索的意大利舰队的拦截。

这时，希特勒注意到了地中海，因此迫使英国人加强了马耳他岛的防务。到4月初，英国的海空军已能够加强袭击墨索里尼为驻在利比亚的部队运送给养的舰只了。在这一行动中，从马耳他岛出动的英国潜艇担任主要角色，而且它们活动的规模和得到的收获都稳步增长。在这一活动中，海军少校马尔科姆·汪克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英雄业绩使他后来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第二年，他同他的舰队“支持”号一起被击沉了。

4月10日，一支由四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战斗舰队驶往马耳他岛，由麦克上校在“迦佛斯湾”号舰上任指挥，准备攻击意大利运输船队。他们在一星期之内，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他们遇到意大利的一支向南行驶的运输船队，五艘运输船，由三艘驱逐舰护航。在一场近距离的大混战中，所有这些船只都被击沉。英国的驱逐舰“莫霍克”号也被鱼雷击中沉没。仅在这次行动中，便击沉了满载14000吨重要物资的意大利船舶。

非洲战事急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连吃败仗。第六澳大利亚师于2月6日攻入班加西，较预定的日期早三个星期。2月5日拂晓，英国第七装甲师越过许多崎岖不平的地区，进抵姆苏斯。该师是奉命去切断海岸公路的。当晚，一个意军纵队约有5000人，碰到英军在贝达富姆设下的路障，很快便投降了。2月6日清晨，意军的几个主力纵队开始进入这条公路，英军同陆续前来的拥有大量坦克的法西斯部队激战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意军狼狈不堪，车辆乱成了一团，绵亘几达20英里，正面被堵，侧翼被攻。2月7日拂晓后不久，他们出动30辆坦克作最后一击，又遭失败，于是伯根佐将军便率部投降了。就这样，在两个月之中，尼罗河集团军前进了500英里，歼灭意大利部队超过9个师，俘虏13万人，坦克400辆，大炮1290门。昔兰尼加已完全被英军攻克。丘吉尔首相致电韦维尔将军，对在短期内获得的这一辉煌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昔兰尼加被英军攻占后，墨索里尼妄图称霸非洲的美梦就要破灭了。回想1940年，当他在法国沦陷后对大不列颠宣战时，是何等狂妄自大，何等不可一世！当时意大利在北非和东非的帝国，的确呈现着一派所谓“壮丽”的景象。

意大利王国，在19世纪兴起的欧洲列强中是后来者。工业力量薄弱，军事力量自然也不强，但在侵略野心的驱使下，竟也参加掠夺非洲的竞赛。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意大利便日益把目光转向非洲的扩张。16年后，马萨瓦被占领，于是厄立特里亚便正式成为意属领土。意属索马里殖民地及其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也慢慢地发展起来。介于这两处早期殖民地之间的是古老的阿比西尼亚王国。随着19世纪90年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克里斯皮首相力主向这个古老的王国进军，希望借此使意大利在欧洲事务中获得大国的地位。1896年，意大利在阿杜瓦遭到惨败。当时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意军全部被歼。这次失败促成了他的垮台，中断了意大利在非洲的冒险行动。

随着意大利新兴工业的发展，实力逐步增强，1911年，意大利侵略军又以咄咄逼人的气势，跨海到黎波里，开始进行征服活动，震惊了当时平静的世界。法国和英国急需争取意大利来抵制日益加剧的德国威胁，就让意大利得以在北非海岸建立一处脆弱的根据地。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战胜国一边，这一事实追认了它对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占有权，使它又开始重温罗马帝国的旧梦，不久它便把这片地方更名为利比亚。

意大利法西斯攫取政权之后，更加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决心要当今日的恺撒，称霸非洲。于是，一个更加疯狂、野蛮的侵略扩张活动在非洲展开了。北非的广大土地被置于格拉齐亚尼将军军事统治的严刑峻法之下。人民备受剥削，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炮台、碉堡林立，铁路、公路、飞机场遍布地中海沿岸。意大利付出所有这些巨大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实现罗马帝国的旧梦。在法西斯狂徒的煽动之下，举国潜伏着为在阿杜瓦的败北和耻辱报

仇雪恨的情绪。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墨索里尼以骄横恣肆、不顾一切的态度，挫败了英国通过国际联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畏首畏尾和半心半意的抵抗，把一个拥有 50 多个国家的国际组织的权威踩于脚下，终于在 1936 年用武力征服了拥有 1000 多万人口的阿比西尼亚。

就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就在那希特勒到处侵略而接连获得“胜利”的时候，特别在那阴云密布的 1940 年 6 月，当英国在法西斯心目中似乎即将崩溃，而法国则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候，墨索里尼乘机大肆扩张他在非洲的帝国。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已构成了一片广大的领土。意大利人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在这片所谓“荒凉的贫困的”土地上，横征暴敛，强迫人民交租交税。有将近 25 万意大利殖民者，在 40 万以上的意大利和土著军队的保护下放手经营。法西斯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发财致富了，他们办起了庄园，盖起了别墅，兴建了工厂，“不毛之地”开始“繁荣”起来了。他们在红海与地中海的各处港口都已设防。如果英国崩溃，那么，埃及、英属索马里和英属东非就会并入意大利的现有属地，那就果真会形成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一片辽阔的土地。像这样大的帝国，自从恺撒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正如墨索里尼说的：“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

然而，这一引人入胜的空中楼阁，现在就要幻灭了。1940 年 12 月 2 日，韦维尔将军制定了向东非进击的计划，他打算用正规部队首先消灭苏丹境内卡萨拉和加拉巴特的意军。正规军暂不深入阿比西尼亚，而由得到英国援助的当地爱国运动组织担负这样的任务：使意大利人难以守住阿比西尼亚，从而在最后光复他们的祖国。

1941 年 1 月间，在普拉特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肃清苏丹的战役。在最初阶段，战事进展顺利。由英印第五师和第四师，在六个空军支队的支援下，于 1 月份向卡萨拉的意军发起了猛攻。1 月 19 日，两个意大利师在遭受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了这个城市。不久，他们又放弃加拉巴特，退出了苏丹。与此同时，在阿比西尼亚境内发动起义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在桑福德准将指挥下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苏丹营和一些经过选拔的英国军官，他们构成了武装起义的核心。由于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大，援助他们的爱国人士也越来越多。阿比西尼亚塞拉西皇帝于 1 月 20 日重返他的王国，戈贾姆西面大部分地区内的敌人也逐步被肃清。

在丘吉尔首相的强令督导之下，韦维尔将军于 2 月中旬发起了以攻占基斯马尤为重点的“帆布”作战计划。坎宁安将军也奉命参加了这一战役。由 6 个旅和 6 个就地征募的大队组成的一支意大利部队据守着朱巴河，基斯马尤就在朱巴河的河口。坎宁安将军于 2 月 10 日面对着这支部队部署了四个旅团。英军于 14 日进占基斯马尤，未曾遇到抵抗。意军的重要阵地部署在基斯马尤港之北、朱巴河对岸的杰利布。22 日，英军从敌军两翼及其后方进击该阵地，获得很大战果。意军全线崩溃，阵亡、被俘、或逃入丛林的有 30000 多人。意大利空军遭到南非飞机的痛击，未能参加战斗。

再向北 200 英里便是意属索马里的主要港口摩加迪沙，现在向这座港口推进已没有什么障碍了。英军摩托化部队于 2 月 25 日进入该港，发现大批器材和粮食、服装，还有 40 万多加仑的宝贵汽油。飞机场上有 21 架被击毁的飞机。坎宁安将军断定，他的下一步行动不致遭到敌人的强烈抵抗。经韦维尔将军同意，他确定以距摩加迪沙 740 英里的季季加为下一攻击目标。部队仅仅休整了三天，3 月 1 日就开拔了。沿途排除了敌人一些微弱的抵抗，他

们于 3 月 17 日攻占季季加。至此，意属索马里全境光复。

丘吉尔首相闻讯十分高兴，立即致电韦维尔将军，祝贺索马里大捷。电报说：“我衷心祝贺你们在意属索马里的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果。坎宁安将军率领他的士气昂扬、训练有素、组织完善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勇猛、果敢而又非常成功的战役，请向他转达英王陛下政府的感激与嘉许，望你请他将这封贺电传达给他的部队。”

坎宁安将军攻克季季加后，继续以轻装部队向摩加迪沙以北 200 英里的费尔弗推进，这将最终完成对意属索马里的占领。英军统率部从亚丁派出空军前去支援，除了在红海值勤外，还要袭击意大利的空军基地。3 月 16 日，英军两个营在柏培拉登陆。意守军一个旅被瓦解，200 人被俘。这时，英属索马里全部收复。因此可以通过柏培拉港更方便地支援坎宁安将军继续向哈拉尔挺进了，该地守军于 3 月 26 日投降。他于 3 月 29 日进抵迪雷达瓦。在这里稍作休整，并集结人力、物力，以便直捣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 3 月份一个月中，坎宁安的部队跋涉了 850 英里，自从越过朱巴河以来，他的部队共击毙、俘虏或击溃意大利军队达 50000 多人，而他的部队伤亡还不到 500 人。

在这个时期，阿比西尼亚战役也有了新的进展，克伦守军顽强抵抗，激战三天，英军伤亡 3000 人，不易得手，战事曾一度中断。3 月 20 日，战斗继续进行，意军曾一再猛烈反攻，尽管他们的损失极其惨重，但尚无立即崩溃迹象。显然，意军为保全这座要塞，要决一死战，他们的空军活动频繁，疯狂进行轮番轰炸，为垂死的守军打气助威。3 月 25 日，英军再次发动猛攻，在陆、空军紧密配合下，意军防线终于在 27 日崩溃，克伦攻下来了。追兵势如破竹。阿斯马拉于 4 月 1 日攻克，马萨瓦守军于 4 月 8 日投降，俘虏达 10000 多人。

在东非其他战场肃清敌军的战斗也取得显著成效。墨索里尼宣布参战时，意大利在红海拥有驱逐舰 9 艘，潜艇 8 艘和许多小型舰只。现在，所有这些舰只已被英国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击沉。到了 4 月 11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红海和亚丁湾已经不是“交战水域”，这里已对美国船只开放了。

4 月 6 日，坎宁安将军率领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以飞快的速度进入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时，飞机场上意大利空军的残余飞机已被炸毁。他随即派遣轻装劲旅经由德西埃向北挺进，堵截阿姆巴阿吉的意军。墨索里尼虽然一再下令“死守”，但是兵败如山倒，抵抗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他们的退路已被切断。同时，普拉特将军的部队也从北面进击，更加上阿比西尼亚爱国者的武装部队，连同向阿皇投诚的意大利土著部队。把戈贾姆的敌军 12000 人逐至德布腊马科斯。其中一半被俘，其余逃至北部的冈达尔，后来也被从刚果横越非洲 2000 英里前来参战的一支人民志愿部队消灭了。5 月 5 日，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在凯歌声中，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墨索里尼的帮凶阿奥斯塔公爵，是意大利国王的堂兄弟。自从 1937 年以来，他就出任意属东非总督兼阿比西尼亚总督，并从 1939 年起担任这些属地内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阿奥斯塔曾留学英国，妻子是一位法国公主，他素日不得墨索里尼的欢心。“领袖”根据某些理由认为他“心慈手软”，也缺乏军事指挥才能。他率同他的残部于 5 月 17 日投降，1942 年作为一名战俘死于内罗毕。自 1941 年 1 月开战以来，在墨索里尼原有的 22 万余人中，半数以上已被歼或被俘，现在只有小股散兵游勇还流窜在深山密林之中，阿比

西尼亚全境已在英军的控制之下。至此，墨索里尼想用武力征服的方法建立一个非洲大帝国，并用古罗马精神向那里移殖意大利人的迷梦，彻底破灭了。

墨索里尼因此十分伤心，从而更加强了他对德不满的情绪。他埋怨希特勒“见死不救”，他说，我们应当记住：“是他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帝国。”这个法西斯独裁领袖，非常依恋阿比西尼亚，称之为意大利“非洲帝国的明珠”。他称 1935 年和 1936 年，是“法西斯主义的浪漫年代”，而现在却是一江春水往东流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章兵不厌诈

敌众我寡用奇兵，指挥如意笑谈中；
以弱胜强凭妙计，多谋深算广传颂。

墨索里尼建立非洲帝国的美梦破灭了。盟国的胜利来之不易。这归功于英联邦各国军队和非洲人民的英勇斗争，同时归功于智勇双全的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他凭着自己的智慧，用伪装和诡诈行动，扭转了战局，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虽然后来他败于狡黠的对手隆美尔，并因此被解除中东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创造的那种“独特的战争”，却被英国将领们广为效仿。韦维尔的事迹全今还在英国、非洲和全世界广为传颂。

1940年至1941年冬季，暴风雨和浓雾保护了英格兰的城市。英国因此缓慢而稳步地恢复元气。当他们的力量恢复过来的时候，远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利比亚沙漠中，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英国人。在韦维尔将军领导下，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这样的胜利是鼓舞人心的。这一胜利也导致了伦敦监督处的诞生。这是英国第一个专门进行骗敌活动的国家机关。

独眼的韦维尔出生在温切斯特，体格强壮，是印度克莱夫式的人物。

丘吉尔领导英国军民进行不列颠战役之时，韦维尔成立对敌欺诈活动机构的计划酝酿成熟。兵不厌诈。作战时对敌人的欺诈活动是经常进行的。韦维尔总结了这种方法，同时指出，世界一切地方的一切行动，不管它们相距多么遥远，不管看来它们是如何互不相关，但彼此都会相互影响。如果在一个战场上对敌人进行欺骗活动并达到某一目的，那么，就要对其他战场的类似活动加以控制。要这样做，就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机构来监督、控制一切战区的欺敌行动。

韦维尔把他的建议写成《备忘录》，送交英国总参谋部。韦维尔在《备忘录》中说，“从人追捕人的时代以来，战争的一切计谋和策略，都是人在人身上用过的几种简单诡计的变种和发展”。他粗略地把这些诡计分为四类：伪情报或伪装，以退为进，鼓励叛卖和削弱敌人的士气。

“每一个司令官，应当经常考虑如何使对手误入歧途，利用对手的恐惧且使他们心慌意乱。”他说，“一切欺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你想要它注意的地方。高明的魔术师用的就是这些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迫使敌人做些有利于我们行动的事，例如把他的后备队调到错误的地方，或者不肯调到应该调去的地方，或者诱使敌人浪费精力”。

韦维尔《备忘录》广泛地谈到欺敌的方法，即特殊手段，包括可以用于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方面的计谋。《备忘录》还讨论了一个无比有效的策略——讯号欺骗。敌人能够从无线电通讯、电台的位置、不同环节所用的密码类型和通讯量来推断部队实力的大小、性质和目的。有时，为了欺骗敌人，须使敌人从它所截获的讯号、所得到的印象同敌人从其他欺骗来源得到的印象一致。

欺骗成功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它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除非透露给敌人的明显意图已经完全合情合理地包括在敌人的判断之内，否则诈骗是达不到目的的”。《备忘录》还强调了解敌人司令官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时刻大力追索这一级的情报。知道对方一个将军非常容易激

动，比知道他某年毕业于某参谋学院要有用得多。

《备忘录》最后着重说，使诈骗成功的辅助手段是保密。将诈骗掩藏起来不让敌人知道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倘若敌人看穿了虚构的事实，他就能推断出真实情况。因此，知道诈骗计划的人愈少愈好。

韦维尔将军的意见和他所写的《备忘录》受到丘吉尔首相的高度重视，这和首相本人的想法完全一致。

韦维尔得到批准，把他的理论在北非战场进行了试验。试验为日后实施战略、战术和使用诈骗技术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韦维尔率领的作战部队。面对着数十万人的意大利法西斯部队，比例是 1：10。

对英国来说，控制地中海是重要的，它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生命线”。通往苏伊士以东的自治领和波斯湾油田的最短航线，都要穿过地中海。墨索里尼在 1940 年 7 月 10 日向英国宣战后，立即制定计划，企图从利比亚向东，从意属东非向西北，从两个方面大规模出击，切断这条生命线。墨索里尼深知，切断这条生命线，就等于卡住了英国在非洲的咽喉。为了攫取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他在利比亚驻有完全处于战备状态的 20 万军队，在红海国家驻有 10 多万军队，加上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在非洲的总兵力约有 40 多万。

同这支数目庞大的法西斯军队相对，韦维尔手下的军队仅有 36000 人，计有一个不完整的坦克师，以及在中东、波斯湾和东非担任卫戍任务的几支小股部队。这些部队中，很多人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或者是土著武装，或者是行政人员，几乎都没有完成作战准备，而且迅速得到增援的前景是渺茫的。英国本土在严阵以待，希特勒正对英伦三岛进行狂轰滥炸，各条战线都很吃紧。人们都指望韦维尔将军用这支力量去守卫、确保和防卫英联邦在下列地区：埃及、苏丹、巴勒斯坦、约旦、塞浦路斯、法属和英属索马里、伊拉克、亚丁、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叙利亚和黎巴嫩等。

对韦维尔说，墨索里尼不是英国人在近东的唯一威胁。韦维尔预料希特勒随时有可能进军巴尔干，以控制地中海北岸，甚至直接出兵非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英国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当前只有一个因素对韦维尔是有利的，那就是，不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都不知道英国在这地区的实力多大。为了虚张声势，欺骗敌人，英国曾经煞费苦心大力渲染这个地区的巨大潜力。所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认为这很可能是真的，这对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仅靠这些，还不足以对付墨索里尼咄咄逼人的威胁。韦维尔记起，在 1917 年加沙第三次战役中，英国人曾用诡计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当时，韦维尔是埃得蒙·艾伦比爵士手下的一名军官。现在，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他不得不再次运用诡计，变得狡诈了。

面对墨索里尼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进攻，伦敦统帅部在短期内还不能派出部队前来支援，丘吉尔只派来了一个杰出的军官参加了韦维尔的参谋部。他是达德利·兰格尔·克拉克准将。他当时 41 岁，和平时期是个律师和关于布尔人和爱尔兰人“叛乱战术”的研究者。在敦刻尔克海上大撤退之后，克拉克应丘吉尔之请，曾负责起草过一项《备忘录》，促成了突击队的建立。现在他要用他的机灵的头脑和律师的技巧，帮助韦维尔用狡计欺骗意大利人了。

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后，即指令意大利参谋总部，从利比亚进攻英国军队，从而展开了他们的非洲战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于 1940 年 9 月 13 日，沿着海岸的狭窄前线进入埃及。英国人退却了，而且韦维尔似

乎不大可能在英国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以西的远处阻止格拉齐亚尼前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韦维尔认为，硬拼是不行的，只能靠智力取胜。

在韦维尔总司令的授意下，克拉克准将具体领导各个小分队的欺诈敌军的工作。他们假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数百个橡皮做的巡逻坦克。它们能够装进板球袋里，然后取出，像气球那样打进气去；野炮可装进饼干盒内；“两吨重”的载重卡车和发动机，放掉空气后还没有弹药箱大。在一次初级战术诈骗中，克拉克的工程兵修建了假公路和制造了坦克履带痕迹。公路一直修到西迪巴拉尼以南靠近格拉齐亚尼的军队驻地。然后，他们领来成群的带着骆驼和马的阿拉伯人，后面拖着犁形装置，掀起漫天云状灰尘，从空中观察像移动中的庞大的坦克纵队。

为了探听虚实，意大利的飞机飞来空中摄影。但高射炮使他们不能低飞，这样就阻止了他们侦察出地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格拉齐亚尼发现，在他的有翼像是有强大的坦克和大炮群，而且比他自己的坦克和大炮还要多得多。这位墨索里尼的元帅还获得情报说，来自伦敦、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格拉齐亚尼害怕了，他担心侧翼受敌并被坦克部队切断。于是，他随即命令他的部队，沿着亚历山大公路掘壕防守，停止进攻，静观局势。

对此，墨索里尼大发脾气，对前线指挥十分不满。尽管这位法西斯领袖一再催促尽早发动进攻，但是格拉齐亚尼仍不敢轻举妄动。从齐业诺的日记里可以看到“领袖”与将帅之间的矛盾。

“1940年9月16日。在埃及前线，进展缓慢，墨索里尼焦急不安。他对前线司令行动迟缓感到恼怒，这样可能使我们得不到战利品。其实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只是一些后卫战而已。”

“1940年10月12日。领袖归来。他对格拉齐亚尼非常生气，因为这位元帅对领袖要他发动进攻的命令又一次答复得拖拖拉拉。领袖说要撤换他，并提名让梅塞将军和韦尔切利诺将军代替他。”

“1940年10月16日。收到格拉齐亚尼元帅的报告副本。他说，在埃及重新开始进军至少需两个月。我立即将此件交给领袖。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愤怒心情。”

时间就是生命。韦维尔和克拉克持续采用这些战术，推迟了墨索里尼军队的进攻，使英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并接受从英国来的增援部队。韦维尔极其秘密地调动部队，然后于1940年12月9日出击。这次进攻是二次大战中最大胆的战役之一。尽管格拉齐亚尼的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结果全面退却了，而韦维尔的军队前进650英里进入了利比亚。到1941年2月7日，已俘获13万战俘、400辆坦克和1290门大炮，虽然韦维尔从来没有超过两个师的“沙漠耗子”——这是沙漠中英国军队的代号。韦维尔的胜利如此巨大，而损失却小得惊人。他手下只有500人死亡，1400人受伤，55人失踪或被认为当了战俘。

同时，在意属东非的英联邦小部队，仅以135人死亡、310人受伤和52人失踪的代价，在另一次大胆进攻中，俘获了阿奥斯塔公爵军队的50000名士兵。意大利的军队垮台了，在韦维尔前后发动的两次大战役中，共歼灭敌军20多万。墨索里尼建立非洲帝国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英国的这些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意大利军队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未能恢复元气。

此后，由韦维尔开创的欺诈战术，在非洲和地中海广泛使用。后来丘吉

尔首相把它命名为“特种战争”。它在打击敌人、保护自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3月中旬，“超级机密”又提供了情报，使英国取得二次大战中第一次舰艇战斗的胜利：马塔潘角之战。侦讯电台破译了德国空军和意大利舰队的“哑谜”密码电讯。侦讯电台透露，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计划对英国在地中海航行的支援韦维尔的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它甚至透露了进攻的日期：1941年的3月27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将军得到“超级机密”的情报后，会同韦维尔商量决定，命令那里的英国分舰队——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和9艘驱逐舰——生火待发。为了不让滨海的轴心国特务觉察舰队的意图，坎宁安身穿便服、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上了岸。天一黑，他就秘密回到舰上，然后他派一架森德兰水上飞机会侦察意大利舰队的维托里奥·纳内托旗舰，使意大利人相信，英国人是从空中侦察而不是靠破译密码觉察到它们从那不勒斯出港。

3月23日，坎宁安率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同他们的分舰队会合。英国舰队在马塔潘角外同墨索里尼的舰队交战。德国空军还没有来得及帮助它的同盟者，大部分意大利舰只就已被击沉，或被严重击伤。“超级机密”再一次帮助英国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优势。正如丘吉尔所写的：“马塔潘角外这一及时的和值得欢庆的胜利，在那严重时刻排除了墨索里尼在东地中海对英国海军制海权的挑战。”

就这样，在1940年至1941年英国孤军作战的困难日子里，中东总司令韦维尔运用这特殊手段打败了一心要在非洲称霸的墨索里尼、几乎使他全军覆灭。最后，这位专制魔王不得屈尊向希特勒紧急呼救，请纳粹德国火速派出军队帮他扭转战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九章隆美尔反扑

墨氏搬来救援兵，“沙漠之狐”立首功；

一时获胜狂得意，海市蜃楼是幻景。

正当墨索里尼在非洲焦头烂额之际，希特勒应“领袖”之求，速派一员“虎将”前去非洲，一来是帮助盟友，把意大利部队从韦维尔手中解救出来，二来想借机扩大自己在北非的势力。希特勒早就希望在中东建立一个日耳曼帝国，真是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希特勒选派的这位虎将，就是隆美尔。

这位将军，走马上任，好不威风。他先到罗马。在这里，他给了狂妄自大的墨索里尼一个下马威。他对“领袖”说：“作为非洲军团总司令，到了前线，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任何人不得干扰！我将根据形势，当机立断，发布命令。”墨索里尼听了觉得非常不是滋味，但在危难之际，求人解围，也只好如此这般了。

隆美尔是德国符腾堡人，1891年生于海登海姆。童年时代体质孱弱，在家读书读到9岁才转入当地的公立学校。他的父亲就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他的母亲是符腾堡州州长的女儿。隆美尔早年有志于飞行。

1910年，隆美尔作为士官生参加了步兵。隆美尔沉默寡言，但机警灵敏，头脑清醒。1914年，他高喊着德国青年战士狂热的口号，参加步兵的行列，走向战争。他的传记作者台斯蒙德·杨格写道：“从第一次上前线起，他就成为一个好斗的动物，冷静狡诈、残酷无情、不知疲倦、当机立断、勇敢非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转战于阿尔贡地区、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曾经两次受伤，获得过最高级的铁十字勋章和战功勋章。宣传家们开始为他唱赞歌。他们说，“前线在哪里，隆美尔就在哪里。”他被誉为具有“第六感觉”、“总是设法用战术来减少损失”、“全心全意”献身于帝国的人。他打起仗来欣喜若狂。除军事著作外，对其他书籍一概不感兴趣。他生活简朴，独身，对食物、酒类、戏剧、寻欢作乐都漠然处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隆美尔没有退役。1933年，他成为山地营少校营长。后来，他接受了一项任务，负责训练一支由希特勒青年团组成的队伍。训练中，他发现上级让他干的。实际上是培养一批“小拿破仑”，他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辞职。后来，他被提升为威纳·诺伊施塔德军事学院的上校院长。1938年10月，在德军占领苏台德区期间，希特勒任命他为陆军警卫营长，负责保卫“元首”的个人安全。隆美尔当时不是纳粹党员，后来他也没有参加纳粹党。希特勒之所以对这个无名军官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步兵战术的题为《步兵在进攻》的书。希特勒对这本书甚感兴趣，于是隆美尔就进入了“元首”亲信的行列。

开始，希特勒的魔力吸引着隆美尔。他认为，“元首”果断，勇敢，具有军事指挥家的韬略和才能。希特勒也器重隆美尔，认为他对纳粹德国忠心耿耿，能不顾一切地执行命令。因此，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希特勒就把他从上校提为将军，并奖给他一枚骑士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隆美尔在波兰战役中任“元首”行营的司令官，其后担任第十五军第七装甲师司令。这一个师的绰号叫“鬼怪”，是德军突破马斯河的先锋。英军于1940年5月21日在阿拉斯反攻时，他几乎被俘。之后，他统率装甲师经由拉巴西向利尔推进。他指挥的这一师是越过松姆河，

沿着塞纳河直指鲁昂的尖兵，曾席卷法军左翼，并在圣梵勒利附近俘获了大批英、法部队。他这一师最先进抵英吉利海峡，并在英国最后一批军队刚刚撤退后就进入瑟堡。在那里。隆美尔接受了 30000 法国军队的投降。

在入侵法国的整个战役中，隆美尔统率的第七装甲师，先后俘虏了 5 名法国海军上将、1 个兵团司令、4 个法国师长以及他们的参谋人员；缴获 277 门大炮、64 门反坦克炮、458 辆坦克和装甲车、5000 辆卡车、2000 辆骡马车、400 辆大轿车；他的部队抓了 97468 名俘虏，击落飞机 52 架，在地面俘获 15 架，摧毁 12 架。隆美尔率领的部队却损失微小：只有 48 名军官死亡，77 名军官受伤，士兵死亡 526 人，受伤 1252 人。

由于这许多战绩和功勋，他于 1941 年初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派往利比亚的军队司令。2 月 12 日，他率领部下抵达的黎波里，协同意大利军队与英军作战。那时墨索里尼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祈求据守的黎波里塔尼亚，而隆美尔的任务则是去攻占开罗，占领苏伊士运河。

隆美尔在非洲战役中自始至终表现出自己是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他特别擅长于每次战役之后迅速整编，连续作战，争取新的胜利。他善于掌握供应问题，藐视种种障碍和困难。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是放手让他去干，后来，对他的成就感到惊愕，怕他受骗上当，因此，有意抑制他。隆美尔热心进攻，猛打猛冲，一往无前；他识破了韦维尔的诈骗术，使英军遭到惨重损失。因此，丘吉尔在 1942 年 1 月在下院讲话时，对这位德国将军赞叹不已。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

隆美尔咄咄逼人的攻势，对英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1941 年 3 月 2 日，韦维尔向英国统帅部报告说，阿盖拉隘路是全局的核心。如果隆美尔突破阿杰达比亚，那么班加西以及托卜鲁克以西的一切据点便岌岌可危。但是，只要英军据守在阿盖拉的门户，德、意法西斯的进攻就会遇到困难。

为了加强阿盖拉的防务，迎击隆美尔的进攻，3 月 17 日，韦维尔将军和迪尔将军到昔兰尼加亲自视察。他们乘汽车经由安特拉特到阿盖拉，迪尔立即感觉到防卫阿盖拉与班加西之间大片沙漠地带的困难。他在 3 月 18 日从开罗发给英国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中说道，显著的事实是：在阿盖拉与班加西以东的那些盐田之间的沙漠，一片空旷，很适宜于装甲车辆的行驶。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较强的装甲部队将获得胜利。步兵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当然，在这些辽阔的沙漠中，给养问题至关重要。面对着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隆美尔装甲大军，韦维尔处境险恶，目前他正在心急如火地解决防务方面的难题。在他攻克班加西之后，为了向希腊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为了尽早解放墨索里尼在东非的殖民地，他已派出了相当数量的军队，而只在昔兰尼加留下少数装甲部队和一个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澳大利亚师。近来，意大利的空军正配合隆美尔加紧袭击班加西，使英国的供应船只不能利用该港，这也增加了防守的困难。

3 月 31 日，英国人所担心的隆美尔对阿盖尔的进攻果然开始了，尼姆将军奉命在敌人进逼时，打一场拖延战，然后退到班加西附近，并尽量持久地掩护该港。他还奉命在必要时破坏该港，然后撤退。因此，在激战两天后，部署在那里一个英国装甲旅就缓缓地撤退了。在空军方面，当时轴心阵营确实比英军强得多，除了墨索里尼的百余架飞机整天进行袭扰破坏外，隆美尔司令部最近又从德国调来 100 架战斗机和 100 架重型轰炸机。韦维尔将军 4

月2日报告，昔兰尼加的前哨部队受到德国一个装甲师的袭击，昨日有几个哨所受到破坏，尼姆的装甲旅损失严重，大部分车辆在短期内不能修复重新参加战斗。

丘吉尔对利比亚前线情况十分关注，他电示韦维尔说，要尽量坚持，除非万不得已，不能撤退。

4月2日，英国第二装甲师的支援部队，被隆美尔和墨索里尼联合组成的坦克大军逐出阿杰达比亚而撤至其东北35英里的安特拉特境内。韦维尔将军于4月3日飞临前线，归来后报告说，装甲旅的大部分遭到占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已溃不成军。这将使班加西以东及东北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左翼失去掩护。他说，由于敌人在利比亚的兵力强大，第七澳大利亚师不能开往希腊，而必须调往西邻沙漠。英国第六师仍未装备停当，心须留作后备。

形势确很严峻。带有关键性意义的沙漠侧翼阵线，几乎在一天之内便崩溃了。攻占墨索里尼所控制的罗得岛，是英国空军在爱琴海作战计划的重要部分，现在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这一出乎预料的新形势使丘吉尔坐卧不宁。他暗自思索：“我们不能和德军对阵，他们一上战场就足以把我们逐退数十英里。这可能在整个巴尔干和土耳其引起最恶劣的反响。”这位战时首相千方百计地力图扭转这一局势。

韦维尔应首相之命，让奥康纳将军接任前线司令官的职务。这位将军当时尚未恢复健康，他向总司令表示，在战争中间，最好不要接替尼姆的司令职务，而是让他利用其对于当地的专门知识从旁协助。韦维尔同意了，这次商定的办法来得顺利实行，或者说没有实行多久。4月6日夜，英国大批军队从班加西撤退。第九澳大利亚师也沿着海岸公路向东撤退。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尼姆将军偕同奥康纳将军乘坐一辆汽车，未带任何护卫，从一条小路抄过去。在黑暗中，他们突然被一队德国巡逻兵截住。德国人从车窗伸进手枪对着他们。这两位英国将军还未来得及抵抗，就被擒住作了隆美尔的俘虏。尼姆曾获得维多利亚勋章，而奥康纳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英国最有经验最有成就的沙漠地区司令官。韦维尔失去这两位英勇善战的陆军中将，有如失去左右臂，不胜悲痛。

真是祸不单行。韦维尔4月8日飞往托卜鲁克，并下令保卫这一要塞。黄昏时分，他动身返回开罗。途中飞机引擎损坏，他们被迫在黑暗中着陆。飞机撞毁，他们步出飞机，站在空旷的沙漠上，不知身在何处。这位总司令决定将他的秘密文件焚毁。他们等了好久，看见一辆车上的灯光。万幸，这原来是一队英国巡逻兵。在开罗的人员因韦维尔失踪，在这6小时中，一直惶恐不安，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韦维尔回判开罗后，立即复电伦敦统帅部。他在详述部队的情况后说：“虽然敌军经过初步行动已经因顿不堪，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有乡长的喘息时间，我仍然很焦虑。托卜鲁克并不是一个好守的地方，其后方的漫长交通线几乎毫无掩护，而且交通混乱。”尽管如此，他仍作出了据守托卜鲁克的决定。韦维尔建议，在巴迪亚—塞卢姆地区驻扎一支部队，尽量提高其机动性，以便保护交通线，并在敌人进攻托卜鲁克时袭击其侧翼或后卫；同时，在马特鲁港地区按计划布防，防止敌人各个击破。这位总司令在做出上述部署之后，深感实力有限。特别是在机动与装甲部队方面，经过一年的沙漠征战，损耗巨大；再加上最近对希腊的支援，主力部队的调走，他手下的军力

非常空虚了；尤其是目前又碰上一个诡计多端、勇猛顽强的对手，确实困难颇多。他望眼欲穿地盼望最高统帅部运来重武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是在同时间竞赛啊！

4月12日，德、意法西斯联军又重新发起了进攻。以墨索里尼的一个装甲师和步兵师为先导，首先攻占巴迪亚，接着隆美尔以重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周围。其后，德、意空军又轮番轰炸。韦维尔鉴于形势已变，有的将领被俘，立即改组指挥系统，并加强战地动员工作，号召将士坚守阵地，勇敢杀敌。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终于打退了德、意法西斯的进攻，并生俘德军二三百名，敌人坦克和飞机的损失，远远超过英军的损失。这次战斗使隆美尔初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在中地中海切断敌军的供应方面，也获得显著的成就。4月16日凌晨，从马耳他岛驶出的4艘驱逐舰，发现一支由5艘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型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船上满载军火和机动车辆，并有3艘意大利驱逐舰护航。这支运输船队和所有的护航舰都被击沉了。在这场战斗中，英国只损失了1艘驱逐舰。

尽管昔兰尼加的局势稍有好转，但是瞻望未来，仍不免使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惴惴不安。虽然他韬略满腹，但是他的坦克装甲力量实在薄弱。而在敌军方面，墨索里尼和隆美尔仍不甘罢休，正在加紧备战。双方都在摩拳擦掌，运筹帷幄，企图战胜对方。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北非战场出现了一种互有胜负的拉锯战。

4月下旬，希特勒又为墨索里尼在利比亚增派了强大的装甲师。这个师拥有400辆坦克，其中育138辆是中型坦克。如果隆美尔能解决供应问题，这将给英军带来巨大威胁。这时韦维尔十分焦急，他火速给丘吉尔发了个电报，要求到5月底能力中东前线提供两团巡逻坦克，以代替被击毁的坦克，而目前在埃及则有足够编成六个坦克团的受过训练的优秀人员。韦维尔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巡逻坦克的重要性。他说，“在沙漠作战中，步兵坦克的速度和活动半径都显不足，务请总参谋部鼎力协助”。

丘吉尔读了这封令人吃惊的电报之后，决定不再考虑海军部的反对，径行派遣一支运输船队装载韦维尔将军所需要的全部坦克，通过地中海直接开往亚历山大港。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丘吉尔请伊斯梅立即携带这份《备忘录》前往伦敦，并说明他对于采取这一步骤是极为重视的。

《备忘录》说：“请看一下韦维尔将军最近发来的电报。中东战事的命运是吉是凶，我们是否要丧失苏伊士运河，我们在埃及建立起来的大批部队是否要一败涂地或陷于混乱状态，美国通过红海同我们携手合作的一切希望是否会破灭，这一句都要取决于几百辆坦克。如果可能的话，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装甲车辆运到。”

《备忘录》进一步指出：“达到这一重大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派遣w·s·第七号运输船队中的车辆运输快速舰只，取道地中海开往亚历山大港。韦维尔将军的电报指明，他所需要的是坦克，而不是人。我们必须冒丧失这些车辆或其中一部分的危险。即使只能运到一半，也可扭转局面。”

当伊斯梅将军抵达伦敦时，三军参谋长正在开会，他们就丘吉尔的《备忘录》进行讨论，直到深夜。他们最初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不赞成。使车辆运输舰安然通过地中海的希望不大，因为在进入海峡前的一天和在驶过马耳他岛以后的那天早晨，它们势必将遭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俯冲轰炸机的袭

击，而这些海域又都在英国海岸基地战斗机的航程以外。会上有人表示这样的意见：国内的坦克力量薄弱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如果再以大量的坦克支援海外部队，本土的防御力量将更加薄弱。

但是，在国防委员会第二天开会时，经过丘吉尔进一步阐明支援中东坦克的必要后，许多大臣和高级将领转而支持他的意见“空军参谋长波特尔空军中将说，他将设法安排一个“勇士”式战斗机中队在马耳他岛加强掩护。丘吉尔要求委员会再考虑增加 100 辆坦克，即总数为 307 辆坦克交这支船队运输，庞德海军上将立即表示同意。会议决定将这个计划称之为“老虎”计划。4 月底，这支运输船队冒着风浪起航了。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的时候，4 月 24 日，韦维尔向伦敦总参谋部报告，空军战斗机方面的情况相当严重。派往希腊的“旋风”式战斗机已损失殆尽，而且由于敌人最近空袭托卜鲁克，驻在该地的一大部分“旋风”式战斗机也被击毁击伤。空军中将朗莫尔认为，要想在托卜鲁克区内驻扎一个战斗机中队，不过是徒然招至重大损失。因此，在战斗机队的生力军建立起来以前，敌人在托卜鲁克一定会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这天早晨，英军击退了一次进攻，毙伤很多敌军，并俘虏 150 人。

不久，韦维尔将军又报告了关于隆美尔的军援即将抵达的消息，这更加令人不安。他们预计，希特勒的第十五装甲师、第五轻摩托师和墨索里尼的阿里埃特师、特兰托师装备齐全后，将于 6 月中旬进军，而不是在 7 月以后进军，这比以前的估计提前了两个星期。

在其后的两个星期中，丘吉尔急切的注意力和焦躁不安的心情都集中到“老虎”计划的命运上了。这位首相并未低估第一海务大臣所冒的风险，他也知道海军部正为此捏着一把冷汗。这支运输船队包括 5 艘时速 15 海里的船，在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的 H 舰队的护卫下，于 5 月 6 日驶过直布罗陀。同这支运输船队一起航行的还有增援地中海舰队的舰只，其中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巡洋舰“水上水神”号、“斐济”号。5 月 8 日，敌机屡屡空袭，均被击退，英方未受损失，7 架敌机被击毁。但是，在当夜，运输船队中有两艘船在驶近突尼斯海峡时触雷。其中之一“帝国颂歌”号爆炸起火，随即沉没；另一艘“新西兰之星”号，还能继续随运输船队航行。在驶抵斯可基海峡入口处之后，萨默维尔海军上将与运输船队分手，驶回宣布罗陀。他派遣 6 艘驱逐舰随同巡洋舰“格罗斯特”号去增援护航舰只。5 月 9 日下午，坎宁安海军上将抓紧机会将一支运输船队送到马耳他岛，然后在马耳他岛之南 50 英里处与“老虎”运输船队会合。于是他的全部舰只都朝着亚历山大港驶去。当丘吉尔闻讯这支运输船队已平安驶过突尼斯海峡，并已得到经过增援加强的地中海舰队全力保护之后，不胜欣慰。这是他寄予厚望的运输船队，他急切希望这批“虎仔”被送到战场之后，能为扭转战局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英国撤出希腊并在克里特岛遭到失败之后，举国上下迫切希望在西部沙漠击败隆美尔。作为中东总司令的韦维尔，更希望早日粉碎隆美尔和墨索里尼的猖狂进攻，从而解除托卜鲁克之围，使一切得到补偿。因此，他对“老虎”计划抱有信心。他知道，经由地中海运给他将近 300 辆坦克的努力意味着什么。他精神焕发，准备再战，以振士气。5 月 7 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说：“你和你的将军们可以自行判断，战术上的可能性是在塞卢姆，还是在托卜鲁克；但是，如果‘老虎’计划成功的话，那就可以放手大干了。

‘老虎’计划一经完成，我便命令从马耳他岛抽调‘旋风’式飞机给你。那些德国鬼子一旦丧失主动权，就远不是那样危险可怕了。我们的心和你的心在一起。”

韦维尔是个雷厉风行、果敢顽强的将军。他力图争取主动，想趁那声势逼人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从黎波里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到达以前，趁班加西还未被敌人有效地开辟为供应捷径以前，击败隆美尔。因此，他甚至想在按“老虎”计划运到的坦克能参加作战之前，就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动进攻。当时，西部沙漠的装甲部队只有驻扎在马特鲁东南的两中队巡逻坦克和两中队步兵坦克。韦维尔希望，到6月初，能把这个部队建成一支有力的打击力量。他认为，他已看出了一个可以在“虎仔”准备就绪之前下手的机会。为此，他已命令将现有的坦克全部拨给戈特的部队使用，以便在塞卢姆地区发动攻势。

5月15日，在戈特将军的指挥下，一支大约配备有55辆坦克的部队，向隆美尔和墨索里尼的守军发起进攻，一举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在左方的一支部队则向西迫阿最兹进军。但是，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十分乐观。在初步进军肃清了塞卢姆—巴迪亚地区的敌军以后，德、意装甲部队接着反击，迫使英军撤退到哈尔法亚。这次虽然俘获德军500名，并且使敌军在兵员与坦克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东非前线传来捷报，阿奥斯塔公爵投降，阿比西尼亚全境光复，俘获墨索里尼军30000多人。从此结束了东非战事。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

然而，灾难不久就降临了。在其后的一星期中，德国第十五装甲师陆续开抵前线。这样，在隆美尔获得增援之前击败他的机会就丧失了。尽管事前进行了准备，但“虎仔”的起卸、装配以及使它们适合沙漠作战的工作，耽搁了战机。用装甲兵的术语来说，“虎仔”的断奶和“长牙时期的病痛”都需要一段时间。使人焦虑的是，许多步兵坦克运到后，尚不能马上投入战斗。

在其后的一个星期中，发现敌军装甲车辆调动频繁，从以后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隆美尔在墨索里尼的鼓动之下，正计划发动猛烈攻势，以便缓和托卜鲁克的局势。为此，他决心要克复哈尔海亚并据守该地，使英军在托卜鲁克的处境更加困难。他部署了新到达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大部分部队，除了把其中一支小侦察队派往南面之外，主力集中于卡普措堡与西迪俄马之间的边界上。在盟军方面，哈尔法亚是由一支混合部队据守的，其中包括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第三营、一个炮兵联队和两个坦克中队。其余的边界守军，除了派往南面的侦察巡逻队之外，已经向后方撤退了相当距离。

5月26日，德、意联军继续向哈尔法亚推进，当晚夺取了隘口北部的高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所据守的全部阵地。英军试图夺回这一高地的反攻未能得手。第二天早晨，敌军在猛烈炮击之后，以至少两个营和60辆坦克的兵力开始出击，这使人数不多的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守军处境十分危险，守军经过激烈战斗撤出阵地，但损失惨重，坦克只有两辆还能使用，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损失官兵170多人。失去哈尔法亚，给日后英军的反攻，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这时，韦维尔怀着渴望和怀疑的心情，等候即将在沙漠中开展的攻势，他希望这次攻势可能对盟军产生有利的结果。为了使第七装甲师能够熟练地掌握“虎仔”，曾额外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根据英国中东司令部掌握的情报，敌人已运入或正在运往东昔兰尼加的部队，除第十五装甲师外，还有德

国的第五装甲师以及墨索里尼的，一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步兵师。早在“战斧”作战计划开始前，隆美尔已成功地在英军阵地前秘密集结了 200 多辆坦克。

为了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韦维尔于 6 月 15 日提前开始他的“战斧”作战计划。由克雷将军统率英国的装甲部队，梅塞维将军统率第四印度师和第二十二警备旅。全部力量约 25000 人，主动向德、意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攻击。最初，虽然敌人在哈尔法亚周围的防守顶住了南北两方面的夹击，警备旅还是在下午攻克了卡普措堡，俘虏敌军数百名。这个旅的一部分部队又向塞卢姆西面的防御地带推进，但是被敌人挡住了。6 月 16 日下午，敌人出动了强大的坦克部队从西面包抄过来。很明显，隆美尔的意图是要围歼英国进攻的部队。这时英国第七装甲师及其支援部队，都出动去应付这一威胁。他们在西迪俄马附近与敌军交锋，但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回。因此，应由该师掩护的一个主要进攻侧翼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第二天，即 6 月 17 日，情况愈加恶化。敌人继续发动攻击，一支拥有 100 辆坦克的装甲部队，从英军手中夺去了卡普措堡。第七装甲旅这时能使用的巡逻坦克仅有 20 辆左右。为了使警备旅不受敌军的威胁，克雷将军命令：第七装甲旅向南面进攻；第四装甲旅则向北面进攻。但是，第四装甲旅刚刚开拔，敌人另一支约有 200 多辆坦克组成的装甲纵队从西南开来，威胁到了警备旅的侧翼。第四装甲旅击退了这次进攻，但是敌军的压力继续加强。为了避免陷入敌人的重围，17 日英军又主动撤退了。

在这三天的战斗中，英军共伤亡 1000 多人，丧失巡逻坦克 29 辆，步兵坦克 58 辆。巡逻坦克大部分是被敌军击毁的；损失的步兵坦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机件损坏，没有运输工具把它们拖回。在这次战斗中，虽说德军也损失了 100 辆坦克，死伤 1000 多人，但他们在各方面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战斧”行动虽然同地中海地区的历次战役比较起来，规模不大，可是它的失败对迫切需要振奋士气的英国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丘吉尔听到这个消息后，来到恰特韦尔庄园，他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达数小时之久。他一个人独自在想：“韦维尔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了。可以说，我们已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各不相同的战区的非常任务都压到总司令一人身上，而且各战区的战事时得时失，尤其严重的是失利的战局，这种情况所形成的压力是军人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过的。”在中东前线视察工作的艾登大臣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 10 年”。还有人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而墨索里尼却又被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认为把英国人驱逐出利比亚指日可待，他又可以重温非洲大帝国的旧梦了。

丘吉尔经过反复考虑，为了及早扭转战局，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他打算调印度总司令奥金莱克担任中东总司令，而让韦维尔去担任印度军总司令。丘吉尔相信，任命奥金莱克就是让一位生气勃勃的新人物去肩负中东的复杂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韦维尔将在那规模庞大的印度司令部内获得时间，以便在那些新的、迫在眼前的挑战和机会来到之前，恢复他的精力。丘吉尔的建议在伦敦的内阁和军界人士中获得通过。于是，他向韦维尔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说：“我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任命奥金莱克将军去接替你指挥中东部队，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你在胜利和失利时对部队指挥和统率有方，使

我不胜钦佩，同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胜利，将蜚声于英国陆军历史，并且对我们赢得这次艰苦战争的最后一胜利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贡献。但是，我觉得，在你长期肩负了这样艰巨的任务以后，这个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战场，需要一位具有新目光的人，需要一位新手。我确信，你是接任印度总司令的最适当人物和最卓越的军官。”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为战时内阁的国务大臣：他的身分是战时内阁驻中东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要替中东最高司令部主持一切非军事事务，并遵照英国政府的政策，协调国内外关系。丘吉尔希望这一切人事更动将给英国在中东的活动带来莫大的生气和推动力量，并保证来自国内外的庞大的人力、物力获得充分的利用。墨索里尼虽然急于借隆美尔之手把英军赶出利比亚，并妄图攻占开罗，但一切并未如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章争夺海洋通道

海浪滔滔狼群嚎，作孽多端定有报；
无数舰船遭其害，斩妖保道看英豪！

纳粹情报部长蒂佩尔斯基希将军声言，英国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十分清楚，针对英国航运的斗争，要到1940年德国建造潜艇的计划初见成效之后，会达到十分激烈的程度，当英国人作出这种预测时，他们还完全没有料到，挪威以及波尔多以北的法国西海岸会丢失，1940年春季，德国海军和空军还忙于进行挪威战役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在英国航运上进行的斗争。

法国战败后，希特勒根据雷德尔将军的建议，在新的条件下加紧对英国争夺大西洋海上通道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德国海军和空军已经掌握了对英国商船队顺利作战的最有利的战略条件，德国潜艇已不必从黑尔戈兰湾远航到敌人的海上交通线，而过去这样做要耗费大量的油料，并缩小了潜艇的活动半径。德军潜艇再也不必由北迂回不列颠群岛了，因此它们就能在作战区域停留长得多的时间。它们的航路已由1500海里缩短到500海里。

在战争的头12个月中，德国共有29艘潜艇服役，它们除了具有海上战略的有利态势外，对付护航运输队的战术也在不断完善，这种战术把以前对付单艘舰艇所用的战术降到了次要地位。现在，如果一艘潜艇发现了护航运输队，就向其他潜艇发出召唤，并在所有潜艇编组队形实施联合攻击之前，对护航队进行监视。一俟护航运输队进入远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还要召唤远程轰炸机参加攻击。由于采用这种战术，护航运输队的损失迅速增大，引起了英国人的严重不安。

德国潜艇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到了水面舰艇的配合。对水面舰艇来说，挪威和法国新基地的位置恰当，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潜艇可以从这些基地十分迅速、十分隐蔽地进入大洋。如果英军空中侦察没有发现它们由基地出航。那么，英国海军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发现并制止它们进一步的行动。1940年4月和6月，5艘辅助巡洋舰驶离德国港口，开始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游弋。截至1940年10月前，它们共击沉36艘船只，总吨位达22.5万吨。10月底，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谢尔”号出海担任袭击任务，起先，它在北大西洋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了6艘船只。接着它便南下南大西洋，前后6个月共击沉和截获英国船只或英国人租用的船只，总吨位达11.3万吨。1941年2月12日，德国巡洋舰“希珀尔”号在亚速尔群岛以东遇上英国没有护航的19艘船只，击沉了其中7艘，剩下的船只利用浓雾逃跑了。到1940年底，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的和从盟国及中立国租用的船只，已有583艘被击沉，总吨位达250万吨，这对英国来说是十分巨大的损失！

1940年夏，纳粹新的空中和海上袭击，还给英国带来了另一些极为严重的后果。德国航空兵的轰炸，德军潜艇和鱼雷艇的威胁，使英国南海岸和东海岸的所有港口，其中包括特别发达的伦敦港，实际上已陷于瘫痪，因为商船的损失已达到很大的程度。由于爱尔兰是中立国，不能提供港口供英国人使用，所以他们只能利用克莱德河与默西河的两河口的爱尔兰海诸港。这样，当船只由大洋驶近，并由北绕过爱尔兰时，便不可避免地聚集在一起，从而为德军潜艇和飞机完成袭击任务大开方便之门。许多港口的负担已大大超过

其吞吐能力。这就使船只来不及卸载，造成港口阻塞。况且，铁路运输能力也不够大，不能迅速将卸载的物资运出去。10月份，利物浦港和布里斯托尔港船只的卸载的周期延长了一倍。卸载不够快，护航运输队的航行又较慢，有时还要绕远路，这些都大大延长了船只周转期限。现在吨位得不到充分利用。例如，油料进口缩减到了需要量的2/3。情况已十分吃紧！

1941年新年伊始，狂风暴雨的袭击骤然加剧，来自大西洋的威胁愈来愈严重了。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丘吉尔说：“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的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进并出入我们的港口。”

如今，德国人控制着北起挪威马格品岛，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被称为“狼群”的敌潜艇十分猖獗。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英国海上运输的粮食、军人和商品。而且它们的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在1941年的第一季度，新潜艇的生产率是每月10艘，不久后就增加到每月18艘。这些潜艇包括500吨型和740吨型两种，前者的巡航航程为1.1万海里，后者则达1.5万海里，构成了海上运输的严重威胁！

这时，除了德国潜艇带来的灾难以外，还有远程飞机在远洋所进行的空袭。在这些飞机中，被称作“兀鹰”的“福克乌尔夫200”式飞机是最可怕的一种。它们可以从布雷斯特或波尔多起飞，在不列颠岛上空盘旋一周，到挪威加油，然后于次日返航。英国由于缺乏护航舰，不得不编成包括四五十艘船只的庞大运输船队，敌人的远程飞机在途中可以从高空俯瞰这些运输船队和个别船只，也可能把方位示知待机而动的潜艇，以便进行截击。因此，不仅船舶遭到严重损伤，而且海运量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减。

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航运，采取了包括护航、变更航线、使用消磁电缆、扫雷、不走地中海航线等措施。大多数船只的航行时间和航行距离都有所延长。同时，由于轰炸与灯火管制，船只在港口也要拖延些时日。船舶的有效运输力大为减低。在开始的时候，海军部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船只能够安全进港，并以沉船愈少则成就愈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就。但是，现在却不能以此为衡量的标准了。大家一致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和作战活动，都依靠安全到岸的进口物资的数量。丘吉尔在2月中旬向第一海务大臣发出备忘录说：“我了解到1月份载货进口的船只不及去年1月份的一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认为对英国的生存有极大关系的伦敦港，这时的吞吐量降到了原来的1/4。

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公布的资料，如果把水面潜艇、航空兵和水雷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1941年1—5月份，英国被击沉的船只吨量是：1月份32.5万吨，2月份40.17万吨，3月份53.74万吨，4月份65.396万吨，5月份50万吨。从1940年6月起，一年内仅德军潜艇就击沉了英国及其盟国和中立国船只近300万吨。此外，水面舰艇和航空兵击沉以及水雷炸沉的船只还有100余万吨，在此期间，直接参加作战的德国潜艇，由平均10艘增加到30艘。潜艇的损失平均每月为2艘。当时服役的潜艇平均数量，大大超过上述损失的数量。

被击沉的船只数字不断增大，迫使英国人采取一个又一个的新措施，但每一个新措施都影响了剩余船舶吨位的使用。除早已实行的、大大降低了船只航行速度的护航运输队体系外，又开始实行新的绕道航行办法，这样就大

大降低了船舶周转率，使未使用的吨位数超过了损夫的吨位数。损坏的船只数量竟大到船坞容纳不下的程度。为了加速修理，只好压缩了建造新船的数量。进口规划成了复杂的数学题：为了满足对各种供给品的急需，要进行最周密而精确的计算。

压力在不断地增加，同时船舶的损失远远超过新产的船舶。美国的庞大资源只能缓缓地发生作用。而且送进船坞要修理的被击伤的船只数量。远远超过现有的修复能力。3月初，送进船坞的船只共达260万吨，其中有90万吨位是一面修理，一面装货，近170万吨位的船只不能使用。面对这些难题，丘吉尔感叹地说：“我是多么愿意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来替代这些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表明的难以捉摸、难以估量的危险啊！”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十分狂妄。1941年1月30日，他在柏林发表演说时以毁灭相威胁，并且信心十足地指出，他们正以海、空军联合作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对英国实行包围。他希望这样会使英国弹尽粮绝，屈膝投降。他说：“到了春季，我们将在海洋中展开潜艇战，而且他们将会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睡大觉（法西斯匪徒们全场欢呼）。空军也将发挥作用，全部武装部队将迫使他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到时候，丘吉尔必须甘拜下风。”

在此期间，德国人除了在上进行潜艇战以外，还以威力强大的巡洋舰进行出击，使英国海军蒙受严重损失。曾经在1940年11月间击沉英国著名的“逸佛斯湾”号的德国“希尔”号巡洋舰，在1至3月间，又击沉英国运输船只10艘，共计6万吨。1月底修复的德国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在纳粹海军上将卢金斯指挥下最初试行驶出时，差一点被英国的本土舰队击毁。久久不散的大雾使它们得救。2月8日，这两艘德国战斗巡洋舰游弋在哈利法克斯航线上，了望到一支正在驶近的英国运输船队。德舰立即分开，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袭击。突然间，他们意外地发现这支运输船队由战列舰“拉米伊”号护航。这时，卢金斯上将立即撤走。他要避免和一艘势均力敌的敌舰交锋。

卢金斯足智多谋，惟恐英方反击，便驶往更南的海域。3月8日，他遇到了从弗里敦开来的一支运输船队。但是，这次他又发现其中有一艘战列舰——“马来亚”号，因而只得召集潜艇，让他们集结前来袭击。潜艇击沉了5艘运输船。他在这一海域露面以后，便再度回到西大西洋。他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3月15日，他截击从一支出航的运输船队中掉队的6艘油船，把它们全部击沉或虏获。第二天，他又击沉船只10艘，大多数是属于那同一支运输船队的。这样，他在两天之内便击毁或虏获了8万吨以上的船舶。在其后两个月的巡航中，“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共击沉或俘获船只22艘，总吨位达11.5万吨以上。

神出鬼没的德国战斗巡洋舰“希佩尔”号，自1940年12月初闯入大西洋后，经常为非作歹，给英国海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它威力强大，机动灵活。它的作战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它经常出奇制胜。3月中旬，它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巡航时，发现一支从塞拉利昂返航的运输船队。它悄悄接近后就猛烈开火，在历时一个小时的激战中，19艘船只被它击沉7艘。它无意恋战，捡到便宜就逃之夭夭了。英国海军对他十分伤脑筋。

威力强大的敌舰的出现，迫使英国几乎把每一艘足资利用的主力舰都用于护航。有一个时期，本上舰队总司令手下只有一艘战列舰。丘吉尔日日夜夜地思虑这个问题。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他指示总司令托维海军上将，把新

出厂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战斗巡洋舰“胡德”号部署在斯卡帕湾。在直布罗陀港，有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统率的“声威”号和“皇家方舟”号。

“却敌”号和新航空母舰“胜利”号，即将护送一支载运 20000 余人的运兵船队到中东去。“罗德尼”号和“拉米伊”号在大西洋上护航。它们之中任何一艘，如果单独同德国新下水的“俾斯麦”号相遇，都有可能被击沉。“复仇”号在哈利法克斯港正准备出航。这时，航行在海面或准备出航的运输船队共有 11 支，其中包括一支运兵船队。巡洋舰在北海的各处海口进行巡逻，空中侦察队警惕地注视着挪威海岸。海上的形势是不分明的，气氛是很紧张的，经常同丘吉尔保持联系的海军部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也敏锐地感觉到分布在各个海域的商船已成了敌人的猎取目标。

5 月 21 日凌晨，英国海军部获悉，德国两艘很大的战舰在强大的掩护舰只的伴随下，驶出了卡特加特海峡。当天晚些时候的情报证实，“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都已停泊在卑尔根峡湾。显然，重要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于是，英国在大西洋的全部指挥机构立刻开始了紧张的活动，海军部采取了正确的传统的原则：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的袭击舰队，而听任运输舰队，甚至那支运兵船队去冒险。

5 月 22 日，星期四，是情况多变、令人不安的一天。北海上空布满乌云，而且下起雨来。尽管天气恶劣，一架从哈特斯顿起飞的海军飞机还是飞到卑尔根峡湾，冒着猛烈的炮火，坚决地完成了侦察任务。“那两艘敌舰已经不在那里了！”当托维海军上将在当晚 8 时接到这一消息时，他立刻登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率领“胜利”号、4 艘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在北海西面占了一个中心位置。这样，敌人无论选择在冰岛的哪一面行动，他都可以支持他的巡洋舰巡逻。第二天早晨，“却敌”号在海上同他会合。海军部断定敌舰可能通过丹麦海峡。当天晚上，丘吉尔在收到报告几分钟后致电罗斯福总统，要美国海军在追踪敌舰方面予以协助。

德舰“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实际上在 24 小时以前就离开卑尔根了，这时正在冰岛的东北，向丹麦海峡驶去。这里流冰群拥塞，把海峡缩小到仅有 80 英里宽，海峡大部分笼罩着一片浓雾。23 日傍晚，“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先后发现两艘军舰从北方驶来，正在上空无云的一片海域中擦着流冰的边缘驶过。海军部先收到“诺福克”号的观测报告，于是立刻用密码通告一切有关方面。追击开始了，目的物已经在望，于是所有的舰队都向敌舰驶去。总司令的旗舰向西航行并加快速度。“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调整了方向，以期在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在冰岛的西面截击敌舰。海军部通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 H 舰队向北高速行驶，以保护当时已驶过爱尔兰海岸一半以上的那支运兵舰队，或者参加战斗。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已升火待发，于 5 月 24 日晨 2 时离开直布罗陀。后来证明，这些舰只的启航注定了“俾斯麦”号的命运。

丘吉尔和几位海军将领，于 23 日下午前往契克斯。他们预计“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将在拂晓通过丹麦海峡，而且“威尔士亲王”号和“胡德”号连同两三艘巡洋舰将迫使它们交战，这天夜里，首相和他的参谋人员，焦急不安地等了半宵，直到两三点钟才去就寝。

大约在 7 点钟的时候，丘吉尔被叫醒去听可怕的消息。英国最大的也是最快的主力舰“胡德”号已被炸沉，它装有 15 英寸口径的大炮 8 门，是英国

最珍视的军舰之一。丧失这艘主力舰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丘吉尔十分难过，但是他相信英国海军一定能打沉“俾斯麦”号。

原来，在那天夜晚，“诺福克”号和“萨福克”号在雨雪交加之下，不管天气如何恶劣，不管敌舰如何尽力想摆脱它们，还是非常巧妙地盯住了它，而且它们的信号整夜不停地指出敌舰、友舰的确切位置。当北极的黎明逐渐变为白昼时，可以看见“俾斯麦”号在南面12英里处向南行驶。“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都已赶到视线之内。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即将开始。天色渐亮了，在“胡德”号上可以判明敌舰正在西北17英里的海域。英国舰只当即开战。“胡德”号于早晨5点52分在距离敌人25000米处开了炮。“俾斯麦”号还击，“胡德”号当即中了一颗炮弹。这颗炮弹使该舰4英寸口径的大炮起了火。火焰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一直烧到舰上的整个中央部分。这时，英方所有的舰只都投入了战斗，德国“俾斯麦”号也中了弹。突然间，灾难临头了，在6点钟的时候，当“俾斯麦”号发射了它的第五次排炮后，“胡德”号发生一阵猛烈的爆炸，船身一分为二。几分钟后，它就在烟雾弥漫中沉没在波涛之中了。除了三人外，它的1500多名英勇的官兵，包括兰斯洛特·霍兰海军中将和拉尔夫·克尔海军上校在内，全部遇难。

“威尔士亲王”号迅速改变航向，以便避开“胡德”号的漂在海面的残物，并且继续这场不相匹敌的战斗。不久，“俾斯麦”号的炮火就打中了它，在几分钟之内，中了4枚15英寸的炮弹，其中有一枚击毁了舰桥，舰桥上的人非死即伤，这时舰尾的水下部分也被击穿一洞。利希海军上校是舰桥上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决定暂停战斗，于是在烟幕之下离开了战场。但是“威尔士亲王”号已使“俾斯麦”号受到了毁坏，因此该舰的速度减低了。事实上，“俾斯麦”号水下船身被两枚重型炮弹击中，其中有一枚将一个油槽打穿，大量的油不断流失，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国司令官继续向西南方向驶去，舰后留下一条显著的油迹。

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如果“俾斯麦”号当初对于自己取得的轰动遐迹的胜利战果感到满足的话，那才真是明智的。它在几分钟之内就摧毁了皇家海军中最优秀的舰只之一，可以带着大功返回德国了。它的声威和潜在的攻击力量，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它的司令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了违反常规的“一拼到底”的决定。

5月24日一整天，英国几艘巡洋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按照丘吉尔的命令，继续尾随着“俾斯麦”号和它的僚舰。为了围歼“俾斯麦”号，海军部命令远在东南方500英里的“罗德尼”号抄近行驶。“拉米伊”号奉命离开那支回国的运输船队，开到敌舰的西侧。从哈利法克斯驶出的“复仇”号也奉命赶往现场。巡洋舰摆下阵势，防备敌舰向北向东逃逸。这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则从直布罗陀向北兼程行进。虽然海上一切变幻无常，但网是越收越紧了。

当晚6点40分前后，“俾斯麦”号突然转身同追击它的舰只交锋，因此，发生了一次时间不长的激战。现已了解，这一行动是为了掩护“欧根亲王”号逃逸。晚上10时，在4艘巡洋舰的掩护下，“胜利”号派出了它的9架“旗鱼”式鱼雷飞机。这些飞机要在雨和低云层中迎着强烈的逆风飞行120英里。飞机由海军少校埃斯蒙德率领，在“诺福克”号的无线电的导航下，于两小时后发现了“俾斯麦”号。飞机当即冒着猛烈的炮火英勇地进行袭击。它们的一个鱼雷击中敌舰舰桥的下方。在“胜利”号舰上，英军正在为飞机怎样

回到舰上的问题发愁。这时海上已是一片漆黑，风势猛烈，阵雨使人睁不开眼睛，而且这些驾驶员就是白天在甲板上降落也不熟练。另外，唯一可以引导他们安全返航的降落指示灯已经失灵。因此，他们顾不得身边有没有德国潜艇，便把探照灯和信号灯全都打开，来帮助这些驾驶员飞近。他们的卓越努力获得了成果，全体飞行人员在黑暗中安全地降落在甲板上，英军莫下感到欢欣和宽慰。

英国舰队为第二天早晨的决战再次作好了准备，但是，海军部的希望却再次落了空。5月25日晨3时许，“萨福克”号突然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行踪。它是向西了，还是急忙转身向北向东了？经过多方分析判断，英国海军司令部越来越相信“俾斯麦”号正驶往布雷斯特，但直到6点钟这个想法才肯定下来。海军部随即命令所有的舰只驶向更南的航线上。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失去“俾斯麦”号的踪迹而引起的混乱和拖延，已使该舰溜过警戒线。到晚上11时，它已驶入英国旗舰以东的海域。

到5月26日晨，散布在广大水域的英国舰只已经艰苦地航行了4天之久，燃料已成为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几艘追击舰已经不得不减低速度。显然，在这浩瀚无际的海洋中，他们的一切努力可能转眼成空。可是，上午10点钟，正当希望破灭的时候，“俾斯麦”号又被发现了。英海军部和空军海防总队，正派出从爱尔兰的厄恩湖附近起飞的“卡塔利娜”式远程轰炸机进行搜索。当时，其中一架飞机报告，那艘逃舰正向布雷斯特驶去，离该港约有700英里。“俾斯麦”号击伤了这架飞机，于是线又断了。但是不到一小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两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又发现了它。它仍然在“声威”号以西相当远的海域内，还没有进入德国空军队布雷斯特起飞的威力强大的空军掩护网以内。

然而，“声威”号一艘军舰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等待“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的到来，这两艘战舰仍然远远落在敌舰的后面。这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急忙派“谢斐尔德”号去逼近并尾随敌舰，一直死盯住不放。下午7时刚过，从“皇家方舟”号起飞的15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对“俾斯麦”号进行了果敢猛烈的袭击。到9点30分，它们完成了任务。有两只鱼雷肯定是命中了。据一架追踪的飞机报告，曾见到“俾斯麦”号整整转了两个圈子，看来它已经失去了控制。这时，维安海军上校的几艘驱逐舰正在逼近，它们在整个夜间包围着这艘受伤的军舰，一有机会就用鱼雷去袭击它。

“俾斯麦”号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德国司令官卢金斯海军上将丝毫不存在侥幸的想法。快到午夜时，他向希特勒报告说：“舰已不堪操纵。我们将战至最后一颗炮弹。元首万岁！”“俾斯麦”号离布雷斯特仍然有400英里，它甚至连这么远也行驶不了。

5月27日黎明时分，正刮着西北风。上午8点47分，“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向“俾斯麦”号展开了猛烈的炮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俾斯麦”号中部起了火，舰身急剧向左倾斜。这时“罗德尼”号驶过它的舰首，在最多不过4000米的距离外，向它射出密集的炮弹。到10点15分的时候，“俾斯麦”号舰上的炮声沉寂，舰桅已被打掉了。它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着，火花熊熊，烟雾冲天。但是，就在这时，它还未沉没。用鱼雷作最后一击的是巡洋舰“多塞特郡”号。那艘强大的战舰，在10点40分的时候才船底朝天沉没了。随同这艘战舰葬身海底的约有2000个德国人和他们的舰队司令卢金斯海军上将。

就在这天上午 11 点,丘吉尔首相正在教堂房子内向下院报告克里特岛战役和“俾斯麦”号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他说：“今天早晨,天亮后不久,实际上已不能动弹而又得不到援助的‘俾斯麦’号,受到英国追击的战列舰的攻击。我不知道炮击的结果怎样。但是,看来,‘俾斯麦’号还没有被炮火击沉,现在将用鱼雷迅速结束它。我想,这一行动正在进行中,而且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丧生‘胡德’号虽然是我们的莫大损失,但是‘俾斯麦’号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新的、威力最强的战列舰了。”丘吉尔刚刚坐下,就有人送来一张纸条,使他不得不再站起来发言。首相征得下院的同意后说：“我刚接到消息,‘俾斯麦’号已经沉没了。”全场顿时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俾斯麦”号的被击沉,是英国海军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虽然“德国海军的骄傲”被摧毁了,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取得海上的绝对优势,战局仍在艰难地发展着。且说英国人取得这一胜利后,随即对法国港口实施连续不断的空袭,企图炸毁停泊在那里的德国军舰。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瑟瑙”号以及从大西洋返航后同它们编在一起的“欧根亲王”号接连受创;德国空军随之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双方展开激烈空战,英国飞机损失 43 架。于是,“沙恩霍斯特”号、“格奈瑟瑙”号和“欧根亲王”号得以乘机逃出重围,回到了德国。

英国海军虽然没有取得围歼这三艘德舰的胜利,但他们却迫使德国军舰不可能再在法国港口停泊,消除了他们的大西洋交通线所受到的经常性威胁。此外,战列舰“格奈瑟瑙”号到达基尔不久,英国空军就使它遭到了重伤,以致它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再参加作战。随后,“欧根亲王”号也被击伤,它在进入特隆赫姆时,又遭到英国潜艇的鱼雷攻击,失去战斗力达 5 个月之久。欲知欧战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